



年

轻

的

眼

睛

黄

《黄土地》荣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

《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奖；《秦颂》则成为中国第一部4000万元大制作电影；还有

《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风月》……中国第五代导演以其不同凡响

的才情震惊了中国，也令世界影坛为之瞩目。他们是

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黄建新、周晓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第五代导演丛书

建新

主编的话 ——回望第五代

张振华 曾果伟

1984年前后崛起于东方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一种令世人困惑而又振奋的群体文化现象，早在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弹出第一个商业化音符后便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它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在中外影坛所激起的石破天惊的反响，却是巨大而久远的。

正是第五代的大胆探索，使中国电影首次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所有这些煌煌业绩，连同他们那体现于思想和艺术统一之中的个人风格都将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册。

所谓“第五代”是指以文革后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导演群体，无论在文化成因抑或创作特点上，他们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按照第五代翘楚人物陈凯歌的观点，举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菊豆》、《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流光溢彩、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经典之作，“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确实，他们都曾饱尝生活之艰辛，经受过文革凄风冷雨的洗礼；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作品亦烙印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他们步入艺术殿堂伊始，适逢“四人帮”粉碎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因而鄙薄传统、不满现状，敢于一反常规电影思维模式，抓住机遇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步的“离经叛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禀赋与艺术素质，又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电影先进语汇和其它美学思潮的滋养；因而对电影新形态感觉敏锐，注重引进，善于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段上标新立异……

没有宣言和纲领，却曾辉煌一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已分道扬镳，遵循着各自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认真回顾第五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下一项急需展开的工作。

我们编撰这套《第五代导演丛书》正是顺应历史需求迈出的一小步。

这套丛书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导演美学风格与文学原著的相融相汇，相映成趣。

资料表明，迄今为止80%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主要是小说），他们有些很注重从名家小说里发掘适宜于电影表现的题材，使原故事因附加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锦上添花（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有些则对刚开始流行，尚未声名大噪的小说情有独钟，以利于从容不迫地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如《黑炮事件》、《二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有些擅长于从散文叙事诗中吸取某些基本素材，藉此生发和张扬自己别出心裁的丰富想象力（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第五代的改编从来不拘泥于小说原著，而是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抛开小说，用触发他们的思想所唤起的形象，来进行始终循着电影轨迹的再创作。为了免涉“糟蹋名著”之嫌，他们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声誉卓著的文学名著，以便于对原著自由地进行新奇脱俗，甚至是肆无忌惮的“篡改”……辑入本丛书的若干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原著，是以反映这种明智的、开放的、多元的改编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黄土地》里似乎游离情节的婚宴、祈雨等具有独立象征涵义的精彩画面，令所有观众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时，人们大概决计不会将这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柯蓝平淡如水的散文《深谷回声》联系在一起；同样，张贤亮作品中并不出类拔萃的《浪漫的黑炮》，由于导演匠心独具地增设了阿里巴巴舞蹈、砖堆“多米诺骨牌”等场景而倍增艺术的张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效应；吴子牛的影片《大磨坊》纵不脱乔良《灵旗》成熟的故事框架，却充满了独特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电影思维；周晓文再度创作《二嫖》，则用其睿智的目光一下子挖出了徐宝琦原著未触及的又一层意象性含义；尤堪称道的是《红高粱》，张艺谋大胆砍削了如罗汉大叔和九儿“不大清白”等人物关系，偷梁换柱地把余占鳌由武装土匪司令改成轿把式、酒坊伙计，那精炼而洒脱的情节链里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情绪之炽热狂放、构思之奇巧割切，竟使作家莫言看完样片不但未因“歪曲原著”而愤港，反而对导演的才华表示了“由衷的叹服”和“妒羨”……

丛书每册篇末有专家新撰的评论，对上述艺术现象作了些分析。相信我们的读者结合鉴赏经验，捧书回味比较，一定能平添几分阅读的乐趣，而且还将获得许多有益的艺术启迪。

这套丛书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有赖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识见与胆略。曾果伟社长作为丛书的蓝图设计者，在冗繁的社务之余具体参与了每一分册的主编工作。丛书各位作者、编选者，赵荣女士及李果、杨鹏、李元、陈垦等诸君，均为这套丛书付梓花了很多心血，此外，一代宗师谢晋导演艺术观虽与第五代不尽相吻，却十分关注丛书出版，表现了老一辈导演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挚爱和大度。著名学者、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余秋雨教授也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视角提示了不少真知灼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历史在不断发展，电影正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人们的想象难于揣测、无法描述的世界。对于每个有美学追求的艺术家的说来，一味拘于某种不变的样式，不跳出“某某代”或“某某派”的怪圈，就很难创造出没有任何时代藻饰与偏见的恒久作品来——我们想说，这才是艺术的真谛。

黄建新

年轻的眼睛

柴效锋

1954年元月，黄建新在西安南院门芦进士四巷，一个普通的院落里，向这个世界呼出了他来至人间的第一声啼哭。建新祖籍河北，他的父母都是官位并不显赫的干部，家庭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父母的惜爱中，建新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不像许多伟人那样，幼小的心灵里就充满了梦一般的幻想和憧憬。现在回想起来，他只记得那时候的他，常挑着纸糊的风轮，满街疯跑；或是跟几个小伙伴，在建筑工地竖砖头，尔后看着那长龙般的砖头阵流水一般倒下。

到了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开始带他去看电影。然而，当时的建新并未显露出与电影的缘份。相反，每当银幕上出现了激烈的战争场面，或者神秘可怖的特务作案镜头，他使用小手捂住眼睛，不敢看，有时甚至被吓得一个劲地嚎陶，惹得邻座的观众，不住地拿不耐烦的眼神往他身上瞅。

建新是父母的头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弟弟，只比他小一岁多，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有一次妈妈带兄弟俩乘公共汽车，车上一位老头仔细端详了他俩的面相，断言：这俩孩子将来必定是一文一武。那文的，自然是建新了。

1961年，建新七岁的时候，背着书包走进了西安五六巷小学。上学后，他果然斯文，自觉遵守纪律，从不惹事生非，而弟弟却贪玩淘气，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为此，他心里还挺难受，感到他这个当哥哥的脸上无光。

建新学习认真，作业从来都是整整齐齐，按时完成。他肯钻研，决不甘心落后于别人，成绩基本上都是五分还带个好字。他写的毛笔字还参加了展览。老师专门写了表扬信寄给他父母。

在学校参加劳动，建新很能吃苦耐劳。他是三好学生，处处带头，可以说，从小到大，建新没让父母操过心。该做的事，他都能主动自觉地、认认真真地完成，不需要父母督促。

守纪律、爱学习的黄建新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埋头读书的书呆子，他的课余爱好很多，兴趣广泛，而且心灵手巧。家里的小板凳坏了，他自己琢磨着修好了它。后来又照着做了一个，做得方方正正，平整光滑，像是专业木匠的水平，他的父母至今仍在使用着这个小板凳。铝锅底漏了，建新先跑到街上看人家怎么修，回来后便自己给铝锅换了底。有一次，建新向父母提出要买无线电零件装配收音机，父母不相信他能自己装，以为他是想听收音机了，便为他买了一台。没想到他不要，坚持要买零件自己装。结果他果然装配成功了。

建新喜欢吹笛子，画画。有一天，他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边，便走过去仔细观察了一番。回到家后画了个马，父母一看，画得挺像。后来他经常给学校画报头，因为家里房子小，没桌子，他就将纸铺在床上画。

幼年的黄建新，并未得到父母望子成龙式的刻意培养，他们所给予建新的，只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气氛。他们从不强迫或干涉儿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让他将来成什么才，做什么家，而对建新自己的广泛兴趣和爱好，他们都尽可能去支持他、帮助他。

建新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很俭朴，他自己也懂得节约，当时虽然父母都有工作，但要负担爷爷奶奶还有姥姥共七口人，经济上也不宽裕，所以懂事的建新从不提出过分要求，给父母增加负担。

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爬华山，由于建新的裤子早就破得补丁叠补丁，

一用力攀登，裤管便从大腿处绷断了。建新随便把破烂的裤子边缘挽了挽，又继续登山。回家后，建新并没有埋怨父母不给他做新裤子，倒是母亲看着破裤子，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革命”的狂飙，漫卷了整个中国大地。黄建新幼小的心灵，第一次遭受到挤压。与千千万万个儿童一样，他背着书包回家了。

那时候，他小学还没有毕业。

就在这以后不久，父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他和弟弟与姥姥一起生活。由于缺钱少粮，姥姥每天做好饭后，都是让建新兄弟俩吃饭，自己只喝几口稀的，或干脆不吃饭就上床躺卧，以减少消耗，保存体力。

看到此情此景，建新拉着弟弟出了家门，他找到一根绳子，绳端系了个挂钩，来到城北公路的一个大坡下。遇有负载过重的架子车，人力车夫拉不上去，他便将挂钩挂在车上，给人家拉“边套”。每次拉上坡，车夫就给他五分钱。

有一次，建新帮一位车夫把架子车拉上坡后，车夫一边停下来歇息，一边和建新聊了起来。他问建新这么小，父母怎让他出来干这个。建新向车夫讲述了实情，车夫善心大发，掏出两块钱给了建新。

对于建新来说，这两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它能买三、四斤鸡蛋或点心，这些都是当时上等的营养品。建新兴奋极了，他立即买了鸡蛋和点心，自己没舍得吃，只给弟弟吃了一些，剩下的便拿回家孝敬姥姥。姥姥看到鸡蛋和点心，询问钱从哪儿来的。建新低着头不吭声，他害怕姥姥知道他在外面干活后会伤心。姥姥却以为他的钱是偷来的。打了他一个耳光。一旁的弟弟给姥姥说出了真情。姥姥哭了。

姥姥的成份高，按当时的政治划分，属于剥削阶级营垒，在学校接受了“革命”教育的建新，本来把姥姥视为异己，他认为自己和弟弟年龄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得已才依靠姥姥的照顾，等长大了，还是要与姥姥分道扬镳，自己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然而，从姥姥对自己和弟弟无私的关怀中，从姥姥那一记耳光和纵横的老泪里，建新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姥姥那颗善良而又正直的心。从此，他对那些荒谬的政治理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学会了在实践中去认识人、理解人、对待人。

多年以后，姥姥生病住院，建新整夜在病床前陪护，端水喂饭倒尿盆擦屁股，样样做得体贴周到。同病房的病人羡慕不已，直说姥姥好福气，有个好外孙。

1970年，16岁的黄建新参军入伍了。他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西安古城，来到河西走廊的甘肃武威，在空军飞机场里做地勤。这里远离都市，座落在荒原沙漠之中，像一个孤岛。

正是在此时此地，黄建新开始了对电影艺术的迷恋和学习。

在那个艺术极端枯竭的年月里，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孤岛上，黄建新和他的战友们难得有别的娱乐活动，看电影成了他们最大的艺术享受。然而，当时所能看到的影片，除了《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是《第二个春天》、《火红的年代》。他把这些影片看了又看，看得几乎能把台词背诵下来。他对这些影片的编导、演员充满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倾慕——是他们挑起了他对电影的热情，点燃了他理想的火花，使他苦苦地迷恋上了电影。

有一次，部队放映《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内部参考片”，

可只有干部享有看片的特权，战士不让看。他偷偷从暖气管道钻过，躲在银幕背后观看。由于距离银幕太近，直看得他眼花缭胀，可他的眼睛依然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

对电影的迷恋，驱使他从理论上寻找答案。碰巧，部队里的图书馆还有点电影书籍，他看的第一本书是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他像一块干枯许久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水份。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电影的无穷奥妙，而这种奥妙又充满了神奇的魔力，使他陷进去益发不能自拔，而他良好的理论素质，也从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无论黄建新当时对电影多么迷恋，对他来说，都只能是一种业余爱好，他的本职工作是检修上天的飞机，这可不是一件可以闹着玩的工作。责任心极强的黄建新每每出色地完成检修任务，几乎没有出过错。到了复员的时候，部队领导曾极力挽留，许愿提拔他，然而，受到电影诱惑的黄建新去意已决。虽然当时他并不能保证自己将来会走上电影艺术之路。

在部队上黄建新依然生活十分俭朴。当兵走时父母给他钱，他坚决不要。后来父母经常写信问他在那里缺什么，他回信从来都是说一切很好，什么也不缺。部队每月发六块钱津贴，他把五块钱存银行，自己只花一块。有时前个月有什么事花超了，就向战友借几毛钱，然后在下个月抠回来，决不动用银行存款。复员回家时他用这笔存款给家人买了一大堆东西做礼品。

黄建新复员了，但六年的部队生活使他产生了与部队终生难以割舍的情缘。1989年，空军部队创作了一部名为《红翼》的电视剧本，特请黄建新执导。接到电话，黄建新依然像战士接到命令，欣然前往，成功地拍摄完成了这部电视剧。

四

1976年，黄建新带着前途未卜的忐忑不安回到了西安。碰巧，西安市卫生教育宣传馆招收摄影人员，他此前虽未拍过一张照片，但凭着极好的悟性，临阵磨枪，竟一考即中。

宣传馆虽与电影厂完全属于两个行当，但因为宣传的需要，馆里备有16毫米的摄影机，黄建新可以自由自在的扛起摄影机到处跑，拍摄有关卫生宣传的新闻片、科教片。他感觉这个工作与他的理想十分贴近，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他老老实实地向一位姓高的师傅学习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刻苦钻研电影语言的组接和结构。很快地，他便能独立工作，独挡一面了。当由他编导拍摄的《饮食卫生》一片被电视台选中播放时，他竟乐得一夜未眠。

1977年，黄建新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北大学新闻进修班学习。在这所中国西部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里，黄建新有了一个较好的学习条件，他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他非常喜欢冯尼戈、巴塞尔姆的小说，继而又酷爱川端康成等人的“新感觉派”作品，自然也没少看爱森斯坦等中外电影大师的电影理论著作。“黑色”的幽默，奇特的“感觉”，丰富了他对人生的感悟能力；中外电影大师的哲语箴言，提高了他对电影艺术的鉴赏水平。这时候，他早已坚定了信念，死心踏地地瞄准了电影之路，并开始为之奋斗。

当时，他们新闻班的班主任叫王忠全。王忠全比黄建新大不了几岁，是前几届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他也酷爱电影，刻苦钻研电影理论。两位同道的师生常在一起聊天，王忠全深为黄建新痴爱电影的精神所感动，也深信黄建新是块搞电影的好材料，决心帮助他实现夙愿。

1978年年底，就在黄建新即将结业之时，王忠全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

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他极力保荐、多方游说，爱才的编辑处处长赵云鹏答应了下來：“让我们考考他再说吧”。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赵云鹏和一位名叫韩俊峰的老编辑，两位“考官”极其认真地询问了他许多问题。没说的，他来了个对答如流，尔后，赵处长交给他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让他在三天之内写出详细的阅稿意见来。黄建新心里明白，要想闯进电影厂的大门，就得看这一锤子买卖了。那天晚上，他一宿没睡，洋洋洒洒地竟写下了八千余字的阅稿意见。第二天，赵处长看过了他写下的阅稿意见，黑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黄建新凭着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跨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门。

五

在大学里，黄建新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爱情，而且是电影结的缘份。

当时，黄建新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宣传委员雷秦是来自《陕西日报》的一名校对员，她与黄建新同岁，是班上的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朗诵、报幕，样样在行。不知为什么，每逢团支部开会，他俩总喜欢在一起聊，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那时候，黄建新的父亲黄同进出任了西安市电影公司的经理。每逢公司里有新片放映，黄建新都从“后门”给同学们弄票。雷秦也是一个地道的影迷，自然一次不落地和同学们随黄建新去看电影。共同的兴趣，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起初，黄建新尽可能多地给同学们弄票，大家一起去看。后来，一遇放映爱情影片，他便只悄悄地塞给雷秦一张票，黄建新当然不是不愿给同学们帮忙，他只是想和雷秦单独在一起。

开始，雷秦并不觉着有别的什么，只感到这个小伙子脑瓜子好使，知识渊博，口才流利，挺有意思的。日子一长，她也慢慢地爱上了他。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他俩一块儿走出西大，在古城的街道上慢慢地走，扯着嗓子尽兴地唱。肚子里贮存的歌儿唱完了，便坐在路边的梧桐树下聊。他们时而走，时而坐；

时而唱，时而聊……这一夜，他们没有回家，没有打过吨，在古城的街头，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夜晚。

1979年，25岁的黄建新和雷秦结婚了，两年后，他们的宝贝儿子也降生了。他们为他取名黄雷，这是黄建新与雷秦两人姓的组合，象征他俩爱情的结晶。

可以说，黄建新爱情的到来简直是水到渠成，其后的婚姻也属顺理成章，完全没有琼瑶小说中的那些一波三折、要死要活的场面。

如今，黄雷已成了一名学习成绩优异的中学生，雷秦也早已改行做了电影剪辑师，成为黄建新的得力助手。这一家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而幸福的家庭据说都是相似的，我们就无需赘述了。

八

调入西影厂之后，黄建新被安排在编辑处外稿组工作，负责处理外来电影文学剧本投稿。在人才济济的创作楼里，初来乍到的黄建新还嫩得出水，他每天默默地、辛勤地工作着。

阅稿的同时，黄建新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明白，自己决不会甘心一辈子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于是，他熬过了几十个不眠之夜，

创作出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他为它取名《女侦察员》。当然，这部作品不免稚嫩、粗糙，甚至只能说是一篇习作，最后死在了襁褓之中，被他无情地撕毁了。但无论如何，《女侦察员》才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有一天，黄建新正在办公室看稿，导演艾水来了。当时，艾水正在筹拍根据鲁彦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第十个弹孔》，他先是与黄建新天上地下海聊了三个多小时，聊得十分投机，临走的时候，突然说，“小黄，到摄制组来，帮我做场记吧。”显然，艾水从聊天中发现了黄建新是颗导演苗子。黄建新先是一愣，尔后便满口答应了。就这样，他被临时借去做了场记，迈开了走上导演之路的第一步。

半年后，黄建新从摄制组回来了。人坐在办公室里，心儿却不再是先前那么安分了。从这次跟组拍片中，黄建新明确了在电影创作这盘棋中，他应该做主帅，即导演，而不是别的棋子。虽然他在卫生局宣传馆时学会了摄影，在编辑处一年多，也掌握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方法。当摄影、做编剧，都可以胜任，但只有成为一名导演，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他的电影梦。

黄建新郑重地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到导演室工作，赵云鹏怎舍得放走这个人才，经黄建新再三要求，他只好说：“厂里决定筹办一本电影文学杂志，但编辑处人员有限，你先参予办刊，等刊物办起来，就放你走。”

1981年4月，黄建新参予筹办的西影厂刊《电影新时代》创刊号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赵处长没有食言，极其痛快地在黄建新的请调报告上写下了“同意”二字。

进入导演室后，从1981年到1983年，黄建新老老实实在地给当时的中青年导演金音、李育才、姚守岗、吴天明当学徒，先后在《特高课在行动》、《白桦林中的哨所》、《瓜熟蒂落》、《没有航标的河流》四部影片中担任场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作态度也受到各位导演好评。接着，老导演郭阳庭拍摄《六斤县长》，提拔他当上了副导演。《六斤县长》拍完后，郭导演逢人便说：“小黄是个人才，不信，几年后看。”

1983年，黄建新被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进修。在这所电影艺术家的摇篮里，黄建新刻苦钻研电影美学理论，跟着老师学习电影导演艺术，还大量观摩并研究了世界各国各个年代的优秀影片。这一切，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铺好了最后一块基石。

临近毕业的时候，黄建新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兵车行》，这个剧本是根据新疆部队作家唐栋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表现守卫西部边疆的解放军战士的艰苦生活和感人情怀。对于曾在西部当过兵的黄建新来说，拍摄这样一个影片，他既有生活、又有激情。然而，学院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让他导演这个耗资太大的影片。没办法，他和张欣合作，拍摄了一部花钱很少的35mm电影短片《小雨中的回忆》，作为他们的毕业实习作业。《小雨中的回忆》在国际交流中，得到了不少行家的好评。

《兵车行》虽然未能投拍，但许多圈内人士看了，都很喜欢。《电影新时代》杂志将它刊发在1984年第6期，配发的编者按做了这样的评价：剧本以篇幅短小，情感真实，风格纯朴和银幕感强见长，令人读之为快。我们希望更多地读到和介绍这样的剧本。

《兵车行》和《小雨中的回忆》的成功，充分证明了黄建新的导演才能，为他取得独立导片的资格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黄建新，就像一只羽丰翅硬的雄鹰，可以独上高天，搏击长空。

七

1985年初，黄建新回到了西安。他回来得正是时候，恰逢西影厂提拔新人之际，厂长吴天明对他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他成为当时西影厂一名最为年轻的具有独立导片资格的导演。这一年他才31岁，刚过而立之年。

这时候，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正纷纷在偏僻落后地区架起他们的摄影机，向世人展示年代久远的中国故事。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以及后来张艺谋的《红高粱》，一部接一部获得了成功。然而，精明的黄建新并没有被同仁的成功所迷惑，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和擅长，选择了当代中国城市题材的《黑炮事件》作为自己给广大观众的第一份见面礼。

剧本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的，虽然听起来很荒诞，可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1983年秋，宁夏银川市一位工程师去西安出差，住在人民大夏304房。此人好下棋，不慎将一枚棋子黑炮遗失在房间内。他回到银川发现后，随即给同房间的棋友打了一封电报，言：“黑炮丢失，304查找。”被文革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服务员接到电报，怀疑是特务联络的暗号，将此电报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闹了好几个月，才真相大白。张贤亮听说这件貌似荒诞的事情后，从中感受到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一星期后，他便写出了小说，并加进了德国专家汉斯这个人物。

黄建新读罢小说，他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从故事表层看，这是一个揭露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主题，或者是呼吁尊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题，但从更深一层看，导致“黑炮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惯性，虽然我们的时代进入了历史新时期，但旧的文化心理像一张无形的网，使每个人仍按惯性在旧的轨道上运动。他说：“揭示我们民族落后的文化心理积淀与现代化物质进程之间的矛盾，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心理进行反省与更新的自觉意识，是我们拍摄这部影片的立意。”

是年八月，黄建新带着平均年龄28岁的摄制组离开了西安，来到沿海城市大连。组里有人对大老远地跑到渤海湾表示不解，黄建新说：这样可以使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缺陷与大工业的现代化背景形成一种鲜明的横向对照，赋予影片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文化感。如果将一种落后的意识与一个落后的环境做同类对比，能丰富电影的视觉造型表现力吗？

片子拍到半截的时候，厂长吴天明亲临大连视察，当时黄建新正带着人马在拍“开会”一场戏。吴天明一看，不由得愣住了：一个搭成的非正常结构的会议室，长12米，宽4米，狭窄的一条。全白的色彩，白墙、白桌布、白椅套、白壁灯、人穿的是白衣服，茶杯里是白开水……，墙上还挂了个巨型石英钟，黄建新看看吴天明的脸色，心里打鼓了：“厂长，你看这行吗？”说实话，若是让吴天明来拍这部片子，也许他有更好的招数，但他决不会这么拍。可吴天明毕竟是个开明的领导，他没有武断地行事，而是仔细地询问了黄建新的艺术构思，最后说：“你是有想法的，就照你的弄，大胆地拍。”

《黑炮事件》拍摄完成了，在西影试映时，观众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极受震撼。多数人拍手叫好，向黄建新表示祝贺，也有人看得眼睛都直了：难道电影也能这么拍？

黄建中在他《年轻的眼睛》为题的发言中说：从《黑炮事件》中，从黄建新、陈凯歌、田壮壮这一代人身上，我得到了启发，他们不因循守旧，他

们不受习惯势力约束，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眼睛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这表明青年导演对生活态度的严肃性及对电影艺术的自觉性。黄建新在《黑炮事件》中，就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种电影思维。

《黑炮事件》荣获了政府奖和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美工提名奖。后来，又相继荣获了新时期十年导演处女作奖（上海），新时期十年最佳导演提名奖（广电部），香港国际电影节十大华语片奖，香港《十处电影信息》评选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专家的权威评价是：《黑炮事件》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电影表现形式的超越两方面都走在了当年国产影片的最前列，它所塑造的“赵书信性格”将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永远留存在电影艺术的画廊之中。

《黑炮事件》的一炮打响，使黄建新在中国电影艺术格局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使他在第五代导演同仁中独领风骚，独树一帜。从此，城市现实题材影片成了他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独特领域。

八

1986年8月，黄建新赴京领奖。会罢，与郑洞天、陈建功等人聚在一间极小的斗室里聊天。先谈《黑炮事件》的荒诞，后来话题就扯得远了。

陈建功说不久前他看了一篇小说，倒是蛮有意思的：一家三代人窝在一间斗室里。小伙子很苦恼，去公园闲逛，无意中得来几句口诀，回来教会全家的人。于是，奇迹出现了——一家人全变得糖人一般大小。他们拆下一张桌子，建起了一座人造的天堂，里面搭满了亭台楼阁。

一屋子人全笑了。郑洞天说：“如此说来，我倒也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科研工作者当了官，结果陷进文山会海，他想得到解脱，于是，就造出了一个机器人替身，专门代他应付各种会议。”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黄建新腾地一下站起身：“你们在座的有谁拍这个题材没？你们不拍我可就拍了哇。”

回到西安，黄建新找到厂文学部的编辑张敏，两个人在办公室侃了两天，然后，张敏用两天时间拿出了剧本初稿，黄建新又用两天时间写完了二稿。他们为这个剧本取名为《错位》。

因为《黑炮事件》的成功，吴天明对黄建新是一百个放心，为他开了一路的绿灯。《错位》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拍摄了。摄制组仍然是《黑炮事件》的原班人马，一帮哥儿们干活很是卖力，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夜点常常是两块肉夹馍。后来，干脆从大雁塔找了一个卖馄饨的个体户，让他每天晚上将三轮车推到摄影棚来做生意。

《错位》是《黑炮事件》的姊妹片，男主角赵书信自然也仍由因主演《黑炮事件》而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的刘子枫担任。片子拍完了。试映时，评论界又是一片哗然。有的困惑，有的惊讶，有人叫好，也有人批评。一时褒贬不一，争论不休。不过，与《黑炮事件》相比较，《黑炮事件》是称道者很多，批评者较少，而《错位》却倒过来了，说好者少，说差者众。有人说他杜撰了一个荒诞的机器人的故事，糊弄中国老百姓，纯粹是哗众取宠。

面对浇过来的这一盆冷水，黄建新显得极其冷静，也很自信。他认为，荒诞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荒诞，最终的目的是观照现实。他想通过这部影片来揭示人类某些行为对自身产生的消极制约，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同时，他也意识到，《错位》的题材距离中国普通老百姓关心的现实生活有些远了，反

映的问题也过于超前。

在中国过于超前的《错位》，在国外却得到了理解。1987年9月15日，中国电影展在京举行，两百多个各国来宾前来选片。那天六个放映室中，唯独第四室爆满——这里正在放映《错位》。许多人没有位子，无奈只好站着，或是席地而坐。

看完影片，法国著名影评家贝热龙先生对黄建新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未来主义电影，澳大利亚的电影发行商说：《错位》所表现出的幽默，一定会受到澳大利亚观众的欣赏。正因为《错位》在澳受到欢迎，黄建新后来被邀赴澳讲学。

九

《黑炮事件》成功之后，黄建新名声大震，为他推荐剧本者，邀他导片者纷至沓来。1986年初，叶大鹰把王朔小说《浮出海面》的校样拿给黄建新。黄建新初读之后，感觉特别轻松，人物活灵活现，很多情节和语言逗人发笑，但掩卷而思，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轻松不起来，当时，我国的个体户正方兴未艾，辞了铁饭碗的王朔正是从生存角度反映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批城市青年的困惑与奋争，还有沉沦。在这部带有强烈自传体色彩的小说里，融进了王朔真实的经历和真切的情感，黄建新感受颇深。如果说《黑炮事件》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影，展示政治对个人的制约的话，《浮出海面》则敏锐地抓住了刚刚萌生的经济意识对人的挤压，反映了一种个人心理的投影。黄建新认为这个题材能够负载他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决心拍出一部既悲观又乐观，在严峻现实中蕴藏着理想，让人哭笑不得的电影。

在厂领导的支持下，黄建新邀请王朔来到西安改写剧本，当时的王朔尚不怎么为人所知，当这位留着小平头的社会青年埋头在西影厂招待所写作时，既没人去采访他，更无人找他签名留念。他默默地在纸上勾画着未来电影《轮回》的蓝图，于1986年3月拿出了第一稿。

当时，西影厂的两部优秀影片《野山》和《黑炮事件》遇到了众所周知的政治挫折，厂里虽然觉得《轮回》是个好东西，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很难推上去，于是黄建新暂时放下它去拍《错位》。《错位》拍完之后，黄建新仍是舍不得《轮回》，又去找厂领导，厂领导没有表态。文学副厂长郑定于拿出鲍昌的小说《盲流》，说：“这是个好东西，咱俩一块儿改编，你导吧！”郑定于不但是厂领导，而且还是黄建新在西北大学上学时的老师。老师加领导的话，黄建新怎能回绝？他和郑定于共同商量，先后执笔，写出了《盲流》的电影文学剧本，并经厂务会议讨论通过，准予拍摄，然而，黄建新总觉得《盲流》不对他的戏路子，最终没有执导。这时，演员许还山正想改行做导演，而且他本人还有在新疆被流放10余年的生活体验，十分欣赏这个剧本，就再三向厂领导请命，要求执导《盲流》。就这样，《盲流》最后由许还山导演完成了。

在写作《盲流》的前后，德国电影制片人杜尼约克先生表示愿意筹资请黄建新导片。黄建新与他商量后，决定拍摄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生活经历的影片。黄建新约请作家郑义与他合作编剧，他俩专门去了德国一趟，感受颇深，很快写出了一部名为《留学生》的电影剧本。然而，《留学生》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投拍。

1987年9月，西影厂同意黄建新进行《轮回》的酝酿筹备工作。他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一起讨论剧本，深入生活，积极准备拍摄。然而，影片尚未

开拍时，他们突然接到厂里通知，因经济形势严峻，决定《轮回》暂时下马。后来，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飞应邀到西影厂讲课，看到了《轮回》剧本，认为挺不错，帮黄建新在厂领导面前说了好话。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1988年5月，《轮回》才正式开拍，由雷汉、谭小燕主演。

《轮回》开拍之时，王朔小说已经火起来了。这一年，共有四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影片开拍，除了《轮回》，还有米家山的《顽主》、夏钢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叶大鹰的《大喘气》，因而“1988年”被称为“王朔年”。在这四部影片中，《轮回》属于“纯情”型的，并且吻合王朔的个人经历，因而得到王朔的偏爱。从艺术角度看，《轮回》的艺术表现手法更加圆熟，表明黄建新的导演才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轮回》荣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提名奖。

十

1990年初，黄建新应悉尼电影电视高等学院的邀请，来到澳大利亚讲学。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回到家把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好了，并向父母交代冬天该注意什么，夏天该怎么办，有了事该找谁帮忙，一切都安排得仔仔细细、周周到到。他还给父母装了电话，说整天忙，顾不上写信，以后可以打电话。半年之后，他又把妻子雷秦接了过去，让没有出国机会的妻子也出国好好玩玩。

悉尼影视高等学院不是一所本科学校，它的学生一般是其他各个大学的毕业生中喜欢影视的学生。黄建新就站在这所学校的讲台上，为这些热爱影视的学生讲授关于中国新电影的课题，后来，他还轮回到澳洲各地讲学。

在讲学的同时，黄建新也在给自己“充电”。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许多电影研究资料，创作参考片十分丰富，学校给了黄建新一间房子，他可以随着影视系统，随便观摩学习。澳大利亚的电影市场基本上被美国影片所占领，这里电影院放映美国新片与美国国内在时间上是同步的。他发现，虽然澳大利亚有许多优秀电影人才，拍出了像《钢琴课》这样优秀的影片，但能够在市场上站住脚的太少了，偶然有一两部能够与美国电影相抗衡的澳大利亚影片，所反映的生活都与澳大利亚本国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密切，讲述的是澳大利亚人独特的思维经历。这一发现，对黄建新回国后拍摄“城市百态三部曲”影片影响极大。同时，黄建新也对电影的商业属性有了切肤的认识和体验。

在澳大利亚一年多的生活和工作中，黄建新深深地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鄙视。1987年他到德国创作《留学生》时，就曾有此类感受。他看到，我们的留学生尽管勤奋努力，学有所成，却打不进美国和西欧的白人圈子，永远比他们低一等。有一次，黄建新在柏林听柏林乐团卡拉扬的演出，趁中间15秒钟的换谱间歇，他小声问翻译是什么乐曲，旁边的一个德国人说话特别难听：“你们究竟懂不懂音乐，跑到这里来听！”而前排几位白人小伙子也在说话，他却不管。这次在悉尼，有天黄建新看到一位坐轮椅的澳洲残疾人上坡特别困难，便好心地上前推他上去，不料这位残疾人并未感谢他，相反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别人告诉他：你应该事先征求那位残疾人的意见，问人家需不需要你的帮助。否则，人家认为你是瞧不起他，不相信他自己有能力上去。

回国后，黄建新根据他在国外了解到的生活和亲身体验，创作了一部电

影剧本，剧本描写主人公叶子楷出国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心态变化，取名为《梦之旅》。黄建新说：人们永远追求梦、追求理想与虚无，追求的东西到手了，却发现还是梦。我想通过这个剧本表现出国者的困惑和希冀，表现西方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怎样看待本民族的问题。

澳大利亚之行，黄建新既对西方文化有了丰富的亲身体验，同时，以此为参照，他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虽然国外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但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事业高于一切。黄建新认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不能离开本土太长时间，太长了就会失去艺术生命的根。1991年7月，黄建新毅然携妻归国了。

十一

在黄建新出国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发生“戏剧性”巨变的一个时期。虽然他在澳大利亚呆了不到两年时间，回国后却骤然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

黄建新记得，出国前国内仅有极少数人开始辞职下海，而且大多搞的是小商小贩，北大有个教授卖馅饼，在国内还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上专门进行讨论，人们议论纷纷。回国后一看，不得了，满街挂的都是公司的牌子，碰到熟人，人家就告诉他，最近刚办了个公司，然后又问他，你啥时候也开个公司。过去朋友问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学习呀，进修呀，现在却只谈如何赚钱，黄建新感觉有点懵，他坐不住了。向厂里请了个假，北上北京，南下海南，开始了一番全国漫游，深入生活。他说：“我需要到全国各地跑一跑，看一看，感受感受，琢磨琢磨。”

黄建新跑了一些地方，亲身体验到改革在普通老百姓心理上打下的烙印。从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微妙变化中，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动向——困惑、期待、追求，非对立变成对立，新的组合……等等。他还发现，各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出现了特别大的分化，有了拥有几十万、几百万财产的先富起来的人，也有的一家子连小孩也养不起。而且往往是过去在学校里学习不好的人，现在日子过得比较好，在这时，文化对人成了一种桎梏。黄建新在思考：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动力，时代变化时有文化的人应该走在前列，但在这场改革中，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却反应得慢？为什么文化反而阻碍了人的变革？因而黄建新决定：“我要从文化角度去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就在黄建新考虑怎样通过电影把自己的感受和思索表达出来时，他读到了邓刚的小说《左邻右舍》，一下子觉得找到了一个表达的载体和媒介，《左邻右舍》通过三家邻居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日常生活事件，刻画了作家、干部、个体户三个阶层人物的典型心态，折射出了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变迁动向。立意深刻、构思巧妙、对话幽默、情趣盎然。黄建新立刻决定，就拍它了。

《左邻右舍》由冯巩、牛振华，达式常主演，在西安和青岛顺利拍摄完成，片名改为《站直啰 别趴下》。影片放映后，在全国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站直啰 别趴下”这个片名也成为中国老百姓中流行的一句口头格言。同时，影片也得到了政府的赞赏，被授予政府优秀影片奖。另外，影片还在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各种电影评奖中，共荣获了十四项奖。

《站直啰 别趴下》拍完后，黄建新感觉他对时代变革的感受和体验尚未全部表达出来，他还有许多话想说。这时，他产生了拍摄“城市百态三部曲”的想法，这样，可以从三个侧面把他想说的话完整地表达出来。于是，他于

1994 年和 1995 年相继拍摄了《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成功地谱写完成了他的“城市百态三部曲”。

《背靠背脸对脸》是根据刘醒龙的小说《秋风醉了》改编拍摄的，由牛振华主演。黄建新通过发生在一个小文化馆里的权力之争，表现了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普通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与他们生存的关系，影片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奖——金鸡奖最佳合拍片奖，同时，黄建新被授予了最佳导演奖，黄建新曾两度得到金鸡奖最佳导演的提名，这一次，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影片还获得了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日本福冈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加上其他各种奖项，共有 18 项之多。

“城市百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根据女作家叶广芩的小说《学车轶事》改编拍摄的，片名为《打左灯向右转》。写的是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一群人在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学习驾驶技术时所发生的一系列可笑可思、可悲可叹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部影片刚刚完成，尚未放映，但前景看好，黄建新个人也充满信心。

与黄建新前期拍摄的《黑炮事件》、《错位》、《轮回》相比，近期拍摄的“城市百态三部曲”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果说前期影片突出主要人物和故事性，近期作品则注重描摹普通百姓的众生相（即“百态”），再现其日常生活的典型细节；前期影片锋芒毕露，近期作品则质朴平易；前期影片风格化、象征性强，近期作品则生活化，写实性强，黄建新说这一变化与他的生活阅历、年龄增长有关，过去看问题比较激进，现在的心态平和多了。

十二

在拍摄《背靠背脸对脸》之前，1993 年，黄建新还拍摄了一部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五魁》。这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旧中国西部的一个故事，属于黄建新所不熟悉的题材，当时，他对小说感兴趣的是一个善良的脚夫如何变成了一个土匪。另外，他试图采用类型片的结构，全部偷换类型片的内容，看看这样做还能不能拍成一部影片。他觉得这样试一把、尝试一个新路子也很有意思。然而，在拍摄现场，他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儿灵感，缺乏一种创作的激情。可以说，拍摄《五魁》对他来说是一个制作过程，而不是一个创作过程。

“城市百态三部曲”完成之后，黄建新又在尝试一种新的拍片路子，他正在拍摄的影片是根据方方同名小说所改编的《埋伏》。黄建新邀请了冯巩、牛振华、江珊、郭冬临等演艺圈著名人士主演此片，力图将此片拍成一部既唯美又好看的文艺片，拍成一部精致的电影作品。

藏经阁

黑炮事件

浪漫的黑炮

张贤亮

一个真实的事件，一段荒诞的故事。《黑炮事件》根据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而成。10年前初执导筒的黄建新以该片震惊影坛，几乎囊括了当年度“金鸡奖”的所有奖项。专家们的评价是：该片所塑造的“赵书信性格。”将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永远留存在电影艺术的画廊之中。

有人以为写小说很困难，以为这种脑力劳动一定有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或是绝对地需要天才，需要灵气，需要超于常人的想象力。其实不然。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故事，几乎能俯拾即得。你看看，这条大马路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走着的芸芸众生，有的悠闲自在，有的兴致冲冲，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目不斜视地埋头赶路，有的成双成对地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蹒跚……还不说那些骑自行车的、坐在电车上的、站在公共汽车上的和靠在小轿车舒适的沙发上的许许多多人了。你只要盯住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你有一股钻劲，有一股韧性，有一副不刨到根、不盯到底决不罢休的执拗脾气，那末，你一定会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个甚至若干个有趣的故事。你把他的事和围绕他展开的事原原本本地照实记录下来，就是小说了。

困难的是，你要学会钻到这个人心里去的本领，就像孙悟空能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一样。铁扇公主心里的念头一动，孙悟空马上就能知道，不上她的当。当然，写小说的人和被描写的人之间不存在什么上当不上当的问题，但这个道理却有相同之处。一则是，没有心理描写，你的文章就不叫小说，而是新闻报道了；并且，写人物的行为却不写行为的动机，有时会使读者莫名其妙。你把人物那最隐秘的心理，那一霎间的闪念写出来，才会使你的小说较为生动，较有情趣。二则，你要是钻到他或她的肚皮里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隐藏的东西要比他或她外表表现出来的东西丰富得多，有趣得多。老实说，故事多半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不是从你眼睛能看到的表情行为上开始的。

比如说吧……好！我们就从那家电影院门口的青年男女中找出一对做例子。你看，那人群里穿着打扮得最时髦的一男一女，亲亲热热地，看样子还没有结婚。现在，他们出了电影院，女的主动地挽起男青年的胳膊，把全身重量的一半靠在他的身上，朝旁边的水果店走去。他们的面孔也像那水果店里的苹果，成熟的幸福全部洋溢到外表上来了。但是，且慢，如果我们钻到他们心里去，你就会发现：那女的痴痴呆呆地什么都没有想，只一个劲儿地沉浸在毫无逻辑的快感里；而那男的却一门心思地想着刚刚看的那部电影中的女演员。他心里说：“假使靠在我身上的不是她，而是她，那该多么好！”对他身边这位傻姑娘的亲昵，他已经感到有点不舒服了。

这还是看得见的一对。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到别处去。好，我们就在公共汽车里来找吧。幸好这趟车不挤，人人都有座位。你看，坐在左边位置上的那个男人，和坐在右边位置上的那个女人，年纪都有30多岁。他们隔着通道分开坐着，显然并不认识。女的打扮得很朴素大方，像个机关干部；面庞清秀，有一对颇能传情的大眼睛，但眉间有几丝不易觉察的细纹，看来她的婚姻遭遇过不幸。那男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教员或技术人员，外表斯斯文文，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们俩在汽车的摇来晃去中不时地相互瞥那么一眼，每

一瞥不超过一秒钟。好，让我们这时钻到他们心里去吧。原来，他们两人此刻都非常渴望认识对方；他们两人在不时地一瞥中，从外表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上，都发现了他是她、和她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人。他们之间有种种无形无影的生物电的磁场，有一种歌德称之为“亲和力”的东西，有一种心灵的感应，使他们彼此都觉得他们能非常和谐、非常亲密地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是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暗暗地企盼的仅仅是一件事——幸福的艳遇。”流亡巴黎的俄国作家、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伊凡·阿历克谢那维奇·蒲宁，就写过许多在路上、在餐馆里、在轮船上偶然相识，而演出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如《中暑》、《三个卢布》、《在巴黎》等等。上面那句话就摘自《在巴黎》这篇绝妙的小说。然而，这可怜的一对却没有能继续演下去，公共汽车在一个站上停下了，女的站起来，用一种很坚定的步子，绝没有一丝顾盼地走下汽车。其实她这种坚定正掩饰着内心深沉的惆怅与惋惜。正如蒲宁写的，“可结果呢，却空等了一场……”而他和她的面容，将长久地印在她和他的脑海里。

你看，这有趣没有趣？

好，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就说这辆从我们身边飞驰过去的“丰田”吧。那后面的沙发上坐的是一位省级干部，身躯微胖，四方脸盘，眉宇之间都显出一派“汉官威仪”。他要去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重新划分几个专署的行政区。如果我们钻到他心里去，你就会发现他这时的心思并不在那个什么会上，而是在想一个古老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过去有两个毗邻的县官，为了划分自己的管辖范围，约定好第二天早晨从自己的衙门开始，不坐轿，不骑马，徒步相对而行，他们在哪里碰到，哪里便是他们的县界。一个县官天没亮就爬起来跑，另一个县官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等他穿好衣裳急急忙忙出了衙门，正好在县城门口迎面碰上那个赶夜路的县官。于是，这个睡懒觉的县官的权力只能到他的城门口为止，城关以外的大片土地，众多百姓都由那个县官统治了。这位领导干部在想：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行政区域的划分倒不错，省得旷日持久地在会上争争吵吵。他虽然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却对那个会厌烦了。

我们再看另一辆小轿车，就是那辆黑色的“伏尔加”。坐在里面的是一位外贸部门的高级干部。他从这个城市一家最大的饭店出来。那家饭店是一般人有钱也不能问津的。他刚宴请完几位外商。吃的菜，喝的酒，席面的规格和服务的质量，我们用“高级”两个字来概括就行了。可是你要钻到他的肚皮里去，你就会知道，他表面上虽在剔牙，仿佛陶醉在酒足饭饱里，但心里想的既不是昨天签定的那项合同，又不是刚吃的那桌酒菜，却是他妈妈在他上中学时每个星期天给他烙的锅盔。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县城的中学没有食堂，住校的农村学生每星期要往学校带一包袱干粮，在六天当中顿顿就着白开水吃。他在想，要是时光能够倒转，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多么好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成了未卜先知的人了，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错误，抓住许多别人不能发现的时机，到他这个年纪，至少当上党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如你有兴趣，我们不妨实验一下。你就在这条大街上随便挑选一个人，不要挑我们刚刚看见的红男绿女，也不要选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因为实验必须用最一般的材料来进行，所以你最好挑一个最平常的、最普通的、

最不起眼的人来，让我们盯住他，试试看能不能随着他的行踪写出一篇有趣的小说。

以上是写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写这篇小说的缘由，可作为这篇小说的“序”或“引言”。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嗯，你挑的这个人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从相貌到衣着都毫无出奇之处。这个人有50多岁，面容清瘦，皮肤暗黄，身材瘦小，略为有点驼背，看来他是个从事案头工作的人。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人的神情有种萧索之气；他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一辈子也没有神采飞扬过。因为这种萧索之气会使人联想到腌制的酸菜，是在盐水里长期浸泡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到，他不是个多年来受着家室之累的人，就是从未被爱情滋润过的老光棍，两者必居其一——这就是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法。他似乎对这个城市，至少是对这条大街并不熟悉。你看，他下了电车以后起初东张西望，一时举棋不定，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停了一会儿，他才向东走去，拎着他那黑色的人造革皮包。那种皮包也是最普通不过的，里面既可以装馒头，又可以装书籍，物质和精神都能掺和在一起，碰到什么处理品之类也能往里面塞。现在，他走上人行道了，一面走，一面很注意地浏览沿街的铺面。这样，我们又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外地来出差的干部。如今出差办事开会的人非常多，因而他也不算是有什么特殊人物，我们不用换别人，仍然继续盯着他吧。

这当儿，他已经进到一家大邮电局里去了。来，让我们看看他在邮电局里干些什么。

邮电局里挤满了人，收寄包裹的、领取汇款的，打电报、打长途电话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长椅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等长途电话的顾客，衬着玻璃板的斜面桌趴满了写信的人。大厅里有股很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是由油墨、纸张、胶水、木器、人造革和人身上的香味与臭味混合起来的，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闻不到，所以倒带有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性。我们跟踪的这个人犹豫了一下，想退出去。但不知怎么，他还是停下了，四处张望一番，终于排进了打电报的队列。

前面有一个人不知和邮电局的姑娘为什么争吵起来。后面的人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微微冷笑，有的趁乱跑出队列，装着看热闹，却在前面夹了一个塞。但我们这位主人翁毫不为之所动，连眼皮都不眨，仍然像列兵一样规矩地排在他的位置上，抱着他鼓鼓翼囊的提包思忖着什么。我们完全能够确定，他是个性格拘谨的、不易冲动的、感情内向的人了。

他在想什么心思呢？这时，就需要我们钻到他肚皮里去了。

“……我是炮二平五，老钱是马八进七”，原来，他在想一局残棋，脑海里映有一幅非常清晰的棋局的图影。“这时候，我卒七进一。我先进这步卒而不出马，是为了后来使用七路马作准备。如果先走马二进三，老钱肯定是兵三进一，那么我的计划便不能实现了……”

他微张着血色不足的嘴唇，用一种冷漠的、略带沉郁的目光视而不见地望着前面。“像一进三吃他的兵是平稳的着法。”他继续想，“唉！如果我当时改成车八进五封锁河头，就能成为更剧烈的对攻局面了……”

队伍总算慢慢地向前移动起来。后面的人用一个什么硬东西在他腰眼上戳了一下，他才好像不情愿地往前挪了两步。“最糟糕的是我马三进四那步走错了，操之过急！”他已经想到战局的最后阶段了。“我本来应该走后炮

七平四，老钱不论怎么走我都会占优势：他如果帅六平五，我马三进四，他车四进一，我马四退二，他车四平八，我炮四平二……假如他不那么走，而是前车八进一，我就车八平二，他马七进八，我车二退五，他马八退六，我象一进三，还可以吃掉他一子。可是，我没这样……真所谓‘棋错一步，满盘皆输！’”

“嗯！”

后面的人又戳了他腰眼一下，他方才醒悟过来。眼前的棋局不见了，只看见那位刚和人争吵过的邮电局女营业员用愠怒的眼光瞪着他。

“哦……我买张电报纸。”

他慌忙掏出一分钱。那位姑娘板着面孔把一张电报纸劈面向他摔来，宛如郎平的猛扣。他本能地用两手护着脸，闪了两下才把电报纸接着。随后，他慢条斯理地在玻璃板的斜面桌上找到一个空档，挤了进去，拧开一支高级英雄金笔，写下这样几个工整的字：

L市东环路胜利宾馆四楼301号房间钱如泉丢失黑炮一枚请在室内寻找赵书信

请注意，这里的地名、人名我们全部都要改换。当然，我们盯着的这个人并不姓赵，收报人也不姓钱。因为我们在实录真人真事，免得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什么麻烦，这种防范措施还是必要的。人名我们按《百家姓》的顺序来起，地名用英文字母来代替。这是写小说常用的方法。

写完电报稿，他端详了一下，脸上忽然展开一丝调皮的微笑。这种微笑使他的神情蓦地开朗起来，带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俗话说“老小老小”，你从上了年纪的人身上经常能发现一闪即逝的幼稚，如秋日晴空突如其来的电光。那一瞬间的电光会使秋日的田野更显现出成熟季节的绚丽和即将进入寒冬的萧瑟。这时，我们在这位赵书信脸上看到的就是这般情景。人，是不可以貌相的；即使是像他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心里也有自己奇特的憧憬。幸亏人心里的幻想、理想、向往、希望，各种荒诞不经的、毫无道理的、愚蠢可笑的念头和圣洁的、崇高的、仁慈的、美好的情怀没有重量，不然，地球就会被形形色色的此类东西压得粉碎——人心里面装的东西要比人的肉体多若干亿倍！

这真是书呆子，不懂得如何生活的人，他写好电报稿，本来可以直接交给那女营业员的，但他却又去排了一次队。在队列中，当他意识到手中的提包的份量时，脸上突然出现了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表情。原来，他刚刚从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里买了一大摞书。他掏了掏上衣的四个口袋和裤子的两个口袋，连钢蹦儿在内还没有凑足一块钱。他是个谨慎的人，旅费都锁在宾馆的小柜子里，出门身上很少带钱。怎么办呢？这九角钱既要打电报，又要做回宾馆的车费……

“喂！”

这次是那姑娘用叱斥的口气招呼他。

“哦，哦……我再买一张电报纸。”

他又向柜台里递去一分钱。姑娘啪地一声把电报纸拍在水磨石台面上，同时用俗话说的“卫生球眼”翻了他一下。

他又从物质的现实飞到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中去了。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表情就不像平时那么呆板，那么拘谨，那么惶惊，脸上又浮起调皮的、甚至是略带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笑意。他重新拟了电报稿，按最经济、最简

明的原则，写了如下几个字：

L 市东环路胜利宾馆四楼钱如泉失黑炮 301 找

第三次排队也挨上了他。他带着极不好意思的表情递进电报稿，仿佛他省了几角钱而使姑娘减少了收入似的。姑娘在电报稿上用圆珠笔点了一遍，惊讶地抬起头来，以一种很特别的眼光审视了他一番，似乎脾气又要发作。他的脸更红了，在柜台前忸怩不安。但不知怎么，姑娘终于隐忍住了，冷冷地告诉他要多少钱。在姑娘埋头开发票的时候，他连连摆手，用深感抱歉的口吻说：“不用了，不用了。”他不像有些出差的人，连八分钱邮票也要开张单据回去报销。这份电报纯属私人通信，要什么发票呢？他付了电报费，就拎起他一包沉甸甸的书，挤出人群，推开弹簧门走上大街，很快地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以上是小说的第一章。写到第二章，我们就需要变换一下人物和场景。这就是所谓小说的章法。

现在我们来看这位邮电局的女营业员。这里又要声明，这位姑娘仅仅代表她“这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绝不代表全体可敬的邮务人员。鉴于经常会有“难道我们的什么什么是这样的吗”的文艺责难——不是文艺批评，这种声明是必要的。当然，她有她的真名实姓，但按《百家姓》的顺序她应该姓孙了，我们就叫她孙菊香吧。

孙菊香其实是个天真幼稚、模样俊俏的姑娘。她现在是坐在高高的水磨石柜台后面，如果她站起来走两圈，你会发现她的身段非常窈窕，自有天然袅娜的风韵。上中学时，她最高的理想是将来到文工团里去，她自信舞蹈、唱歌、表演都拿得下来，会成为一名全能演员。但中学毕业后，投考艺术院校和本市的歌舞团都没有被录取，在家闲呆了一年。后来顶替她妈妈进了邮电局。由于她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人也活泼可爱，不久就从装邮袋、搬邮包的工作调到前台来当营业员。不过她并不喜欢这种工作。不管是装邮袋、搬邮包还是收电稿、开发票，她都觉得烦闷枯燥。

在平时，她是个迷人的、妩媚的姑娘，不但注意梳妆打扮，也很懂得运用自己的一颦一笑博得同志们和邻居的喜欢，所以人人都说她是是个好姑娘。追求她的男青年不少，但她还想再等一两年才结婚。这样的年龄，正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可是，只要她一走进这间 C 市邮电局的营业大厅，坐在柜台后面这把人造革包的椅子上，就像被施了一种什么魔法似的，模样即刻变了：不只面若冰霜，并且态度生硬，和这间大厅里散发的那股特殊气味完全和谐地融为一体。今天上班，她本来就不痛快。百货大楼新到了一批外国进口卷发器：电吹风、电剪夹、电梳子等等全套才卖 41 块钱。盒子的装璜很漂亮，印着一个风骚的白种金发美女，柜台上写道：“进货不多，欲购从速！！！”光那三个大惊叹号就够刺激人的了。吃早饭时，她跟妈妈商量，要买一套。妈妈大吃一惊，说是从来没听过搞“毛毛”的玩意儿要卖几十块钱的！她妈妈在 50 年代初期参加工作时剪掉辫子，直到如今快 60 岁了还是土话说的“二道毛”，从来没有在头发的花样上翻新过，嘟哝说：“那又不是碧玉簪，又不是金钗，要好几十块钱？！”而她正嚼着油条的爸爸，一个土产杂货门市部的副主任忿忿地说：“现在，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会有那么多闲钱买那种玩意儿！”

提案在家庭会议上没有通过，倒惹了一肚子气。上班来，她又听旁边管长途电话的姑娘说，那种电气卷发器昨天就卖完了。可见现在有钱的人还是

不少。这更使她郁郁不乐，自怨自叹没能加入文工团。在演出单位，像这种化妆用品都是公家出钱买的。于是，她不自觉地就要在一件什么事情上发泄一下。憋着气办了几件平常的业务以后，一份这样的电报稿伸到她面前：

R市西大街市文联

众星散

她把电报稿朝水磨石台面上——摔：

“打电报，不能用隐语和雅语！”

“请问，这怎么是隐语和雅语呢？嗯？”柜台外面的人用嘲讽的语气质问她。

她抬起头。这是个30岁左右的白面书生，戴着一副式样新颖的宽边眼镜，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风衣里是隐条花呢的西服和雪白的衬衫领子。从他的上身，她可以想象到他下身穿的一定也是笔挺的裤子和三截头皮鞋。她暗自思忖没有找对发泄对象，语气和缓了一些：

“请你把意思写明白一些。”

“还要怎么明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白面书生仿佛对她比对打电报还感兴趣，风度庸洒地跟她貌似说理辩论，而实际上是自我介绍起来。他是R市文联的编辑，来本市参加什么“诗会”的。这个“诗会”很盛大，全国有名的诗人都荟萃一堂，言下之意他也是位名诗人，R市有些业余作者也想来见识见识，但今天“诗会”散了，他打电报回去报告那些著名诗人已各奔东西，意思是叫他们不要赶来。

“打电报不是和写诗一样，要用最简洁、最精炼的语言么？”诗人脸上挂着揶揄的微笑。“你难道要我写上‘著、名、诗、人、已、回、全、国、各、地、你、们、不、要、白、跑、一、趟、了’这么多字吗？要不，你替我拟个稿子吧！”诗人一面说，还一面诙谐地掰着手指头算字数。排在后面的人早就嫌她办事很慢，趁此发出了一片有倾向性的笑声。听到诗人要她代拟电报稿，又见她张目结舌的样子，笑得更欢了。

如果是在公园里，在电影院门口，诗人的风度和外貌她还是很欣赏的。但偏偏他们是在这间营业大厅里，偏偏她被施加了某种魔法，偏偏她今天非常不愉快，再加上诗人的话引起了人家对她的嘲笑，这样，诗人的卖弄不但没有使她动心，反叫她更加恼火。她像被狗惹怒了的小猫，虎虎地说：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重写一张！”她顺手扔出去一张电报纸，“再交一分钱！”

诗人对女性都有细腻的审美能力。他起初对她完全没有恶意，不过是想趁“诗会”的余兴逢场作戏地开个小玩笑。但她冷若冰霜的面孔和寒风般的口气，却一下子激怒了这位生性敏感而又自尊心很强的年轻诗人。诗人也出奇地固执起来，脸色陡然一变，涨得绯红。他把那张电报纸又摔进柜台，坚持要按自己拟的电报稿发报；他还拍着水磨石台面说，他写的诗寄到大刊物的编辑部，都不允许编辑改动一个字的！

毫无条理、东拉西扯地争吵了一会儿，总算在后面的人的催促劝解下平息了。当然是帮着诗人说话的多。孙菊香姑娘被奚落了一番，噙着眼泪收下了这份或者是“隐语”、或者是“雅语”的电报稿；诗人得胜，扬长而去。

我们这位赵书信同志正碰在孙菊香姑娘十分伤心、十分委屈、十分恼怒的时候去打那份叫别人看来莫明其妙的电报。

他第一次买电报纸时，孙菊香还没有顾上注意他，只一心想着要是我在

舞台上，哪怕随便唱支歌，随便朗诵一段台词，下面也得鼓掌，而坐在这个倒霉地方，即使我态度再好，也有人找碴生事……第二次，他又排着队来买电报纸。因为他个子瘦小，隔着柜台递那一分钱，胳膊要伸得老长，孙菊香一眼就瞄见他干枯得像公鸡趾的腕上戴着一块瑞士名牌的全自动双历金表。孙菊香是常逛百货公司的，知道这块表至少值十套电气卷发器的钱。这明晃晃的玩意儿和他的袖子、和他的胳膊完全不相称。又看见这个衣着寒酸的老家伙一副猥猥惹惹的、欲进还退的、目光张惶的神情以及放在柜台上的鼓鼓囊囊的提包，倒猛然想起她爸爸的庭训：“现在，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有那么多闲钱买这种玩意儿！”就开始怀疑了。到他第三次捏着电报稿，带着一脸惶惶不安的神色交给她的时候，她一看电文，岂止什么“隐语”“雅语”，简直是不折不扣的暗语黑话。她小时候听爸爸说，旧社会把鸦片不叫鸦片，叫“黑土”、“黑膏”：她妈妈有次生病，她爸爸就说过：“要是有点‘黑膏，就好了！”现在，走私贩子不是还把赃物叫做“黑货”么？孙菊香姑娘还最爱看电影，什么《407号谋杀案》、《R4之谜》、《39级台阶》等等她都看过。她有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男朋友，还带她去看了几部内部资料的录相片，演的是《117在东京》、《女皇陛下007》之类詹姆斯·邦德的特工故事。所以，凡是莫名其妙的数字都会使她联想到可怕的事情和某种特殊人物的代号。如果她没有和前面那位诗人发生过争执，她就会义正严词地呵斥这个家伙一顿，叫他重写或是干脆拒绝发这样的电文。可是，在一秒钟之内，她脑子突然机警起来，想起了那位诗人给她的教训，就按捺着报复的激情和为社会除害的冲动，不露声色地把这份电报稿收下来。而那老家伙连单据也不要，急急忙忙地溜出人群，更使她确信这份电报大有问题了。

到中午下班的时候，她把“失黑炮301找”交给了邮电局主管这方面事务的领导。

四

真糟糕！我们并没有准备写什么推理小说、惊险小说，不想搞无谓的噱头，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乎我们的意外，似乎有向侦破小说发展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得赶紧找到那位赵书信同志，弄清楚他发那封电报的意思，使我们的实录沿着生活的正常进程写下去，不要像拙劣的小说一样设置一个廉价的悬念。

当我们按照那份电报稿最下一栏的发报人地址找到本市一家招待所的时候，赵书信正在一间乙级房间里闭目养神。

窗外，初秋的阳光和煦明亮，蓝天中没有一丝云影，微风不时地轻拂起绿色的窗帘；大街上传来隐隐的喧闹声和蓝天下最远处朦胧的、乳白色的雾霭，都仿佛在召唤人们出去畅游。是的，这是一个旅游的好日子；而这个历史名城又是有许多好去处的，从秦朝到民国年间，都给她留下了供后人凭吊的遗迹。可是这位赵书信同志对游览毫无兴趣。他搞的是技术工作，单调刻板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常规。而那种生活也恰巧适合他的性格。他昨天到达C市，明天一早要转乘长途汽车到一个和他工作单位同类的大工厂去参加现场会议。他可以有半天时间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的，但他情愿躺在床上不动。那么他有什么心思呢？现在让我们钻到他肚皮里去。

原来，他肚皮里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字、方程式、机械图形、应用技术理论和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国外字。啊，且慢，这里好像有一点微弱的亮光，像萤火虫似的在心头一闪一闪的。当我们爬到那里去，我们会发现那

是一种友情的结晶体，虽然很微小，像芥子一般大，却使他这颗缺乏水份的心散射着蓝幽幽的光彩，怪不得他脸上有时会浮现出只有自己才能意会的微笑哩！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颗结晶体。

这颗结晶体是前两天才形成的。正因为他这颗心缺乏水份，和一块石头一样，所以这颗结晶体非常小，同时却又非常可贵。这是一个孤僻的老单身汉，身边没有亲人，工作单位里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历经政治运动越挨斗越胆大，有的人却看别人挨整也觉得害怕，他就属于后一种人，多年来是在自己作的茧中生活的。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就是喜欢下象棋。但是在工作单位，他也很少和人交手。有些小青年倒挺喜欢下象棋，可是他讨厌一摆上棋盘，旁边就围来一堆人指手划脚，比对弈的双方还积极。他更讨厌那些小青年的油腔滑调，什么“走哇！走哇！前面是蓝色的天空……”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啦啦啦——啦啦啦呀——啦——”身子同时像触着电似的颤抖，好像骑在马上一样。据说这一套是从一部日本电影和一段中国相声里学来的。他觉得这简直是对文明的娱乐的亵渎。他情愿闲时一个人埋头在棋盘上自己跟自己搏斗，也不愿参与那种集体活动。

这次，他从他所在的 S 市乘火车来 C 市出差，中途要在 L 市转车。在 L 市的那家胜利宾馆里，却碰上了一位难得的棋友。这个人就是收报人钱如泉。他们俩当时住在一间客房里。钱如泉五十多岁，比他年龄稍大一点，但长得面白体胖，很是富态，行动举止也显得年轻活泼。他自我介绍他是 C 市外贸公司的干部，在 L 市办点事还要去新疆。他出身贫寒，12 岁就被送到一家当铺当学徒。除了扫地倒茶递水送烟，凭着他机灵的脑袋，还学了点识别古玩玉器字画的知识。这位外贸干部显然是个见多识广，善于结交，带点江湖派习气的人物。那天是星期日，L 市又下着小雨，两个人闷在房里无处可去。钱如泉喝了二两大曲，中觉醒来以后，伸了个大懒腰，先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跟他闲谈，渐渐就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从秦砖汉瓦说到养花种草，从扬州八怪说到“四人帮”，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赵书信这个书呆子肚皮里除了 X、Y、Z 之外，社会常识其实贫乏得很，在这位几乎是无所不识、无所不晓的杂家面前，只有洗耳恭听、目瞪口呆的份儿。钱如泉这种老社会油子，是他那偏僻的 S 市很少见的，更是科技界里找不出的，在书呆子眼里，他无异于一部社会的百科全书，因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兴趣和亲切感。这种情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寂寞的旅途中经常容易闪现出来的。

吃完宾馆里淡而无味的晚餐，钱如泉冒着细雨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看来这还是一个绝不让自己口腹受委屈的人。他撕了一只鸡大腿给赵书信。赵书信慌忙摆手拒绝了。他那拘谨的、木讷的模样，这时倒又引起了钱如泉的兴趣。从学历上讲，赵书信是名牌大学 50 年代初期的毕业生，如今是工程师，但谈起天来这个人却又呆头呆脑地什么都不懂，连江青的丑闻和现在买布不要布票了都不知道。于是钱如泉诧异地问：

“那末，你闲下的时候干些啥呢？总不能一天到晚啃书本子吧？”

“……我有时候，也爱下个象棋。”他为自己的知识贫乏深感羞愧，期期艾艾地说。“哦？下棋？”钱如泉躺在床上，一拍大腿。“我也能下两下子！可惜这会儿没有棋子。”

“啊！我有，我有。”他突然兴奋了，脸上都泛出了血色。“我出差时随身带着象棋，呆着无聊，我就摆上棋盘研究研究说着，他拉开自己的旅行

包，拿出一副四边贴着胶布的象棋盒。“要是你有兴趣，我们不妨来两盘。”他带着恳求的笑容对钱如泉说。

“来两盘就来两盘。”

钱如泉在床上盘腿坐起来。他中觉睡足了，这会儿来了精神。他们把棋盘铺在两床中间的小柜上。钱如泉主动挑了黑子，说了声：“红先黑后，你先请！”

几招一过，赵书信就发现这位对手真是样样精通的“博士”，在棋术上也出手不凡，变化多端。他对付得很吃力，下到半夜12点，钱如泉胜局居多，而败给他的那两局，他看出来钱如泉也是为了保持他的面子，有意让给他的。一个人的棋风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为人和道德水平，他更对这位外贸干部有好感了。

“你说你‘研究研究’，”钱如泉咂咂嘴笑着说，“看得出来你老弟光会研究机器，还没研究过古谱《韬略玄机》和现代人谢侠逊编的《象棋谱大全》咧！这里面，学问大着哩！你看，就这一局来说……”他端开茶杯，把棋盘小心翼翼地转过来。棋盘上的残局，就是赵书信在电报局营业大厅里苦苦思忖的那种局面——自己已经明显地处于劣势。现在，由钱如泉走红子，来处理颓败的形势。

“你看，”钱如泉又拿掉几个红子，自信地说，“我就光下这几个子，你也难赢我。你别小看这老师的战斗力，其实它的潜力很大，尤其是在残局结尾的阶段，可以说是‘不出九宫，决胜千里’。嘿嘿！跟‘文化大革命’里一样……不信，咱们就走着瞧瞧……”

果然，赵书信换了占优势的一方，钱如泉还让了几个子，下到最后，还是一盘和棋。赵书信像见了爱因斯坦一样，对这位钱如泉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他也活跃起来。两人越说越投机，把一只烧鸡啃得精光。请注意，两个性格、学历、经历截然不同的人，结下的友谊有时会比同类人物之间的交往更亲密，赵书信对钱如泉是相见恨晚，他觉得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兄在他面前陡地揭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钱如泉也豪爽地说，可惜自己还要去新疆，不然就跟他一起回C市，好好招待招待他。

“我家里房子宽敞得很，还有一个小院；我老伴做得一手好饭食。”钱如泉感叹地说，“我年纪也不小了，这趟是最后一次出差；以后，我就呆在家里不出来，过两年，也该退休了。你说C市那个厂跟你们厂搞协作，今后你还断不了来C市。你来，别住招待所，就住我家里去。你不来，是看不起我！咱老哥儿俩好好聊聊，我带你到C市好好逛逛。我看得起你，别看你不会下棋，可老弟你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咱们国家的栋梁之材……”

天快亮了，两人交换了通讯地址，才朦朦胧胧地打了个瞌睡。清晨7点钟，赵书信匆匆地洗漱了一下，打点起提包去赶开往C市的火车。钱如泉非要把他送到车站不可，拦都拦不住。

“喏，你跟我客气啥？”钱如泉抢着拎起他一个小包，“我送了你，在车站吃点早点，正好去办公事。走吧，走吧！”

在月台上，两人终于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赵书信一辈子也没有和钱如泉这类人物交往过；同时，他觉得他在钱如泉面前那种呆头呆脑的模样，是决不会博得别人的尊敬的，但钱如泉却看得出来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咱们国家的栋梁之材！”那颗缺乏水分的心，被知音人的友情所滋润，在火车上，他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石头的心不动

情便罢，一动情就非同小可，不好收拾。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要向这位知音人表达自己的思念的激情。

恰好，到C市住进招待所，他收拾旅行包的时候，发现他的那副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这使他蓦地想起了他们科室里一位技术员有趣的轶事。

那位技术员是华南工学院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外号“小老广”，是个活泼坦率，爱好文学的青年。今年年初，他去广东探亲，和他的对象热乎了一阵子。回到单位，跟赵书信此时的心情一样，急切地向他的对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写信嫌慢，长途电话破费又太多，想来想去，他给在中学里教书的姑娘发去一份电报，仅仅两个字——“红豆”！既有情趣，又有不尽的言外之意。不久，未婚妻就来信了。“小老广”一点也不隐讳，兴高采烈地在科室里当众朗读了这封情书：

“亲爱的：‘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同样，恐怕比你还深沉，还痛苦。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南国女儿，我就是家乡的‘红豆’……”

情书还有些肉麻的话，听的人全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赵书信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窗前，被那些情意绵绵的话所感动。办公楼前的山沟里，野桃花含苞欲放，柳树和槐树已经绽开了新叶；潮湿的山坳中，丛丛野草也开始向四周铺展开来——万事万物都说明青春长在，并且会周而复始，但他的青春却永远不会再现了！他在大学时，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两人很要好，她在功课上多得他的帮助。然而毕业以后，她却嫁给了另一位男同学，一起去了贵州。使他最伤心的，还是她临走时跟一个女同学说，“赵书信是个好人，但是跟这种人只能交朋友，不能嫁给他。要是跟他结了婚，家庭生活肯定不会有什么乐趣！”那个女同学以老大姐的身份把这话告诉他，意思是劝他以后活泼些、开朗些、兴趣广泛些，却不料反成了他致命的一击。从此，他在女性面前更加自卑、更加腼腆、更加没有男子气概了。再加上他分配来大西北的一个矿山，男多女少，阴阳失调，尽管他后来每月有一百多元的高工资，也没有和他相匹配的知识妇女垂青于他。

是的，大自然的青春能周而复始，而他呢，正如他在大学里曾听过的一首歌中唱的：“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亲爱的”，这是多么动听的、令人心摇神荡的词！但不论在书信上，在耳边，都没有一个女性这样称呼过他。他那颗枯涩的心底泛起一种深切的悲哀，痛感到他这一生可说是白过了，没有一小时、一分钟值得他炫耀，值得他临死时留恋。他暗暗地羡慕年轻活泼的“小老广”。“小老广”享受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的幸福。而那种巧妙的、迅捷的、富有独特性和浪漫气息的表达思念的方式，也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这个被偶然建立起来的友情感动的书呆子，突然心血来潮，从“小老广”的“红豆”一下子联想到“黑炮”；同时，他的直觉也告诉他，钱如泉这个胖子是个海阔天空的人，如果他不主动去信，钱如泉一定想不起来给他写信的。于是，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就跑到大街上，先买了几本科技方面新出版的书，随后去邮电局打了那份电报。表面上是要钱如泉找找那颗棋子，或是给他寄来，或是保存着，待他下次来C市取，从此建立经常的联系，骨子里，却有种只可意会的罗曼谛克的情愫。

这个书呆子活了50多年没有浪漫过，这次浪漫了一下。可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份电报差点叫他扭了腰，后半生爬着走。

五

写到这一章，我们又要声明，我们不想写什么侦破小说，所以即使写到公安保卫部门，不过是事情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照实记录了而已。我们刚刚说他“扭了腰”，也绝不是公安保卫部门给他造成的。总之，这篇小说的主题，和公安保卫工作完全无关。

公安保卫部门忠于自己的职守，对下面报上来的案件，总要按法律程序调查调查。倘若确有必要继续追查，则要立案侦破，如果并没有异常情况，也就存档了事。现在，我们就照抄几份C市公安局要求协查的信函和复信吧。

L市公安局：

本市邮电局报上一份发往你市胜利宾馆四楼钱如泉收的电文，全文是“失黑炮301找”。发电人赵书信，此人原住本市××部招待所，今日清晨已离去。请你们协查收报人情况。

C市公安局×月×日

C市公安局：

收到你局×月×日要求协查信函一件。去胜利宾馆调查情况如下：从登记簿上得悉，收报人钱如泉是你省外贸公司干部，赵书信是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干部。两人于×月×日同住四楼301号房间。第二日赵即离去，钱于×月×日订购火车票去新疆。目前301号房间已住进别的旅客。据服务员证词，在他们离去时，301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遗失物品。

L市公安局×月×日

既然钱如泉就在本市，调查起来当然更方便了。第二天，C市公安局就收到省外贸公司人事部门报来的材料，全文如下：

钱如泉，男，58岁，本市人，家住本市平安巷42号。目前此人有妻子、三儿一女。除女儿尚在高中念书，其他家庭成员皆参加工作。该钱家庭成份城市贫民，个人出身学徒。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由私营企业店员转为国家工作人员。1959年任收购门市部副主任时，因下属盗窃还没有上交的宋代瓷器两件，以失职过错被撤去职务。1962年，因在收购时私自留下（即以公家名义收购，个人付款的方式取得私人所有权）翡翠扳指一枚，受严重警告处分。1965年又因私自留下清代扇面一幅受行政记过处分。1976年以当时所谓“散布政治谣言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1978年平反出狱，仍任我公司职员。1982年在香港商人走私古物一案（见82.145号案件卷宗）中有牵连。但因他是经别人介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案犯请去鉴定古物的，仅与案犯吃过一次饭，没有直接违法活动，故未给予处分。此人经常被民间的收藏者请去鉴定估价古文物，以此收受礼品。只因该钱熟悉业务，我公司从工作需要出发，尚未对其采取措施。目前此人被派往L市与新疆两地出差。这样，情况有点复杂化了。C市公安局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赵书信，就给S市公安局去了一封协查的信函。S市公安局转给了矿务局机械总厂人保科，责成他们调查答复。下面是两份函件：

S市公安局：

你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干部赵书信于×月×日来我市，住我市××部招待所。×月×日赵在我市邮电局发往L市一份电报，给我省外贸公司当时住L市的工作人员钱如泉。电报全文是“失黑炮301找”。现将L市公安局协查信件与钱如泉的材料的复印件寄给你们。请调查赵书信的情况。

C市公安局×月×日

C 市公安局：

你局×月×日要求协查的信函并材料两份收悉。赵书信情况如下：

男，52岁，南京人，未婚，家庭成分旧职员，本人出身学生，未参加任何党团。1954年毕业于××大学机械系，1955年分配来我局。现为我局机械总厂设计室工程师。此人历史清白，在历次运动中皆未犯过错误，无前科可查。家中有母亲、两兄一妹，均在原籍，没有其他社会关系。他确系×月×日被我厂派往中央××部在你省××矿机械厂召开的现场会。行前，他曾请假趁便去南京探亲，我厂考虑他多年未归，在此地又是单身，故准予30天的探亲假。现在假期未滿，此人尚在原籍。如归厂后发现异常情况，当即时函告。

S 市矿务局机械总厂×月×日

六

我们在C市大街随便盯上的这个人，竟把我们带到××矿、带到南京，最后带到S市这个偏远的山沟里来了，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他在××矿、在南京的言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不必记他，且看他回到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以后的事吧。如果不节外生枝，赵书信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以后慢慢传出来，至多变成一个笑话，像“小老广”的“红豆”一样供大家一乐罢了。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给C市公安局复函中所说的“如归厂后发现异常情况，当即时函告”等语，不过是支应差事的套话，对赵书信这样的书呆子，谁也不会再去注意他。可是，这时偏偏有这么一件事，来了这么一个人，于是，在赵书信还傻头傻脑地盼着C市钱如泉给他来信的同时，他的背后，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紧张活动，光厂党委会就开了三次。

S市矿务局从西德引进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的安装、调试、运转都由机械总厂负责。去年年底，西德专家来洽谈过一次，现在，机器运来了，专家也跟着来了。按合同，他要指导安装，待试车成功以后才算完成任务。去年西德专家来，是由赵书信陪同当翻译的。因为矿务局的技术人员懂得英语、日语的虽然很多，而懂得德语的却只有赵书信这么一个宝贝。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再让赵书信去跟外国人接触呢？

请注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我们的小说也不叫小说，叫报告文学了。而报告文学是最难写的，批评也不是，表扬也不是，总会遭到“违反真实”的指责。并且，我们如果把技术上的事写得太细，不熟悉这种专业的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枯燥。幸好小说不是写机器，而是写人的；机器、技术的描写我们就从略了。感谢相声演员马季给了我们灵感，他在1984年迎春晚会上表演推销“宇宙牌”香烟，说是有一种新产品叫WC。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西德运来的这套机器称作WC好了。

现在，WC机器来了，西德专家汉斯（这也不是他护照上的名字，而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最普遍的德国姓，就像俄国的伊凡，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也到了S市。还让不让赵书信去当翻译，厂党委会上煞费脑筋。

“老赵这个人我很了解，”新上任的厂长、原厂副总工程师李任重思忖着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20多年。说这个人缩手缩脚，工作没有魄力，不主动，不能独当一面，我是信的。可是不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这两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就是为了C市公安局来的那封调查函件吗？我

看，那也并不能说明老赵有什么问题。咳！……”

说到这里，李任重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沉吟了。他瘦高个子，身材匀称，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如今已50开外，两鬓已经花白，自当了厂长以来，性格也比过去稳健得多了。并且，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反证，但此刻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来证明赵书信没有问题；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仅仅靠经验，靠直觉办事。于是他咳了一声后，沉默了下来。

冷场片刻，厂党委副书记周绍文轻轻地叹了口气，绕了一个圈子说：

“唉！现在，社会上要比过去复杂多了。我记得报上还登过这么一件事：南方哪个省的一个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香港的富商做小老婆。唉！真是……”

“真是”什么，他也没说出来，言外之意是，社会比过去复杂多了，人也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此人现在不会出问题。李任重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这个论据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便没有理睬他的话，接着说：

“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决定吧，汉斯先生在S市已经住了三天了，总不能再拖下去。我的意见还是让老赵去试试，万一有什么问题……”

“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这位新提拔上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又傻眼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只好焦躁地在皮椅上扭动了下。

“真要命！这种事又没法表决的。”厂党委书记吴克功拍了拍桌子。在我们看来，他长得却有点像钱如泉，面白体胖，是个心地宽厚的人。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一面笑一面叹息。“赵工这份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把它当回事吧，人家公安局部注意上了，那个钱如泉又是那么种人。把它当回事吧，赵工又是这么个老实头子……嘿嘿！……”

提到钱如泉，周绍文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用笔敲着记事本说：

“哦，去年汉斯临走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汉斯的确给我们出了些好主意，我们想表示谢意，送给他点什么。可是他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中国的一个小古董。这话也是赵工翻译的。后来，我们花了40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汉朝瓦盆送给他。他也不懂真假，高兴得眉开眼笑。买古董这事，我记得去年党委会的会议记录上有……”

周绍文向来是绕着圈子说话，但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总能使人听明白。果然，这种联想引起了党委成员们的注意，连李任重都警觉地皱了皱眉头：是不是这个书呆子真的受汉斯私下的委托，代买什么古董，这次趁出差的机会和C市的一个古董贩子挂上了钩，却卷进一件违法案件中去了呢？……

“嗯，这事倒是有的。”党委书记吴克功点点头，又搔搔花白的短发，带着无可奈何的、会意的笑容说，“嗯，这里面，嗯，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啊，有啥……哎，老郑，这个汉斯会不会说英文呢？要会说英文，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厂好几个工程师都会英文哩，哪怕由李厂长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他呢。”

吴克功不愧搞过长期的政治工作，搔了搔头就想出了这个李代桃僵的办法。

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专家的郑副厂长埋在靠墙的沙发里，用不满的口气回答：

“这事我早就问过他了。他会英文，可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

他向来不用英文说话。”

“啥？德累……”吴书记诧异地问，“那不是德国？那跟不说英文有啥关系？会英文，又不说英文。这，这里面……”

在这方面，吴书记可又糊涂了。郑副厂长懒得跟他解释，埋在沙发里喝茶。显然这位副厂长、党委委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取表决的话，他是会投赵书信的票的，但他却不愿在会上表态：管他的！书记厂长决定谁去当翻译谁就去吧！

“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空军炸了个一塌糊涂。”李任重见吴克功的窘态，看不过去，耐心地告诉吴书记。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斯才不在国外说英语。这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何止于一塌糊涂！当时汉斯面红耳赤地说，他的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李厂长说话了，郑副厂长才用激烈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别扭。可正因为关系别扭，才能从反面激出话来。

吴克功总算明白了，但又搔开了头。会议僵在这儿，和前两次一样，无法进行下去。

“哎！老郑，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的？”周绍文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他要引导别人往他的妙计里钻。

“德文。”郑副厂长眼睛都不看他，仅仅吐了两个字。

“那么，”周副书记面带微妙的笑容，“他说的是德文，你怎么懂得的呢？”

“我怎么懂的？我前天不就汇报过了么？我只好从省社会科学院借了个新分来的大学生！”郑副厂长的潜台词是：你别的事情记得倒挺清楚，前天的事你却记不得了！

“嘿嘿！”周绍文点点头，眼睛横扫过会议桌，朝大家一笑。意思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书信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

“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S市的招待所楞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40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

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呢，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

七

你在大街上我的这个最平常、最普通、最不起眼的赵书信，现在却引出个很不平常、很不普通、很引人注目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了。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复杂，人与人之间就有着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是你有功夫折腾，你很可能从那个卖烧鸡的个体户身上找到他是哪一个皇帝的皇亲国戚的线索。汉斯由郑副厂长和那位大学生陪同来到机械总厂，下了小轿车，吴书记、周副书记、李厂长把他迎进由会议室临时布置成的客厅。双方握手致礼，嘻嘻哈哈地寒暄了几句零七八碎的话，大学生也无法翻译。坐定之后，汉斯很高兴地叽哩咕噜说了一通，大学生在一旁凝神倾听，随即对大家说：“他说，他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来，算是和老朋友见面了。他对厂方对他的招待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他已经在北京游览过了，这次，你们又让他在S市休息了好几天，等于度了个假期。他认为S市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对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的成绩表示敬佩。他还说他想早点开始工作，最好是下午就工作。”

听了这番话，李任重松了口气。他不是因为汉斯感到满意松了口气，而是觉得这个大学生翻译得还算流利。

“哪里，哪里！”吴克功微笑着说，“汉斯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支援我们……我们理应招待的。要是汉斯先生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大学生别过脸去，向汉斯翻译了吴克功的话。汉斯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朝吴克功点了点头，意思是感谢他的好意，又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大学生听了，白晰的面皮上突然泛起红晕。按《百家姓》顺序，大学生应该姓冯了，我们就叫他冯良才吧。他中等身材，衣着入时，戴一副黑边眼镜，是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第一次跟着外国人当翻译，态度还不太自然。“他说，中国人是非常讲礼貌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他非常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他问你们厂有位姓赵的工程师，赵什么……按音译是赵、新、树，这位先生在哪里，他希望让他来当翻译。他说，他上次来，就是这位先生当翻译的。”

听了大学生的翻译，吴克功竟也像大学生一样，态度不太自然了。他干咳了一声，眼睛瞅着大学生说：

“嗯，是有这么一位赵——赵工程师，他叫赵书信。不过——不过，他现在不在这里，调到别的工厂去了。”

说完，他挨个儿地看看其他人，仿佛是征求意见：我这样答复对不对？其他人没有表态，在沙发上端坐着。

冯良才把吴克功的回答告诉汉斯。汉斯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说了几句话，冯良才翻译道：

“他说，他表示遗憾。他说，这位赵先生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很诚实的

人，他和他在那 10 几天中结下了友谊。他要求你们代他问赵先生好。”

“好的，好的，”吴克功连忙答应。“我们一定把他的的话带到。”

宾主又谈了一会儿，商定第二天开始工作。吴克功等人就送汉斯到招待所休息。招待所新布置了一套客房，和汉斯上次来又大不同了。服务员全是本厂职工模样长得比较秀气的子女，替客人沏上热腾腾的香片茶。汉斯环顾了房间的设备，连连用刚学来的中国话笑着说：

“顶好！顶好！谢谢！谢谢！……”

从招待所出来，吴克功也很高兴，说：

“嗯，我看这个大学生也不错，翻的话也挺快，都不打嗝的。”

郑副厂长低着头，没有搭话。李任重考虑明天的工作安排，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周绍文意味深长地说：

“嘿嘿！这个外国人为什么对赵工那么感兴趣？一来就夸他，还要叫你来当翻译呢？”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如雷贯耳，旁边走的三个人都掉过脸来盯着他。吴克功的一团高兴被冲到九霄云外，心头还罩上了一丝阴影，李任重肚子里暗自嘀咕：

“这个搞政工出身的人，果然有头脑，幸亏我昨天没有坚持……”

八

且不说这四个人心事重重地走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国人是怎样想的吧。写小说不但要钻到中国人心里去，还要钻到外国人心里去。

汉斯身材高大魁梧，如今已年过 50，开始发胖了；金黄色的头发淡了下去，变成了亚麻色；有皱折的皮肤红通通的，还很滋润，要不是罩着一层汗毛，就和煮熟了的胡萝卜一样。他的行动还带有年轻人的敏捷，这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效果。

这些天，他的确在 S 市呆腻了。这里没有夜总会，又没有体育馆，电视上演的节目他全听不懂。由郑副厂长和翻译陪同逛了两趟大街，他看出来连这两个中国人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消遣的了。但是他又不明白为什么还不让他开始工作，对中国人的慢节奏，他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又不便问，只好成天坐在特级套间里喝啤酒。啤酒是青岛出的，比德国啤酒和美国的罐装啤酒都好，这才把他暂时稳住。今天来到机械总厂，知道老朋友赵书信已调走了，他就想赶快干完活，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意思的地方，在公司给他限定的出差日期里，余下几天到中国南方去逛一趟。

他和赵书信怎么建立起的友谊呢？现在让我们顺着他的回忆追溯上去。

原来，他去年冬天被公司派到这个矿务局机械总厂洽谈业务，一下火车，就听到一口很纯正的德国话招呼他。对一个离家万里的人来说，这首先就使他感到十分亲切，消除了他在漫长的旅途中的寂寞感。而这位能说很纯正的德国话的人，又是一个瘦小的、文质彬彬的、脸上总带着一种很羞涩的笑容的中国人。赵书信的外貌在我们看来是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可是在外国人看来，这却是一副典型的东方人的形象。汉斯从小到大，在德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上，经常看到画着这种单眼皮、黄皮肤的人的插图。于是，他像见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把把赵书信搂进怀里，两人着实亲热了一番。

赵书信第一天来接他，穿的是自己的涤卡棉制服，外面穿了一件在 S 市的冬天离不开的军绿色老羊皮大衣。把汉斯接回厂里，在宴请汉斯的酒席上，

吴克功忽然发现我们的工程师和汉斯比较起来穿得大寒伧了，有失国体。宴会以后，就叫王副厂长去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买套西服来，把赵书信打扮打扮，以壮声威。王副厂长连茶也没有喝，赶紧坐小轿车进城。但是，西北的这座中等城市在当时还没有一家商店出售西服，挂的都是灰色、蓝色、黑色的棉中山装，还不如赵书信本人的衣服。幸好王副厂长的女儿是S市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她给爸爸想了个办法，去文工团向一个小个子演员借了一套演出服。王副厂长连夜赶回机械总厂，和吴书记一起来到赵书信的宿舍，硬要赵书信穿上。赵书信涨红了脸，扭扭捏捏地不肯穿，说：

“汉斯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他还佩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艰苦朴素哩。他说，要是外国的工程师处在我们这样的生活水平，是受不了的……再说，我从来没有穿过西服，我还是穿自己的衣服习惯……我，我的确不愿意这样做……”

“哎！”吴克功说：“他不在乎，我们可要在乎呀。赵工，你现在不是代表你自己，是代表我们国家跟外国人打交道。你看，我、老王，这不都换上料子服了吗？你当我愿意穿？这件衣服的领子做小了，也不知道是我胖了，”说着，他扭了扭脖子，“你看，箍得紧紧的，还不如我穿大棉袄舒服哩！可是，我们得识大体呀！习惯嘛，穿穿就习惯了。来吧，来吧，穿穿试试。”

赵书信从来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在领导面前。他勉强地穿上了演出服。吴书记和王副厂长像两个服装设计师一样，把他拨来拨去地看了看。

“嘿！好！”吴书记笑着拍了拍巴掌，“这你在外国人面前一站，才像那么个样子！”

“正合身！正合身！”王副厂长也笑着说。这一下午他总算没有白跑。

西服有了，还没有大衣，总不能里面穿这样讲究的西服，外面穿那件军绿色老羊皮大衣吧。吴克功苦苦地想了一会儿，突然高兴地说：

“有了，我老伴刚给我做了件二毛皮、礼服呢的大衣，我还没穿过。我这就叫司机去拿。”

大衣可不怎么合身。吴克功身材跟赵书信一般高，但要胖得多。吴书记和王副厂长想了想，只好对赵书信说：

“这么着：你要出门，就把大衣披上，进了房子就脱下来。屋子里嘛，反正有暖气，不冷的。”

第二天一早，赵书信就土洋结合，里面穿着西服，外面裹着吴书记的二毛皮大氅，顶着寒风来到汉斯的住处。招待所里暖气果真烧得很热，赵书信进了门就扒下了大衣，露出舞台上的演出服。汉斯刚刮完脸，从卫生间里出来，见了，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

“嗨！赵先生，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漂亮？是在这S市做的么？”

赵书信这个书呆子一辈子不会撒谎，并且心里对这种做法也有隐隐的反感，苦笑了一下，竟脱口说道：

“不是的。这衣服不是我的，是我们厂借来的。你一走，我还得还人家。”

汉斯听了哈哈大笑。但从这点，他更认为这是个诚实可信的中国人，具有东方人固有的美德，而且还有别人不易发现的幽默感。他亲热地拉着赵书信在沙发上坐下，喝着带来的速溶咖啡聊天。他问赵书信的德语是在哪里学的，赵书信告诉他那还是在大学里，他的教授是30年代留德的学生，曾得

过德国的博士学位。

“那末，你那位可敬的教授在德国上的哪所大学？”

“汉诺威大学。”

“啊！”汉斯兴奋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我也是汉诺威大学的。他是30年代毕业的；我是50年代毕业的。他是我的前辈了。想不到我在中国能够和我前辈的学生见面。赵先生，在中国，我们两人的关系应该算什么关系呢？”

赵书信想了想，在中国，这算不上有什么关系，连师兄弟关系也算不上。但他不愿意让汉斯失望，说：

“在中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同学关系。”

“对的！对的！是同学关系！”汉斯高兴得又和他握了握手。两个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赵书信在钱如泉面前显得呆头呆脑，社会常识很贫乏，但他毕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年知识分子，与汉斯比较起来，对中国的风俗人情、地理历史当然要知道的多得多了；他又能用很准确流利的德国话向汉斯作介绍，甚至能讲一些有趣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在汉斯眼里，他简直成了个知识非常渊博的学问家。

在工作中，汉斯还发现赵书信对本行业务也很精通，虽然对现代的科技发展不太了解，但基础知识比自己还要扎实。工作的最后阶段，汉斯终于推心置腹地向赵书信说了实话：

“赵先生，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买我们公司的WC机器。这种机器其实已经很落后了，在非洲都很难推销出去。你们应该买另一种机器——WCL334，那才是最先进的。你们买了WC，对你们采矿业的帮助并不大。”

“唉！”赵书信摇了摇头。“我一看图纸和说明，已经知道了。但是，买什么机器，不买什么机器，不是由我们技术人员决定的。”

“那由谁来决定呢？由那位姓吴的政府官员吗？”

“不是，”赵书信看了汉斯一眼，“他也决定不了，厂长也决定不了。那是由上面决定的。”

“上面？那你可以建议呀！”汉斯热情地说，“我把这信息透露给你，你去建议，不是更能取得你们政府官员对你的信任吗？”

赵书信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局里召开的一次会上提过了类似的意见。但是局里说，我没有到过外国去，怎么知道外国采矿机械发展的情况呢。又说，上面已经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照着办就行了。上面不重视我的意见，我，”他也学汉斯耸了耸肩膀，“没有办法。”

汉斯当然更“没有办法”，只得撇开不谈，叫他介绍他们家乡——长江以南的风景了。

九

以上一章，在小说技巧中叫做倒叙，或是倒插笔。下面，我们再接着第七章记录下去。

第二天，汉斯脱下西装，穿上厂里为他准备的工作服开始工作。WC机器已经由大卡车、起吊车运到矿场，头两天是拆箱搬运，大学生冯良才的翻译还能应付。到了安装阶段，冯良才当翻译就越来越感到吃力，而汉斯的火气也暴露出来了。也不知汉斯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当翻译的不是赵书信，他心里不痛快，抑或是他想早点于完赶快逛江南去，总之，只要冯良才稍不如他意，他就会火冒三丈。两个人经常闹点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小矛

盾。

一次，汉斯带两个工人仰卧在机器下面，叫站在旁边的冯良才拿个“Kugel”来。“Kugel”一词冯良才学过，是“子弹”的意思。他也奇怪站在机器下面的汉斯这时候要颗子弹干什么，但又怕问多了汉斯发火，就叫一个小工人去找子弹。这个小工人是学徒，刚刚进厂，什么也不懂，心想：“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吧”。工地上当然没有子弹，小工人就跑到民兵指挥部去。管武器弹药的人还要叫他去领导那里批张条子来。跑来跑去，等小工人拿着一颗步枪子弹跑回工地，汉斯早从机器下面爬出来了，一面用棉纱擦手，一面向冯良才大发脾气。

“Kugel！Kugel！”汉斯指着机器旁边一堆钢球，朝冯良才瞪着眼睛大喊，下面还叽哩咕噜了许多话，四周的工人也听不懂，反正觉着不是在表扬他。

当着许多工人，冯良才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红着脸跟汉斯顶起嘴来。两人指手划脚地叽哩咕噜了半天，汉斯才告诉他，“Kugel！”一词在德文里不但指子弹，也指金属制的球和轴承上的滚珠。

“你不行！”汉斯直摆手，“你不能当翻译！你比赵先生差远了。请你去跟你的领导人说，再把赵书信先生调回来。你们中国的企业不都是国营的吗？人员调动要比我们西方容易得多。去！请你去向政府官员说，就说这是我的要求。那位吴先生不是说过，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吗？”

吃完中饭，冯良才就气乎乎地跑到郑副厂长的家里。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从小娇惯到大，“文化大革命”中家庭也没有被冲击过，哪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毕业后，看着别的同学有的留校，有的分配到京津沪穗等人城市，偏偏把他这个学德文的分配到西北来，他本来就一肚子气，不愿在这里呆哩。

“郑副厂长，”冯良才板着面孔说，“那个汉斯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把姓赵的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

“怎么？”郑副厂长给他端来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向旁边的沙发上指，“你先坐下。你翻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慢慢说。”

“困难嘛——”冯良才脑子转了转：他还不能承认有什么困难。在学院里，他考试的成绩都不差，现在，一般的口语翻译也很流利，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于是他这样说：

“困难倒是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你知道，说外语的人应该和翻译合作、配合。要是两人合作、配合得不好，多好的翻译也不行！我看那个汉斯和那个姓赵的工程师一定能配合；大概赵工程师也摸到了汉斯说话的方式，有了经验。把赵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对工作也有利些。”

郑副厂长是个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他肚子里早就一清二楚，但冯良才自己不愿承认有困难，他也不便把问题捅破。

“那你就好好争取和汉斯合作、配合嘛。人家是外宾，是我们请来的，小冯，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哟！外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在工作上，人家是不讲什么交情的。有时候，你也会受点委屈。那没什么！年轻人嘛，磨练磨练对你也有好处。”

“我倒不怕受委屈，其实汉斯对我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他虽然气得要命，还是要掩盖他和汉斯的磨擦。领导如果知道汉斯对他不满，准认为是他的过错。“我只是觉得，要把赵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他们两人投脾气，工作会进展得顺利些。再说，这也是汉斯本人提出的要求。”停了停，他又

问，“赵工程师调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调他有什么困难？”

郑副厂长喝了口茶，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用感慨的语气说：

“唉！调他有什么困难，什么困难也没有。哼哼！赵工哪儿也没去，就在我们厂里，可是现在领导上还不能让他和汉斯接触。”

“啊！”冯良才一怔，诧异地问，“那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我也莫名其妙。”郑副厂长侧过身子，面向着他。“小冯，‘为什么’你也别问了。总之，我们是相信你的。”郑副厂长把重音放在“你”字上。“将来你就知道，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是最困难的。你还是继续去当翻译吧，有什么困难，努力克服。你别小看在我们这儿当10来天翻译，送走汉斯，你完了事，我们就以局的名义给你们社科院写个鉴定和感谢信。这个，对你将来的提级、评定职称，用处可大哩。你好好干，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冯良才不明白不让姓赵的工程师和汉斯接触的个中奥妙，但根据经验，他想这个中国人和那个外国人之间一定有什么勾当。要不，为什么汉斯非要姓赵的跟着他不可呢？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当临时的翻译对他的前途还是有好处的，只得按捺着性子，继续跟在汉斯后面。

一下午相安无事。第二天，在安装工作中，碰到了一个技术名词，冯良才又错译成别样的东西，工人给汉斯搬了来，汉斯看见，再次大发脾气。

“冯先生，你是不能搞技术翻译的！”汉斯不客气地手指着冯良才。“技术翻译和一般翻译是不同的。我请你去提的要求你提了吗？为什么还不把赵先生调来？”

冯良才不是个甘居人下之辈，又容易冲动，面对着汉斯，不卑不亢地说：

“我已经把你的要求转告了厂领导，但是他们没有答应。汉斯先生，据我所知，赵先生并没有调走，还在这个厂里。”意思是，你就凑合点吧，人家不让那个姓赵的跟你接触；你们俩搞的什么名堂，你应该自己肚子里有数！

“哦？”汉斯疑惑地瞪起蓝色的眼珠。“他还在这个厂里？他没有调走？那为什么不派他来跟我一起工作？走！请你带我去见你们厂的负责人，我当面去提出要求。”

冯良才没有料到汉斯有这一手。看着汉斯毫不心虚、理直气壮的神情，他不得不去了。但他不能带汉斯去找郑副厂长，因为赵书信没调走的秘密是这个厂长透露给他的，闹不好，会把他装进口袋里。于是他带汉斯去找李任重。

在厂长办公室，李任重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坐下之后，汉斯说了两句话，冯良才这样翻译道：

“李厂长，我听别人说，赵书信并没有调走，我希望你们能让他来跟我一起工作。”汉斯原话是“听这位先生说”，冯良才翻译成“听别人说”。

李任重却用英语直接问汉斯：“汉斯先生，是不是这位冯先生在翻译中有什么困难，使你不太满意。啊，你可以用德语回答我。”

汉斯瞥了冯良才一眼，耸了耸肩膀，说：“你问冯先生吧。”

这话是不用翻译的，从汉斯的表情上也能看得出来。冯良才见李任重的英语很好，又是位技术人员，就很坦率地说：

“李厂长，你是科技人员，又懂外文，你也知道，科技翻译和一般翻译不太相同，那里面有许多专用的术语；德语中一词多义的情况又很多。我不是搞你们这项专业的，我在大学里学德语时从来没有读过这种专业的教科书。调到我省社科院，只译了几篇德文的哲学和社会学资料。所以我本人

也觉得有一个专家来跟汉斯在一起工作比较好些。”

李任重抿了抿嘴唇，思忖了一会儿，对冯良才说：

“这个我早就知道，让中国专家随同外国专家工作，当然要比你当翻译合适得多。可是，赵书信同志手头还有很多事没完，不能马上把他抽出来。你就这样给汉斯解释，说一旦赵书信那边的事办完，即刻调来同他一起工作。小冯，这些日子，请你一定要仔细一些，在外国人面前要虚心，至少人家比你的德语要强得多，不清楚的地方，你多问人家两遍，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好不好？”

“我——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冯良才垂下眼睛，歪着脑袋说，“只是汉斯有这样的要求，提了几遍了，从一来就提出过，我怎么跟汉斯解释？一会儿说赵工调走了，一会儿又说没调走，只是有别的工作。李厂长，要是赵工有什么问题，不能让他跟外国人接近，就干脆告诉汉斯好了。这样也能使他断了那个念头，跟我配合得比较好些。”

“哎！你决不能跟汉斯那样说，”李任重急忙说道，“赵工什么问题也没有！并没有不让他跟外国人接近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跟外国人撒谎。赵工没调走就是没调走，他现在正忙于其它工作。小冯，你再干几天，如果技术翻译上有什么困难，你直接找我好了，我们一起研究。唉！我要不是当了这个厂长，成天忙着企业整顿，开会学习，我就和你一起跟他干，把这套WC 机器摸一摸。但是……你看，我一天到晚忙得看点技术资料的时间都没有。真是……”

两个中国人用单音节的汉话抑扬顿挫地说了半天，汉斯在一旁也听不懂，但从表情上看得出来两个中国人都很为难。最后，冯良才告诉他，赵书信先生的确没有调走，仍在本厂，可是他现在担负了别的工作，待那项工作一完，马上就给他当翻译。汉斯也无话可说了，站起来告辞。

“汉斯先生，”李任重送汉斯出来，用英语对他说，“这位冯先生刚从大学出来，又不懂我们的专业，所以，还要请你在术语上多给他解释。他是个年轻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他……”

汉斯点点头，“呀、呀”地表示答应。然而，他心里总觉得，中国人的礼貌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没让他知道。

十

送走汉斯，李任重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沉思起来。他比谁都懂得应该有个专家来跟汉斯一起工作。这不单单是个翻译的问题，还便于WC 机器今后的维修；如果这套机器的确既先进又不复杂，自己厂说不定还能仿造。他也完全信任赵书信这个人。一起工作了20多年，对这个人再不认识，真是笑话了！但是，那“失黑炮301找”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跟那个值得怀疑的什么钱如泉挂上钩的呢？这么一个稳重的人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用电报和一个古董贩子联系呢？……种种疑点揉合成一个疑团，他想来想去想不通。他决定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亲自去了解了解。

吃完晚饭，在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他出了门，徒步向单身职工宿舍区走去。矿山土路骑不成自行车，他爬了好几里坡路。一面走，还一面低着头回忆赵书信这二十多年来的表现。脑子里和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但除了“黑炮”事件，再没有找到这个书呆子一点可疑的地方。

十一

以上是简短的一章，在小说中是必要的过场。现在我们再跑回赵书信那

里，看他在干些什么。

这是间和招待所客房一样的住房，开开门就是长长的走廊，门上还编了号码。房间有 15 平方米，一对带茶几的简易沙发，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床和两个大书橱就挤得满满的，但收拾得却很干净整齐；墙上的空间也利用了，挂着三角板、直尺之类绘图器具。老单身汉不像小单身汉，多年的独身生活使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从 C 市回来，受了钱如泉的熏陶，他居然还弄了两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文竹，一盆吊兰，其实不算是花，而是草。

前 10 天，厂里忽然把他从设计室抽出来，要他到 20 里路以外的一个矿场作“现场指导”。那不属于他的工作，他并不能帮什么忙。但他还是服从调动，按时去上班。上下班都有交通车接送，可是下了班必须在那个矿场吃饭，因为到他回来的时候，这边的食堂已关门了。所以，他每天都很晚才能回“家”。

这天，他下班回来，翻了翻带回来的资料，见没有什么可办的，就把棋盘铺在茶几上，照着从南京买回来的一本《象棋谱大全》，一个人研究起棋局来。

他正在研究第二局——“双炮双士胜炮双仕”，李任重敲门进来了。

“啊，老李，你怎么来啦？有什么事？”他很惊讶。李任重从来没到他住处来过。一个有家室的人是很少到单身汉那里串门的。

“没什么事，”李任重跟他握了握手，“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

他请李任重坐在沙发上，沏了一杯从南方带来的茶，递到厂长手里。两个人随便扯了几句，李任重问：

“汉斯来了，正在安装 WC，你知道吗？”

“知道。”他心里想，也许又要调我去跟汉斯一起工作了吧。他很希望去，见识见识 WC 究竟“先进”到什么程度。

“你去找过他吗？”李任重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瞥了棋盘一眼。

“找过。第一趟去，招待所的人说不在。上个星期天去，看门的老头子叫我不再去，说周副书记告诉过，汉斯这次来是干活，除了那个姓冯的翻译，谁也不要放进去，免得打扰他。这样，我就没有去了。”

“嗯，是这么回事……”李任重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但没有说下去。

“老李，”赵书信恳切地说，“汉斯上次来，跟我坦率地说过，WC 其实是很落后的东西，在非洲都推销不出去。买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上次你出差去了，我在局里的会上提过，可是……”下面，他谨慎地把话咽回肚子里。

“唉！”李任重又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茶叶很好，和 WC 一样，也是 S 市买不到的。“这是局里弄来的，我没插手。你知道，我们出国采购的人里面，有一些根本就不懂专业，不是看需要，而是看手头有多少外汇来买东西的；什么东西便宜买什么……东西既然已经买来了，那就安上吧，至少它还能干活，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儿，李任重蓦然想起来：

“哎，他怎么会把这种话告诉你呢？我听局里的人说，汉斯还口口声声说 WC 如何如何先进哩！”

“哦，”赵书信呆笑道，“那还不是混熟了，他是把我当作朋友才说的。”

“那么，”李任重紧盯着他问，“他是不是曾经托你办过什么事？私人的事？”

“没有，”赵书信断然否定。想了一想，又说，“没有！”

从他的神态上，李任重看出来他说的是实话；从多年的经验上，也深知这个人不会撒谎。李任重松了口气，同时更觉得这个人老实得可怜：不让他去当翻译，他也不问个所以然；有意隔离他和汉斯，他也看不出来个迹象，还一个劲儿地为 WC 先进不先进的问题操心。

李任重默默地又把茶杯放回茶几。这时，他注意到了那副棋盘。他心中一动，俯身在上面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棋盘上有一颗棋子，是由一个牙膏盖代替的。他急忙问：

“老赵，这个牙膏盖是颗什么？”

“哦，那是个黑炮。”

“你是丢了颗黑炮？”

“嗯，这趟出差丢在路上了。”

书呆子莫名其妙厂长问这些闲事干什么，而李任重却几乎要惊叫起来，想把事情的原委托盘告诉他。但转念一想，自己现在是厂长，是厂党委委员了，他无权把党委会上议论的事泄露给当事人。这样做，是违犯组织纪律的。在一瞬间，他自持地稳住了神色，沉静地靠回沙发上，笑着说：

“老赵，你还喜欢下棋啊？”

“嘿嘿！”书呆子讪讪地笑了笑，“没有事的时候，下两盘消磨消磨时间。”

李任重还是在上小学时下过棋，只知道“马走日字象飞田”。以后四十年来不是忙于学习，就是忙于工作，忙于家务，如今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对这项娱乐更失去了兴趣。他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就抬起眼睛四处看了看。他发现这间房间虽然收拾得很整齐，书籍杂物都放得井井有条，却不知怎么，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里有一种让人看不见、摸不到、说不出的冷清、寂寥、落寞和没有勃勃的生气。就连窗台上那盆吊兰和文竹，也是死样怪气的、焉焉乎乎的，仿佛是它们不愿来，而是被主人拼命地把它们拽了来似的。

这里缺少什么呢？似乎什么都有，一应家俱齐全，可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李任重端起杯子慢慢呷着茶，琢磨了一下，才猛然想起来：这里缺少一个女人！

是的。他自己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入了党，夫妻双双来到这个偏远的矿山。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新婚夫妇的日子过得还很快活。以后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现在每晚围在电视前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

而眼前的这个书呆子呢？比自己还早毕业两年，到这里的时间比自己还长。可是多少年来他都是在这种冷清的、寂寥的、落寞的气氛中生活着。在人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孤独地呆在房子里自己跟自己下棋。过去，当然谈不上组织对他有什么关心，不整他就是他的福气。现在呢？记得就是为了使他自己一个人能住这么一间房子，厂里还有人喋喋不休地说闲话：矿上的单身汉都是两人一间，工人还四个人挤在一间里，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占一间？

蓦地，李任重又想到，厂党委会从来没有为这个长期以来埋头矿山建设、叫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的书呆子的生活、工作、组织问题开过半次会，只是发现他有什么“黑炮”事件了，才急急忙忙在两天中开了三次党委会，紧张紧张、郑重其事地。

一时，厂长的感情激动起来，他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公道的事情，首先，要解决书呆子的终生大事。这事是不必经过党委会，他自己就能作主的。

“老赵，”李任重深情地说，“你也该成个家了吧！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想给你谈谈这件事。计财处有个会计，叫陈淑贞，跟我爱人在一起工作，常到我家来玩。我看她人不错，长得也很端正，还是个南方人，跟你一定合得来。她丈夫是职工子弟中学的教务主任，前年得癌症死了，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孩子，没有多大的家庭负担。怎么样？你有意思没有？要是愿意谈谈，我明天就叫我爱人去跟她说……”

赵书信见了女同志都会脸红——比如上次和孙菊香打交道，听见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更忸怩不安了。他全身缩在沙发里面，埋着头盯住棋盘，一言不发。

李任重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他的意见，以为他算是认可了，就站起身告辞。临走时，又盯了那黑色的牙膏盖一眼。

李任重决定明天一早上班就提议召开厂党委会。

十二

李任重的一席话，撩得书呆子心慌意乱，一晚上睡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他极力在脑海中寻找那个女人——陈淑贞的形象，似乎见过，又似乎没见过。这个机械总厂有两三千工人干部，厂房沿着山沟逶迤下来，占地长有几公里，他到哪儿去找呢？

他一点也没想到在他背后还有针对他的政治活动，他的呆就呆在这里。

一宿无话，现在我们也去参加第二天一大早就由李任重提请召开的厂党委会吧。

五个党委委员来了四个。王副厂长一听说又是讨论翻译的事头就疼：早已决定的事，有什么必要还翻来复去地讨论？他借口快进入第四季度了，要作财务总结，没到会议室去。

开始，李任重就说明了必须配备专业翻译的必要性：让赵书信去不但是当翻译，还要去熟悉引进的机器，这对矿山机械化是大有好处的，何况，外国专家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厂方总不能置之不理。

“我保证赵书信同志没问题！”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已经亲自调查过了：他确实丢了一个黑炮。这黑炮不是别的，却是一颗棋子，象棋里的棋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认为，我们厂党委对他的生活关心得很不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在矿山勤勤恳恳地干了快30年，却连个家都没有。这……周围的同志也应该替他操操心，给他一点温暖吧……”

这个知识分子也有点书呆子气，连翻译问题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侃侃地谈了10来分钟，说到后来，他也发觉自己走了题，又把话拉回来，说：

“总之，我提出还是让赵书信去和汉斯一起工作，大家讨论吧。”

吴书记主持会议，当然要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才作总结，这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郑副厂长早就觉得应该让赵书信来当翻译，到外单位借人是多此一举。什么“黑炮”不“黑炮”的！他知道赵书信此人即使干坏事也干不了大的坏事，至多和汉斯有点私下的财物来往，无非是交换中国的古董和国外的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比误了生产上的大事好。但是，因为这个提案是李任重提出来的，他就执拗地不表态支持，靠在椅子上两眼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天花板。

会场静默了一会儿，周绍文坐起来，两手放在会议桌上，轻轻地咳了一

声，说：

“对赵工，关心，我们的确是应该关心的。过去，我们对他是够关心的，啧啧！今后……不过，关心不等于不搞清楚问题。正是为了关心他，更要把问题搞清楚。所以说，李厂长，你是不是能把调查的过程介绍详细点呢？”

周绍文绝对没有一丝恶意。由赵书信当翻译和由冯良才当翻译，对他个人都没有一点利害关系。他只是从他主管的事情上出发，一定要把每个人的问题弄得水落石出而已。

李任重原原本本地把夜访赵书信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只是略去了给他介绍对象的话。

“嗯——”周绍文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脸上蓦地展开一丝异样的笑意。

“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一，下棋是两个人才能下的，你当时去的时候，房子里并没有别人，他为什么要把丢了一个黑炮的象棋大明大白地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呢？二，一颗棋子值多少钱？李厂长说是木头做的，我不会下棋，不懂那玩意儿，可我想一副木头棋子至多值一块多钱吧；一颗棋子，不管它是黑炮红炮，就更不值钱了，他为什么要花好几毛钱打这么份电报呢？嗯？”

他睁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笑意看看每一个人，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希望大人能给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三个人也困惑地看着他，连郑副厂长的目光也从天花板上收了下來。李任重直眨眼睛：这两个问题既没有数据，又没有资料可查，比任何技术问题都难回答。

是的，一件生活上的小事一旦提到严肃的会议桌上来讨论，它本身就无形中具有了严肃性和神秘性，谁也难以摸透——理性解释不了非理性！

大家又像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翻译的会上一样，僵在各自的坐椅上。最后，还是吴书记出来打圆场。

“哎——我看，老李，WC的安装也快完成了，翻译呢，也不用再换了吧。那个姓冯的大学生，不是也对付到今天了吗？再把赵工换上去，他还要重新熟悉，也有困难。是不是？啊，咱们……这就算了。赵工呢，今后咱们的确要多关心他，主要要从政治上关心，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新情况吧。啊，咱们这次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李任重回答不了周绍文的两个问题，再说不出什么意见了。郑副厂长和周绍文更无话可说，收拾了桌上的本子，端起茶杯，一前一后地走出会议室。

“老李哇，”吴书记站起来把门关上，转回身坐到李任重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谨慎小心啦！像这类问题，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要出了什么纰漏，责任算谁的呢？你还敢在会上大包大揽地‘保证谁谁谁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我参加革命40年了，都从来没敢说过这种话。你现在可不像过去了……你也知道，为了提拔你当厂长，从局里到厂里，有多大的阻力！直到现在，咱们党委内部，不还有人不服气吗？唉！你千万别出错呀！你出了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给咱们党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上抹了黑啦！到时候，你看吧，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难啦！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个领导真不容易！至于赵工呢，我还是那个话：也别难为他。干脆，让他啥都不知道，不参与。这样，要是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没啥问题，他心里也不会不好受……”

李任重半小时前还满腔热情，想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为赵书信伸张正义，辩白冤屈，但在周绍文这位由职业所决定的怀疑主义者面前，心里的血液一

下子降到了冰点，听了吴书记这番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暖和过来，反而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他沮丧地坐在皮椅上默默无语。吴书记看看他的脸，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吴书记此刻心里想：

“唉！真难啦！你看，我还得给厂长做思想工作！”

十三

好了，以下，我们也没什么可记的了。汉斯仍然带着冯良才安装那套 WC。赵书信仍然每天去 20 里外的矿山上“指导工作”，不过一路上总心神不定地想发现谁是陈淑贞，见了 40 岁左右的女人就不自觉地要盯上一眼。机械总厂生产照样进行，李厂长仍然忙于企业整顿和日常事务，真是七荤八素，什么问题都有，几乎把自己的专业也忘了。吴书记继续做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周、郑、王统统一如往常。日子，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选个不平常的人来写。在这个山沟里，不平常的人只能是汉斯。

汉斯是个爱国主义者，可惜他爱的是他们德国，而不是中国。那天他和冯良才从李厂长的办公室出来，心里就产生了疑团：怎么搞的？一会儿说赵先生调走了，一会儿说赵先生还在厂里。在德国，他曾听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前些年有些离奇古怪的遭遇，那么，是不是他的老朋友又碰到了类似的不幸呢？这样，汉斯就不认真地工作了，但也不再向冯良才发脾气。冯良才译错的时候，他只冷冷地站在一旁看，或是自己动手去做，并不告诉冯良才这个词的多种含义。WC 并不是什么精密的机器，零件都很粗笨，即使没有冯良才，他用手指点工人也能把它装配起来——由不同语言的人能造巴别塔，何况一部 WC 呢？不多日子，WC 装好了，在矿场上开机运转，一切正常。局里的人来验收，觉得很满意，在合同上签了字，汉斯第二天就打点起行装告辞。这次走，他显然没有上次愉快。

且不说汉斯跑到江南游山玩水，也不说冯良才拿着一份很好的鉴定和一封感谢信回到省社科院，我们来看这部 WC。

WC 刚运转了半个月，整部机器就像患了疾病一样发开了抖，后来越抖越厉害，几乎要立刻散架瘫下来，矿长只得命令关掉机器。WC 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第二矿场的生产计划整个乱了套。局领导立刻下令检查原因，如果是德国人的错，就要向德国公司要求赔偿。这个任务，当然落在机械总厂的头上。

李任重带着几个技术人员和 10 几个工人奔赴现场。他这是第一次见到装配好的 WC，远远地一看，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先进”的玩意儿，至多是 60 年代的产品。这种东西国内也会制造，甚至比它还要灵巧。可是有什么办法？是你自己跑去买的，又不是人家硬塞在你手上的。现在，这部偌大的废物正堵在坑道门口，进进出出的工人没有一个不骂的。李任重黯然神伤，心想，要是听了赵书信的话，何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

事故很快就检查出来了：没有别的毛病，是 WC 的全部轴承被磨损得变了形。正如一个人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得了关节炎。它还怎么能工作呢？

“真是开玩笑！真是开玩笑！”李任重踢着卸下来的轴承，气愤地说：“WC 安的是滑动轴承而不是滚动轴承，这算什么‘引进’！照这种标准，我们都可以向西德输出技术了！”

下一步，是要检查责任。局里下令把和德国公司签订的合同、矿场各班的开机记录和汉斯留下的注意事项等等都集中起来，交给机械总厂分析。

“一定要迅速查明责任！”局长在电话上向吴克功喊，“这关系一大笔外汇哩！连夜把有关的人，把那个懂德语的姓赵的工程师也找来，局里明天就要你们的报告。你明天上午带着报告来开会。”

局长咔嗒挂上电话，吴克功连忙打发人去通知召开党委会，吃完晚饭，党委委员们都到了会议室，一个个阴沉着脸，垂头丧气。

“哦，没到齐！”吴克功眼睛溜了一遍，“还有赵工，赶快去把赵工叫来。这会儿，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厂里的小轿车一溜烟飞驰到单身宿舍大楼，通讯员连拉带拽地急急忙忙把赵书信塞进汽车。不一会儿，他就来到鸦雀无声的会议室。

“啊，来来来！”吴克功迎了上去。“赵工，你快看看，把我们的记录和德国公司的说明、注意事项对照一下，看看 WC 损坏的责任究竟该谁来负。”

他把一大堆材料放在赵书信面前。赵书信已经听说 WC 出了问题，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慢条斯理地坐下来，摊开材料，一字一句校对起来。李任重是技术人员，又懂外文，事故也是他检查出来的，他在旁边帮着赵书信。其他人都焦急地在会议室里踱圈子、抽烟、喝茶。责任检查不出来，他们这一晚上别想去睡觉。

合同是赵书信译的，没有错误，但他还是仔细地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检查到汉斯留下的说明书、注意事项时，一条条改正了冯良才译错的地方。冯良才译的中文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字，就像批改过的小学生的作文本一样。

“唉，这真是，这真是……”李任重气得说不出话，只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气。但冯良才上面的译文与这次事故并无直接关系。

“啊，在这里了！”赵书信忽然抬起头，呆滞的眼睛放出光彩。周、吴、郑、王赶紧聚在他的身后，尽管他们不懂德文，也一齐盯着桌上的那份说明书。

“是这样的，”赵书信把说明书捧到吴书记眼前，“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上第 27 条这句话：‘Ander Maschine Soll en alle Lager geschmier f Werden，’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机器上所有的轴承都应该涂上润滑油’。可是中文本上却译成：‘机器仓库都应涂上油’。这、这，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咦！”吴克功惊异地说，“咋会错的码子这么大呢？”

赵书信歪着头想了想，用不太有把握的语气说：

“可能是这样的，‘Lager’这个词，在德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阵营’；一个是‘仓库’；一个是‘轴承’。这位翻译平时大概很少接触机器，就按‘阵营’和‘仓库’来考虑了。按‘阵营’译，显然不像话，按‘仓库’译比较妥当。既然是‘仓库’，那就不存在要涂‘润滑油’的问题，他就把‘润滑油’译成了‘油’。这、这只是我不成熟的看法，还是请领导考虑。”

“他妈的！”王副厂长气得骂了起来。“幸亏他光说‘油’，还没说是什么香油、麻油、棉籽油……”

郑副厂长沉重地一屁股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一言不发。李任重皱着眉头把矿场的记录一把拉到自己面前，一页页地翻了一遍。

“是的！”李任重指关节敲了敲记录。“我们就是在最平常的事情上忽视了。我们以为人家先进，那就样样先进；谁知道 WC 安的还是滑动轴承，既然注意事项上没有注明要涂润滑油，也就想不起来去给它涂润滑油，因为

现在最先进的轴承可以不上润滑油的。你们看这记录，从开机直到停机，从来没有给轴承上过润滑油。一天三班倒，机器不停地转，滑动轴承还有个不磨损的！”

“这么说，”吴书记也无力地坐下了，“责任不在德国人，而在翻译？”

“什么‘在翻译’？！我看在我们！”郑副厂长在他们背后气恼地撂来一句。“我们还是在‘背靠背’地解决问题！”

“唉！这一来，连停工带维修，咱们要损失三、四十万啦！”管财务的王副厂长马上想到财务损失上去。“哼哼！还刚碰上这企业整顿，讲求经济效益的时候……”

会议室一下子寂静无声，党委委员们都在寻思：损失了这几十万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笔帐究竟应该挂在谁的名下？赵书信忐忑不宁地缩着脑袋，仿佛他是罪魁祸首似的。

“哎！赵工，”忽然，吴书记打破了沉闷，“你想想，你是不是给一个姓钱的打过一份电报，说啥‘失黑炮301找’？”他是党委书记，毕竟有魄力、有胆量，没有经党委会讨论就把问题捅了出来。

“嗯，嗯，”赵书信惊讶他说，“是呀，是，是有这么回事！”

“唉！你给那个姓钱的打啥电报嘛！那份电报是个啥意思嘛！”吴书记焦躁地叹气。

“我，我跟他是在L市旅馆里认识的。我们下了一晚上象棋。第二天我到了C市，发现我的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就，就给他打了份电报。这、这有什么问题吗？”

“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吴书记啼笑皆非地摇着脑袋，“对你来说，啥问题都没有！可是……”

“‘可是’，可是我们晚了！我们早就应该跟老赵面对面地谈开的！”李任重倏地站起来，走到窗前凝望着一片灯光，陷入了沉思。“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总不能相信自己的同志，还要等着看他的‘新情况’哩！”

“哎，赵工，”一直没有说话的周绍文问，“你怎么会花好几毛钱去打电报找那颗不值钱的棋子呢？有那钱，你再添点，不就能买副新象棋了吗？”他还是想搞清楚他怀疑的问题。

书呆子看着五个党委成员突然都撂开了重要的WC来追问他打的电报，似乎也明白了他那份电报和WC损坏的责任有什么联系，急得头上的汗都冒了出来。但急中生智，他知道什么友情，什么心灵里微妙的秘密等等浪漫主义的东西，是无法使人相信的。在这种场合下，人与物之间的感情，倒比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有说服力。于是，这个一辈子也没撒过谎的书呆子也撒起谎来，嘎嘣地说：

“我，我只是，只是用惯了原来用的棋子……原来这副象棋，我，我用习惯了。”

“哎呀！”吴书记拍了一下桌子，“真是，真是……你这个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十四

行了！小说就此刹住吧。如果写到书呆子老树开花，在李任重夫妇的撮合下和陈淑贞结了婚，写到他退休，写到他寿终正寝，我们会写成一部叫人看了直打瞌睡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了。写小说讲究“风头、猪肚、豹尾”，我看这结尾虽然不算是豹子尾巴，也可算老鼠尾巴，上面是抹了油的。现在，

让我们向“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人告别，向 S 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告别，回到 C 市来吧。你问我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社会意义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从整个过程来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位都是好人，连外国人汉斯也不坏，可就是为了书呆子那颗“不值钱”的黑炮，弄得国家损失了几十万！

吴书记说得对，“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再见！

轮回

浮出海面

王朔

当尚不为众人所知的社会青年王朔留着小平头，在西影厂招待所将自己的小说《浮出海面》改编成电影剧本《轮回》时，他绝对没想到两年后——1988年竟成了中国电影界的“王朔年”。在当年由王朔小说改编而成的四部影片中，《轮回》最受其喜爱，因为那里面有他自己曾经的影子。

上篇

经过一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队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流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的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光广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夜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再说。

我到柜台上换了些零钱，走到外面一个投币式自动电话亭打电话。拨了两遍没拨通，没了耐心，看到外面一个姑娘很焦急，便让给她打。自己走出来。一辆无轨电车驶来，我跑两步挤上去。车到站我又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想见了，继续往前乘，一直到总站才下来，蹒跚瞎逛。这条街有根浓密的洋槐，乘凉的人很多。男人们在路灯下打扑克，小孩子坐在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则搬着小板凳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闲篇。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

我想找个演外国旧片的影院，走了两家都满座。走到一家剧场，有人迎上来问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张电影票的价，那人踌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给我，我进剧场时不禁有些怀疑。

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观众，台上一个古装少女在跳着徐缓但十分舒展的中国古典舞。水袖在淡蓝的光中拖来曳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筝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曲终舞罢，灯光暗下来。尽管我很入迷，也没鼓掌。

舞台再次亮起来时，这个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来。跳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个神话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个倒霉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严重后果后，这个女人像瓦匠一样把天重新砌好，使我们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据说，也是这个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产卵，提供了第一批人种。值得欣慰的是编导没让这个女孩子裹上一层蛇皮，否则，她就不能向我们展现她那双极富表现力、生气勃勃的腿。最后，我还是觉得扫兴。我以为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现雄壮、慈悲，即使她是好心眼。

我对这个女孩子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

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曲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又像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姊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岙，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请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要马上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你们跳吧，专心跳吧。”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子。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着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留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这时，一个穿红拖鞋的姑娘挎娉娉婷走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白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圆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

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咪咪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

“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

“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角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

说。“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来。”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祸补天。不不，女蜗女蜗。”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

“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向钢琴，掀开盖丁丁当当砸起来。“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

“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的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去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像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颗维生素E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岬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衣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我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麇集在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汉堡，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心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锲而不舍地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几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躺在床上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淡一笑：“你来了。”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上：“看什么书？”她合上书，给我看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游——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

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婵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婵娟丁点儿暧昧的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我问于晶跳什么角色。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着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无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脸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他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们说。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磕着瓜子，独自出神。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跃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借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漂到木樨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即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漪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拼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的浓密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陪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睁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栏，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陪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陪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润的草坡上聊天。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世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扬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地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里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挑，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走来。

小杨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还得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

到前面。我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湖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波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像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中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梆梆、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像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当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尽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

我们好像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是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一些小名气。10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时，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他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像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

“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待

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餐巾扔到一边，抓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嚼，凤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眼看她，她笑咪咪的，手把着酒杯玩。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劳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帐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和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 37 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头看于晶，她的眼睛在桔红的路灯下又黑又亮，露出那么点饶有兴致的神气。

“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辞职？我们都猜你是被开除的。”

“这可是凭空诬人清白。我，”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些艰难。我咽口唾沫：“想发财——”

于晶笑，看来她又以为我在信口开河。

“真的，”我诚恳地说，“怎么说我跟你也不一样，浑浑噩噩 30 年，身无一技之长，再没钱，将来谁待见？我过去那个单位终日无所事事，薪水菲薄，饿不死也吃不饱，难受坏了，毁我青春。”

“那你辞职后，比过去好点了？”

“常饿肚子，真惭愧。可我不怨别人，机会有，全看自己。另外。”我笑着说，“也不是没有挥霍的时候，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

“你真反动。”

“我寻思着，官不是人人都做得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渡。”

“你辞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看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

“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自己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来没有过什么恣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他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了。”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一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像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哪儿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子？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愣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颊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不知怎么搞的，石岙。”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像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了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的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时间，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

在街上商店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凉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

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到旅店介绍处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

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舶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船在蓝色的海面上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头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锥、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的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新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制品堆积如山。晒得黧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掏出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俩吮着冰糕来回走动，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打闹跑过。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衩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

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海水晶莹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跃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弋在潜不见底的深海。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得进，人借涌势，是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伏彼起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惶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着，像是另一个快乐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恣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

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得着吗？老子愿意。”

我继续闷头游着，不再理睬他们，汽艇仍跟在我身后。“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得老子直呛水。”“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跄跄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乐。我吃了一通冰激凌，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

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当然，我没再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告，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千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像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抽，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倘样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

“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于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权的。”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未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了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得都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黢黢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漫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蓝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

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像这次饿得这么狠，像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回头，“不要，”我尽量和气他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落地跟着我。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我拭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

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

我连干了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

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老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像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只好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了，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几天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腊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崩儿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一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偌大的白晃晃的钢崩儿，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的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魔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像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像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

去见他们。其实，即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的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下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一顶旧军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像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陪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里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得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作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像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像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咯滴咯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晚上，我去看《屈原》。于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蹒跚。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有，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哟，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她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在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他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

小杨不爱听，我们换了话题。她说她家在下关有几间铺面房，我说可以开个卖服装的杂货店。从广州购进，铁路到昆明，然后用军车运到下关，只是不知销路如何。小杨说销路没问题，边境地区从来都是很时髦的，穿着牛仔裤刀耕火种。“我可没说着玩，要于咱们就真干。”

“我也没说着玩，干就干。”小杨说，“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干脆双管齐下，回去要没劲就当老板娘去。”“这年头，”我笑着说，“都是曲线救国的路子。国军皇协军不分。”

这时，要开演了，演员们涌出来，小杨也跑走了。

我下到剧场里，已黑了灯。幕拉开后，我看到前排还有些空座位，就和其他观众忽拉拉往前涌，换了个座位坐下。我使劲在台上的演员中找晶晶，那些脸搽得粉粉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样。直到后来一个女子挺剑自刎，我才想起这人就是晶晶，可她已经死了，被人拖下去。

“你觉得《屈原》怎么样？”

晶晶问我。她嘴里含着饭，犹豫着不知夹哪个菜。今天菜是我做的。西法红烩牛肉有点狐臭味。

“吃吃，别客气。”我自己喝了口汤，“还不错，我说《屈原》。那些小桔子跳得挺喜人，身段袅娜，我爱看人数众多的群舞，变队型就漂亮。灾

难舞不如上海的《木兰飘香》，没什么气氛。当然，除了你……不能吃就别吃了。”

我看晶晶嚼着臭烘烘牛肉的难受样儿，笑了。晶晶也笑了，把牛肉吐出来：

“炒的什么玩艺呀，真难吃。”

“主要是牛不好，老死后还停了两天尸。本来这菜我挺拿手。”

“就会吹牛。”晶晶把碗里的牛肉全扒拉到桌上。

“你还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就是不认识你也注意到，死得很突出。”

“还会拍马屁。”

我涨红脸大声继续说：“男演员实在让人没法恭维，包括屈夫子，就会剑指问天，什么呀，《蝶恋花》。”

“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是什么专家？”

“我很为我们的民族舞剧担忧，这样下去，会连我们这种相当宽容的观众也失去的。如此矫饰、机械，毫无意趣和演技。女演员抢尽风头，把男演员仅有的那点可怜的光彩也剥夺了。使男演员成了难以想象的奇形怪状和不体面的某种东西，只能像搬运夫那样显露肌肉，卖卖力气。”

“你还行嘛。”晶晶瞅着我，“挺有见地的，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耳熟？”我装糊涂，“别人也说过这话？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

吃过饭，我看到晶晶在我房内翻书，忙冲过去夺，她灵巧地闪开，笑着对我晃着说：“你看东西真是过目不忘啊，现炒现卖。”

我笑着说：“我也没想在你跟前卖弄，原意是想跟不懂的人吹吹，可也还挺贴切是不是？我确实为如此糟蹋男演员忿怒。”

刚才我对男演员的议论，几乎原封不动引自美国人理查·克劳斯所著《芭蕾舞简史》里戈蒂埃对1840年法国芭蕾舞舞台上男演员的批评。

我戴上耳机听歌，晶晶低头削京白梨，我们都爱吃这种汁多绵软的水果。晶晶递给我一个，又给自己削了一个。吃了两口，张嘴无声他说了句什么。我忙挪开一只耳机：

“你说什么？”“你是要去云南开店吗？”她的声音大了。

“小杨告诉你的？有这么回事。”

“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

“这可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店铺，好当家做主，从领导、父母给我气受那天起。”

“你不是被哪儿驱逐回国的吧？”

“不，不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生在这间屋子，长在这间屋子，就像俗话说：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一点看不出来。”

“我可认为自食其力没什么不光彩。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让公家操碎了心，就业、婚姻都得公家一手操持。就像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总住在父母家，公家慈祥，不说什么，咱自己也不好意思。而且，明摆着，公家也顶不住了。”

“噢，这么说，你也算开拓型干部了。”晶晶欣赏地看着我。“不敢当，小的溜的吧。”

“你比我好呀。”她叹口气。

“怎么？”

“就是好嘛。我们，舞蹈演员，小儿麻痹，长不大，30就成了豆腐渣，不像你蒸蒸日上。”

“不是也有很多老同志还活跃在舞台上，风韵犹存。”“我可成不了那号精。说真的，”晶晶说，“将来你要真成了个肥胖的百万富翁，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可不能装作不认识。”“你还不知道我，像百万富翁吗？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用嘴侃大山，每天不止。”

我们都笑了。笑了一阵，晶晶看看表：“哟，净胡扯了，我该去剧场了。”

“来得及，”我也看看表，“我还有个建议没跟你说呢，”“什么建议？”晶晶站起身拎上化妆箱。

“先问你，有男朋友吗？”

“你指哪种？我有一簸箕。”

“我指可以结婚的男朋友，就是说不一定非结，但结也无妨的那种。”

“没有，目前没有。”

“想有吗？我有个合适的人选向你推荐，你可以试一下。”“你不是想推销自己吧。”晶晶笑起来，怪有趣地看着我。“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没发觉咱们俩挺合适？你不漂亮，我也不漂亮；你日暮途穷，我孤苦伶仃。”“你这些废话呆会儿再说吧。我二幕三幕没戏，你到后台来找我。”

“你不吃点东西再走？”我洋洋得意地送她。

“我包里有巧克力。”

“别吃那玩艺，又该上火起疙瘩了。”

“我说，”晶晶又羞又气，“你要老纠缠细节，我就给别人当女朋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在剧场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为一个人看舞剧要打瞌睡而忧心忡忡，见到我大喜，和我旁边的人换了票，坐在我一旁嘴巴不停他说起话。他怀疑他们单位领导是隐藏很深的“三种人”，准备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举。我问他怎么知道的，“文革”时他才上小学。他说那个领导长得象。他愤愤地抱怨领导诬陷他是经济犯罪分子。这我倒挺同情他，我知道他不是，虽然偶尔当当掮客，除了蹭过几顿便饭没拿过一分钱。

接着他又问我国家于吗请三千日本人来玩，他们干吗不请咱们？我说这事没人跟我商量过，我也不清楚。

“你在谈恋爱是不是？”他借着幽暗的光线审视我，“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

“没有啊，”我把目光从台上舞姿婆娑的晶晶身上收回，“没有没有，你看我像谈恋爱的人吗？”

“千万别结婚，石岙，听哥哥的没错。你本来可能还有点出息，一结婚就全毁了。婚前蜜糖似的，婚后，女的瞧男的不殷勤了，男的瞧女的不新鲜了。我就不打算再结婚。”

“我不结，答应你。”

我一边和那个朋友前言不搭后语地胡扯，一边继续看台上跳来跳去的晶晶，她跳完编织舞，退到一旁席地而坐当观舞的民众，她们在台上也聊天。过了会儿，我见晶晶往台下观众席上看，断定她看到我后，便做了个“八”

的手势，她轻轻点点头。

“你给谁打手势，你给谁打手势？”我那个朋友好奇地都快疯了，拼命伸着脖子往台上找。

“好哇，和舞蹈演员勾搭上了，走向深渊。”

“我得去帮农民兄弟点忙。你别跟着我，”我厌恶他说，“我拉屎可臭。”

“我也没把你当成麝香牛。”

我在厕所里呆了半天，才出来，那个朋友也走进休息厅，东张西望地找我。我刚想藏，已被他发现，飞跑过来：“你千万听我一句……”

“去你妈的吧，”我挣开他，冲他脸大喝，“我他妈愿意毁了自己。”

我逃出剧场，那个朋友摇头叹气踱回观众席。满台都是腾挪跳跃的王侯将相、妃嫔宫娥以及渔人樵夫、甲士村姑。第一幕结束，演员们涌进后台，边走边拔头钗摘耳环，一溜小跑冲进各化妆室抢妆。8点多一点儿，晶晶换完妆出来，薄薄的舞衣袖袂飘飘，远远看见我就笑嘻嘻的，越往近走，越发笑成一朵花。我看着她，觉得她真是很好看。

“你笑什么？”

“瞧见你我就想笑。”

“你笑什么？”我拉晶晶坐在后台门口的石阶上。“你瞧你吧，穷得叮了咣当响，还挺沾沾自喜，四处跟人说要发财，简直像个骗子。”

“我哪四处跟人说了，不就跟你说过的，也是说着玩，哎，我那个倡议你考虑的怎样了？”

“你还真要这样呀，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呢。”

“试试吧，怎么样？不行就拉倒，什么也不影响。我问你，你讨厌我吗？”晶晶摇摇头。

“那就这么定下了。”

晶晶光笑不说话。

“别光笑。”我说。

“试试就试试。”晶晶说，“以后你对我好吗？”

“当然要比现在好。”

我们相视而笑，晶晶用水袖掩住嘴。我们侧耳听前台音乐，屈原已经将黜，痛不欲生。

“你该进去了。”

“再呆会儿。”

“进去吧，”我推她，“散场我在大门口等你。”

晶晶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进去。

那些天，我是《屈原》最忠实的观众。还掏钱买票，请朋友们的客，拉大批闲人来捧场。晶晶跟我说过，一个再谦逊的演员也是很在乎观众掌声的。她很伤感地告诉我，她第一次登台跳什么“大寨，亚克西”时，下台听到一片掌声热泪盈眶，别人无情地告诉她，那不是掌声，是拉幕的隆隆声。现在她如愿以偿了，每当她宛转痛苦死去时，总能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虽然这掌声显得那么没心没肺。

散场后，我就在后台门口等她。她梳着头发跑出来，我们沿着幽暗寂静的街道走回家。北京的夏末，街上摆满鲜花，夜晚清凉的空气中浮动着浓郁袭人的花香。我把家里的窗户终日敞开，这样，晚上回到家就能嗅到满室芬芳。晶晶演出完总要喊饿，我们就搞点简单的夜宵，咖啡和馒头夹奶粉。我

有一罐咖啡豆和一罐速溶咖啡，我常搞错，使咖啡味道一塌糊涂。

“为什么不喝茶呢？”晶晶问我。

我先说喝茶有点老气横秋，又说喝咖啡显得绅士，最后承认茶水使我走肾，夜里睡不踏实。我说过，我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很使晶晶紧张过一段。后来她了解我后才安下心，我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你没觉得我其实很腼腆吗？”

“不，没觉得。”

“我从小就很害羞，很胆怯，为了掩饰这个缺点，我才学吹牛说大话，故意胡闹。可直到今天，我仍像一个经常手淫的中学生那样怯懦自卑。”

“你是说你其实像天使一样纯洁？”

“那倒不是，”我不好意思了，“没那么白。”

我告诉晶晶，我过去的确谈过几次恋爱，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正常的。但我人基本上是正派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

“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我说过我喜欢你吗？”

“你说过不讨厌。”

“我也说不上来，”晶晶想了半天仍这样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喜欢呗。你很爱钱？”

“是啊，”我说，“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也爱钱，所以喜欢你。”

“别这么赤裸裸，晶晶。”我求她，“这大打击人情绪了。起码心里这样想，嘴别说出来。”

晶晶和我大笑，笑得喘不上气。

“好吧好吧，”晶晶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

“还能再热情一点吗？”

“我可以为你死，你能吗？”“不能！”我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似乎挺失望。

“你能为我死？”

“是的。”

我把窗户大开：“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们又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把窗户关好。

“你说，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

“是你叫我热情点的。”晶晶点起一支烟，懒懒他说。“我不想陷进去，我不想丧失也不想看别人丧失独立的人格。”

“怎么，你害怕了？”晶晶看着我大惊小怪地喊，“吓成这样，简直面无人色了嘛。”

“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怕，我是在坚持我的原则——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放心，”晶晶打了个呵欠，“用不着害怕，要是将来你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

晶晶早晨起床，一般都很早，不管晚上睡得多么晚。她像一匹精力充沛的小马，不停地在屋里跳跳蹦蹦，搞一些空中劈叉击打、腿的曲直伸拉之类的名堂。如果我还在睡懒觉，她就拼命砸门，大声放收音机，把我闹起来，

然后拉我出去跑步，说我的身段实在不像话，再下去就甭想冒充演员往剧场里混。我们俩沿着阳光初洒的大街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晶晶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我就把皮都剥给她。晶晶过马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不规则的，任意乱走。我批评她，她也不听，警察吼她，她才往人行横道跑。警察叫她过去，她冲人家笑仍走自己的路，多数警察也就一笑随她了。我过马路规规矩矩，可有时爱随地吐痰，卫生警察抓住就毫不客气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罚款，根本不听我有鼻炎的申辩。搞得我一见大壳帽就神经紧张。现在街上大壳帽又多，连邮递员也神气得像将军，一惊一乍的，我是不爱上街了。常常是我受了一肚子气，执意回家，撇下晶晶单独去自由市场买菜。南方女孩子从小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都有一手讨价还价看秤的绝活，北方再精明的农民也坑不了她们。我很放心晶晶，每次她都能买回又便宜又好的蔬菜。就是她也有一般南方女孩的毛病，逛市场一上瘾就刹不住车，转遍全城也要买回那几根最佳黄瓜。

她兴冲冲回来时，我已急得胡思乱想了，对她发脾气：“到哪儿去了？一上午。”

“买菜去了，你瞧这几根黄瓜多嫩，顶着花呢。”

“犯得上么，不吃行不行？”

“我怎么啦？”晶晶委屈地说。

“知道吗，”我口气和缓下来，“晶晶，有时我老觉得我们好得不真实，像场美梦，特别是你一不在，我就恍惚受了什么幻相的蛊惑。”

《屈原》演完后，舞蹈学院开始毕业分配，晶晶如愿分到一个在观众中颇有人缘的歌舞团。

“我到团里以后就不来你家了。”临报到那天晚上，晶晶嗑着瓜子对我说。“那你去谁家？”我在看博伊尔的《背叛之风》，没抬头。“我天天来影响你不能干正事，我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学习。我妈妈都来信说我，不能光谈恋爱——虫！虫！”晶晶忽然指墙上说。

我抬头一看，有只蟑螂爬在墙上。我用书将它打落，铲起举到晶晶面前。

“别闹，你别闹。”她把我手推开。

“你刚才说什么，以后不来了？”我把蟑螂尸体开窗扔下去，坐回桌旁问。

“少来。我到团里就不整天泡这儿了，我要学习了。”我嘻嘻笑起来。

“怎么，你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

“随便，”我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后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

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挺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的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

“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寄东西，就像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他说，“使我痛苦。”

“ 嗬荷， ” 晶晶笑起来， “ 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

“ 我是真的。 ” 我执著他说。

“ 好好， ” 晶晶安抚我， “ 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对我也好。 ”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好在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虽说写字楼、酒店、工厂一夜之间林立了，文化方面仍是乡村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影剧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 10 多万元。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像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浩荡的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个家伙忽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南国仍是盛夏，挥汗如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城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大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街。入夜，那些收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我在这儿遇到一些老朋友。有的是取得学历后被招聘来的；有的我原以为已经坐了牢；有的老老实实拿着几百元人民币谨慎度日；有的趁机猛赚钱已成了小富翁。他们给了我各种互相矛盾的劝告。

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当天便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找的人关押在他们看守所里。我以领导身份去了趟公安局，了解到这小子原来没给公司办事，炒卖外币发了笔小财，买了张假护照跑到东南亚逛窑子，花光了钱才回来，还染了身脏病，目前狱医正给他注射大剂量青霉素，不日将解回内地劳动教养。我十分懊丧。又从朋友处听说那个舞蹈家已找到合作者，我认识的那个助手也不在此地，不是在上海家里休假就是在福州帮人家排舞剧。我给北京打了长途，总经理让我等几天，务必见到那个助手，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碰到一个中学女同学刘华玲。我简直不敢认她了。过去她是个胆怯、漂亮的女孩子，很多男孩子追她，我也给她写过纸条，冬天放学后，我们在昏暗的街道拐角偷偷接过吻。后来她和一些年龄大的男孩

子混在一起，我见过那些戴羊剪绒皮帽、穿黄呢大氅，每天晚上用冰刀互相往脸上刹的野小子轮番拉着她在什刹海冰场滑冰。一个下雪的晚上，我还遇见她被家里赶出来，一个人在铺满白雪的街道上边抽泣边茫然地走。后来我去当兵，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一晃快十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她，珠光宝气，端庄丰腴，一副有钱单身女人的豪奢派头。

饭后她请我去酒吧听歌。聊起来才知道，她 1980 年和一个叫戴维的外国人结婚出了国，取得外国籍后，便和那个洋鬼子离了婚，靠一大笔赡养费悠闲度日。

“这么说，您现在是外宾了。”

她矜持地笑了，说她还是爱中国甚过爱她前夫那个国家。她现在新加坡定居。“那也算个华人国家，没有肤色问题。”

“你现在算干什么，回国观光？”

“对。”

她说实际上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内，这儿毕竟是故国，气候、民俗、语言都熟谙：“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过是个外国人的感觉。倒是在戴维的国家，处处觉得像个外国人。”

“那你何必非要那个外国籍。”

“不不，你不懂，这不一样。”

“我懂，我怎么不懂。”

侍者不停地上色彩缤纷的鸡尾酒，我喝的有点多了。穿着像马戏演员的男歌手在倏忽变幻的灯光下做着各种亮相，声嘶力竭地唱。顾客都在乱哄哄他说话、鼓掌、高喊着点歌。我瞧着那个满脸堆笑，一个劲鞠躬致谢的歌手，觉得他挺可怜。

“那么，”我扭头问刘华玲，“你爸爸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好了？我记得他过去曾经把你赶出来。”

“他现在仍不让我进门，把我送的电视机从窗户扔出去。他认为我嫁给外国人是他的奇耻大辱，”

“有趣的老顽固。”

“我并不认为他这样就是立场坚定。”

“是啊，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和亲和伤了心，总认为这么做是国力疲弱的一种屈辱表现。其实，外国人爱上我们的女孩子，是因为她们美丽，是我们的骄傲，只要那些外国人不是洋瘪三就行。”

“我不觉得你是在恭维。”

“那就换个说法，我们不是也娶过这些外国女人嘛，还把她们选进各个委员会。国际交流总是互通有无的。”

“你还是那么爱胡说八道，政府没再逮捕你吗？”

我笑了，她指的是 1976 年我卷入“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三个月那件事。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个混乱、灾难深重的凶年，她还记得我站在批斗台上的那副凄惶相，那时晶晶才上小学。

“我没能挺住，一进去没打就全招了，也就没当成‘四·五’英雄。我现在还存着平反时送回来的那些声泪俱下的交代书，看一回笑一回。”

“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

“不当了，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人很成熟，国家料理得有条不紊，我也放心。”

我告诉我那个入了外国籍的女同学，从部队复员后的有段时间，我倒当真信过一阵基督教。那年我在泰山顶看了一本斯维特拉娜写的悲怆的书，引起宗教情绪，下山时我偷了岱庙里的善男信女贴在铜锣上的香火钱，泰山神未能降祸于我，使我对中国神大为失望。考虑到凡心未泯，既不愿剃秃子也不愿吃素，又把佛门摒除。最后觉得基督教挺文明，没什么义务也没什么苦行，全凭自觉，便欣然信了。那年圣诞节，唱诗班唱的多声部《弥赛亚》神曲，曾使我深受感动，差点受了洗。只因那天的牧师不许我领圣餐，使我觉得他很可恶。我一向厌恶豪奴，神仆我更不能宽恕，我抛弃了主。主一定在天上哭得很伤心，末日审判那天他不能给我走后门了。我妈妈倒破啼为笑，但最后她还是被我气死了。

“我是在极端苦闷中退的职。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我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我要探索生活的意义，我很难受……”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小时候也想当过刘胡兰，被人塑成雕像。”她也喝多了，结结巴巴地说：“小时候我多为我们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那时我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妈的人家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管闲事，我倒成了资产阶级。”

“你不必过意不去。”

第二天酒醒后，我头疼欲裂，想起昨晚有点后悔，觉得说多了，为向一个女人倾诉苦衷羞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也有点局促，难为情地跟我说：

“我现在不能喝酒，一喝就醉，就胡说八道。”

“我也是。”我说，“我都忘了昨晚说了些什么，喝多了酒是让人显得幼稚可笑，其实我现在过得还不错，我在谈恋爱。”

“是吗，那一定是个好姑娘，太让人羡慕了。我一向羡慕在谈恋爱的人，我没谈过，噢，那些都不算。”

“别说这些没劲的事了。”

“好，不说。”她笑，“其实一个女人也用不着要求太多，生活舒适就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福的。”

饭后我们驱车去游乐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骑马跑了几圈，又到射击场比枪法。为了有趣些，我们还打了赌，一顿晚饭。她打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打得更好，在部队我就是神枪手，而且这种轻便的小口径步枪比我们那种跳动很厉害的军用步枪更易于操纵。打完靶，我们都得了奖品。

在水上餐厅吃茶时，我碰到刚从上海休假回来的舞蹈家助手，她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大局已定，我也不想勉为其难，这种事也是“自由恋爱”。谈毕公事，她问我，是不是晶晶到那个团后不太顺心？我说没有呀，她挺乐。她说她听回云南绕道上海玩的小杨说，晶晶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都快哭了，说她一个人在团里很孤单，叫小杨去看看她。小杨临走事情多也没去成。舞蹈家助手走后，我屈指一算，晶晶给小杨打电话正是我走那天。

下午没事，我回饭店要了个北京长途到晶晶团里。晶晶午睡刚起床，还没去上排练课，可线路不好，听不到她的声音，由北京的话务员传话。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什么东西。话务员告诉我，没事，什么东西也不要。

我想说我很想她，忽然又觉得很烦恼，那边晶晶的声音一点听不到，就像对着空房间自言自语。我没了兴致，挂了电话。

晚饭时，刘华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啦。我说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打通，我补了句：“我很爱她。”

她笑，我告诉她：“我不是开玩笑。”

她沉默了，不再笑。晚饭吃到一半，气氛实在沉闷，我们都很别扭，又快喝醉了，她终于忍不住，求我讲讲我的女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讲，便把我和晶晶的关系始末细细讲了一遍。讲完后，她眼泪掉得抬不起头，我知道我勾起了她的伤心事。

“我也曾追求过真情，可总和肉体遭遇。”她说，“我很灰心。”

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天返京。她说她跟我一起走，一定要见见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她又改了主意，说不想去了。她拿出两只玉色手镯表，要我送给晶晶：

“不要介意，这东西很便宜，并不贵重，是一点心意。”

我我知道，那些飞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很爱戴这玩艺。我说谢谢，晶晶一定喜欢。

“回北京，见到熟人说起我，你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吧？”

“不会。”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色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

我在楼道穿行，认出一个正在像模像样炒菜的蓬头小伙子是位很受青年人欢迎的歌星。练功房内传出清脆的钢琴声和嘭嘭的手鼓声。正在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肯定是男低音，巨大的共鸣音震得楼道嗡嗡作响。一个穿着运动衣的俊秀小伙子拦住我，打量着我问：

“你找谁？”

我告诉他我找谁。

“她住那个房间。”他有礼貌地让开，“她可能不在，洗澡去了。”

“已经回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从旁边匆匆走过，边走边说。

我敲敲那扇紧闭的门。

“进来。”

瘦得飞起的晶晶站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梳着长发，看到我进来，两手拢着头发怔住了。她刚洗过头，脸庞头发潮润润地闪着光泽，散发着发乳香脂的馥郁气味。我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她，她仍在发愣，接着，像片羽毛轻轻飘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还哭鼻子呐。”

在街上走时，我们互相争着说话，晶晶为压住我拼命大声嚷嚷，说她的新朋友，她的新节目，在马路上一肆无忌惮地走。当时正是下班高峰，一辆辆汽车开得老鹰一样又猛又快，好几次我不得不拉住她，才没被疾驶的车辆撞上。后来我也不看车了，光顾和她说话，就出了事。

出事时我最后和她说的话似乎是：“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了，一定学到第二册了。”

她好像那么说的：“我不学了，我正挨章学《家庭主妇日用大全》。”
接着我见她脸骤然变得恐怖，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就飞到半空中。在空中我想：坏了！

下篇

“一位擦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位擦地，一二三四……一位蹲……”

我们手扶把杆站成一排，在钢琴单调、永远不变的那支曲子伴奏下，做着枯燥乏味、十数年如一日的的基本训练，像一群虔诚的僧众，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痴心修行。

“腰组合……控制组合……”

这些动作我是那么烂熟，完全可以条件反射地随着节拍准确、有条不紊地做下去，脑子同时开着小差，胡思乱想，甚至万念俱寂，视一切于无睹。

“大踢腿……大跳组合。”

我轻飘飘地连续大跳，不为人察觉地偷着懒，再剧烈的活动我也不会出汗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练功对我就像一个官僚对待他的文件，无动于衷，轻圆自如，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和目的。

练完功，休息一会儿，准备上排练课。我懒懒地坐在地板上，尽管没卖力气也觉得疲乏无力。我们这个团的舞蹈多是异邦的民间舞，跟中国古典舞功两个“法”。不管你过去在省里如何受宠，在学院拿了多少五分，在这儿都得老老实实地跑龙套。老演员对我说：

“你们这拨来的可以了，一来就上节目。我们当年，换灯片，跟幕都是三组。”

领导说：“你们年轻的，先不要谈恋爱。”

我们私下说，不谈恋爱干什么？每天呆在宿舍里光吃，吃肥了再吃“果导”泻下去？谈恋爱还能劳劳神，燃烧燃烧脂肪，就说我的那个家伙，虽然被撞了，还是那么带劲——

“想什么呐？”

“我在想，要是我处于蛮荒时期，当人不如不当人。”

“你想当什么？”

“一只大猛犸或者披毛犀什么的。”

“那无所谓。”

医院大楼一层，窗户对着花木扶疏庭园的一间病房里，我坐在车祸受伤的石岬身旁。护士刚为他接过小便，他由于不得当公众小便而感到体面扫地，一脸懊丧。

“腿怎么样了？我看看。”“别看。”他按住被角，“我不喜欢把有瑕疵的东西给人看。”“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长势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不喜人。医生说，残废是不可避免的。”

“那好哇，”我说，“你对社会危害可以少点了。”

“是值得庆幸。其实，”他恶毒地说，“那条腿已经不在这儿，切下去了。”

我顿时失色，伸手隔着被子一摸，恼怒地板起脸：

“你太不地道了。我知道你转的什么坏心眼，你干吗总那么坏呢？”

“他们说，痛苦让别人分担一点，能轻些。”

我缄默了，抓起一把松子，用牙咬开坚壳，嗑出一捧果仁，递给石岬。瞅瞅他，伏在他枕边问：

“你是真痛苦了吗？”

“真的。”他在枕上偏过头来看我，“我不想连累你，我想高尚一点，我现在是个又穷又瘸的人。”

“别说蠢话了。”我说，“你就是真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就在乎。”

“那可能，因为你总要情不自禁地表现一下卑劣。”

“不是，”他睥我一眼，“我不屑隐瞒我的观点，就是落到这步田地也不屑隐瞒，我不喜欢别人占我便宜，也决不占人家的便宜。”

“你认为金钱和外貌就那么重要？”

“是的，如果你破了相，一文不名，我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你，不管有多少道德先生站出来谴责。”“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多漂亮多有钱，我见过比你棒的腿、比你趁的人多了。要是为了找个鼓钱包找条粗腿，我早去找别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喝酒了？”

“嗯，团里招待一个非洲舞团，让我们作陪。”我在他床旁坐下，拿出个纸包，“我给你买了些无锡酱大排，人家说吃排骨有利于长骨头。”

“我也听说过吃什么长什么。”

“现在吃吗？”我把玫瑰色的排骨从纸包里拆出，问。“要吃。”

石岬坐起来，接过排骨吧唧吧唧吃起来，顺着嘴，很香的样子。他跟我说医院虐待他，营养灶的厨子过去是养鸡场的饲养员。我给同病房的病人送去一些排骨，然后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听他抱怨。

吃够后，他张着两只油腻的手叫我把脸盆里的毛巾拿来。我走到脸盆前一看，哪里是什么毛巾，简直就是一块抹布。我拎到盥洗室洗干净，像对孩子似地使劲给他擦手擦嘴巴。“我自己来。”

“你别动。”我把他脸上的渣子一一擦去，“怎么吃了一脸。”“哎晶晶。”我正在擦自己的手，他对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在这儿陪绑。”

“……”

“老呆在病房会传染上病人的有害情绪。你瞧你的脸，都快跟泌尿科护士一样——铁青。”

“我以为你愿意我来。”

“我是愿意你来，一天来看我一眼，尽尽朋友义务就行了。多找那些健康的朋友玩玩。”

“和你交朋友后，我就没别的朋友了。”我说。

“这可不好，我可没叫你不理人家。恰恰相反，”他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你有几个正派、有学问的男朋友，我还很赞赏。”

“你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欢，想趁机把我甩了，还落个高尚。”

“不不，你别误会。”他脸红了。过了会儿，他握住我的手，我挣了挣，没挣脱，就任他握。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他轻声说，“不陷进愚蠢的爱情中去。”

“……是说好了。”

我低着头，慢慢抽回自己的手，走了。

我有几天没去医院看石岬。每天排练完，就自己上街逛，自由自在地挨个店吃心爱的冰激凌和酸奶，挨家影院看新上映的片子。我们的喜剧还是不行，无休止地卖弄噱头，尽管我也跟着笑，可每回笑完都有被人笑了一场的感觉。悲剧依然是湿淋淋的，那些成年人号陶大哭的嘴脸，使人又厌恶又蔑视，我宁肯闭着眼睛听台词，我喜欢上海的配音演员。有时我买上一包烟，坐在街头长凳上的老爷爷老奶奶旁边悠闲地吸。常有小伙子过来和我搭讪，我跟他们搭讪几句，要带我走，我就不理他们了。一天我碰上一个在石岬家见过，可叫不上名的小伙子。他见我坐在马路边，凑过来和我说话，他自称是某大学的学生，请我去吃晚饭，说饭后还有场音乐会，我跟他去了。吃饭时他说石岬很多坏话，说他如何道德败坏，见钱眼开，我光笑不置可否。等到在剧场坐下听音乐会，他讲起贝多芬，我受不了啦，找茬溜掉。

回到团里，同宿舍的小青姐说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我问是谁，小青姐说她也不知道，那个说一会儿还打来。9点多钟，电话打来了，我跑去接，是石岬。

“你怎么不来看我了？”

“不爱看你。”我气哼哼地说，“找别人玩去了。”

他笑了。说明天来吧。他挺想我，还有话跟我说。

“好吧。”我说。挂了电话，连蹦带跳地跑回宿舍。

小青姐今天过生日，买了酒，跟她男朋友边聊边喝。我也坐过去蹭酒喝，傻乎乎地听他们说笑话。小青姐说我：

“你老笑什么，傻不傻？”

我还是穷笑，喝了酒越发笑个不停。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医院，石岬正在和一个神经质的中年男人说话。我不想打扰他们，就在一旁坐下。开始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会儿，只言片语传进我耳朵里：“我已经老太太吃柿子——嘍瘪子了，两个月都是靠借支开的工资。”“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我懂。”我倾耳听起来。这个男人是石岬的朋友，他曾为什么事雇佣了石岬，现在他想解雇石岬。他的公司很不景气，营业额日趋萎缩，如果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项不能达到20万元水平，今年年底就要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只得裁员，可是他心里很过意不去。倒是石岬开释了他半天：“我要是你也得这样做。”“事关重大，私情公谊应当截然分开。”中年男人走了，石岬笑着转向我：

“你也支着耳朵听呐。瞧，众叛亲离了。”

他摸我的脸，我咬他的手，他把手躲开。

“你交的朋友，真够呛。”我说。

“不怪他。”他说，“本来朋友就是为了锦上添花，互相坠算怎么回事。”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坚持说。

他一笑，滑进被里躺下，仰面看着天花板出起神。宽大的枕头衬得他的脸颊那么瘦削、孱弱。

庭园中阳光明媚，亭亭玉立的五角枫树冠已是金黄掺杂着绛红，威严的雪松凝成深深的墨绿。穿着白衣的病人三三两两在廊道阳台闲坐，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看，我们没有勉强下去的必要了吧。”他忽然笑。

“什么？”

“试不下去了，算了，各投生路吧。”

“你今天叫我来，”我竭力克制自己，还是脱口而出，“就他妈为了跟我说这话。”

“别傻了。”

妈的！我正要发作，外面聚成一堆听录音机的病人那里传来一个低沉柔和的女中音：“尽管我和你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那歌反复地唱，熄灭了我的火气，涌上满腹凄凉。要不是他无能为力地躺在这儿，我真要以为他从头到尾跟我开了个大玩笑，耍了我一场。我忍住泪对他说：

“这事没那么简单，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还得我同意才行，我不能让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啊——噢——！”我躺在被窝里大叫，小青姐她们坐在一边嘿嘿笑。最近老停电，一停电我就趁机歇斯底里嗷嗷怪叫。电来了，屋里亮了，小青姐过来扳我身子，我还是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

“你干吗呀，起什么哄？”她笑着说，“我汗毛都倒竖了。”

我笑着推开她手，翻身闭眼睡觉。

连着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团里放了两天假，小青姐她们搞了辆车，去郊外野游。问我去不去，人多热闹。我想了想，说去，去高兴高兴。

秋初的山里，丰饶富足，多彩多姿。酸枣棵子丛丛密密，荆条上果实累累；漫山遍野的“山里红”斑斑点点，沉甸甸地结满枝头；山道旁柿子树上悬挂着一个个小灯笼似的肥柿，摇摇欲坠；深山里，溪流边，不知名的野花仍在成片盛开；疏落有致的簇簇树林已在郁郁葱葱中透出那么点杏黄和嫣红。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下一个狗声吠吠的庄户院里。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一片片干柴林子，气喘吁吁，兴高采烈地爬上山顶。毫无顾忌地任山风吹透自己的衣衫。当时正是下午，天空湛蓝，浮雕般的白云凝固在黛色的山头。远处平原、河流蜿蜒东去，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精耕细作的农田如同一幅由黄绿不一的颜色拼接得整整齐齐的巨大地毯。

在群山间一座空旷无人、碧波粼粼的水库旁，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男孩们咋咋呼呼下了水，一边哗啦啦游着水，一边大叫痛快，叫我也下去。我穿着练功衣下了水，水库是高峡出平湖，水很深，水凉彻骨，鱼也很多，不时滑溜溜地从大腿旁擦过，水面辽阔平静，游起来很舒服惬意。游着游着，我想起了夏天在市内那个湖里游泳的情景，上岸后，我就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很委屈，还冷。抱着双臂蜷在那儿，瑟瑟发抖地望着远处的山水哭泣，硬咽一声便掉下一串泪珠，山水都模糊了。小青姐她们躺成一排晒太阳，见我哭，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给我披了件衣服，便躺在一旁看我，也不劝。

我哭够了，小青姐问我：

“怎么啦？”

“没怎么。”我擦干泪说。

我们走在绵亘的山脊上，强烈的夕阳将山岭分成壮丽的明暗两个世界。一面是灿烂夺目的山坡，草木花叶轮廓纹路清晰，栩栩灵活。一面是幽深昏暗的谷壑，水声潺潺，潮气升腾。山的皱襞阴沉了，山势也显得凶险。远远地，长城起伏，透迤在崇山峻岭的茫茫暮色中。

国庆节将要到了，电台电视台报纸每天都报道刊登大量标志建国以来国民经济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数字和比率。今年是大庆之年，节前就开始人心浮动，街上挤满购物的人群。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将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一购而空。工人们粉刷油漆了天安门和各主要大街的建筑物，在天安门广场安装了大型霓虹灯和激光照射装置。民警们也动员起来，加强治安保卫，清理居民户口。军队则忙于操练，国庆那天，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示新式武器和新式军装。

30日下午，日本青年代表团中的几位女演员到我们团来联欢。笑眯眯地左鞠躬，右鞠躬，大吃一顿，送了几把日本纸扇，一人抱着一架精美的贝雕哭着走了。我们一边挥手欢送，一边小声嘀咕：“小日本真抠门。”

送走她们，我来不及洗澡，用纸擦了脸上的妆，就匆匆乘公共汽车往医院跑，紧赶慢赶还是在天安门被堵住了。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人头攒涌，照相机的镁光闪成一片，到处是穿着节日盛装、合家留影的人们。公共汽车连成长龙，在人堆中缓慢地行驶。

我赶到医院，天已经相当黑了。病房大楼空荡荡的，能行动的病人都提前出院回家了。急诊室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医生护士团团转地急救着大批因激动而脑溢血、心肌梗塞的胖老头。这些一点不节制的老家伙，每回女排一比赛或过节都要兴奋得晕过去，让人又可气又好笑。

我推开病房门，石岌正在和开摩托撞他的那个小伙子聊天。最近，这个小伙子常带女朋友来看他。他们混得挺熟，已经成了朋友。他的女朋友，一个妩媚的糖果店售货员见我来了，就说：

“哟，你可来了，我们正说你呢，外面车不好坐吧？”

“嗯，在天安门堵了一小时。”

“快来吃香蕉，我们刚买的，特别好。”

“现在不想吃，先放那儿吧。”

我和她坐下说话，石岌老看我，我冲他笑笑，继续和那个女孩子聊天。她正在学交际舞，兴趣很高，跟我说了半天，又叫我给她跳一段。我说我也没跳过交际舞。“迪斯科，迪斯科你总会吧？”

“迪斯科我也跳得不好。”

“跳跳嘛，别谦虚。”

她一定要我跳，我说这是在医院，她说没事，去把门关上，又来拉我。我没办法，只好随便扭几下，那个女孩笑嘻嘻地和我对扭。一个护士探头进来，我跳着跟她笑笑，她也笑笑走了。我停下来，看着那个女孩扭，说：“你比我跳得好。”“再扭再扭。”石岌和那个男孩一齐对我说。

我摆摆手坐下。

“有什么关系，今天过节。”妩媚的小姑娘央求我。我把她搂坐下：“我累了，已经跳了一下午。”我喜欢这个女孩，亲亲热热搂着她热汗淋漓的身子。她朋友给我一支香烟，我抽了两口，小姑娘也要抽。我给她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教她怎么抽，又回头问石岌：“你抽吗？”

他点点头。我把手里这支给他，又点上一支，全神贯注地吐烟圈。

“晶晶。”

“嗯？”

我把脸前的烟赶散开，掉脸看石岌，他又不说话了，我移过身俯下问他：“什么事？”

“我想回家了。”他说。

“还没全好，怎么能回家？”我说。

“差不多了，在家养也是一样。”

“家里没人，谁照顾你？还是全好了再出院吧。”

“我们，”那一对说，“回去了。”

“他想出院。”我跟他们说。

“着什么急？”小伙子说，“不全好不能出院，你还怕我付不起医药费。”

“不是。”

“安心住着吧，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明天全城戒严。”

“我们穿胡同。”

“算了，明天你们别来了。”我说，“好好玩去吧，这些天也没开过心。”

我从医院出来，已经很晚了，我没回团，去石岙家过夜。我开了门锁，在偌大的、空荡荡的公寓中走来走去。我害怕，把所有房间灯都打开了。公寓内还是石岙住院前那种东西乱丢一气的凌乱样，家具什物已蒙上薄薄一层灰尘。我坐了会儿，动手打扫起房子。擦地擦玻璃，倒烟蒂，归置书报，一直干到拂晓，才倒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天亮后，我又上街买菜。节日交通都临时断绝了，我只得在附近小店买些食物。好在是过节，小店货物也很齐全。我回到家，庆典已经开始，打开电视，观看威武的阅兵仪式和花团锦簇的群众游行场面。

晚上，大部分街道交通恢复后，我去了医院。石岙也坐在医护人员中看了一天电视。我进去找他时，电视还在播放焰火晚会的实况。我让他再看会儿电视，自己去找值班大夫办出院手续。办好手续我帮石岙收拾了简单的东西，换了衣服，走出医院。

街上到处是出来看焰火的人群，我们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走着。路过一座新落成的巨大华丽的灯光音控喷水廊时，上百条和着音乐奔涌跳跃的水柱将清凉的水花细雨般地洒在我们头上，我挽着石岙，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和其他人们一起欢笑，他也在笑。

家里收拾得整洁异常，窗台上的花盆，果盘里的苹果散发出幽幽芳香。酒柜上玻璃鱼缸里，金鱼在无声无息地游动。卧室也重新布置了，凉席，草垫都撤去，换上干净松软的被褥和绣花椅垫。书籍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插在书架上。

“是你收拾的？”

我看出他有点感动，没说话，径自走上阳台。夜空中仍不时有礼花从三个方向升起，无声地闪耀成绚丽的一片，旋即又一切黯淡下来。他也走进阳台，我回屋给他搬了张藤椅，又倚在栏杆边，托腮望着夜空出神，那夜景时而辉煌，时而混沌，辉煌时烂漫夺目，混沌时一切皆空，变幻无穷，盛时即衰。

“今夜是最后一夜吗？”我小声问。

又是成百个红亮的礼花笔直地递次升起，壮丽地怒放在整个天穹，熄灭，陨落下去。

我等了良久，不见礼花再次升起。天空的晕红慢慢消褪，醇蓝的夜色迅速在空中横行扩散，覆盖统一了城市景物的调子，阳台、我们也被黑暗吞没了。

“我有什么过错吗？”我在黑暗中问。

“没有……”

“你觉得我离开，对你更好点？”

“嗯。”“你考虑过我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一点没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

“好吧，就这样，我说过，你要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

“你，挺恨我吧？”

“别说这种无聊话，不会的。咱们是好说好散——原来也只说的是试试。”

“我倒希望你恨我。”

“进去吧……我冷了。”

石岙一瘸一拐进屋，我拖着藤椅跟在后面，屋里的灯亮了，我们暴露在光明中。他的脸很激动，相形之下，我倒显得过分平静了。

“我问你一件事。”我垂下眼皮，随即扬起脸凝视着他问，“你爱过我吗？”

“爱过——”他身子往前一冲，一刹那，几乎站立不住，“——爱过！”他站稳后说：“这是不容置疑的。”

“你不是捉弄我，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我粲然露齿而笑。

夜深了，我们仍在开怀畅饮甜葡萄酒，彼此都有些醉意朦胧，快活地笑个不停，说个不停。

“你，你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呢，给你印象好吗？”他问。“还可以还可以，”我说，“足够记几年的。”

“我们不会互相诽谤，互相鄙薄吧？”“我不会，”我停了一下说，“也许你倒要说是我不配你。”“不配一个瘸子？”

“哦，你尽管瘸，还是瘸得挺有风度的。对了，”我说，“你的照片我不想还了。”

“好吧，”他说，“你的照片我也就不还了。”

“如果你打算悄悄销毁，还是还给我。”

“我倒担心你将来的丈夫要吃醋。”

“丈夫？”我木然冲他一笑，“我发觉一句都提不起来。”“什么？”

“过去说过的话呀，那些海誓山盟真没用。”

“……过去我们起过誓吗？”他怯生生地问。

我眼里闪出泪花，把杯子一顿，心平气和地问：“这个你也想否认？”

他不吭声了，我久久盯了他半天，又端起酒杯，把嘴伸进琥珀色的液体中啜饮。

“你说，”我喝了一阵酒，喘口气问，“会很快过去吗？”“什么都会很快过去的。”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少跟我转词。”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他看看我说，“像过去一样，你常来找我玩。”

“真的希望我常来？”

“直的”

“那我就常来。”我注视了他一会儿，咬着嘴唇笑了，“我常来。”我

低下头，飞快抹去下巴上的泪珠，问他，“我的演出你还看吗？”

“看。”他也笑。

上床睡觉时，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过去说过什么山盟海誓的话？大概真没说过，可那，还用说吗？

秋天一个个晴朗无尘、阳光充沛的日子倏忽而过。不堪酷暑又畏惧严寒的人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一年中最后的好时光户外活动。今年街上流行鲜丽的羽绒马甲和斑斓的粗线毛衣。有的国家领导人带头在电视里穿西服会见外宾，出席国宴，为全国表率。西服立刻畅销，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与不合身西服行走的男女。

秋天是我们团的演出旺季，前去观看者趋之若鹜，票子一售而光。可首场过后，黑市价跌得很惨，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票子砸在手里的“倒爷”焦急地在剧场前徘徊。因奥运会胜利和国庆阅兵大大高涨的爱国热忱没能在歌舞上移情。那些6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高亢清越的汉曲宋词、讲究意境的古典舞蹈依然隔膜，掌声寥寥。演了几场后，团里只得把上半场的民族舞大部拿掉，换上疯狂喧闹的布莱伏舞和踢达舞。团里对这些老掉牙的节目的依赖程度是令人悲哀的。

石岍仍在家静养，由于长好的骨盆有些倾斜，走起路来，十分明显地跛脚。他在青岛的姐姐请了假来照顾他的起居。我也时常去看他，他给姐姐介绍我说：

“晶晶，我妹妹。”

姐姐看了我半天，然后就和我有说有笑地聊起来，一起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对石岍说：“喂，我挺喜欢你‘妹妹’。”就红了脸瞅石岍。他笑笑，装作若无其事。我垂了会儿头，又开始说笑忙活。

姐姐是个一丝不苟、爱管别人闲事的女人，常以挑剔的眼光打量我和石岍的穿着。她特别瞧不惯我随随便便的打扮，但她不跟我说，却去训石岍。

“你也不给晶晶买几件衣服，瞧你们两个，穿得像一对叫花子。”

“我们没钱。”石岍说，“再说我们也不出门。”

“你不出门，晶晶总要出门，总要打扮得漂亮点，这会儿不穿什么时候穿？”

“我们赶不起时髦。”我也这么说，“夏天还可以凑合赶赶，秋冬季的羽绒皮货太昂贵了，我是低工资。”

“其实，心灵美也就行了。”石岍说。我闻声瞅他，他忙对我说：“姐姐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买几件——你没听出来？”

“你我不管，晶晶我要管。”姐姐说。

“我什么也不要，真的，姐姐你什么也别买。”我说。

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游。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撂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岍却乜着眼说：

“真难看，像小县城的。”

“管得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了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住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

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容整治得像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光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瞒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有膀胱刺激症，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的也快，小青姐她们就拉住我跟我捣乱。“上哪儿去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笑着从我身旁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吧，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一直就会的，”我掰开她的手，“看跟谁了。”在大家的笑声中，我囊囊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我和石岙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个小板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换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岙的脸拉得像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挺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水开了。”姐姐

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岬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在家里憋得很烦。假日，我陪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们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里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岬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的。”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震动颤抖起来。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回事。瞧你那副德行，真叫人讨厌。什么东西。混蛋一个！”

石岬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稳，我跳下车，石岬也跟着跳下来，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住，面向他。他身后的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

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14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队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母佬佬”。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舞。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

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搅奶油。说到石岙，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岙。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中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岙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岙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岙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胡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候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耷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在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地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首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若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货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快快走开。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怀雄心去了，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的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

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帐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

“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像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岙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岙现在好吗？噢，我跟他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岙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岙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岙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他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她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匀，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哆嗦嗦从包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抽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喀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节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道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的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

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气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岵。”

“谁？”

“石岵！”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

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像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些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霾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窗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像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沉默地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身旁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甜食，穿得像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踽踽而行。铺满雪的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拖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塌，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方了。

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

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她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霁，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的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公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喁喁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常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舞蹈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筒冰激凌，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岷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像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岷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向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是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岷说，“我自己也没吃。”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

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是我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着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她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儿？”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像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队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里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在排练老师的吼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断，很多人一边跑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10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30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个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是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岬。”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岬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你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岬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着石岬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儿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岬眼他说，“这事我来办。”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了？”“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自己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再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两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我。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铢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台上，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像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涸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间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纳妾。”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他接着又问。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坐起来倚着。“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我说。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他又问。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我能帮你做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岙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岙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轻轻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在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载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内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详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是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迷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精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

“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岙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蹁跹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是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像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婚姻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

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他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岍结婚吗？”我毫不害羞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都笑了。石岍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在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岍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岍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我跟石岍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什么？”

“水。”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像是一只饥饿的狮子，目光灼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他妈的！”石岍把被子掀到地上，狂怒地喊，“怎么结了婚还这样！”

团里由几个著名歌星组成的小队向我们舞队要几个人给她们伴舞，名单里有我。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歌星队的演出收入10倍于我们歌舞大队，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知道别的演员都说不去，我还是说去。老师当场就急了，说：“你的事业都不要了？就为多挣几个钱！我没想到你这孩子是这样，大学毕业去给人家伴舞。你这么年轻，搞了这么多年舞蹈，就为这个——钱？”

“是的。”我难过地说，“就为这个。我需要钱。”“你真叫我们老师寒心。本来我们还说你不错，以后考虑给你多安排些节目。而你，自甘堕落。我决不答应让你去当什么伴舞。”

我低着头，只是对好心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公园的音乐堂演出。我刚化好妆，有人找我。我以为石岍，赶紧走出来，却见是小杨。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舞蹈学院毕业后，小杨分回云南，我们有一年没见。

“我怎么不能来？”小杨笑着说。她黑了，瘦了，精神却很好，不像去年分回去前那么消沉。她说他们这次带了个舞剧来北京调演，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当然是你的主角了。”我羡慕地说。

“小地方的舞剧，粗糙得很。”

“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还没一个上舞剧的，还是分回省里强。”

“那你们当时干吗不回去，像躲瘟疫似的躲省里来要人的老师。我不也是没躲过去才回去的。”小杨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挺好的？”

“挺好。”我忙说，“这团条件不错，新盖了房子，练功房和宿舍可漂亮了。还要盖大剧院大酒店，专门接待外宾。以后我们团就是北京一个名胜了，旅游手册都要写上的，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全聚德’烤鸭店齐名。”

“你和石岍怎么样了？上封信你说你们又和好了。”

“我们结婚了，没告诉你真抱歉。他对我特别好……我很满足。”

“他还在捣腾买卖？他那个人挺逗。”“他不太干了。嗯，你知道他能写几笔，正在写小说呢。”“是吗？”

“噢，他一会儿就来。我每次演出他都来，他对我特别好。”正说着，石岍吊儿郎当走进后台。看见小杨先愣了一下，接着便笑喊：“怎么，胡汉三又回来了。”

小杨笑着说：“又回来了。你还是老样子。”

他们俩握了握手，石岍往旁边一坐。我问他干吗去了，他说在广场上看了一会儿人家放风筝。又看着小杨说：“《咪依鲁》是不是？我全知道，晚报登了，彝族舞剧，领衔主跳。”

“你消息还怪灵通的。”

“那是，好容易报上看见一个认识的人，还不眼睛一亮。哪天首演？”

“过两天。到时候去看吧，别嫌丑。”

“哪能呢，没看我就知道不错，不看看谁挑的大梁，喊！”“你现在天天在家写小说？”

“没有。”

“候场啦，《满妃仪》演员候场了。”老师在后台叫人。“我得上台了，你陪小杨坐会儿。”我跟石岍说。“我能不能从后台下去看你们演出？”小杨问我。“哟，这儿后台管得挺严，不好下。”

“有什么不好下的。”石岍插话，“我回回从后台下去看，从没人管，别看瘸一条腿。”

“谁能跟你比。”我瞪石岍一眼，又对小杨说，“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还不是咿哩哇啦那一套。”

“看看你呀。”

“你根本找不着我。”

石岍看我，我白他一眼。他一笑，跟小杨说：“确实没什么好看的，你在台上也找不着她。她们那舞是溜肉片，大小厚薄一模一样，脸上还勾了芡。不像你们《咪依鲁》，干烧鱼，你是那鱼，从头到尾都是菜，别人不过是胡萝卜、辣椒丝而已。”

“别拿我开心了。”小杨说，笑了。

我笑着起身对镜整整头饰，穿着高底鞋踩着碎步走了。石岍这大扯子跟小杨侃开来。

“咱那买卖怎么着了，不开了？”

“你还想呐，我早忘了。你说去云南也没去呀。”

我《满妃仪》下来，看到石岍和小杨眉飞色舞谈得正热闹。便先去换了

妆，笑微微地坐在一边。石岬转脸对我说：

“小杨正跟我说她在云南采风的事。一个女孩，走州穿县，跋山涉水，了不起是不是？事业家呀你——小杨。”

“我当然不能跟人家比了。我们，匠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怎么闻着醋味了，谁在后台吃饺子呢？”

“我也是逼到那份儿上。”小杨说，“我还想跟晶晶换个位。光看见我在北京出这么几天风头，没瞧见我在云南憋得死人一样，这辈子能来几回北京。”

晚上回到家，石岬又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我揪他耳朵：“去，洗脚去。”

他假装睡着不理我。我给他打来水，狠拉一下他耳朵，甩手走开。他疼得蹿起来，揉着耳朵说：“你这不是闹着玩，故意伤害。”“对。”我回头说，又问他，“我晾的那杯水呢？”“不知道。”他闭着眼睛把脚泡在水盆里。

我去外屋找了一圈，找着了空杯子，忍着气问他：“是不是你喝了？”

他仍旧闭着眼边擦脚边笑着说：“不是。”

“就是你喝的。”我一下火冒三丈，把他拽下地，刚洗干净脚又踩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演出那么辛苦，好容易晾了杯水，你还给喝了，什么人呀。”

“你别冲我撒气。”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招你。”“谁冲你撒气？你说你对不对，一点不会体贴人，就会气人。”“我气你了？”

“你气了你气了，就是你气了。”

“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气哭了。

“好好，我不对我不对。”石岬忙哄我，“别生气，我给你晾水，晾一盆。”

那一夜，我没喝水也没理石岬，自个抱着被子哭着睡着的。我也知道，石岬有点冤枉。

小杨她们舞剧公演后，北京大报小报都登了文章，连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和剧照。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云南籍和少数民族出身的）以及各国驻华使馆人员都看了演出。我和石岬也看了演出。石岬还买了所有刊有肉麻吹捧文章的小报给我看，跟我说。

“什么狗屁文章，‘群舞整齐，表演认真……理解人物深刻，有激情……’简直不知所云，马屁全拍到马腿上去。”“什么叫拍马屁，”我呵斥他，“人家演的就是好。”我跟他说他结婚没请小杨，应该补请。让他和小杨联系，看哪天休息，到家里吃饭。

“在家折腾什么，外面找家好一点的馆子不就行了。”石岬说。

“就在家吃。”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她给我看了她的拿手戏，我也得给她看我的拿手戏。”

小杨演出休息那天，我请了假，在家准备了一上午。石岬去接小杨，半天没回来，我等得着急，不住出门张望。石岬小杨到底回来了，一起还有一男一女。

“遇见两个朋友，好久没见，就一起来了。”石岬说，“这是刘华玲。”我向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笑笑。

“你们不是见过一次吗？”石岬说。

“那次是她呀。”刘华玲说，“我都记不清了，还以为是另一个。”

“石岍。”同刘华玲一起来的那个男的说，“换得勤。”石岍笑笑：“胡扯。”

那男的也笑着对我说：“不得罪吧？”

“不得罪，我知道他。”我笑着让他们进屋，“坐吧你们，抽烟。我得去厨房炒菜了。”

石岍跟进厨房，看看我准备的菜。

“够么？”我问他。“够了。”他数数酒瓶，“酒够就行。我是在路上遇见他们的，非要来看看，其实那男的我根本不认识。”

“别解释了。”我切着菜说，“来就来呗，人多还热闹。你去陪他们先喝着酒吧。”

石岍拎着几瓶酒出去后，小杨又进来，“要我帮忙吗？”“不要。”我笑着说，“你就等着吃吧。”

小杨站在一旁看我熟练地忙活，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在学校你可光会蕃茄拌面。”

“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我说，“我记得那会儿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又嘴馋，练功回来就偷食堂的大白菜裹在衣服里拿回宿舍……”

“放在脸盆里用加热器煮，吃得可真香。”小杨笑着接着说，“那会儿可真是穷学生。”

“你看我胖了吗？”我问小杨。

“你还好。”小杨打量着我。

“我要成大胖子了，从学校毕业我长了10斤肉。”

“你有福，我可是掉了10斤肉。”

我和小杨一齐笑起来，“哈哈”，外屋传来一阵更响亮的笑声。石岍和他的两个朋友边喝酒边说着笑话，开始，还挺规矩，后来就有点闹了。大概他们觉得有些冷清，就端着酒杯挤进厨房。

“你们干吗呐？还没炒完菜。”

“马上就好。”我加快了动作。

“我来给你们炒一个菜。”刘华玲喝了口酒，放下酒杯，夺我的炒勺。

“你行吗？”石岍问。

“开玩笑，过去我家的菜都是我炒。”

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时，大家尝了尝刘华玲炒的菜，一致认为不错。

“好长时间没干了。”刘华玲一手执箸一手端酒杯说，“我在外面那个家的厨房有30平米，但我除了煎鸡蛋，什么菜也没炒过，一个人没兴趣。”

“你没结婚？”小杨好奇地问。

“结了，又离了。”刘华玲做了个潇洒的手势。

“感情破裂？”

“哪来的什么感情。”刘华玲大笑，“就为了离婚才结的婚。”小杨被她搞糊涂了，又不好再问。我听石岍讲过她的事，对小杨说：

“为了得笔赡养费。她嫁了个有钱的外国人。”

“为钱？”小杨小声说。

“对。”刘华玲听到了，笑着对小杨和我说，“为钱。挺卑鄙是吗？”

“有什么卑鄙的？”石岍插嘴，“这太正常了，人之常情。”“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表示赞赏的，干杯！”刘华玲和石岍挺脆地碰了个杯，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第一个？”刘华玲带来的那个男的问。

“你也不是。”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一瓶红酒。石岬开了瓶白酒：“喝这个，这个有劲。”他们三个又斟满酒，满饮。石岬说：“钱，好东西。你是幸福的人。将来我有女儿，也许她嫁老外。”

他们三个带着醉意嘎嘎笑。小杨看我一眼，我一笑，慢条斯理地喝我的酒。

“有钱和没钱的确不一样，不承认不行。是不是华玲？”那个男的感慨万分，对石岬说，“华玲算咱们师姐了吧？道行高呀。”

“算师姐！”石岬一举杯，“为师姐干杯。”

“干，师姐，跟我们说说，有钱怎么个快活法？”

“尽可以醉。”刘华玲舌头打着结说，“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敞开了喝，喝最好的酒。”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还有，不用生儿子。”刘华玲说，“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他们喝醉了吧？”小杨小声跟我说，“别让他们喝了。”

“让他们喝，我家地上能躺开。”我把录音机打开，用强烈的音乐盖住他们的喧嚣。

“她骂咱们呢，你没听出来？”石岬大声跟那个男的说。

“骂呗，谁让她有钱的，人穷志短。”那个男的跟石岬说，“我30了，到现在家无隔夜粮，到处蹭饭吃，这他妈也叫为人一世。都是人，谁不比谁短多少，怎么香嘴巴都亲到她刘华玲的屁股上？气死活人呐！”

“你怎么不死去？”

“你怎么不死？”那个男的火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好媳妇，可少那么一截腿，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们吵什么！！”刘华玲喝得满脸通红，不耐烦地喊，“你们也别死呀活呀的，以后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我喝啤酒不能让你们喝马尿，我吃片肉不能让你们吃狗屎。”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岬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夺不能夺要饭碗，坑不能坑婊子钱。你留着养老吧，干儿子不可靠，买条好狗。”

“你当我打算活80呢？”由于录音机的音乐轰鸣，每个人的说话已变成大叫大嚷，“一旦脸上的粉盖不住褶子，我就自杀。你猜我打算怎么死？拣处悬崖跳下，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默默地躺在深山，血沃中华。”

“遗臭万年？”

“一个意思。”

“吓！”

“钱呢？”那个男的定定神，问，“你的钱怎么办？”

“什么？”刘华玲没听清。

“钱！”那个男的贴着刘华玲的耳朵喊，“你的钱怎么办？”

“全他妈当大便纸擦了屁股，给就给真不要脸的。”

刘华玲嚷完，一把搂住我，吓了我一跳，洒了她一身，她也不管不顾，喷着酒气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你。你是个多好的女孩，当年我像你一样，比你漂亮。你怎么爱上石岬呢？太不应该了。他是什么

东西我知道，没出息，不伦不类的男人。你指望他发财吗？没戏，他没戏。发了也没劲，我发了，有的是钱，那又怎么样？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到了我这一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的不是接过厚厚一叠钞票时刹那间的快感，不是欢耍游乐时的恣意放纵；而是你这个年龄时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微笑，早晨起来看到的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要当一朵花，在阳光下开放；我要当一只小鸟，飞在天空，只让孩子们着迷……”

刘华玲说不下去了，呜呜哭起来。

“她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带来的那个男的问石岂岂：“是不是骂咱们呢？”

“跟你没关系，骂我呢！”石岂把唾沫星子全喷到那个男的脸上。

“骂你就是骂我，打丫的。”

那男的晃晃悠悠站起来。小杨吓得尖叫，刘华玲嘻嘻笑，我对那男的说：“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真的？”那男的大声诧异地问，走过来。石岂伸腿把他绊倒，他唏哩哗啦地摔在地上，哇哇吐起来，像个漏的泡沫灭火器。石岂把他拖出门，扔在马路边。刘华玲也不行了，醉得又唱又笑，咕咚向后摔过去。我忙拉她，她在地上打挺，嘴里说：“我死了，牺牲了。”

石岂进来说：“扔出去喂狗。”

“不。”刘华玲恐怖地喊，“不喂不喂。”

我安慰她：“不喂。”

“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好好，一定撒。”

我扶她到里屋躺下。

“不许她躺到我们床上。”石岂声嘶力竭地喊。

“你好啦。”我往回推石岂。他身子也已经软了，一推就倒了。

“拉我起来。”他冲我伸出手，“拉我起来！”

“不拉。”我也冲他喊，“想起来就自己爬起来，不想起来就躺着。”

疯狂的音乐震天价吵，响彻房间每一处角落，钻进人的每个细胞，使人的血从四面八方奔涌进心脏。接着，戛然而止，键子嗒地跳起，犹如毒药喷进了鼠窝，欢蹦乱跳的老鼠们一下全无声息了。

我们三个重新在狼藉的桌前坐下。房间里静得人都感到耳鸣，说出话来也是瓮声瓮气的。

“该咱们喝了。”我对小杨说，“喝点吧。”

“不。”

“你不想喝？”

“想喝，可有演出，不敢喝。”

“那我喝了。”

我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和石岂对着干。很快，我醉了。原地不动也觉得像在溜冰，一圈圈旋转，屋里的景、物、人一一飘逝，又一一再现。我仍然喝着，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发现只剩我和石岂两个人了，只剩两张皮肤紫涨，眼睛血红的脸。这两张脸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忽而年轻，忽而苍老，忽喜忽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呢？”我失去知觉前问。

“在岸上。”石岂说，“浮上去就看见了。”他在屋里做游泳状，踩着

椅子上上了桌子。
五魁

五魁

贾平凹

一个善良的脚夫变成一个声名显赫的土匪；一个无愁的汉子飘荡着一段动人的情怀。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五魁》，被国内同行认为“有跟风之嫌，是失败之作”，在国外却声名鹊起，风行一时。

迎亲的队伍一上路，狗子就咬起来，这畜类有人的激动，要撵了唢呐声从苟子坪到鸡公寨 40 里长行中再不散去。有着力气，又健于奔跑的后生，以狗碍了腿脚为理由，总是放慢速度，直嚷道背负着的箱子、被褥、火盆架、独坐凳以及枕匣、灯檠、镜子，装了麦子的两个小瓷碗，使他们累坏了。“该歇歇吧！”就歇下来。做陪娘的麻脸王嫂说不得，多给五魁丢眼色，五魁便提醒世道混乱，山路上会有土匪哩，后生们偏放诞了勇敢，说土匪怕什么，不怕，拔了近旁秋季看护庄稼的茅棚上的木杆去吆喝打狗。狗子遂不再是一个两个，每一个沟岔里都有来加盟者，于亢昂的唢呐声中生发了疯狂，跃起细长黄瘦剪去了尾巴的身子在空中做弓状，或乍起腿来当众撒尿，甚或有一对尾与尾勾结了长长久久地受活在一处了。于是就喊：“嗨，骚狗子！嗨，骚狗子！”喊狗子，眼睛却看着五魁背上的人。五魁脸也红了，脚步停驻，却没有放下背上的人。

背上的人是不能在路上沾土的，五魁懂得规矩，愤愤地说：“掌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们当然不像五魁，”后生们说，“我们背的是死物，越背越沉。五魁有能耐你一个人快活走吧！”

五魁脸已是火炭，说“造孽哩，造孽哩”，但没办法，终是在前边的一块石头前将背褡靠着了。背褡一靠着，女人的身子明显地闪了一下，两只葱管似的手抓在他的肩上，五魁一身不自在，连脖子都一时僵硬了。

五魁明白，这些后生绝不是偷懒的痞子，往日的接亲，都是一路小跑着赶回去，恋那早备了的好烟吃，烈酒喝，今日如此全是为了他背着的那个女人的。

当一串鞭炮响过，苟子坪的老姚捏着烟迎他们在厅屋里吃酒，瞥见了里屋土炕上正坐了一位哭啼抹泪的女人，他们就全然没有嘻嘻哈哈的放浪了，因为那女人生就得十分美艳，为他们见所未见。一个贫穷的茅草屋里生养出个观音人来，实在是一个奇迹，立时感到他们来此接亲并不是为柳家的富豪所逼使出的苦力，而是一种赐予与恩赏了。世上的闺女在离开了父母的土炕将要去另一个作妇人的土炕时，都是要哭啼落泪，而这女人哭起来也是样子可爱。她的母亲和她的陪娘在劝说着，拉下她的手，将粉重新敷在她的脸上，梳子蘸了香油再一次梳光了头发，五魁就看见了她歪在炕沿上，一条腿屈压在臀下，一条腿款款地斜横在炕沿板上，将绣花的小鞋就欲脱未脱地露出了脚跟的姿态。那一刻里，他觉得这女人是应该嫁到富豪的柳家去享福的，而且应该用八抬花轿来抬，但可惜山高沟大，没有抬花轿的路可走，只得他五魁驮背了。

五魁在 16 岁的时候，已经体格均匀，有大力气，被选作了驮背新娘的角色，以致从此成了专门职业。10 年来，他几乎背驮了数十个新娘，他是知道了鸡公寨的各家媳妇重与轻，胖与瘦，甚至俊丑及香臭，但他从来还未背过这么美妙的女人的。他不明白在他走向炕边，背过身去，让那女人爬上背来，

他竟是刷地出了一身微汗，以致于在女人已经双膝跪在了背褡上的毡垫还不知道，待到一声叫喝，姚家的人将朱砂红水抹在了他的脸上，他才清醒他是该出门走了。这一路都在后悔，他不能看见背上的人，背上的人却这么近的能看着他，该怎么在窃笑他那时的一副蠢相呢？

正是这女人被他背驮着了，挨在后边的抬着嫁妆的后生们，他们是完全可以一直不歇气地走到天边去，走到死去，也不觉劳累的。但是40里山路轻易地到达实在不是他们的需要，后生们话才这么多，才这么兴奋，才这么故意寻借口拖延。在接亲的路上，做了新娘的虽是柳家的人了，但还不是真正的柳家人，他们的嘻谑都不为过，若一经进了柳家，这女人就不是能轻易见得到的了。后生们如此，他五魁还能这么近地接触了她吗？

所以五魁也就把背褡靠在石头上歇起来。

八月的太阳十分明亮，山路上刮起悠悠的风，风前的鸟皱着乱毛地叫，五魁觉得一切很美，平生第一次喜欢起眼前起伏连绵的山和山顶上如绳纠缠的小路。如果有宽敞的官道，花轿抬了，或者彩马骑了，五魁最多也是抬嫁妆的一个。五魁几乎要唱一唱，但一张嘴，咧着白生生的牙笑了。麻脸陪娘走近来很焦急地看着他，又折身后去打开了陪箱的黄铜锁子，取出了里边的核桃和枣子分给后生们吃。这些吃物原本准备给接嫁人路上吃的，但通常是由接嫁人自己动手，现在则由陪娘来招待，大家就知道麻脸人的意思了。

“天是不早了呢！”陪娘说。

“误不了夜里入洞房的，”后生们耍花嘴，“瞧这天气多好！”

“好天气……”

“哪还怕了土匪？”

“哪里怕了土匪！”陪娘不愿说不吉祥的话，“你们可以歇着，五魁才要累死了！”

“五魁才累不死的！”

五魁想，真的累不死。他就觉得好笑了，这些后生是在嫉妒着他哩。当五魁一次又一次作驮夫的差事，他们是使尽了嘲弄的，现在却羡慕不已了。他不知道背上的女人这阵在想着什么，一路上未听到说一句话，五魁没有真正实际的待过女人，揣测不出昨日的中午，在娘家的院子里被人用丝线绞着额上的汗毛开脸，这女人是何等的心情，在这一步近于一步地去作妇人的路上，又在作想了什么呢？隔着薄薄的衣服，五魁能感觉到女人的心在跳着，知道这女人是个纯净的又有心计的人儿；多少女人在一路上要么偶尔地笑笑，要么一路地啼哭，她却全然没有，她一定也像陪娘一样着急吧，或者她是很会懂得自己的美丽，明白这些后生的心意，只是不言破罢了。

不言破这才是会做女人的女人。

好吧，五魁想，那不妨就急急她。她急着，陪娘急着，在鸡公寨外的山口上等待着新人的柳家少爷更让他急着去吧。

老实坦诚的五魁这一时也有了一种戏谑的得意，若这么慢慢腾腾地走下去，一个晌午女人是不能吃喝和解手，使她因水火无情的缘故而憋得难受，于他和他的同类将是又怎么开心的事呢？一个将要在柳家的土炕上生活的妇人，五魁对于她的美的爱怜而生就出了自己的童身孤体的悲哀，就有了说不清的一种报复的念头了。

有了这一念头的五魁，立即又被自己的另一种思想消灭了：谁让自己是一个穷光蛋呢，不要说自己不能有这样的美人，连一个稍有人样的女人也不

曾有，既使能得到这女人，有好吃的供她吗，有好穿的供她吗？什么马配什么鞍，什么树召什么鸟，这都是命运安定的。五魁，驮背一回这女人，已经是福份了，是满足了！于是，五魁对于后生们没休没止的磨蹭有些不满了。

“歇过了，快赶路吧！”他说。

后生们却在和陪娘耍嘴儿，他们虽然爱恋着那个可人的新娘，但新娘的丽质使他们只能喜悦和兴奋，而这种丽质又使他们逼退了那一份轻狂和妄胆，只是拿半老徐娘的陪娘作乐，他们说陪娘的漂亮，拔了坡上的野花让她插在鬓角。五魁扭头瞧着快活了的麻脸陪娘也乐了。

是的，陪娘在以往的冷遇里受到了后生们的夸耀忘记了自己的本色，如此标致的新人偏要这个麻脸作她的陪娘，分明是新人以丑衬美的心计所在了。或许，这并不是新人的用意，而她实在是美不可言，才使陪娘的脸如此地不光洁吗？五魁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他离开了石头，兀自背着新人立在那里，看太阳的光下他与背上的人影子叠合，盼望着她能说一句：这样你会累的。新人没说。但他知道她心里会说的，他的之所以自讨苦吃，是要新人在以后的长长的日月里更能记忆着一个背驮过她的人。

天确实是不早了，但后生们仍在拖延着时间，似乎要待到如铜盆的太阳啾啾一声坠下山去才肯接嫁到家。戏弄了陪娘之后，又用木棒将勾连的狗子从中间抬过来，竟抬到五魁的面前，取笑着抹了朱砂红脸的五魁，来偷窥五魁背上的人面桃花了。

五魁无奈扭身，背了新人碎步急走。

这一幕背上的女人其实也看到了，一脸羞怯，假装眼盯在前面的五魁头顶的发旋上了。

五魁感觉到发旋部痒痒的。在一背起女人上路，他的发旋部就不正常，先是害怕虽然洗净了头，可会有虱子从衣领里爬上去吗？即便不会有虱子，而那个发旋并不是单旋，是双旋，男的双旋拆房卖砖，女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呢？到后来，发旋部有悠悠的风，不知是自己紧张的灵魂如烟一样从那里出了窍去，还是女人鼻息的微微热气，或者，是女人在轻轻为他吹拂了，她是会看见自己头上湿漉漉汗水，不能冒然地动手来揩，便来为他送股凉风的吧！

这般想着的五魁，幻觉起自己真成了一匹良马，只被主人用手抚了一下鬃毛，便抖开四蹄翻碟般地奔驰。后边的后生果然再不磨蹭，背了嫁妆快步追上，唢呐吹奏得更是热烈。五魁还是走得飞快，脚步弹软若簧，在一起一跃中感受了女人也在背上起伏，两颗隐在衣服内的胖奶子正抵着他的后背，腾腾的将热量传递过来了。草丛里的蚂蚱纷纷从路边飞溅开去，却有一只蜜蜂紧追着他们。

“蜂，蜂！”女人突然地低声叫了。

蜜蜂正落在了五魁的发旋上。

听见女人的说话，五魁也放了大胆，并不腾出手来撵赶飞虫，喘着气说：“它是为你的香气来的。”但蜜蜂狠狠蛰了他，发旋部火辣辣的立时暴起一个包来。

“五魁，螫了包了，你疼吗？”

“不疼！”五魁说。

女人终于用手指在口里蘸了唾沫涂在五魁的旋包上。

五魁永远要感激着那只蜜蜂了。蜜蜂是为女人的香气而来的，女人却把最好的香液涂抹在了自己的头上！对于一个下人，一个接嫁的驮夫，她竟会

有这般疼爱之心，这就是对五魁的奖赏，也使五魁消失了活人的自卑，同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邪念，倒希望在这路上突然地出现一群青面獠牙的土匪，他就再不必把这女人背到柳家去。就是背回柳家，也是为了逃避土匪而让他拐弯几条沟几面坡、走千山万水，直待他驮她驮够了，累得快要死去了。

是心之所想的结果，还是命中注定的缘份，苟子坪距鸡公寨仅剩下 15 里的山道上，果然从乱草中跳出七八条白衣白裤的莽汉横在前面，麻脸陪娘尖锥锥叫起来：“白风寨！”

白风寨远鸡公寨 60 里，原是一个下河人云集的大镇落。20 年前，从深山里迁来了一对夫妇，妇人年纪已迈，丈夫却很精神，所带的四个孩子到了镇落，默默地开垦着山林中的几块田地生活着。这丈夫的脾气十分暴躁，经常严厉地殴打他的孩子，竟有一次三个孩子炒吃了作种子的黄豆，即用了吆牛的皮鞭抽打，皮鞭也一节一节抽断了。做母亲的闻讯赶来，突然破口大骂道：“你就这么狠心吗？他们是我的儿子，你也是我的儿子，你在他们面前逞什么威风？！”那丈夫听了妇人的话，立即呆了，遂即大声狂叫起来，一头撞死在栗子树上。消息传开，人们得知了这一对夫妇原是母子，他们就愤怒起来。这妇人为自己的失言而后悔，也为着自己的失去妇德和母德，虽然她说出了当年在深山这样做是为了能与野兽和阴雨荆棘的搏斗而生存下来的需要，但她还是被双腿缚上了一扇石磨，而脖子套上了绳索挂在栗子树干上。四个妇人的孩子也被抓来了三个，并在妇人没有咽气中被人们用锄头砸死。妇人就在同一瞬间死去了，于一个夜晚，身子同石磨的重量拉断了纤细的脖颈，掉入了树下的那个深渊，而头却依然在绳索里吊着如摇摆的钟铁……

那个走脱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终没有下落，20 年后的一天，白风寨便有了一个年轻的枭雄唐景，他打败了官家，以此安营扎寨，演出了许多英武的故事。外边的世界里都在传说着这个枭雄正是往昔的妇人的最小儿子，他是在别的村庄别的山寨里提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但在白风寨却大受拥戴，他并不骚扰这个寨以及寨之四周十数里地的所辖区任何人家，而任何官家任何别的匪家却不能动了这地区的一棵草或一颗石头。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匪胎，虽然也娶下了一位美貌的夫人，但他的服饰从来都是白的，也强令着他的部下以至那个夫人也四季着白色的衣裤。为了满足寨主的欢喜，居住在这个寨中的山民都崇尚起白色。于是，遭受了骚扰的别地方的人一见着一身着白的人就如撞见瘟神，最后连崇尚白色的白风寨的山民也皆视为十恶不赦的匪类了。

麻脸的陪娘看得一点没错，拦道的正是白风寨的人，他们不是寨中的山民，实实在在是唐景的部下。原本在山的另一条路口要截袭县城官家运往州城的税粮，但消息不确，苦等了一日未见踪影，气急败坏地撤下来议论着白风寨近期的运气不佳全是殁了压寨夫人所致，痛惜着美貌的夫人什么都长得好，就是鼻梁上有一颗痣坏了她的声名。为什么平日荡秋千她能荡得与梁齐平而未失手，偏在 7 月 16 日寨主的生日，那么多人聚集在大场上赛秋千，她竟要争那个第一呢？为什么在荡到与梁欲平的时候，众人一哇声叫好，她的宽大的丝绸裤子就断了系带脱溜下来，使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不该看到的部位呢？寨主从不忌讳自己的杀人抢窃，当他把大批的粮食衣物分给寨中山民时告诉说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甚至会从襟袖中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讲明这是官府 XXX 和豪富 XXX，但他却是不能允许在他的辖地有什么违了人伦的事体。他扬起枪来一个脆响击中了秋千上的夫人，血在蓝天上洒开，几乎把白云都

要染红，美貌的夫人就从秋千上掉下来。他第一个走近去，将她的裤子为她穿好，系紧了裤带，又脱下自己的外衣再一次覆盖了夫人的下体后，因惯性还在摆动的秋千踏板撞了他的后脑勺。

现在，他们停下来，挡住了去路，或许是心情不好而听到欢乐的唢呐而觉愤怒，或许是看见了接亲的队伍抬背了花花绿绿的丰富的嫁妆而生出贪婪，他们决定要逞威风了。此一时的山岭，因地壳的变动岩石裸露把层次竖起，形成一块一块零乱的黑点，云雾弥漫在山之沟壑，只将细路经过的这个瘦硬脊梁衬得像射过的一道光线。接亲的队列自是乱了，但仍强装叫喊：“光天白日抢劫吗，这可是鸡公寨柳掌柜家的！”

拦道者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来，几乎是很潇洒地坐下，脱下鞋倒其中的垫脚沙石了，有一个便以手做小动作向接亲人招呼，食指一勾一勾地，说，“过来，过来呀，让我听听柳家的派头有多大的？”

接亲的人没有过去，却还在说：“鸡公寨的八条沟都是柳家的，掌柜的小舅子在州城有官坐的，今日柳家少爷成亲，大爷们是不是也去坐坐席面啊！”

那人说：“柳家是大掌柜那就好了，我们没功夫去坐席，可想这一点嫁妆柳家是不稀罕的吧？！”

后生们彻底是慌了，他们拿眼睛睃视四周，脊梁之外，坡陡岩仄，下意识地摸摸脑袋，将背负的箱、柜、被褥、枕头都放下来，准备作鸟兽散了。麻脸的陪娘却是勇敢的女流，立即抓掉了头上的野花，一把土抹了脏脸，走过去跪下了：“大爷，这枚戒指全是赤金，送给大爷，大爷抬开腿放我们过去吧！”

陪娘伸着右手的中指，中指上有闪光的金属。

那人就走过来欲卸下戒指，但一扭头，正是藏在五魁背后的新娘探出头来瞧陪娘的戒指，四目对视，新娘自然是低眼缩伏在了五魁的背后，那人就笑了。

陪娘说：“大爷，这可是一两重的真货，嫁妆并不值钱的，只求图个吉祥。”

那人说：“可惜了，可惜了！”

陪娘说：“只要大爷放过我们，这点小意思，权当让大爷们喝杯水酒了！”

那人却说：“这么好的雌儿倒让柳家的消用，有钱就可以有好女人吗？你家少爷能，我们白风寨也是能的。”遂扭转头去对散坐的同伙说，“瞧见那雌儿了吗？好个人材，与其让做财东婆真不如做了咱们的压寨夫人哩！”

同伙在这一时里都兴奋得跳起来。

陪娘立即站起，“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双手挥舞，似要抵挡了。那人抽刀来扫，一道白光在陪娘的面前闪过，便见一件东西飞起来，陪娘定睛看时，东西已被贼人接住，是半截指头和指头上的戒指，才发现自己中指已失，齐楞楞一个白碴，就昏死地上了。

那人叫道：“都听着，这新娘还是新娘，但已是我们的压寨夫人！柳家是大掌柜，他少不得被我们抄家杀头，这女人与其做少奶奶短命倒不如做压寨夫人长长久久！”

五魁不待那人说完，拧身就往来路跑，跑到一块大石后，拐脚钻入一块茅草地，不顾一切地往岭沟窜去，已经吓得木木呆呆的新娘这一刻里双脚双手只搂着五魁如缠树藤蔓。慌不择路的五魁不住地要耸耸身子，将越背越下

沉的女人在瓮中向上挪送，每一瓮就摔下一把汗豆子，再后就双手反搂在后，勒紧了女人的腰，说：“我要滚了！”已是刺猬一般从一个斜坎滚下去，荆棘茅草就碾平了一道。滚到坎下，前面就是一条河了，河面上架一棵朽柳树的桥，深水旋着无数的涡儿，看去如一排排铆钉。五魁仰头往山上，看不到脊梁，却想，若立即踏桥过河，山脊上必是能看得见的了，就用嘴咬咬左侧的一处鹰嘴窝岩，说：“那里有一个洞的，藏在那里鬼也寻不着了！”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还倒在草窝里，女人的双手还勒着自己脖子，女人的双脚也弯过来绞住了自己的腰，五魁就驮着女人拱身要站起来，但几次拱不起，女人终于说：“让我下来！”一句话使惊魂失魄的五魁知道现在是安全地带了，便庆幸起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时松弛了的脑袋里闪动了许多思绪，啊啊，一个菩萨般的女人现在与自己是很亲近的了，且不说她到了柳家做少奶奶是五魁不能正眼看的，即使她还在苟子坪做女儿，比五魁更魁伟的也更有钱的男人能挨着她一个指头吗？而如今她手脚纠缠地在自己身上合二为一，她是把一切的一切都依赖着他了！他看见了在自己下巴下十指交叉着的白手有一处流着血，就后悔滚坡下来的时候没有保护得了被荆棘的划撕，那一只脚上，绣花的红鞋也快要掉了，如果真要被树枝挂走了，一个女人赤着一只脚，女人的难堪会使自己怎样的负疚呢！他腾出一只手来，将她的小鞋穿好，这一动作蛮有心劲，浑身的血管就汩汩跳，但表现得似乎毫无别的心思的样子。女人竟也如小孩一样并不配合，软软的，让他穿了许多。

女人说：“五魁，你救了我，你好行哩！”

这样的一句话，使五魁无限的激动，一拱身就站起来了。“土匪我见得多了，跑得过我的他娘还没生下哩！”

五魁想，躲在鹰嘴窝岩下只要熬过一时，土匪就会寻不到他们而离去，那么，驮着女人过了那个桥面，再顺沟下行20里，再绕上鸡公寨，天擦黑是可以将新娘背驮到柳家的。对于这一场抢劫，于五魁实在不是灾祸，原本想多背驮女人的想法竟成现实，五魁对土匪是不恨的，倒觉得土匪与自己有一种默契似的。

“王嫂她不知怎么啦？”背上的女人突然说。

“不知怎么啦？”五魁也说，为女人的慈良叹息了。土匪用刀削掉了陪娘的指头，他是看见了，他可惜这个陪娘，却又怨恨为什么要送给土匪金戒指呢？如果土匪发现走失了新娘，会不会就又抢走了这个麻脸断指的黄皮婆呢？”这都是那些崽子的罪！”五魁骂起抬嫁妆的后生们了，呸，口大气粗，遇事精松，要不是他五魁及早逃走，这女人今日晚上不就沦为土匪的床上用品吗！

“只要你好，”五魁说，“我会把你囫囫圇圇接到柳家的。”

土匪是可能抢走了所有的嫁妆，也可能杀死一些人的，这消息会传到柳家，柳家一定在为新娘担心了，或许他们痛哭嚎叫，或许组织人去白风寨要人，或许绝望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五魁背驮着新娘安全无恙地出现了，柳家于惊喜之余如何感念他啊？是的，五魁的举动并不是建立在柳家的是否感念，只要求得新娘对自己的记忆，再退一步，即使新娘此后再不记忆这事，他五魁完成了他对于一个美丽女人的保护，五魁就是很英雄很得意的人了！

已经到了鹰嘴窝岩下，五魁还是没有放下女人。他说他不累，有什么累呢，百五十斤的劈柴捆，他会从40里外高山上一气背回来的，一搂粗的碌碡

也能搬得起来，“我行的！”他说得很豪迈，甚至背驮着女人往上跳了一下。但是，他突然跌在地上，女人也摔在一丈开外了。五魁顿时羞愧满面，抬头就看女人，却看到的是三个提刀的土匪，明白了刚才的跌倒并不是他的无能，是土匪的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腿内弯的。

五魁扑过去把女人罩在了身下。

土匪嘿嘿地笑了：“小子你好腿功！”

五魁说：“你们不要抢她，她怎么能嫁给一个土匪呢？！你们捆了我去吧！”

土匪一脚把五魁踢倒了，却用手拍拍他的脸：“养活你个吃口货吗？”

五魁就势抓了匪手又扑过来，土匪再踢开去，五魁已流血满面，还是扑过来。土匪说：“是个死缠头！”举刀就砍下去。女人叫道：“不要杀他，我跟你们走是了！”落下来的刀一翻，刀背砸在五魁的长颈上，五魁就死一般地昏过去了。

死里逃生的接嫁人抬背着完整无损的嫁妆到了柳家，但接亲没能接回新娘，蜂拥在柳家门前鸣放着三千头的鞭炮的众人，便立即放下挑竿，用脚把炮捻踩灭。柳掌柜怀里的水烟袋惊落在地，肥胖的稀落着头发的柳太太一声不响地从八仙桌上软溜下去，被人折腾了半日方才缓醒。那个少爷，戴着红花的新郎，倒是哈哈大笑而使众人目瞪口呆，笑声就很凄惨，很恐怖，慌得旁人拿不出什么言语去劝慰，正要符合着他的笑也笑上一笑，少爷却把一位垂手伺立的接亲人一个耳括接一个耳括煽起来。柳家门里门外，顿时一片静寂，等少爷已返回东厢房里，众人还瓷着大气儿不敢出。

柳少爷的发凶理所当然，这位富豪家的孩子，并没有营养过剩的虚胖或贪食零嘴而羸孱不堪，魁伟的身体是鸡公寨最健壮的男人，有钱有力却新妻遭人抢夺，他没有失声痛哭，自然进屋去抄了长杆猎枪，压上了沙弹和铁条，便又搭了高凳去取屋柱上吊着的竹笼。竹笼里存放着平日炸猎狐子和狼的用品，全是以鸡皮将炸药、铁砂和瓷片包裹成的炸弹。这炸弹放在狐狼出没之地，不知引诱了多少野物丧命，现在他脑子里构想着立即领人抄近道去截击土匪，将炸弹布置在他们需要经过的山路上，然后凭一杆猎枪打响，使土匪在爆炸声中丢下属于自己的新娘。但是，就在少爷双手卸下了竹笼从凳子上要下来的时候，凳子的一条腿却断了，少爷一趔趄，竹笼掉落，随之身子也跌下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就发生了。

众人闻声冲进屋去，柳少爷躺在血泊里，拉他，拉他起来，一放手他又躺下去，才发现少爷没了两条腿，那腿一条在门后，一条搁在桌面上。

柳家的噩耗沉重地打击了鸡公寨，五魁的老父得知自己的小儿子没能回来，就蹣跚在太阳炎照的山墙根足足抽完了一把烟叶末，叫着两个儿子，说：“揭了我炕上那页蓆吧，把五魁卷回来。”两个兄长没有说一句话，带了蓆和碾杆往遭动的地方走了。

15 里外的山峁梁上，嗡嗡着一团苍蝇，走近看了，有一节胖胖的断指，却没有五魁的尸体。两个兄长好生疑惑，顺着坡道上踩倒的茅草寻下去，五魁正坐在那里，迷迷登登茫然四顾。

“五魁，五魁，你没有死？！”兄长喜欢地说。

五魁突然呜呜地哭起来了。

“你没有死，五魁，真的没死！”兄长以为五魁惊吓呆了，“五魁是想爹了！”

五魁说：“新娘被抢走了，是从我手里抢走了的！”

兄长就拉五魁快回家去，说土匪要抢人，你五魁有什么办法？原本是10个五魁也该丢命了，你五魁却没死，回去喝些姜汤，蒙了被子睡一觉，一场恶梦也就过去了。但五魁偏说：“我要去找新娘！”

话说得坚决，兄长越发以为他是惊吓呆了，拿耳光打他，要打掉他的迷登来。五魁却疯了一般向兄长还击，红着双眼，挥舞拳头，兄长不能近身。遂抽手就跑，狼一样从窝岩跑上峭梁，大声说：“新娘是我背的，我把新娘丢了，我要把她我回来！”兄长在坡下气得大骂：“五魁，五魁，你这个呆头，那是你女人吗？！”

五魁并没有停下脚，他知道白风寨的方向，没死没活地跑，兄长的话他是听见了，只是喘着气在嘟叨：不是我女人，当然不是我女人，可这是一般的女人吗？嫁给柳家她是有福享的，却怎么能去做了土匪的婆子呢？

况且况且，五魁心里想，女人在和他一起滚下坡坎的时候，是那样地用身子胶着他，是那样地信任他，作为一个穷而丑的五魁，这还不够吗？即使自己不能被她信任，给她保护，却偏偏是她保护了自己，在土匪的刀口下争得自己一条活命，现在活得旺旺的五魁要是心没让狗吃，就不能不管这女人了！

五魁后悔不迭的是，那一阵里自己如果不逞英雄，不在女人面前得意，急急过了桥去又掀了桥板，土匪还能追上吗？而自作聪明地要到窝岩下，又那么自信地在岩下歇息，才导致了土匪追来，岂不是女人让自己交给了土匪吗？

跑过了无数的沟沟峁峁，体力渐渐不支了的五魁，为自己单枪匹马地去白风寨多少有些怀疑了。要夺回女人，毕竟艰难，况且十之八九自己的命也就搭上了。他顺着一条沟流跑，落日在河面上渲染红团，末了，光芒稀少以至消失，是一块桔橙色的圆。圆是排列于整个河水中的，愈走看着圆块愈小，五魁惊奇他是看到了日落之迹，思想又淫浸于一个境界中去：命搭上了也就搭上了，只要再能见上女人一面，让她明白自己的真意，看到如这日落之迹一样的心迹，他就可以舒舒坦坦死在她的面前了。

五魁赶到了白风寨，已是这一日夜里的子时。白风寨并不是以一座山包而筑，围有青石长条的寨墙和高高的古堡，朦胧的月色下依然是极普通的村镇了。一座形如鸡冠状的巨大的峰峦面南横出，五魁看不到那鸡冠齿峰的最高处，只感到天到此便是终止。山根漫坡下来，黑黝黝的散乱着巨石和如千手佛一般的枝条排列十分对称的柿树，那石与树之间，矮屋幢幢，全亮有灯火，而沿着绕山曲流的河畔，密集了一片乱中有序的房院，于房院最集中的巷道过去，跨过了一条石拱旱桥，那一个土场的东边有了三间高基砖砌的戏楼，正演动着一曲戏文，锣鼓嘈杂，人头攒动。五魁疑心这不是自己要来的地方，却清清楚楚透过了戏楼上十二盏壮捻油灯辉映下的戏楼上额的三个白粉大字：白风寨。于往日的想象里，白风寨是个匪窝，人皆蓬首垢面，目透凶光，眼前却老少男女皆只是淫浸于狂欢之中，大呼小叫地冲着戏台上喊。戏台上正坐了一位戴着胡须却未画脸的人，半日半日念一句：“清早起来烧炷香”，然后在身旁桌上一炷香插了，又枯坐半日，念：“坐在门前观天象。”台下就嚷：“下去下去！我们要看‘换花’！？”五魁知道这是正戏还未开前的“戏引”，却纳闷白风寨好生奇怪，夜到这么深了，还没到开演时间。台上那人就狼狈下去，又上来一人说道：“今日白风寨有喜开了台子，演过

了‘穆桂英招亲’，寨主也都走了，原本是收场了。大家不走，要看‘换花’，总得换妆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马上开始！”果真戏幕拉合了，又拉开来，粉墨就登场了。五魁心不在戏上，只打听寨主的营盘扎在哪儿，被问者或不耐烦，或虎虎地盯着他看，五魁担心被认出不是白风寨的人，急钻入人群，企望能在旁人闲谈中得知唐景的匪窝，也就有一下没一下假装看戏。戏是极风趣的，演的是一位贪图占小便宜的小媳妇如何在买一个货郎的棉花时偷拿了棉花，货郎说她偷花，她说没偷，后来搜身，从小媳妇的裤裆里抓出了棉花，那棉花竟被红的东西弄湿了，一握直滴红水儿。在一阵浪笑声中，五魁终于打间清了唐景的住处，钻出入窝就高高低低向山根高地上走去。

在满坡遍野的灯火中果然一处灯火最亮，走近去一院宅房，高大的砖木门楼挂了偌大的灯笼，又于门楼旁的木桩上燃着熊熊的两盏灯盏，一定是盛了野猪油，灯芯粗大如绳，火光之上腾冲起两股黑烟，门口正有人出出进进。五魁想，大门是不好进去吧，却见有人影走过来，忙藏身一个地坎下，坎沿上有人就说话了：“寨主得到的女人好俊哟！”一个说：“我知道你走神了，死眼儿地看，可你却不看你自己，你是寨主吗？你是卖烧饼的！”先头的便说：“其实那女人像你哩！”问：“你说哪儿像？”说：“你近来，我给你说！”两人靠近了，一个很响的口吻声，一个就骂道：“别让人瞧见了！”五魁知道这是一对少男少女，正是去看了抢来的女人，便想：白风寨真是土匪管的地方，唐景抢了女人，就有人唱大戏，还有人跑去相看，看了寨主的女人就贼胆包天，暗地里要来野合吗？却听那少女又说：“你离远点，看着人，我要尿呀！”少男不远离，女的就训斥，后来蹲下去撒尿，尿水恰好浇在五魁的头上。五魁又气又恨，却不敢声张，遂又自慰：不是说被狗尿浇着吉利吗？待那少男少女走远了，不免又于黑暗里目送了他们，倒生出欣羡之心，唉唉，这嫩骨头小儿倒会受活，咱活的什么人呢？五魁这般思想，越发珍贵起了柳家的新娘待自己的好心诚意，也庆幸自己是应该来这一趟的。可是，门楼里外还是站了许多人，五魁就顺着宅院围墙往后走，企图有什么残缺处可以翻进去。围墙很高，亦完整，却有一间厕所在围墙右角，沿着楞坎修的，是两根砖柱，上边凌空架了木板，那便是蹲位了。五魁一阵惊喜，念叨着这间厕所实在是为他所修，就脱了外衫顶在头部，一跃身双手抓住了上边的木板，收肌提身爬了上去，木板空隙狭窄，卡住了臀但还是跳上来。五魁丢了外衫，双手在土墙上蹭了污秽，见正是后院的一角，院中的灯光隐隐约约照过来。

贼一样地转过了后院的墙根拐角，五魁终于闪身到了中院的一个大厅中，于一棵树后看见了那里五间厅堂，中间三间有柱无墙，一张八仙土漆方桌围坐了一堆人吃酒，厅之两头各有界墙分隔成套间，西头的门窗黑着，东头的一扇揭窗用竹棍撑了，亮出里边炕上的一个人来。五魁差不多要叫起来了，炕上歪着的正是新娘！五魁鼓了劲便往厅门走，走得很猛，脚步咚咚地响，厅里就有人问：“谁个？”五魁端直进门，问道，“哪位是唐寨主？”众人就停了吃酒，一齐拿眼盯他，一个说：“是给寨主贺喜吗？夜深了，寨主和夫人也要休息了，拿了什么礼物就交给前厅，那里有人收礼记单，赏吃一碗酒的！”五魁说：“我不是来送礼的，我有话要给寨主说！”在座的偏有两个是亲自抢夺了女人的，五魁没有看清他们，他们却识得五魁，忽地扑过来各抓了他的胳膊扼在地上了，回头说：“寨主，这小子就是那个驮夫，竟寻到咱们白风寨来了！”中间坐着的那个白脸长身男人闻声站起，五魁知

道这便是唐景了，四目对视了半晌，唐景挥手让放了他，冷冷说道：“你一个人来的？”

五魁说：“就我一个。”

“好驮夫！”唐景说，“我就是唐景，唐景要谢谢你，来，给客人倒一碗酒来！”

五魁不喝酒。

唐景就哈哈笑了：“不喝你就白不喝了！你是个汉子倒是汉子，可一人之勇却有些那个吧，要夺了女人回去，你应该领了百儿八十人才行啊！”

五魁说：“我不是来夺女人的，我只是来给寨主说个话。”

唐景说：“白风寨上唐景没有秘密的，你说吧！”

五魁说：“寨主要不让我说，就着人拔了我的舌头，要让我说，我只给寨主一个人说。”

唐景又笑了：“真是条好汉子！好吧，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众人散了开去，一个人已经走到厅院了，又进来将身上的一把腰刀摘下给了唐景，唐景说：“用不着的。”倒将厅门哐啷关闭了。

五魁还站在那里不动，心里却吃惊面前的就是唐景吗？外边的世间纷纷扬扬地传说着有三头六臂的土匪头子，竟是这么一个朗目白面的英俊少年吗，且这般随和和客气！僵硬了半日的五魁一时却不知所措，突然腿软了，跪在地上说：“寨主，五魁是一个下贱驮夫，莽撞到白风寨来，得罪寨主了！”唐景说：“来的都是客嘛！权当你是我派的驮夫，有话喝了这碗酒你说吧。”

五魁便把酒接过喝了，一边喝一边拿眼看唐景的脸，看不出有什么奸诈和阴谋，心里倒犹豫该不该对他撒谎呢？这么一想，却立即否定了：唐景不像个凶煞，可土匪毕竟是土匪，柳家的新娘不是现在抢来要做压寨的夫人吗？我是来救女人的啊！就放下酒碗说：“寨主，我只是个驮夫，原本用不着为柳家的这个新娘来的。这女人若是被别的人抢了去，我也不会这么来的，一个女人嫁给谁都一样，反正不是我的女人。可寨主是什么人物？我五魁虽不是白风寨的人，寨主的英名却听得多了！为了寨主，五魁才有一句话来说的，寨主哪里寻不到一个好女人，怎么就会要这个女人呢？她虽然眉眼美一点，却是个白虎星。”

五魁的话十分啰嗦，他始终在申明自己来的目的，唐景就一直看着他微笑，可说出最重要的一点了，却嘎然而止，唐景就霍地站起来，问道：“白虎星？”

五魁说：“是白虎星。”

白虎星是指女人的下身没毛，而山地的风俗里，认定着白虎星的女人便是最大的邪恶，若嫁了丈夫，必尅丈夫，不是家破业败，就是人病横死，即使这号女人貌美天仙，家财万贯，男人一经得知断是不肯讨要的。

五魁看着唐景脸面灰黑起来，却说：“寨主如果是青龙这便好了！”

青龙者，为男人的胸毛茂密，一直下延到下身器官，再一溜上长到后背。若女为白虎，男为青龙，这便是天成佳偶，不但不能相尅反倒相济相助，是世上最美满的婚嫁。

但唐景不是青龙，白脸唐景连胡子都不长。唐景直愣愣拿眼看着五魁，看得五魁几乎要防线崩溃了，突然说：“她是不是白虎，你怎么知道？”

这是五魁在准备说谎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他说，这女人是荀子坪姚家的女儿，而他五魁的表姐正好也在那个村的，鸡公寨柳家少爷订了这门亲，一

次他去表姐家提说起此事，表姐悄悄告知他的。五魁这么说着，尽量平静着心，说了上句，就严密谨慎下句，不要出现差错，猛然之间，他想起了外边世界里传说着的唐景的身世一事，他是不能确定这个枭雄是不是20年前那一个遭人吊死的妇人的儿子，但却想，或许要是，他一定是要最忌讳女人乱伦的事了。“表姐说，”五魁就又说，一次是表姐同这女人上山捡菌子，捡得热了，两人偷偷在林中的一个山泉里洗澡发现的。表姐发现了，心里就犯嘀咕，怪不得姚家族里的那个小伙上山砍柴就滚坡死了，以前都在说这女人与那个本门哥相好得怎样怎样，原来她是白虎星短了他的寿呀！这事表姐当然不敢对人言说，只是柳家一向欺负他五魁家，他五魁无可奈何，知道了柳家订了这门亲，表姐才喜欢地说恶人有恶报，瞧他柳家的霉事吧！

“这也真是，”五魁说，“鸡公寨年年要娶多少女人，而每一个新人都是我当的驮夫，可从来没有遭人抢过，偏偏柳家就出了事，这不是白虎星女人一结婚起就尅柳家了吗？”

唐景说：“我要是不信你这话呢？”

这话却使五魁全然没有预料，五魁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低下头去，心里慌乱了，唐景怎么个不信呢？是他要验证吗？今日夜里，那女人就成了他的女人，是白虎星不是白虎星一目就知的。可是，五魁又想，风俗里讲，若是白虎星，男人即使不与行房事，但亲眼见了那东西，也就有了尅的作用，唐景是不会作这种险事的。那么，先让手下人检查吧，可一个寨主何等人物，自己的女人能先让手下人检查吗？唐景能一枪打了秋千上断了裤带的夫人，他绝不肯将这女人的隐私暴露给部下的。五魁心里有些安妥，却仍是一头汗；说谎原本心中发虚，唐景若再诈问一次，他就一定会露出破绽了。或许，他这阵已看出我的谎言，一个变脸就要杀了我了！杀就杀吧，既然已经说了谎被他识破，五魁来时也就不想活着回去了！五魁的汗水有一颗滴在了地上，他现在遗憾的是还没有见上女人一面。

“信不信由你。”他无可奈何地说。

唐景却返身进了西边套间，很快又出来，端了一盅酒，说道：“你是这女人的接亲驮夫？”

五魁茫然，不作回答。

唐景说：“一个驮夫，新娘被人抢了，主人家是不会怪了你的吧？驮的新娘被抢，新娘做谁的新娘你也用不着太计较的吧？为一个富豪人家的新娘而来白风寨要人，你不会这么大劲头吧？可你却来了！或许你是来救这女人的，或许你真为了我好，但怎么让我相信呢？这里有一盅酒，说白了，酒里有药，你要是来救女人，念你一个驮夫有这般勇气，我放你囫囵回去，绝不伤你一根头发，唐景说话算话。你要是真心为了我，你就喝了这酒，这酒能毒聋你双耳，耳聋了我却有大事交给你干，你肯喝吗？”

酒盅放在了桌上，五魁的脸刷地变了，琢磨唐景的话，明白面前的这个白脸少年，之所以能成枭雄果真有不同一般的手段！承认是来救女人的就放走，承认说了真话却让喝毒，但不论怎样就是不说还要不要放这女人，五魁是犯难了，想，承认了来救女人，唐景真的会生放了他？就是生放，我五魁是来干什么的，就这么空手又回去吗？证明一切为了唐景，却要喝下聋耳毒酒，土匪就这样恩将仇报吗？好吧，五魁是来救女人的，女人救不走，五魁也是不回去的，聋就聋了耳朵，先呆在这里再寻机救那女人吧！五魁端了酒盅一仰头就喝了，立即倒在地上准备毒在腹内作凶。

但五魁没有难受，耳朵依然很聪。

唐景说：“五魁是真心待我了！我现在告诉你，这酒里并没有毒，而抢这女人我事先也全不知道，压寨夫人才死了，我也没个心思这么快再娶一个，手下的兄弟一番好意，人既然到了白风寨，不应允也怕冷了兄弟们的心，可要立即圆房却是不肯，只准备养了她在这里，待亡人周年之后才能成亲。现在既然如此，我会让这女人回去的，唐景也不落个抢人家女人的名声，但却希望你能来白风寨吃粮，不知肯不肯？”

五魁一下子则浑身稀软，手脚发起抖来，他给唐景磕头，磕了一个又一个，说：“五魁当不了粮子的，我只会种地。”

唐景说：“那也可以来寨子里安家嘛！”

五魁说：“我还有一个老爹，他离不开热土，寨主还是让我回去吧”。

唐景说：“你这个硬憨头！那好吧，你老爹过世了，你想来白风寨住，你就来找我吧！”

依唐景的意思，五魁可以在白风寨歇一夜，天明领女人回去，五魁却要求连夜走，直待五魁进东套间背驮起了又惊又喜的女人出门了，唐景又倒了酒，一盅给女人喝下，一盅自己喝了，说：“毕竟咱们还有这份缘！”伸手忍不住在女人的脸上捏了一把。

五魁驮背了女人千辛万苦地回到柳家，柳家却怀疑了，怀疑的不是五魁，是女人。无论五魁如何地解说他是怎样混进了白风寨乘唐景醉酒之后偷背了女人逃出，柳掌柜只是赏了他三升黑豆，一筐萝卜，以及吃饱了一顿有酒的小米干饭外，并没有将女人安置到装修一新的洞房，也不让与少爷相见，而是歇在厢房，门窗就反锁了。夜里，柳太太于厢房放了一个蒲团，蒲团上铺了油布，油布上捏了一撮灯草灰，令女人脱得光光的分腿下蹲于蒲团之上。女人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蹲上去纹丝不动，婆婆就拿一羽鸡毛要求她捅鼻孔，遂一个巨声的喷嚏，女人的鼻涕、唾沫都喷溅了，那灯草灰仍未飞动。婆婆说：“你穿好衣服吧。”穿好了，婆婆端过一个木盆，揭盖放出一个龟来，女人吓了一跳，旋即蹦到凳子上。婆婆说：“没规矩！”女人又下来。婆婆再说：“你踩到龟背上去！”惊惊恐恐踩上去，老是立不稳，好的是龟沉寂如一冷石，单是瞄准了猛踩上去，龟背一角响动，裂了一道小纹，也摔得女人在地上了。柳太太慢慢地笑了，说：“五魁说的是实话，我儿的地里是不插别人的犁啊！”到了此时，女人方清楚做婆婆的在验证自己的童身，不觉满脸羞红，一腔恼怒了。死死活活逃出了土匪的手回到柳家，柳家原来要的并不是她和她的心，而是她的贞操！看来柳家在得知了她遭抢劫时就已失望了心，她的返回只是意料之外的收获。那么，土匪唐景真的糟踏了她，在验证时因处女膜破裂打喷嚏而使下身冲飞了灯草灰，龟背未裂不是千斤，婆婆又会怎样待她呢？两行悲酸热泪就流了下来。

“回来了就不要哭哭啼啼，”婆婆说，“从今往后不要对人提说你是到过白风寨的，只道是五魁背了躲在一个山岩下的！记住了吗？记住！”

婆婆出去了，不一会有人送来姜汤催她服下，再有人进来拿了香火在她头顶、周身绕了三绕，再是有人抬了环盆，添了菊花汤水要她沐浴，就听见外边鞭炮大作，遂拥来七八人牵了红绸彩带的毛驴抱她上坐。坐上去她的面与驴头相左，正欲掉过身来。牵驴人说：“要倒骑才能消灾灭罪！”拥着就走出厢房，和驴一起在院中转了三六一十八个圆圈，每一圈于东西南北的方向立栽的木桩上点燃一支香火，待到弄得她头晕目眩停下来时，她已是

坐在洞房的炕上了。

炕上并不是新娘初入洞房时独坐的一张四六草蓆，而红毡绿被铺得软乎，被窝里正睡着她的夫君柳少爷。

五魁是蒙头睡了三天三夜，昏昏如死。第三日的黄昏起来，回想往事，惊恐已去，正得意做了一场传奇人物、英雄壮士，却得知柳家少爷已经断了双腿，今生今世残废得只能在炕上躺着了。

五魁捶胸顿足地后悔起来了，自己冒死抢回的女人，就是为着她来陪伴一个不是人形的人吗？如果自己不去抢救，不在白风寨编造那一番一生唯有的一次弥天大谎，女人就是白石寨的压寨夫人了，嫁了土匪声名虽是不好，可土匪唐景却年轻英武，是个真真正正的男人啊！唉唉，到底是做了一场好事呢还是作了一次罪孽，五魁眼泪就淌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菩萨般的女人，人见人爱，原本是有最好的郎君，是有最大福享，命运却如此不济，在真正要成为女人的第一天里就遭匪抢，到了婆家，丈夫又残，这会使多少男人愤愤不平的事啊！五魁为自己痛恨，更为着女人而惋惜，也想到那个白风寨的唐景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又不知怎样的一声浩叹呢？

当女人进入洞房，看见了等待自己的就是没了双腿的一块肉疙瘩，做女儿时多年来的蓬蓬勃勃情焰被一瓢冷水浇灭，一派鸳鸯鸯鸯的憧憬一时化为乌有的女人会想到些什么呢？能不能怀疑起自己一个贫贱的与柳家无亲无故的驮夫怎么能冒死去匪窝救她出来的动机呢？女人一定要认定柳家少爷的残废在前，娶她在后，被土匪抢去，他五魁又是拿了柳家重金赎她而回又得了柳家一笔可观的酬金的。啊啊，他五魁的一切英雄行为原却是一场阴谋的大骗局了，五魁在女人的眼里是个恶魔，是个小人，是个一生一世永远要诅咒的了！

五魁想很快能到柳家去，他要把一切实情告知女人。

但五魁没有理由去柳家，除了红白喜事，一个穷鬼是不能随便就踏进柳家院门的。五魁便见天清早拾粪，三次经过柳家门前的场，或是远远地站在场前的河对面堤畔，看着柳家门前的动静。终一日，太阳还没有出来，村口、河岸一层薄雾闪动着蓝光，五魁瞧见女人提着篮子到河边洗衣服了。女人还是那么俊俏，脸却苍白了许多，挽了袖子将白藕般的胳膊伸进水里来回搓摆，那本来是盘着的发髻就松散了，篷得像黑色的莲花，后来一撮掉下来，遂全然扑撒脸前，发梢也浸在河面了。女人几次把乱发撩向脑后，常常手搭在脑后了，却静止着看起水面发呆。五魁想，那脑袋稍稍再抬高一些，就能看见蹲在河之对岸看着她的他了，但女人始终是那么个姿势。五魁看看四周，远处山沟岭上有牛的哞哞声，河下游的水磨坊里水轮在转着，一只风筝悠悠在田畔的上空荡，放风筝的是三个年幼的村童，五魁就生了胆儿，提了粪筐轻脚挪近河边，出山的日头正照了他的身影印过河面，人脸印在女人的手下了。

女人发了一阵呆，低头看见水里有了一个熟悉的人脸，以为还浸在长长的回忆之中而产生了幻影，脸分明红了一下，忙用手打乱了水面，加紧了搓洗衣服。可是，就在她又发呆之时，那人脸又印在水里，她这下是吃惊了，猛地抬了头来。五魁瞧见的是一脸的瀑布似的乌发，女人湿淋淋的手拨开乌发，嘴半张了，却没有叫出声来。

“柳少奶奶，”五魁说话了，“大清早洗呀？”女人说：“啊。”

五魁却再没了词。

女人说：“是五魁呀，多时不见你了，你不住在寨子里吗，怎不见你来坐坐？”

五魁说：“我就在寨里的三道巷住的，我怕柳家的那狗。”

女人笑了一下，但再不如接嫁路上的美妙了。五魁看见她眼睛红红的，似乎是肿着，他明白她哭的原因，心便沉下来了。

“五魁，你过得还好？”女人倒问他。

“我，我……”五魁想起自己的罪过，“柳少奶奶，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事我真不知道是那样的……你还好吗？”

女人的眼睫一低，两颗泪水就掉了下来，同时也轻轻笑了一下，说：“还好，他伤口已经不痛了。”

五魁这才注意到女人洗的并不是衣服，而是一堆沾满了血滴和药汤斑渍的布带子。有一条在说话间从石头上溜下去，要顺水冲去了，女人伸手去抓，没有抓住。

五魁就要从河面的列石上跳过来帮她去打捞，列石被水冲得七扭八弯，过了一次，没能跳过，女人说：“过不来的，过不来的！”

女人越说过不来，五魁的秉性就犯了，他偏要证明能过来，后退几步猛地加力一个趺子跳过来。但他还是没能捞住那冲走的布带子，遗憾地直跺脚。

“算了，冲了就冲了，”女人说，“你住在三道巷，我几时去谢你，你和你哥哥分家了吗？”

五魁说：“我一个人过的。我那地方脏得没你好坐的。”

女人说：“那你就常来我家喝杯茶呀！你对柳家是有恩的人……我以后听到狗咬，会出来接你的。”

女人说完，拾掇了布条在篮子里，扭身回去了。上大场的那个斜坎，回头看五魁还站在那里看着她走，半边乌发遮盖的脸上无声地闪一个笑，五魁记得那个眼笑起来特别细，特别翘。女人似乎知道五魁还在看她，步子就不自然起来，手脚有些僵，却更有了一种味道。

再是五魁依旧过了河去对岸地畔捡粪，列石怎么也跳不过去，弄湿了鞋和裤管儿。

10天之后吧，做光棍的五魁又为寨子里一家人当驮夫接回来了一位新娘，照例是被朱砂水涂抹了花脸，还未洗去，请来坐了上席的柳掌柜对他说：“五魁，你是我家的功臣哩，一直要说再酬谢你的，但事忙都搁下了。你要悦意，你来我家喂那些牛吧，吃了喝了，一年给你两担麦子。嘿嘿，权当柳家就把你养活了！”五魁毫无精神准备，一时愣了，心想柳家有八头牛，光垫圈、铡草、出粪就够累的了，虽说管吃管喝，可一年两担麦子，实质是一个长工，算什么“柳家把你养活了”？！正欲说声“不去”，立即想到若长年住到柳家，不就能日日见着柳家少奶奶了吗？且柳家突然提出要他去，也一定是少奶奶的主意。便趴下给柳掌柜磕一个头，说多谢掌柜了。

去柳家虽是个牛倌的份儿，但毕竟是作了柳家大院中的人，接亲的一帮村人就起了哄，这个过来摸摸五魁剃得青光的脑袋，那个也过来摸摸脑袋。五魁说：“摸你娘的奶头吗？男人头，女人脚，只准看，不准摸！”

村人说：“瞧五魁爬了高枝，说话气也粗了，摸摸你的头沾沾你的贵气呀！”

五魁说：“我有脚气！”

村人说：“五魁脚气是有，那是当驮夫跑得来，往后还能让柳家的人当驮夫吗，你几时让人给你当驮夫呀？”

五魁说：“我那媳妇，怕还在丈人腿上转筋哩！”

村人说：“你哄人了，现在听说有八个找你的，可惜身骨架大了些，要是脾气不犟又不抵人，那倒真是有干活的好力气！”

说的是柳家的八头牛了，五魁受奚落，气得一口唾沫都喷出来，众人乐得欢天喜地。

翌日中午，五魁果真夹了一卷铺盖来到柳家大院内的牛棚来住了，他穿上了油布缝制的长大围裙，牵了八头牛在太阳下用刷子刷牛毛。太阳很暖和，牛得了阳光也得了骚痒舒坦地卧在土窝里嗷叫，五魁也被太阳晒得身子发懒，靠了牛身坐下去，感觉到有小动物在衣服下跑动得酥酥，要脱衣捉虱子，柳少奶奶却看着他嗤嗤地笑。

女人来院中的晾绳上收取清晨照例洗过的布带儿，看见五魁和牛卧在一起，牛尾就一摇一摇赶走了趴在牛眼上的苍蝇，也赶了五魁身上的苍蝇，她觉得好笑就笑了，五魁立即站起来说：“少奶奶好！”

女人说：“中午来的？午饭在这儿吃过的吗？”

五魁说：“吃过的。”

女人说：“吃得饱？”

五魁说：“饱。”

女人说：“下苦人，饭好赖吃饱。”

五魁说：“嗯。”

五魁回过话后，突然眼里酸酸的了，他长这么大，娘在世的时候对他说过这类话，除此就只有这女人了。他可以回说许多受了大感动的言语，可眼前的是柳家的少奶奶，他只得规矩着。“多谢少奶奶了！喂这几头牛活不重的，少奶奶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是了。”

女人在阳光下，眼睛似乎睁不开，说：“五魁你生分了，不像是背我那阵的五魁了！”

五魁想起接亲的一幕，咽了口唾沫，给女人苦笑了。

自此以后，五魁每日在大院第一个起床，先烧好了温水给八头牛拌料，便拿拌料棍一边笃笃笃地敲着牛槽沿儿，一边拿眼睛看着院里的一切。这差不多成了习惯。这时候柳家的大小才开始起床，上茅房去的，对镜梳理的，打洗脸水，抱被褥晾晒，开放了鸡窝门的公鸡扑煽着翅膀追撵一只黄帽疙瘩母鸡的，五魁就注意着少奶奶的行踪。少奶奶最多的是要提了布带儿去河里洗涤，或是抱着被单来晾晒。五魁看见了，有时能说上几句话，有时远远瞧着，只要这一个早上能见到了女人，五魁一整天的情绪就很好，要对牛说许多莫名其妙的话，若是早上起来没能看到少奶奶，情绪就很烦躁，恍恍惚惚掉了魂似的。

到了冬天，西风头很硬，河的浅水处全结了冰，五魁就起得早，去河里挑了水，在为牛温水时温出许多，倒在柳家人洗澡的大木盆里，就瞅着少奶奶又要去洗布带子了，过去说河水太冷，木盆里有温水哩。少奶奶看了半天他，没有固执，便在盆里洗起来。五魁这阵是返回牛棚去吃烟，吃得蛮香。等到一遍洗完要换水了，五魁准时又提了一桶温水过来，女人说：“五魁，这样太费水哩！”

五魁说：“没啥，水用河盛着的。”

女人说：“你要会歇哩。”

五魁说：“我有力气，真有力气呢，那个碌碡我也能立起来的。”

女人说：“五魁喂牛也会吹牛！”

五魁就走过去，将一个拴牛的平卧的碌碡双手搂了，列一马步，一个嗨字就掀得立裁成功，女人尖声说：“五魁，可别闪了腰！”五魁偏还显能，再要去掀另一个碌碡，一扎马步，裤子的膝盖处蹦地裂开来，窘得五魁跑到牛棚半日没敢出来。

午饭后，柳家的人睡午觉，五魁穿了背袂，挽了破了膝盖的旧裤在牛棚出粪，正干得一头一脸的热汗，少奶奶趴在牛棚边的木杆上叫五魁，五魁忙不迭地就擦脸，女人说：“你不要命了吗？一日干不完还有二日嘛。我收拾了少爷的一件旧裤子，他也是穿不成了，你就穿吧。可能你穿着长，我改短了一下，不知合适不合适，已放到你的床上了。”女人说完话要走，却又返回来说：“这事我给老掌柜已说过了，你穿吧，别人不会说你偷的。”同时笑了一下，左眼还那么一挤转身又走，却不想一头牛在槽里吃草，一甩头，将草料和汤水甩了她一脸，五魁急扑过去拉牛头，女人擦着脸已走开了，五魁一腔激情无法泄出，抄了一根木棍就打牛，牛因为缰绳系在柱子上，受了打跑不脱，就绕着柱子转，五魁还是撵着打，那柱子摇晃起来，尘土飞扬，吓得鸡叫狗也咬了。厅房里柳掌柜午休起来，提了裤带去茅房，看见了训道：“这不是你家牛就不心疼吗？！”五魁说：“掌柜，这牛抵开战了！”棍子一丢，脚下顺势踢到牛棚角里。

五魁试穿了柳少爷的裤子，裤子当然是旧的，但对五魁来说却是再新不过的了，他惊奇的是少奶奶并没有量过他的身材，却改短之后正好合体。五魁先是穿了脱下，再穿了再脱了，不好意思走出牛棚去。当少奶奶见着他问他为啥不穿那裤子呢？他终是鼓了勇气来穿，一出门，双手不知哪里放，脚也发硬走了八字步，女人说：“好，人是衣服马是鞍，五魁体面多了！”五魁就自然了，除了在院内忙活牛棚的事，又忙活院内杂事，他也穿了这裤子牵了牛出大院去碾子上碾米。掌柜无聊，也到碾子边来，在旁的人就羡慕五魁的裤子好，五魁说：“托掌柜的福哩！”掌柜说：“五魁是我们柳家人嘛！年终了，还要给五魁置一身新的哩！”回到大院，掌柜却说：“五魁，这衣服虽是你家少爷穿过的，但只穿了一水，原本是四个银元买的布料，就从二担麦子中扣除四升，让你拾个便宜，谁让五魁是柳家的人呢！”

这件事，五魁只字不给少奶奶说，凡是看见少奶奶在院中的太阳下做针线或在捶布石捶浆布，五魁就在牛棚脱了旧裤，穿上这件裤子走出来。他当然是牵了一头牛假装要给牛去院子里的土场上刷毛的，这样，他们互相有话可说，又有事干，五魁就不显得那样紧张和拘束。这时候，少奶奶常常取笑了五魁的一些很憨的行为后就自觉不自觉地看着五魁，五魁心里就猜摸，她一定是在为自己改做的裤子合适而得意吧。但是，女人那么看了一会儿，脸色就阴下来，眼里是很忧愁的神气了。五魁便又想：可怜的女人，是看见我穿了裤子便看见了少爷未残废前的样子吗？如今裤子穿在我的身上，跑出走进，而裤子的真正主人则永远没有穿裤子的需要了，她的心在流泪吗？五魁的情绪也就低落下来，他要走回牛棚脱了那裤子，却又不忍心在女人难受时自己走掉，他说：“少奶奶，你还好？”

女人说，“不好。”

五魁的话原本是一句安慰话，如果女人说一句“还好”，五魁心也就能

安妥一份，但女人却说出个“不好”，五魁竟没词再说下去。

女人看着五魁，眼泪婆娑而下。

女人一落泪，五魁毫无任何经验来处理了，慌了手脚，口笨得如一木头，也勾下头去了。脚前是一只细小的蚂蚁在搬动了什么，看清了，是一只死亡了的蚂蚁。这死去的蚂蚁是那只小蚂蚁的丈夫吗？妻子吗？一个弱小的躯体搬运与己同样大的尸体行动得够艰辛了。五魁猜想小蚂蚁的心灵一定更有比躯体大几倍十几倍的创伤吧，眼泪也吧嗒嗒掉下来。女人突然低声说：“掌柜过来了！”双手举起来假装搓脸而擦了泪水，同时大声说：“五魁，这条牛是几个牙口了？”却不待五魁反应过来，已站起身，迎着公公问今日中午吃什么饭，她要去伙房通知厨娘呀，掌柜才没走过来。而五魁还在那里独自落泪。

这一夜又一次失眠了的五魁，细细地回想了与少奶奶的初识和每一次相见的情景，女人对自己的关心这是无疑的了。菩萨一样美好的女人，同时有一颗慈母般的心肠，这使五魁已淫浸于一种说不出也说不清的欢悦之中。中午女人当着面说了她的“不好”，当他的面流了眼泪，五魁感受到了这女人待他是敞开了心扉，完全是把他当作了亲人或知己了。但是，五魁一个下人，一个柳家的牛倌，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如果能换了腿去，五魁会决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双腿给了少爷，而只要这女人幸福。但这怎么可能呢？

使五魁稍稍心安的是，女人虽没有幸福的小日子好过，可柳家毕竟是鸡公寨最富有的大家，做了少奶奶的女人在这个家里地位也不能说低微，一切下人，甚至村寨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恭敬的。她是不会像一般人家的媳妇去田地耕犁翻种，施肥收割，也不会上山割草砍柴，一日三餐吃的虽不是山珍海味却也白米细面。这是鸡公寨多少女人所企羨不已的福份。正因为怀有这份心思，五魁在原先是同全村寨的人一起妒嫉过和仇恨过柳家的富裕的，现在却希望柳家的日月不败。他作为一个长工式的牛倌，也不再学别人的样子消极怠工，当然盼望的是柳家牛马成群，五谷满仓，而这一切均为少奶奶所有，让掌柜，让掌柜婆，甚至包括那个无法再变成完整人形的柳少爷都快些蹬脚闭眼去吧！若到那时，少奶奶再招一个英俊的主人进门，他五魁就永世为她喂牛，甚至死后，也情愿变作一头牛就来到她家供她使唤。

所以，再当少奶奶和柳家的公婆在厅房里吃着有鸡鸭的干饭时，少奶奶总是在饭桌上说鸡没煮烂，公公要把鸡头、鸡爪倒给狗去吃时，她就主张让下人吃去，端出来，当着院中吃着包谷糊汤的下人高声喊：“来，来，我爹让这些好东西叫大伙尝尝！”却全部交给了他五魁，说：“你不要嫌弃，总比你碗里的强。”他五魁明白女人的心意，就要当着她的面可口无比地咬嚼剩肉，讨得她喜欢，甚至说：“你不要顾着我，只要你吃好，我喝凉水也会长膘的！”

能说出讨女人喜欢的话来，这于五魁也惊奇了自己。女人就在一次他说过话伸手点了他的额头，很撒娇地噘了嘴；“你倒会善解人意了！”

这撒娇使五魁去了许多怯，生了无数的胆，言语也渐轻狂起来，他希望这样的撒娇每日赐与他，但往后却再没有发生。

到了阳春三月，柳少爷能被人背了出来在院中晒太阳，看云看云中的鸟了。五魁很久很久再没有见过少爷，猛地见了，确实吓了一跳。少爷头发蓬乱，脸色浮肿寡白如发酵面团，一条被子裹着整个身子在躺椅上，俨然一颗冬瓜模样。可躺椅前的小桌上，少奶奶端放了茶水，水烟袋，又正砸着一碗

核桃，砸一个仁儿，交给他嚼吃。五魁就走过去，躬腰问候；“少爷，你晒太阳了！”

少爷看见了五魁，五魁高高大大站在自己面前，嘴要启开说话，没有说，眼睛就闭上了。五魁不知怎么啦，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女人说：“五魁你蹲下来砸核桃吧！”五魁一时明白女人让他蹲下来，一定是少爷不愿看见一个下人端端正正站在他的面前，就蹲了下来。少爷果然眼又睁，却立即看见了五魁穿的是自己曾穿过的裤子，七眼就看女人，鼻子里发出“嗯？！”女人立即说：“这是爹让给的。”少爷却对五魁吼了一声：“你滚！我是你的牛吗，我让你来喂我吃吗？！”女人咬了咬嘴唇看着五魁，五魁起身走了。他听见身后的少爷脾气更焦躁了，连声骂女人把核桃全砸碎了，遂即垮地一声。五魁回过头来，少爷推翻了小桌，正将一把核桃打在女人的脸上。女人呜呜地哭起来，而从厅房走出的柳太太却在说：“你哭什么呀，他是你男人，你不知道他心情不好吗？”五魁急步回跑到牛棚里自己的卧屋，扑在床上，头埋被窝里无声地流泪了。

从那以后，五魁每天可以看见女人抱了少爷到院中的躺椅上晒太阳，除了那一颗硕大的脑袋，纤弱的女人犹如抱了一个孩子，然后服伺他吃喝。这个时间，院子里不能有人走过，甚至后来不能有牛羊猪狗走动，凡是看见除了父母和自己女人外，任何有腿的东西都要引起他的烦躁，院子里以致后来只有碌碌、石头或蒲团。

不久掌柜放出风来，说自己的儿子伤彻底好了，又不久就购买了两个粗壮的丫环在少爷跟前伺候。五魁见到了女人，说：“有了丫环，你就轻省了。”女人却哇地哭出了声，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平生第一次对五魁发了脾气。五魁一脸灰气，只好回坐到牛棚发了半天的呆。

想不通女人是怎么啦的，五魁一连好多日在纳闷着，夜里更睡不着，起身坐到牛槽边，听吃了夜草的老牛又把胃里的草料泛上牛嘴里反嚼，还是琢磨不出女人发脾气的原因，倏乎什么地方就有了幽幽的哭声。五魁凝神听了听，声音是从厅房左边的套间里发出的，似乎就是少奶奶在哭，便挪脚往那里走，隐身于鸡圈的后墙处，看见了少爷的卧房窗口还亮着灯，果然是少奶奶的哽咽声，同时听见少爷在大声骂：“你是我的老婆！你是我的老婆！”接着有很响的耳光，旋即窗纸上人影晃动，少奶奶的哽咽声起起伏伏断断续续，静夜里十分凄凉。天明，五魁起得早，在院子里第一个就碰见了女人，女人的脸上有了几道血痕，眼肿得如烂桃一样。五魁不敢相问，想起那日的训斥，扭身要走，女人却说：“五魁，五魁，你也不理我了吗？”五魁吃了一惊，站住说：“少奶奶，你怎么啦，跌在哪儿吗？”女人说：“打的。”五魁一脸苦楚：“昨夜我听见你哭了。”女人说：“你是知道了？”

五魁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只恨少爷的脾气古怪暴躁。可是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女人都是很晚很晚了在房中哭泣，哭泣中还是夹杂了殴打声。终于在一个中午，五魁正在牛棚垫圈，远远看见女人又陪着少爷在晒太阳，少爷就反复要求着女人把头发梳好，还要抹上油，敷粉，施胭脂，女人都依了，少爷就笑着问身边的两个丫环：“少奶奶美不美？”丫环说：“美。”少爷再问：“怎么个美？”丫环说：“像画上走下来的。”少爷又问：“你们见过谁家的媳妇比少奶奶还美？”丫环说：“再没见过。”少爷就让女人前走几步，转过身来近走几步，嘿嘿地笑。女人始终没有笑，机械得像个木偶，忽见狗子从大门口走过来，说：“它在门口，怎么进来了，我去拴好！”

就走去了。少爷却说：“抱我回去！”两个丫环抱着回去了，立即一个丫环在那里喊：“少奶奶，少爷叫你了！”女人说：“他要吃酒，你去给他倒呀！”丫环说：“他不吃酒，他要干那个……事哩！”女人不言语，头也不回地还是走她的路。另一丫环又跑过来喊：“少奶奶，少爷发脾气了！”果然卧房里就有了少爷狼一样地嚎叫。女人依旧往大门口走。大门口却站住了刚刚从外进来的柳太太，竖了眼，说：“你男人叫不动你吗？回房去，回去！”女人站住了，却抱住了那里的一棵树说：“我不回去！”柳太太一个耳光打过来，叫道：“你是反了吗？柳家娶你为了啥？你那个×是要留给外人吗？！”便哗啦关了院门，喝令两个丫环把她拉回屋。两个丫环架了女人走，柳太太一边在后边骂，一边用手拧女人的屁股，到后，卧房里就传出凄厉的哭声。

五魁明白了女人在受着怎样的罪了。

于是，他不愿意再见到少奶奶，不忍心看见了她而想到自己的过失所造就给她的不幸，也不忍心见她而她看着他时的脸上的悲苦和难堪。五魁除了担水、运土和背驮草料，其余的时间就把自己困在牛棚里，或是架了铡刀，双脚站在分叉的铡刀架狠命地铡草。他想起了一首很古老的谜语：“一个姑娘十七八，睡下腿分叉，小伙有劲只管压，老汉没劲压两下。”谜底说的是铡草，谜面的描写却是男女交合。遂想，少奶奶如果嫁的是一个老汉也还说得过去了，而少爷算什么呢？柳掌柜为儿子购置的两个粗笨丫环，就是抱了那一个肉疙瘩来发泄性欲吗？五魁不禁一个冷颤，一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夜里的哭声如幽灵一样压迫着五魁，白日丫环的每一次呼喊：“少奶奶，少爷叫你哩！”五魁更紧张得出一身汗，就跑进自己的睡屋拳击墙壁，墙壁泥皮便一片一片掉下来，一日，他把一大片泥皮击打下来，精疲力尽地瘫坐在了地上，屋门哗啦地被推开了，几乎像倒柴捆一样，少奶奶披头散发地顺着门扇倒在地上，放开了声地哭。五魁惊叫着扑来把女人扶起，女人的头却歪在他怀里哭声更大，眼泪鼻涕湿了他一胸口，五魁把女人抱住了，像远久出门的爹抱住了委屈的孩子。女人说：“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把我带来的，你把我再带走吧！我去当尼姑，去要饭，我也不当柳家的少奶奶了！”

“少奶奶！”女人的一句话，使五魁惊恐了，他一个下人，又是在柳家的大院里，柳家的少奶奶却在自已怀里，五魁触电般地挣脱了身，站起来，但五魁无言以对。

门在开着，门道里射进着白光光的太阳，女人瞧见五魁的呆傻样，越发嚎陶了。

“你不要哭，你一哭，他们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五魁紧张地说。

“你把我带走，你把我带走！”女人不哭了，却死眼看着他。

这不是说小儿语吗？五魁是什么人怎么敢带走一个少奶奶？怎么带？往哪儿带？带出去干啥？五魁看看女人，又看看院外，五魁急得也掉眼泪了。

女人却突然双手攥了拳，狠劲捶打自己的一双缠过的小巧玲珑的脚，她没有翅膀，也没有一双能跑动的脚，只好双手开始抓自己的脸，已经抓破了一道血印，五魁就握住了她的双手，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女人往回抽手：“都怪我这张脸，我成丑八怪了，让他休了我去！”

五魁只是抓了她的手不放。

柳掌柜领着人横在门口了。五魁忙丢开女人，静立一边，听掌柜在骂道：

“柳家世代代还没这个门风哩！捆起来，给我往死里打这贱货！”

女人立即被一条绳索捆了，五魁跪下说：“掌柜，这不怪少奶奶，要打就打五魁！”

掌柜说：“你瞎了心，也是我瞎了眼，原本我也要打死你这个穷鬼在这里，念你还对柳家出过力，你滚吧，滚，永远不要到我柳家来！我也告诉你，你要在外胡说少奶奶来你这里的事，我会拧了你的嘴到屁股眼去的！滚！”

五魁把自己的铺盖一卷，夹在胳膊下走出门，走出门了，回头看了一下女人，说：“掌柜，那我走了，五魁最后求求你，你把少奶奶放开吧，你若不想杀了她，她还是柳家的人嘛！”掌柜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同时听到了劈哩叭啦的鞋底拍打女人脸面的声音。

五魁回住到他的老屋，第三日就逮到风声，说柳家的少奶奶得了病，瘫痪了，整日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有人就说，柳家真是倒了霉了，少爷没了腿终日睡床，少奶奶有腿也是床上睡。有人也说，柳家爱收藏古玩，这少奶奶成了睡美人，如今可是柳家的一件会说话的赏玩品了吧。五魁知道少奶奶为什么就瘫了，这么一瘫，少爷就可以随时让两个丫环抱了他来享用女人了，不禁黑血翻涌。

到这个时候，五魁才是后悔，为什么女人求他带着出逃，他竟没有应允呢？这该是一种什么缘分，一个下人偏今生与这个女人有恁多的瓜葛，第一次没有听她的话过河逃亡，这一次还是没有听她的话逃出柳家，就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次次在苦难中沉下去，五魁仇恨起自己的孱弱和丑恶了！

夜里，他独自躺在床上，总听见有人在叫着“五魁”，叫得殷切，叫得怨恨，叫得凄惨不堪。五魁明白这是一种幻觉，幻觉却使他整夜不能安生。是的，完全变成了一个供人发泄性欲工具的女人那么睡在床上终日在想些什么呢？她清楚不过的知道大天白日在柳家大院内跑到五魁的卧屋痛哭是做少奶奶的危险，但还是跑去了，去了在他怀里放声大哭，她是忍无可忍了，她是勇敢的，是把五魁还看作了一个男人，一个有能力保护的人，可是可是，窝囊的五魁……五魁为着自己伤透了一个女人的心的罪过把头颅在炕沿上咚咚地撞起来了。

五魁再也在屋里坐不住，黑明不分地，在村巷中走，看什么也不顺眼，见鸡撵鸡，逢狗打狗，旁人说一句，就张口叫骂，甚至大打出手。鸡公寨的人都认定他是疯了，叫苦着这地方脉气不对头了，尽出了些不可思议的人。也就在村人这么疑惑恐惧之时，一个晚上竟又是柳家的在村口大场上的三座高大饲料谷草堆着火了。火光十分大，冲天的烟火笼罩了鸡公寨，照得半边天都红了，柳家老少，一并男女佣人哭喊着招呼村人去灭火，鸡公寨所有人皆忙如乱蚁，却有一个人在忙乱中溜进了柳家大院，直奔少爷的卧房。

推开屋门，少爷首先发现了，张口欲喊，来人一拳打过去，肉疙瘩窝在那里昏过去了。转身过来，女人仰躺在另一床上，窗棂透进的月光照她美如冷玉，他扶着床沿给她笑着，眼泪却流下来。

“五魁，是你放火了？”女人聪明，女人说。

五魁点点头。

“你就为着来看看我吗？你真是不要命了！”女人说，伸出手来摸上了五魁宽宽的额角和鼻梁。“你快回去吧，让他们发现你真会没了命的。”

五魁说：“我是来要带你走的！”

女人说：“迟了，都迟了，我成了这样子，我已经认作我是死了。五魁，

我不能再害了你，你快走吧！”

五魁忽地挺直腰，说：“我要带你走就要带你走！”双手将被的四角向一起裹，女人裹在被卷里，用力一耸，身子已钻在被卷下，双手趁势往后搂了顺门就走。

五魁将女人背到了很深很深的山林。

一夜的山高月小，他只是拐进一条沟慌不择路，直走到了两边的山梁越来越低，越来越窄，最后几乎合二为一在一座横亘的大岭峰下，已是第二日的中午了。感觉到鸟飞天外，鱼游海际，柳家是不会寻得着了，坐下来歇息，啃了块从家里出走时揣在怀里的玉米面饼子，两人皆觉得没有一丝力气可以再迈动一步了。这是什么地方，翻过这黑黝黝的岭峰之后那边又将是什么地方，女人询问着五魁，五魁也茫然无答。走到哪儿算哪儿，哪儿的黄土不养人呢，五魁放下了女人，要到看不见也闻不着的地方去解手，大出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坍得几乎只有四堵墙的山神庙，墙头一株朽了半边靠一溜树皮还活着的老柏，庙后的涧上桥已断去，残留了涧沿一根腐木，卧一秃鹰呆如石头，偏很响地拉下了一股白色的稀粪。五魁一时四肢生力，跳蹦着过来如孩子：“咱有住的了！”

女人眼睛也亮起来：“在哪儿？”

五魁说：“那边有个山神庙！既然有庙，必定先前住过了人，住过人就有活人处，咱们住在这儿不会死了！”

把女人背过来，钻过了梢林和荒草，女人的身上、被子上、头发上粘满了一种小小的带刺的草果。五魁指着古庙在讲，屋顶虽然没有，砍些树木搭上去就是椽，苫上草编的帘子就是瓦。瞧，从庙后的那条小路下去不是可以汲到涧中水吗？那一大片埋脚的荒草又是以前开垦过的地，再开垦了不是就种麦子收麦粒种玉米收棒子吗？满树林子里的鸟儿会来给你唱歌再不寂寞，一坡一坡的野花采来别在你的头上，蝴蝶能飞来看你的美。这草地多软，太阳出来背你睡在这里，你会看着云一疙瘩一疙瘩怎样变个小猫小狗从山这头飞过山那头。咱们再可养鸡养羊养牛，你躺着看我怎么吆喝犁地，若有黄羊山鸡来了，看我又怎样将它们打倒，熬了肉汤给你喝……

五魁说得很兴奋，在他的脑子里，一时间浮现了往后的清静日子的图象，离开了柳家，他那般勤女人的秉性就又来了，说：“你不信呀？你只管信着好了，我有力气的，我不会死去就绝不会让你死去，你信吗？”

女人说：“我信你的，可我肚子饿了，你还有饼吗？”

五魁在怀里掏，掏出一块干饼末儿，把腰带解下来再寻，饼是没有了，却掉下了一把小小的斧子。斧子是五魁准备着进柳家时作防身用的，一路安全无恙，他几乎就忘了还带了斧子来。

五魁虽然在安慰着女人，说了那么多似乎已是一处安闲日月的住处，可他在说这些的时候何尝没有知道这一切只是日后的事呢，现在，他把她背驮到了一个荒野僻地，自由是自由了，却拿什么吃呢？晚上怎么睡呢？如果是他一个人还罢了，还有少奶奶这样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他英雄一场搭救出来，又让她饿死冻死在山地吗？！

女人看着发急了五魁，她笑了：“我并不饿的，真的，不饿哩！”

五魁没有接她的话，不知怎么心里酸酸的，他有些羞愧，却不愿她看见他的难堪，将目光极力放远。他看到了白云驻在远处的山林上。五魁把斧子重新别在了腰带上，说：“你好生坐着，我过会就来！”

他去了，他又回来了，带着好大一堆山桃。山桃个儿不大，颜色异常红嫩。五魁无法带得更多，是脱了外套的那件柳少爷穿旧的裤子，用藤条扎了裤管，桃就装在里边竖立了一个人字。五魁不识文墨，不知人字的好处，却看作如搭在驴背上的褡裢，架在脖子上回来了，他说：“我是王母娘娘的毛驴给你送蟠桃来哩！”

有了吃的，五魁却不吃，他在女人很响的咬嚼声中去砍作椽的树木。选中了一种长得并不粗却端直无比的栲木，斧子在下面哐哐哐地砍，树顶上的稀疏的黄金之叶就落下来。叶子往下落如是蝴蝶，一旋一旋划着无数个半泓，女人就想起了小时在清水潭丢砣入水的情形，叫道：“我要那叶子呢！”五魁抱了一堆叶子给她，她还要，叶子就把她埋起来，她睡在了一片灿烂的红霞上。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精力，五魁砍下了 10 多根栲树搭到墙头去，因为没绳，一切都是葛条在系，他手脚并用从墙头上、木椽上爬动，女人就要在下面反复叮咛着小心，五魁偏不，竟要直了身来走，有几次腿一晃就掉下来，但身子掉下来了手却最后抓住了椽，女人大呼小叫，甚至变了脸唬他。五魁说：“我是逗你哩！”然后把树枝和茅草编成帘子，一层一层苦上去，一个安身的小巢屋就造成了。女人要五魁背她到屋里去看看，五魁说不急，又砍了无数细树棍来，先一排排在屋地栽了一圈，再竖一层横一层把软树枝编上去，再铺了茅草和树叶，五魁把女人抱过来往上一丢，女人竟被弹得跳了几跳，惊喜地叫：“这是睡了棕条床嘛！”

五魁得意地唱起来，唱的是一种很好听的小曲子，就眨了眼说你是应该有这么个床的，小时候爹说过故事，讲古时代一个皇后流落民间，后县官查寻时，竟有三个女人自称是皇后，县官就在床上放一个豌豆，再铺了 40 几条被子让每一个女人去睡，有谁感觉到身子垫着疼，谁就是皇后。五魁也就捡一个小石子放在茅草里边。

“我不是皇后！”女人笑着说。

“可你是少奶奶！”五魁说。

“我不是少奶奶！我不是！”女人坚决地说。

五魁愣了一下，立即也说：“不是，不是柳家少奶奶！可你是菩萨！你能试出垫吗？”

女人说：“我腿全瘫了，你放上刀子也试不来的。”

五魁的心受了刺激，低下的头好久没有抬上来，就走出去又狠劲砍了树枝抱回来，在屋之中间扎起一个界墙了。

女人说：“五魁，你又要干什么？”

五魁说：“那边是你的房间，这边该是我的卧屋了。”

女人的眉宇间骤然泛红了，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五魁的老婆。五魁只是救自己的一个贫贱牛倌，一个光棍。在这荒天野地的世界里，五魁能自觉地将睡窝一分为二，女人为坦白憨诚的五魁而感动了。

红日坠山，乌鸦飞来，天很快就黑了。五魁安置了女人睡好，燃起了松油节，便坐于旁边说许多豪迈的话，叮嘱夜里放心安睡，狼来了有他哩，熊来了有他哩，有他持一把斧子守在同一屋中的界墙那边，狼和熊是不敢靠近的。女人担心不下的是他没有被褥，五魁说他不会冷的，他从小就钻过茅草堆睡，做得也是甜甜蜜蜜的梦来。并说他明日就再下山，要弄来被褥、锅碗、粮食。女人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跳跃不已的松节灯焰，又看着那松节灯焰

的光亮在五魁的黑红脸上反射出的油光，她说了一句：“你快歇去吧，五魁哥！”

五魁倏忽浑身骨节酥软了，瓷眼看着女人，女人也看着他，五魁的嘴唇翁动了，颤巍巍伸开了双手，但手只把女人的被角掖了掖，忽地拨大了松节灯焰，再慢慢地压灭了，轻脚退出来到界墙的那边，躺在自己的草铺上了。

五魁并没有在自己的卧屋点燃松节，他感觉到黑暗对于他的世界更大，内容更丰富。人世间有一种叫诗的东西五魁不懂，五魁心里却涌动了一种情绪很兴奋，很快活。劳累了一夜一天的疲倦没有集中到他的眼皮上来，坐起来，实在觉得睡着是太浪费，太辜负这夜了。

这一举动和想法于五魁是从未发生过的，他不明白今日里怎么啦，是充满了自己久久以来的内疚呢，是帮助了女人解除折磨，第一次体会到了保护了女人的男人的能力呢？

墙那边的女人瑟瑟窸窣了一阵之后一切归于安静。可怜的女人经历了一夜一天的惊恐和劳累是需要安眠了，她醒着的时候，温柔和气，睡着了也如猫一样安闲，发出轻轻的啾儿啾儿的呼吸。作为一个爱恋着女人的光棍汉五魁，在这么个晚上同一个美艳女人睡一庙内，仅一草墙之隔能听到她的呼吸，闻到她的气息，五魁的感觉十分异样和新奇。他轻轻扭转了脖子，将头贴近了草墙，只要用刀轻轻拨动，从那间隙就可以看到椽头缝里透进月光所朦胧了的夜中的睡美人，这种欲望一经产生，五魁浑身躁热烫的，恍恍惚惚竟站了起来，挪脚往门口走，要走进墙的那边去了。

但是，睡窝前的那一块白光忽地消失了，这白光是屋顶草隙所透射的，五魁初睡下时幻觉是一块白石头，也是走入的白月亮，现在消失了，而自己却正动步将身子处于了这白光之中，猛然获得的是一种警觉，以为受到了一种惩罚，被光罩住要照出他的心中邪念，五魁责备起自己了：这是要干什么去？去了墙的那边一下子按住了她吗？还是跪在床边乞求赐舍，那又说些什么话呢？

五魁认定了这白光实在是天意，是在监视他的一只夜之眼。去了那边，女人会如何看待他呢？强迫是完全可以如愿的，这女人就是自己的了，可英雄英雄救她出柳家，原来是为了自己，这岂不如同土匪唐景，唐景他们抢人且公开说是为了个压寨夫人，而自己却打着救人家的名份，做乘人危难的流氓无赖了！即是女人悦意的收纳自己，在五魁做人的规矩中这又是一场什么事体呢？

五魁回身坐到了草铺，那一块白光又出现了。白光的出现使他心情平静下来，感觉到从一种罪恶的深渊重新上岸，为自己毕竟是一个坚韧的男人而庆幸了。随之而来的是坦白磊磊的荒诞之想，其兴奋自比刚才愈发强烈，试想想，自己一个什么角色，竟现在有一个美艳女人就在自己的保护下安睡入梦，这是所有男人都不曾有的福份，就是那个家有万贯的柳少爷他也没有的了。女人睡得那么安妥和放心，她是建立在对自己绝对的信赖：那么，作男人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呢？一只蟋蟀不知什么时候跳到了白光之中，嚯嚯地振翅鸣叫了。这旷野的小生命，山林精光灵气凝化物，又喝饱了甘露在为他五魁颂什么样的赞歌吗？

五魁平身躺下，在蟋蟀的美音妙乐中迷迷糊糊坠入梦境。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醒来，觉得胸膛上奇痒，本能地拍了手，手心粘腻腻一股腥味，同时听到嗡嗡之声不绝，他明白深山林子里蚊子很多，入睡时或许蚊子还不曾知

道这里有了人，也不知人血的滋味，在月到中夜才成团涌来的吧。五魁用唾沫涂着被叮咬的地方，立即想到墙的那边的女人也一定被蚊子欺负了，薄嫩的皮肉，所叮咬的地方恐怕不是一个红点而大若小栗的疙瘩了。五魁终于走出睡窝，蹑手蹑脚到墙的那边用火链打着火，燃一小堆湿茅草，让浓烟为女人驱赶蚊虫。这一切做得特别小心，黑暗中女人却说：“五魁哥！”

声音低却清脆，当然不是梦话，五魁忙解释：“我，我不是……我是来烟薰蚊子的……”

“我知道，”女人说，“我有被子盖了头，蚊子叮不到的。”五魁说：“你是早醒了？”

女人说：“我一直没有睡得着哩！”

女人没有睡觉，这是五魁难以想象了，她睡不着在想些什么呢？那么，她是听见了墙那边自己曾经站起又睡下的声响了吗？五魁的脸在黑暗中又红了一下。

“夜深了，要抓紧睡的。”五魁说着，赶紧就退了出来。

一切又都安静了，五魁却没有再睡下，也没有燃湿茅草取烟，还在琢磨女人没有睡着在想些什么，是不是也同自己一样的想法呢？念头一闪，就又责备起自己的不恭。不想了，不再想下去。可是，身闲的又无睡意了的五魁越是不让自己想女人，脑子里总是摆脱不了女人。今晚里她没有说他们就住在一个床上，也没有说出两人要分住两个地方，其实这女人已是把他当作最亲近的人了。现在蚊子这么多，那边燃了烟火，他这边偏不燃，就让蚊子都过来叮咬他吧。在一只蚊子又于他脸上叮咬得火辣辣痒痛，五魁再不拍打，倒生出一种奇异的想法：这只蚊子或许是刚才在墙那边叮咬过了女人的，现又叮咬了自己，两人虽然分住了两处，血却在蚊子的肚里溶合一体了吧。再幻想：如果自己能变成个蚊子就好了，那就飞过去，落在她的脸上叮她，这叮当然不要让她疼的，那该多好哩。或许，她能变个蚊子又过来哩，那怎么叮怎么咬也都可以了，即使这叮咬会使他五魁中毒，发疟疾，他也是多么幸福的啊！

天亮起来，脸上布满了一层小红疙瘩的五魁来告诉女人，说他下山去，女人哭了。五魁安慰女人，保证很快就能回来，女人说：“我哪里是为了我，我半死不活的人却要害你！”就从头上拔了头钗，从手腕卸了银镯，说是到山下什么地方换些吃的穿的，五魁这时倒哭了。女人便笑了，说：“我不哭了，你倒哭，男人家的羞死了！”五魁也就不哭了，把昨日采摘的山桃一颗颗擦净放在床上，出来用木棍拴了柴门，说：“我走呀，”就走了。他一路小跑下山，却并没回到鸡公寨，抄近道去了苟子坪见女人的老爹。老爹正在家长吁短叹，因为柳家派人已查看少奶奶是否被偷背回娘家了。听了五魁叙说，老爹倒生了气，说女儿嫁了柳家，嫁鸡就要随鸡，嫁狗就要随狗，何况柳家何等豪富，人一生有吃有喝还不是享福吗？五魁不等说完出门就走，老爹还拉住问：“你把她藏在哪儿了？”五魁说：“这我不能说。”老爹说：“你不说也罢，既然我女儿是个薄命享不了大福的人，我也没办法了，你就带些吃食去吧。”翻锅里瓮里却没什可吃的，从炕洞的夹缝中抠出几个银元给了五魁。五魁下午赶到一个镇上，将头钗、银镯兑换了银钱，买了一些粮食以及锅碗油盐，再就是一把锄头。

他们就这样在深山野沟住下来了，五魁每日于庙后开垦新地，播下种子，然后挖了竹根，采了山楂野果，拔了野菜蕨芽，回来做菜糊糊饭吃。三天四

天了，砍一根木头或一捆竹子掬到山下的镇落去卖，再办置生计用品，日子一天比一天开始有了眉目。

女人肤色明显地是不如先前了，但精神挺好。每日五魁开垦地，就让背她出来，靠一棵树坐了，她不能帮了五魁去劳动，却知道五魁喜欢她，喜欢来了就能解他的乏，她就不断地说许多话给他，还给他唱歌。她的手能动的，又懂得女人美在头上，就拿了新买来的梳子不停地梳各种各样的发型，让五魁瞧着好看不？五魁说：“你怎么个梳都好看！”就折一朵花来让她插。女人偏要五魁给她插。五魁为难了，女人噘了嘴生气，不理五魁，五魁的憨相就暴露了，不知所措。女人抬头，五魁只是蹠在那里看她，说：“你生气了也好看哩！”还是噘着嘴。五魁就说：“你不高兴了，我给你翻个跟斗你看吗？”就一连翻了五个跟斗，女人倒忍不住噗嗤嗤笑了。

一日没风，暖暖和和的，五魁挖了一阵地，地头上的女人在叫他：“五魁哥，你要歇着！”

五魁说：“我不歇。”

女人说：“我要你到这边来哩！”

五魁走过来，女人把头发解了，扑撒满头，又将衣领窝进去，露出长长的白细脖子，说：“你给我分分头发畔儿。”五魁只好蹠在她身后分发畔。柔软光洁的头发揽在手里，五魁的心就跳起来，女人问：“我头发好吗？”五魁说：“好。”女人说：“怎么个好？”五魁说不上来，拿眼睛看见了头发拢起了的后脖，甚至从脖的圆润白腻的边沿看见了前边解了领口扣子的地方，那愈往下愈起伏的部位，在阳光下有细小的茸毛晕成了光的虚轮，能想见到再下去的东西会有怎样的弹性，散发着怎样的芬香。五魁禁不住浑身酥颤起来，越是要控制，越是酥颤得厉害，那手中的头发就将这酥颤传达到了另一人的身上。女人问：“你冷吗？”五魁说：“不冷。”站起来，却一身的汗，说天气怪好的，坐在一边掏起了耳屎。

掏耳屎是五魁的一种发明，他往往在最骚动不安，或是害怕了女人瞧见了裤子的一部分出现异常而不致两人尴尬的时候，就要坐下来掏耳屎，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

但是，女人却说：“你笨手笨脚的，让我替你掏吧。”

他不肯过来，女人手一伸，牵了耳朵过来。掏了又掏，女人让他坐得更近，竟将他的头侧按在了自己怀里在掏了。头侧睡在女人怀里，五魁一切皆迷糊了，温馨馨的热气从女人身上涌入他的鼻中，看见了衣服内部有肉团在咕拥着，他很窘，却觉得到处的石头到处的树木都是人，都是用眼睛在瞧他，他的那只被掏着的耳朵就火炭一样的彤红起来。

“好了，”他架开了女人的手，把头抽出来了。

女人明白他的意思，不禁绯红了脸面，要说什么了，却没有说，假装看见了远处林子里飞动了一只五彩的山鸡，一口气轻轻吁出。

这吁出长气，五魁是看见和听见了，他感觉到时间突然很长起来，想岔开来说些别的话，一张口却说起往昔接嫁的一幕，女人突兀兀冒了一句：“唐景倒不是个坏人哩。”

“不像个土匪。”五魁说，真心也这么认为了。

“可他怎么就当了土匪呢？”女人还在说。

也就是搭这以后，他们常常便说到了土匪，而差不多话题都是由女人首先提到的，五魁想，女人说到唐景的好话，或许是与那个柳少爷做对比的。

是的，唐景土匪真是个人物，他闹得天摇地动的事业，官家也惹他不起，却偏偏是那么一个俊俏的脸面，抢得女人又被他五魁三言两语的谎话所骗，放人或或许也是可能的，没想竟动也未动女人一下就放了。他们虽然这么论说着唐景，土匪唐景毕竟是遥远之事，五魁就又想到，女人这么提说唐景，莫非日子是太寂寞了吗？尤其在他下山去购买东西或上山去砍柴捡菌子，留下一个走不动的她在草房里，她是没有个可说话解闷的人事了。因此，他又一次下山，花了钱买来一只狗子。

狗子非常地漂亮，一条大尾巴弯过来，可以搭到头上，黄毛若金，却在眼睛上部生出两个圆圆的白毛斑。女人叫狗子为四眼。

四眼初来，性子很野，总是乱跑，五魁怕它逃散，拿绳拴在一块石头上，而它一听见山林起风就狂吠不已，竟要拖了石头扑腾。女人解了石头，拉到身边拿手抚摩那软软的耳朵和长长的毛，不住地唤：“四眼，四眼。”四眼不再狂躁，只要女人锐声叫着它，即使它已经跟着五魁到了山林，也闪电一般返来摇尾了。五魁常常劳作回来，总看见狗卧在女人身边如一孩子，女人正给它说着话，似乎一切话皆能听懂，女人竟咯咯笑起来，五魁就说：“四眼是咱的一口人了！”

女人说：“四眼好通人性的，它不仅听得懂我的话，连心思都猜得出来哩！”就拍了狗子头，“去呀，你爹回来了，快给他个蒲团歇着。”四眼果然把一个草编蒲团叼给了五魁。

五魁说：“我怎么是狗的爹？”

女人说：“你不是说四眼是一口人吗？”

五魁说：“那你该是四眼的什么呢？”

女人说：“我做四眼娘！”

五魁说：“可不敢胡说！”

女人一吐舌头，羞得不言语起来，眼睛却还看着五魁，五魁也就看着她。四眼站在两人之间，也举了头这边看看，那边也看看，未了却对五魁汪汪吼叫，女人说了一句：“四眼向着我哩。”把狗子招过来抱在怀里，那金黄的狗尾就如围巾一样缠了女人一脖颈。

女人是不寂寞了，而使五魁心愈来愈不安的是女人一日不济一日地削瘦起来，虽然每次做饭，他总要先给她捞些稠的，但她吃着的时候常说：“这菜要炒一下就特别香了！”五魁就十分作难。女人在柳家的时候，她是从未吃过这种清汤寡水的饭食，五魁即使尽最大努力，自是与柳家不能伦比，他不禁怀疑了这样下去能是什么结果呢？原本是救了女人出来让她享福，而反倒又在吃苦，尤其在他每每回来看见了她的泪眼，而一经看见他了又要对他笑，他就猜测女人一定是为往后的日月犯愁了。于是，就在女人时不时提到土匪唐景，五魁突然感到自己认为英雄了一场救她出来，是不是又犯了大错误呢？他倒希望在某一日那个唐景会突然出现，又一次发现了女人而把她抢走！土匪的名声是不好听，但自己一个驮夫出身，一个没钱财没声望没武功不能弄来一切，自己的名声还真不如唐景。也正是有这一条原因，他五魁才自己说服了自己，压迫了自己的那方面欲望。而唐景呢，虽是个土匪，可是多英俊的男人，闹多大的事业，又有足够的吃的穿的戴的……

五魁在心里说：好吧，既然我爱着这女人，要对这女人好，那就再躲过一段时间，等山下柳家的寻找无望而风波平息，我就把女人背到白风寨去，我权当作了她的亲哥哥，哥哥把妹妹嫁给唐景。或许，唐景以为她仍是白虎

星，不愿接娶，那就说明一切，甘愿受罚，要是嫌她成了瘫子，他也会说服唐景的：她瘫了，她也是睡美人，世上哪儿还能找下这么美的人呢。况且她菩萨般心肠，天下还能有第二个吗？

有了这种心思的五魁，却没有把心思说给女人，而是加紧劳作，接二连三掬了木头和竹子下山赶镇市，宁愿自己少吃少喝，为她弄来可口的食物，一面暗暗打听鸡公寨的动静以及白风寨的消息。

或许是努力的报应，或许感动了上苍，山神破庙中的东西丰富起来，女人脸上的气色红润起来，在太阳温和的中午女人被背到庙前的草地上，五魁也看见了女人起伏的身躯恢复到接嫁时的模样，那隆起的前胸愈加饱满起来了。五魁却黑瘦如烧焦的木柴，显得嘴大，鼻子大，眼白特多。但五魁，十分地得意了，感觉里他现在最磊磊坦白，无私心邪念，他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如给黑夜以月亮，如酝酿一轮红日将付于白天。他平生第一回地出口叫女人是“妹妹”，无拘无束地为她分发畔，烧了水给她洗头洗脖还洗了脚，甚至下定决心在他背她走下山去的时候一定得把以前贱卖出去的头钗和银镯再给她买回来。

进入冬天，到处都驻了雪，五魁在房中生燃了柴火，自己就往山上去捕杀岩鸡子。五魁没有枪也没有箭，但他摸清了岩鸡子的特性，仍可以赤手空拳弄到这种美味的东西，他翻过了一条沟，又爬一面坡，在一处树木稀少的土壑地带，果然发现了就在那并未避风的一个低岩上站有十多只岩鸡。他就手脚并用爬至壑沟中间，拣了石头掷向左岩，大声叫喊，受惊的岩鸡叶啦啦向对面岩上飞，岩鸡是飞不高也飞不远的落在了对面岩上，他就又掷石子向右岩，大声叫喊，岩鸡又飞向左岩。如此只会笨拙地向两边飞停的岩鸡，就在他永不休止的掷打叫喊中往复不已，终有三只四只累得气绝，飞动中突然在空中停止，如石子一样垂直跌死在涧底。五魁捡了岩鸡，一路高唱着往回走，直走到山神庙后了突然捂了口，他想冷不防的出现在女人面前，然后一下子从身后亮出肥乎乎的岩鸡，让她吃惊不小，要问是怎么猎得这么多？那时候，他，五魁哥，就开始一边烧水烫毛，动刀剖鸡，一边讲他的聪明与能干，当然要夸大其词，从她的眼里读出一篇英雄的颂辞来啊。

但是，当五魁走近了房前，却无一点声息，连四眼也没有听到动静而来迎接，本来是要按捺下收获后的激动，仍禁不住轻狂的五魁还是先从柴门缝中要看看睡在里边的女人。

这一看，却使五魁长长久久地冻僵住了。

草房里的女人是还睡在被窝里，而那四眼竟也同女人一样睡在被窝，且前爪分叉在女人的头的两边撑着，身子却在动。五魁先是惊奇，待明白了一些什么，就弯身去捡被雪已埋了一半的台阶上的斧子，而斧子冻在地上一时捡不起，这一瞬间他停住了。然后悄声走到房后的雪地里，开始大声地咳嗽和跺脚，制造他刚刚返回的气氛。

这一个下午，五魁照样熬过岩鸡汤两人吃过后，他假说到后山去拣些柴禾去，一个人离开了草房坐在雪地上痛哭了。中午眼见的事情，无疑对他的打击太残酷，他简直不能想像，女人怎么会干这种事呢？是看花了眼吗？他这么想，或许是看花了眼。女人不正是为了逃避柳少爷的糟贱而痛不欲生吗？怎么会同一只狗？！五魁的脑子炸起来，要竭力地作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或许，却始终不能消除那恶梦般的场面：女人的眼睛是微闭了的，口半合半启，一双手就搂在四眼的背上……

那么，女人原本就是一个淫荡的雌儿吗？这怎么可能，若是那样，为什么死死活活要让他背她出逃？！

无法解释得清的五魁回想着他与女人先先后后的接触，尤其到了这里，女人是对自己有过多次的表示，他五魁何尝没有冲劲，几乎数次要于出越轨的事体。但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更明白怕引起帮她而成了为自己的现实而从此活着的内疚。难道女人就是在自己的理智制约下而冷落了她才使她这样吗？可不管怎样，她怎么就能到这一步呀？！

这是怎么啦，怎么会这样，自以为最了解了女人的五魁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什么，女人到底怎样才是女人！

终于得出结论：一切罪恶源于狗子四眼！这狗子买下时就觉得与别的狗不同，偏偏在双眼上还有一对白毛斑。五魁认定了这狗子是精而托变的鬼魂，它出奇地通人性，出奇地喜欢在女人身边，必是以妖法迷惑了女人，然后在女人的迷糊中……

五魁想到这里举起双拳来揍自己了！狗子是自己买来的，自己又一次害了女人，害了女人的身子，害了女人的贞洁，害了女人做女人的德性！

他咬着牙站起来，要回去立即就斧砍了恶狗。但走回草房了，五魁打消了念头，如果那么气势汹汹地当着女人的面杀了四眼，女人受得了吗？那么把狗子拉出来处死，女人问起来怎么回答，不点明狗子的罪恶，女人没有自省自己的过失，作为他这么一个哥哥又怎么起到保护她珍惜她的作用呢？

三天后，太阳把地上的雪差不多晒薄晒稀，世界再不是一片银白，而一块一块露出黑的土地和杂乱的草木。五魁说：“妹妹，外边太阳好红的，我背你出去看看吧。”女人说：“雪下得人心好憋。”五魁就背了女人，却也牵了四眼一块出来，一直走到了深得不可久看的沟涧边，把女人放在地上的一堆干草上。

五魁说：“妹妹，这地方多好。”

涧上是早已搭好了的两根长竹。

女人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五魁说：“瞧涧那边的冰锥结得多大，我让四眼过去叼一根过来，对着太阳看里边有五颜六色的哩！”

就把一条长长的绳索系在四眼的脖子上，又将绳索的一头挽个环儿套在竹竿上，给四眼指点了涧那边的冰锥，撵它从竹竿上过去。四眼走到竹竿上，却不愿过去，五魁推，推不动，五魁让女人给它发话，女人说：“四眼不要怕，能过去的！”四眼就走了上去，摇摇晃晃走到了中间，那绳索环儿也随着套到竹竿中间。五魁突然在这边将竹竿使劲一分开，四眼掉了下去，绳索一头勒着脑袋，一头套在竹竿上，四眼就吊在空中四蹄乱动了。

女人锐叫道：“快，快，快把竹竿拉过来！”

五魁没有看女人，没有动。

四眼先是汪地叫了一声，一双红眼直向女人看着。

女人说：“五魁哥，五魁哥，四眼会死去的！”

五魁说：“这狗子不吉利的，它也是该死的了！”

女人啊了一声沉默了。天地间一个特大特大的静，五魁感到自己呼吸也停止了，却同时听见女人在低低地说：“五魁……你这是要让我看吗？”

五魁痛苦地说：“不，不是，不是的。你瞧那面坡，树枝结了冻，太阳一晒多像是玉做的，啊，妹妹。”

五魁心慌口慌地说着，始终没有回过头来。他不愿看见女人一时的羞愧，但却在心里说：“原谅我这样做吧，我的好妹妹，我不能不这样做呀！你是少奶奶，你是我的妹妹，不，你是菩萨一样圣洁的女人，我怎么能害了你呢？但是他听到了一声不大也不小的响声，以为是涧那边的冰锥断裂了，看着涧的那边，太阳依旧光明，冰锥依旧银洁。回过头来，却见女人正爬到了涧边，双手在抓自己的脸面，抓出了深深的血印。五魁惊叫着扑过去，就在要抓住还未抓住的时候，女人双手一撑，反过身掉向涧下去了……

一年后，山神庙改造的草房扩建成了有十多间木屋的小寨子，小寨子里聚集了一伙土匪。这股土匪队伍虽比不得白风寨的唐景庞大，但他们匪性暴戾，常常冲下山林去四方抢劫，而抢在寨子中来的压寨夫人已经有十一位，官府在县城的大街上和县境的所有村寨路口贴满了悬赏缉拿的布告，但布告上的首匪不是唐景，而赫然写着二个字：五魁。

站直啰 别趴下

左邻右舍

邓刚

根据邓刚小说《左邻右舍》改编而成的电影《站直啰 别趴下》，在海内外共荣获了 14 项大奖。它叙述了平常中国人的平常事，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站直啰 别趴下”也一度成了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

远亲不如近邻，这话确实有道理，邻居关系搞不好，终日不得安宁。幸亏现在楼房设计绝妙，独家厕所独家自来水独家电表，家家紧闭门户，老死不相往来，减少许多麻烦。问题是我们这一层楼不行，有个厉害的邻居，你就是钢门铁窗，也防他不住。

先交待一下我们楼层的结构：一共三家，我居中。左边是三室一厅，住着一个叫刘干部的，据说刘干部是一个单位的书记，又据说是哪个科的科长，还据说是哪个室的主任。总之，弄不太清楚，反正是干部，大家就直呼刘干部。刘干部长得文雅干净，头发梳得一根是一根，衬衣领子永远洁白板整，举止像日本人似的礼貌。刘干部之所以终日保持这种高雅风度，和他细皮嫩肉的妻子有关。他妻子似乎有洁癖，从早到晚洗呀抹呀扫呀刷呀地收拾不停。偶尔从微开的门缝望去，屋内一片耀眼的明亮，门口摆着一溜拖鞋，不洗干净脚是不敢进刘干部家门的。刘干部妻子还有个洁净的名字叫雅受，有时从楼梯口经过，听到刘干部在门里亲昵地呼叫——“雅雯儿”……弄得你浑身汗毛都打颤。雅受似乎有点什么病，整年在家休养，愈发养得白嫩了。雅雯养得一个女儿 17 岁，也和她妈一样细腻，皮肤蜡捏般的柔润白亮，并起了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叫刘美。

我要和你说的厉害邻居不是刘干部，而是我右边的一家。四十来岁的俩口子，不知怎么才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那男孩终日哭声震天，也终日饱受父母拳脚，但仍雄壮哭叫，宁死不屈。这一家最厉害的是男人，名叫张永武，也确有武艺，敢打敢拚，并经常招来一些绿林豪杰，在他家吃酒吃肉，吃到热闹处，吆三喝四，震动整座大楼，但没人敢哼一声。张永武者婆不知叫什么名，却也挺厉害，招待伺候丈夫的酒肉朋友，特别卖力勤快，从不烦恼；而且她也能喝酒，和丈夫并挤在酒桌上仰脖饮酒，拍桌说笑。她最大的特点是打扮起来妖艳夺目，比唱戏穿的还花花；不打扮时披头垢面，衣钮不整，趿拉双破拖鞋招摇过市，像个叫花子。据邻居暗传，这个女人实劲儿比丈夫强，张永武能分两室一厅的房子，其实是她冲到丈夫单位办公室里大打出手，把领导吓得赶紧签字批条。按张永武一家三口条件，一室一厅就不错了。

我住一室一厅，但自觉着很美。因我才结婚，没小孩。文联是个穷单位，没能力也没钱，原分给我一间旧中国房，厕所半里地开外。上厕所时得计算提前量，否则半路上出麻烦。我之所以换到大楼一室一厅的新房里，是因为原先这家住户被张永武打跑了，说是再住下去定死无疑。当然，我这个写小说的并不勇敢，不过，一间破中国房和新大楼一室一厅相比，诱惑力太大了，壮烈牺牲也合算，再说，我的爱人是在艺术馆搞音乐的，脾气温顺得像电子琴上的音符，就是吵起架来，声音也似乐曲般的抑扬顿挫。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和魔鬼住在一起也打不起来。

记得我们搬进来第一天，全楼的住户都探出脑袋看我们，表情全是哀怜状，好像我们就要奔赴刑场似的。有人还悄悄朝我耳朵递话：“已打跑了四家，你这是第五家了！……”

爱人在旁边听了脸色不自在。刘干部却笑吟吟地走过来说：“问题没那么严重，来，我帮你们搬！”

我听了欣喜万分，至少我旁边还有一家好邻居。后来我才明白，刘干部希望我搬去，是需要我在中间挡一下驾，否则他就有处于阵地前沿孤军奋战的可怕感觉。

搬进去第一天，我就领教了张永武的厉害。他把家里的垃圾全倒在门口楼梯转弯处，而这转弯处又正冲我的门。一开门，腐臭的垃圾气味就迎面灌来，紧接着一片轰炸机般的嗡响，一大群苍蝇朝我面门冲撞，吓得我爱人尖叫一声关上门。问题是张永武家毫不在乎，并将门大敞四开，任苍蝇自由飞翔。他老婆不时地挥动扫帚，将屋内瓜皮果壳和撒到地上的饭菜挥扫出来；扫完后，将黑乎乎的扫帚朝楼梯栏杆上一拍了事。

由于垃圾的气味更加丰富，全世界的苍蝇都兴奋地飞来，红头的黑头的紫头的，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种类、如此多花样的苍蝇，这下子全见识了。为此，我和爱人每次出门，都像冲锋陷阵那样，事先大喘几口气，然后紧捂鼻孔嘴巴，猛冲出去，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关门。

刘干部家早已森严壁垒：安装了两道门，一道木门，一道镀锌铁皮包裹的门，门边镶了一圈橡皮条密封。刘干部出门动作比我敏捷熟练，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来我发现他的敏捷原来是只顾往外冲，雅雯在后面负责关门。

我们期望张永武承受不了垃圾的熏陶，会改变这种做法。但他无动于衷，就像没长鼻孔。反而他对苍蝇还饶有兴趣，经常听他在楼道上吆喝：“嘿，苍蝇也搞对象呢！哈，苍蝇也强奸妇女……”

刘干部在路上与我相逢，便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太不像话了，垃圾倒在你家门口，太欺负人了！”

我也悻悻地点头，但心下不动。我感觉到刘干部的用意，他想挑动我去和张永武打架。

张永武见我却挺爽朗：“喂，才搬来的，哪个单位？”

我说是文联。

张永武不明白：“什么是文联？”

我便认真耐心地说出一大串文联的原称。

“噢，大广场东边的黄楼！”

我说那是妇女联合会。

张永武似乎很把我当作一回事儿，再三再四地询问我，终于弄清我是写小说的，眼珠子一亮：“你是报社的呀！太好啦，你给我写写，操他妈的电业局想干什么？三天两头断电，让不让老百姓过了！……”

我苦笑着乱点头，心想认真下去更麻烦。

弄不清张永武是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的。他和他老婆一样，有时穿得新程程港商一样，有时油脂麻哈的似乎工作条件又脏又累，然而，他爱好广泛，爱好一样就发狂一样，但又突然地扔掉再爱好别的。

开始他爱养花，几天之内就倒弄来一大批花草，屋子里摆置得像个森林，都无法走路。逢浇花肥的时候，全楼算倒了霉。他把无数瓶闷泡多日的臭豆水倾倒出来，立时臭气熏天。张永武也忍受不了，两口子把臭豆水浇完，领着孩子躲出去一天，等晚上家里臭味散得差不多了再回来。更可怕的是他喜欢别人去他家赏花，楼道上相逢，不管你愿不愿意，充满热情地拖你进去看

他的杰作。他洋洋自得地告诉你这盆花值多少钱那盆花值多少钱，哪盆花是别人送的，哪盆花是他去要的，哪盆花是偷的。

我对他的坦率很感吃惊，绝想不到一个人会这样随意地说出自己的偷盗行为。

张永武以为我看中他偷的那盆花，便大度地一挥手：“你看中这一盆？拿去！”

我说我拿去你怎么办？

他说什么怎么办，再去偷一盆。“好偷，过了半夜，老鸡巴头睡得和死人一样，随便搬！”

我发现刘干部从不去张永武家赏花，张永武也不去拖他。

很快，养花热过去了。几乎是一宿之间，张永武家的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鱼。三四个大型鱼缸摆在那间大一些的屋里，三口人挤在小间里睡。各种各样的鱼奇迹般地出现，装满了所有的鱼缸。鱼缸上安装各种电子调温器，制氧器，一些灯泡在鱼缸上昼夜亮着。走进张永武家，一股浓重的湿气涌来，使你感到像走进浴池。

张永武的者婆在那里尖声嘶叫：“一个月电费 60 多块，你想不过了！我非得给鱼缸里放进敌敌畏，全害死这些臭玩艺儿！”

张永武眉飞色舞地向来者介绍他的宝贝鱼。什么龙鱼、七星、看鲨、地图、清道夫……有一条龙鱼值一千多元。他自豪地说：“全市这样的鱼只有三条，一条在交电公司的经理家，一条是一个大工厂的厂长家养着，再就是我这条！”

他老婆又在嘶叫：“光鱼食一个月也得 30 来块，要命！”

张永武入迷地看着一千多元的龙鱼游动。那龙鱼也确实惹眼，似一柄亮的的长剑，细鳞上银色的龙纹花清晰可见；最令人惊奇的是嘴上还有两根龙须，高傲地支棱着，显出与众不同的威严。

“就那么个破玩艺儿值一千多块，一锅炖了不够塞牙缝的！”

……”张永武老婆又在嘶叫。

张永武惋惜地叹道：“可惜这是条公的，等再托人去香港弄条母的，配对儿下崽，一条鱼崽就能卖百来元钱，一对鱼能下好几千好几万崽子，绝对发财！”

张永武就怕电业局停电，一停电鱼缸上那些电子玩艺儿就不转了，鱼很快就会憋死。张永武这时什么也不顾了，用铁勺飞快地搅动鱼缸里的水，来个人工制氧。那个骂天骂地的老婆也不骂了，也用铁勺搅水，比他丈夫还卖力。张永武在我面前充满仇恨地骂电业局，就是这个原因。

很快地，鱼和鱼缸也消失了。一天夜里，一声宏亮的狗叫震动了全楼，接着就狂吠不止。大家吓坏了，因为谁也意想不到，在城里闹市区会响起如此响亮而真切的狗吠声。那狗完全像嘴对着麦克风，叫声中伴着雄壮的嗡响，无疑，这狗是在楼内吠叫的。事后，人们发现张永武家养着一条大狗，也许在窄小的屋里，那狗显得格外高大凶猛。张永武洋洋得意地牵着这条大狗出来散步，狼状的狗头配着他多胡茬的张飞脸，全楼居民处于恐怖之中；有些孩子放学时吓得不敢进楼，连大人走在楼梯上也颤颤抖抖。一下子，大家觉得不是生活在安全热闹的城市，而是生活在充满死亡威胁的山林里。

幸亏，有人通报了派出所的警察。警察带着手枪和绳索紧张地包围了张永武家。大楼的居民都幸灾乐祸地看着张永武倒霉。谁知张永武却面无惧色，

反而词严义正地说他养狗是防盗，是保护全大楼居民的利益。这家伙说得顺嘴，竟说现在盗窃案太多，警察根本不顶事儿，不如养条狗。

这一下子警察大为恼火，差点当场开枪打狗。最后，连张永武带狗一齐拉走。

大楼安静了没几天，猛然又雄鸡高唱，使所有居民都在星光闪烁的黎明起了个大早。原来还是张永武捣的鬼，他竟在住屋里建起个大鸡窝，把玻璃窝拆下安上铁网，养了一群精神抖擞的鸡。每天天不亮，这些鸡就放肆地大声啼叫，把这水泥建筑变成乡村原野。

一伙戴红袖标的街道干部起来，要勒令张永武把鸡杀掉，因为这不卫生。

张永武大发雷霆，说他养的不是普通的下蛋鸡，而是高贵的斗鸡，训好了可以参加国际斗鸡比赛，为国家挣外汇，为国家争光！

街道干部大都是老娘们儿，被张永武为国家的大词儿吓住了，只好回去研究研究再说。可没等街道干部研究完，斗鸡也消失了。张永武又背上猎枪，要下乡打野鸡、兔子。

一天，这家伙喝得醉醺醺的，推开我的门，说是要同我谈谈。说我这个邻居不错，忠厚老实；说这个世界好人不多，都他妈的该打；说刘干部不是东西，净背后暗算他，他要彻底教训刘干部；他今天就是来郑重通知我，他要开战，开战时他要我不要出来拉架，要我什么也听不见，否则他就六亲不认了。

我心里一下怒火中烧，觉得这家伙太蛮横无理，他说打谁就打谁，还不许旁人干预。

我爱人看出我那份知识分子的勇气，便笑着过来插话，劝他不要生气上火，有什么事可以谈谈心，都是邻居么。

张永武一摆手：“不用你们劝。我和刘干部不是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接着他历数刘干部桩桩罪行：“我养花，他去派出所告我偷花；我养鱼，他去电业局告我偷电；我养狗，他去报告警察；我养鸡，他去……反正，谁也别劝，我要让他彻底明白！……”

我很为刘干部家捏一把汗，又不知我在中间怎么办，只好小心翼翼地观察动静。

刘干部处事其实相当谨慎，谨慎到胆小怕事的程度。他除了上下班在楼道里匆匆掠过，其余时间绝少出门。因此，他家的门总是紧闭不动，就像里面没人住似的。有的多少年的老邻居，竟然没见过刘干部的妻子什么模样。不过刘干部的宝贝女儿刘美，经常在楼道里轻盈地走上走下，而且极有教养，见了所有的邻居都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问好，问好时笑得那样甜，雪白的小牙微微闪光。

所有的邻居都喜欢刘美，夸她真是干部家的孩子，教养好。唯有张永武俩口子例外，说刘美和她爹一样，笑里藏刀。

张永武说他同全楼的人都打过架，就是没同刘干部家打过。但他全楼谁也不恨，却最恨刘干部。张永武告诉我，刘干部是“四人帮”时的爪牙，是搞政工的，搞政工的没一个好东西，全是整人的家伙。张永武最恼火的是和刘干部打不起来，怎么打也打不起来，简直就没办法！张永武采取过各种挑衅行动，或把垃圾泼在刘干部门上，或是在楼道里指鸡骂狗，有一次张永武俩口子在刘干部门前轮流骂阵，连续骂了半个月，刘干部家纹丝不动，一声不吭，累得张永武俩口子口干舌燥，肝火烧身，吃了好几盒牛黄清心丸。这

真是活活气死人，你有天大的能耐，人家不给你用武之机，张永武气得干瞪眼。更叫张永武受不了的是，就连他俩口子骂得凶狠火热之时，刘美照常问他们叔叔阿姨好，照常甜甜地一笑，闪出一排雪白的小牙。张永武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长叹一声刘干部你水平太他妈高了！

刘干部看来确是水平高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邻居们的眼中，刘干部是天下第一大好人，老实得令人受不了。张永武骑他头上拉屎他都不反抗，比雷锋还雷锋的大圣人！从表面上看，刘干部简直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敢犯人的。其实不然，他真正的力量使在后面，正如张永武说的笑里藏刀。实际上张永武大吃其亏，被园林处和电业局罚款，被派出所街道干部屡次传讯批评，就是刘干部暗地里的战绩。张永武每隔一段时间就哇哇乱叫暴跳如雷，并不是没有缘由。这点我能感觉到，仅从刘干部在路上偶尔相逢的几句话，我就能揣摩他城府极深，手段老辣。

刘干部的官运似乎是每况愈下。过去，每逢年节，他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送鱼虾送水果点心送各种礼品的令全楼羡慕。有时送礼人很紧张，趁天黑来，急急敲门，放下礼物掉头就走。问题是那些送礼人有的心慌，有的可能不熟悉门号，往往敲错我和张永武的家门。为此，我每当看到提包裹敲我家门的客人，便话也不用说，只消把手往左面的门一指就行。然而，张永武却胆大包天，竟公然以刘干部名义接礼。这家伙手段巧妙，只把门开个缝，悄声说：“老刘不在家，把东西放这儿吧！”

送礼人一般心怯，巴不得这样，立即轻快走掉。

张永武得了几次便宜，并不隐秘，反而乐滋滋地四处宣扬。他朝我甩过来一盒石林烟，说：“上贡的，随便抽！”

我明白了烟的来源，赶紧还他。他火了：“你们他妈识字人胆小如鼠，这是不义之财，老子用实际行动打击不正之风！”

消息很快就传到刘干部那里，一些热心邻居为刘干部鸣不平。刘干部却笑道：“没有的事，张永武爱说笑话，闹着玩的”

刘干部以后果然也不当一回事儿。大家半信半疑，也渐渐不听张永武的宣扬了。

这几年刘干部不行了，门庭寂然，不用说送礼，一般的客人也不来一个。张永武说刘干部受处分降级了，定为“三种人”。也有邻居说刘干部是搞政治的，现在讲经济，政治不吃香了。不过，从脸色看不出刘干部有什么晦气，他还是那样头发梳得一根是一根，衣领洁白板整，依然日本人风度。

一天刘干部领着女儿刘美到我家，说是多年邻居，早想过来坐坐，主要是怕耽误我们艺术家的宝贵时间。

由于刘干部从不串邻居，我不由得有些受宠若惊，赶忙倒茶倒水，热情招待。刘美很快和我爱人混熟了，大谈哆来密发嗦。

刘干部对女儿说：“以后好好跟叔叔阿姨学习，人家都是艺术人才呀！”

邻居之间总是这样，不来往便罢，一来往，感情就油然而生。一杯热茶下肚，我的心胸就热了，说着说着话就多起来，情不自禁，我就把张永武要打架的意思说给他听。

刘干部听完后，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吃惊，只是冷静地说：“这样的地痞流氓邻居，你怎么忍让也不行。不过，咱还是得忍让，你总不能和他一个样！”

刘美走到我跟前，掏出一篇作文要我批改，说是参加学校征文活动。

刘干部说：“小美来求你，以后请你多帮助，小美最崇拜作家！”

我说作家有啥用，没钱没能力没住房，还是像你当干部好。

刘干部沉吟了一会儿，说：“好什么，都一个样，现在于正经事的，老老实实听话的全不行，胡作非为的倒发财！”

话说到深一点，我顺势问了他这些年的处境。他苦笑着摇摇头，似答非答地说：“我这个人吃亏就吃在一辈子听上级领导的话，实在是太听话了！”

刘美的文章写得不错，但词句过分华丽繁多，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华丽的形容词。我告诉她，用词过多，感情就假了。我大略地删掉一部分词藻，改成通俗的句子，然后读给她听，果然显得亲切感人。

我对刘美说，最感人的文章几乎没有华丽的词藻。

刘美有些不服气，便反问我：“那我们为什么发明那么多华丽的词藻？如果从语法规定中，下令把那些华丽的词藻都删掉，不是谁都可以写出感人的文章了吗？”

我立即语塞。

刘干部说：“现在的孩子可了不得，绝不像我们那时那样老实！不过这也好，不会吃我们那些亏了……”

我突然觉得刘干部这人不错，不是那么老练狡猾。

张永武终于向刘干部开战了。他选了个星期天，在宁静的假日上午，这家伙主动攻击，打响了第一枪。当然，张永武是蓄谋已久，他手攥着一根准备好的铁棍，毫无缘由地砸向刘干部家的镀锌铁门。完全似放枪放炮那样，楼道内轰轰作响。只几下子，那薄薄的镀锌铁皮便被砸瘪砸破，露出碎裂的木茬。

刘干部全家以为地震或什么东西爆炸了，先是全家缩成一团，然后听到张永武的叫骂声，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个时刻，刘干部无论怎样老练文雅礼貌也沉不住气，他推开砸破的门，脸色苍白地走出来。

张永武盼的就是刘干部走出门来，好打他个天翻地覆。他立即后退几步，亮出武把式。没想到刘干部双臂下垂，摆出一副讲道理的老实姿态：“有话可以当面说么，为什么要破坏国家财产？”

张永武登时就呆了一半。他不怕动武打架，却怕讲什么道理，他自觉得讲不过刘干部。再加上刘干部不说砸自己家的门，而说破坏国家财产。就这一句，张永武这辈子就学不了。

刘干部看到张永武呆住了，勇气顿生一半，连连质问下去：“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提，不能拿国家财产出气！”

楼上楼下看热闹的人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开始叽叽喳喳地靠近。坦率地说，这时我躲在屋里没出来。其实我绝对想第一个冲出来，问题是我那个电子琴音符般温柔的爱人死死拖住我不放。一股正义的冲动在我胸膛里滚动，我觉得我绝对得出去。张永武如此凶狂，不勇敢地制止他，后来将更加恶劣。但爱人不仅使尽全力拖着，而且眼窝里涌出泪珠，她大概相信我一开门就会被打死。应该说这种感受有点理由，因为在屋里听外面的声音格外恐怖，尤其现在草率的建筑，铁棍砸在刘干部门上，在屋里听完全像砸在我的门上。

张永武见众人越来越多，立刻横起眉眼，骂道：“你少来摆大道理，你少来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背后射暗箭！”

刘干部响亮争辩：“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做什么坏事你拿出证据来！”

张永武见刘干部这样硬气，大怒特怒，拿出野劲儿，历数着刘干部罪行

臭骂一通，骂中还对上下楼梯看眼的人群吆喝：“大家小心点，这是个特务，专门向上面打小报告！……”

一贯温文尔雅的刘干部终于经受不了这种羞辱，一下子热血沸腾，胆气升腾。他拿出少有的严厉劲头，喝道：“你偷园林处的花是不是事实？你偷国家的电是不是事实？你在屋里养鸡养狗影响人民生活是不是事实？……”

这一连串的排比句问号，比棍棒还有力量，把张永武问得目瞪口呆。

也许是提前安排好的，张永武老婆从后面一下跳出来，直扑刘干部又抓又打。

刘干部被这突如其来的女人弄得不知所措，条件反射似的抵挡几下。那泼女人立时顺势倒下去又哭又嚎：“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关键时刻，派出所警察来了。这是刘美的功劳，没想到她还有这种机灵劲儿。

从实际情况分析，刘干部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第一，他家门被砸破；第二，他本人脸上身上被抓伤多处，一道道血杠杠使他多少天来面目狼狈不堪。张永武完整无缺。他老婆除衣服上滚一些泥土外，胳膊上有一处轻微紫痕，估计是她在地上撒泼打滚时自己撞的。总之，全楼任何人都预测张永武肯定倒霉，至少得赔偿刘干部的损失，弄不好要被拘留关押几天。

派出所为首一个姓魏的大个子，看了现场后也十分气愤，当场明朗表态：“这还了得，没王法了吗！用铁棍砸门，这是有意破坏！……”

众人见派出所明确表态，也就墙倒众人推，因为这时张永武两口子已被带到楼下，大家也就放开胆量，纷纷为刘干部说了许多好话。

刘干部见此状大为感动，再加上身上有伤疼，竟流出泪水来。他反复委屈地说：“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自始至终讲道理……”

魏警察见大家众口一词，群情激昂，也受了感动，说他们早就掌握张永武俩口子的行为。这俩口子不仅在家里和邻居打架寻事，在单位里也表现恶劣，不遵守厂规厂法，不安心工作，五马六混，和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打得火热……

派出所警察走后，大家心里都觉得痛快，觉得正气大长，正义大伸，觉得除掉了一个祸害，从此这个大楼将会天下太平。

有人给伤痕累累的刘干部出主意，趁势到医院里住下，拚命吃好药。反正张永武得赔偿医疗费，叫他赔个倾家荡产。

我和爱人早趁混乱钻出门来，给了刘干部无限安慰。我爱人心细，找出药水药布之类的要给刘干部包扎。但刘干部没用，因她妻子早端出更完备的家庭药盒，正细心给丈夫洗擦伤口，并要丈夫吃什么高级消炎药，预防伤口感染。

大家乘机涌进刘干部家。平日里大家都没有机会没有胆量进刘干部神秘莫测的家，这是个堂皇而大好的机会。一尘不染的绣花椅垫和明亮光滑的打蜡地板，使人们发出赞叹的啧啧声。由于特殊的时刻，人们免去了脱鞋的困难，增加了一种优待感。如此精致整洁的家俱摆设使大家陡然变幻了一种情绪，忘却了刚才惊心动魄的可怕场面，有人甚至兴致勃勃地议论起衣柜和地板的颜色是否和谐。但很快他们就想起了自己的责任，都不约而同地骂起张永武来，也许是在刘干部的家里，大家骂得格外热情。

刘干部像个孩子依偎在妻子身边，任妻子细柔的手指在伤口上抚弄。他

的嘴巴却一直不停：“大家都看到了，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自始至终讲道理……”

我惊奇地发现，只有两个人没骂张永武，那就是刘干部妻子雅雯和女儿刘美。此时她们全部的悲伤都集中在刘干部的伤口上，默默含冤的表情使你感到她们确有教养而张永武确实罪该万死！

大家为刘干部愤慨了一阵后，渐渐走散。这时刘美却悄悄扯了我一下袖子，要我到她那小巧的卧室里，我以为她有什么更严重的事告我，也就表情疑疑惑惑地严肃了一阵。想不到刘美拿出一个金红色的证书，羞涩而兴奋地告诉我：“叔叔，你帮我修改的文章获一等奖了！”

我愕然而立，隔壁房间还飘散着酒精药水的气味，还能听到刘干部怨恨的呻吟，可女儿却为获奖而兴奋不已。冤恨看来很难传导。

万万意料不到，张永武两口子大摇大摆地从派出所回来，满脸的理直气壮。原来他们在派出所挨批时，张永武老婆突然地大哭大叫，说是手指上的戒指被刘干部趁打架之机撸去了，说当时她就有感觉，刘干部抓她的手时，她感到嗖的一下挺疼的。张永武更是气极败坏，说那金戒指两千多块，全家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定要刘干部赔偿损失。

俩口子一唱一和的哭叫，把派出所的警察弄得不知所措，连旗帜鲜明站在刘干部一边的魏大个子也没了主意。应该说这分明是讹诈，是耍无赖。但张永武俩口子冤哭得惊天动地，捶胸顿足，几次扑到魏大个子脚前，抱着警察大腿哭喊着：“为我们做主啊！……”

警察们被闹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只好放了张永武俩口子，重新调查清楚再说。

张永武完全像打了大胜仗，在家里大摆宴席庆祝。他的狐朋狗友来了一群，吵吵闹闹好不热闹。这其实也是张永武惯用伎俩，每当他和邻居打架之后，总是招来一群哥儿们喝酒，以显示自己雄厚的实力以及盟军的威力。果然，酒足饭饱之后，那些喝得东倒西歪的哥儿们在楼道里故意大声吆喝：“张大哥，谁再敢欺负你，哥们儿就踩平他！”

刘干部家吓得一连多天寂然无声。

最使刘干部痛不欲生的是警察来查问他撸张永武老婆金戒指一事。他简直气得要哭了，他要警察搜查他家，要是查到金戒指，枪毙也甘愿！刘干部拍着搽红药水的胸脯，说他家不用说张永武老婆的金戒指，自己家的戒指也没有，他家世代贫下中农，带金的东西从来就没沾一点儿！

邻居们也纷纷议论戒指的事，绝大多数骂张永武缺德，无赖，为刘干部抱不平。但有人说这事不那么简单，刘干部也许厮打时偶然碰上戒指，顺手牵羊。那么点儿小玩艺儿，怎么查？！更有甚者，说谁见了金货不眼红，当干部的不是过去年月了，现在也穷，刘干部家看着锃明瓦亮，其实就是拾掇得干净，细看没值钱的东西：电视是黑白的，洗衣机是单缸的，冰箱还是国产货！

事情越拖越复杂，张永武三天两日地还喊叫赔戒指，弄得刘干部更不敢出门见人，倒像真的偷了戒指。

最后，事情拖得派出所也撒手不管。当然不能叫刘干部赔戒指，但也似乎无法叫张永武赔砸破的门和刘干部治疗费。这个案子就稀里糊涂各认倒霉了。

应该说倒霉的只是刘干部，他得自己舔伤，自己雇人修理门，还得不明

不白地忍受着偷戒指的耻辱。从此，刘干部在整个大楼里是出名的软弱可欺，窝囊熊包一个！

张永武趾高气扬，在楼道里走路，更是铿锵作响。日子久了，他也不装模作样地叫喊赔戒指，反而大咧咧地宣扬：“哥们儿绝对百战百胜，关键是哥们儿有韬略！”

这件事使我对张永武产生相当厌恶之感，厌恶到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无法写作。我也尽力避免与这个无赖见面，一见到他那肮脏的嘴脸我就产生正义冲动，就真想狠狠抽打他那张无耻的面皮。问题是我身材瘦小而且还戴着近视眼镜，更重要的是我内心也挺不起来。靠笔杆子吃饭的人大概全这个德性，胸中烈火熊熊燃烧，表面却得春风徐徐。这点我爱人早看透了，她说：“你就是长得虎背熊腰也没用，你的胆量全装在脖梗下面！”

我也恨自己这种怯懦，甚至挺痛苦的。爱人安慰我：“行呀，咱不能英雄，却也不坏蛋就可以了！”

我只好默认自己的无能，把满腔怒火化作情感，去抚慰刘干部。我经常有意识地去刘干部家，有时张永武那边敞着门，我也鼓起勇气去敲刘干部的门。

我感觉到刘干部被张永武彻底吓怕了。和他在一起，我认为他会激烈地咒骂张永武，其实不然，倒是大部分时间我在数落张永武，似乎是我同张永武打了一架而不是他。渐渐地我有点不愉快。因为我发现刘干部不是吓怕了，是对我持谨慎态度。他大概不相信我会一心一意和他站在一起，怕我传过去他骂张永武的话，然而渐渐地我又产生了怀疑，他不是谨慎而确是吓怕了。他几乎一听我提张永武，就赶紧用别的话支吾过去。不管是谨慎还是吓怕了，我开始觉得刘干部不值得可怜，因为你实在是无法可怜他。

雅雯从不多一句话，自始至终默默地坐着听我们讲话。你能看出她对刘干部百依百顺并且很纤弱，似乎没有力量生气。

也许是那篇获奖的文章的关系，刘美对我欢迎并信任。她正全力以赴地准备考大学，她要我出主意报考什么样的学校，发誓要像我一样当作家，描绘美好的生活和理想。

我说你应该学法学，将来当法官。

刘干部说：“我生的孩子心慈面善，当不了法官。还是学经济好，将来是条热路。”

奇怪的是张永武看见我在刘干部家进进出出，却不恼怒和生气，照常主动和我搭话。

他在楼道上撞见我，陡然地就扔过来一句：“你们作家应该住在海边有风景的地方，住外国那样式的房子！”

有时在路上相遇，他说：“作家都坐小轿车，你怎么拿腿走？”

有一次他砰砰地砸我的门，把我吓一跳。他兴奋万分地冲将进来：“我看见了，你今天上报纸了！”

我愣怔一下，才想起是头些日子报社约我写一篇散文，大概今天发表了。看到张永武那张过分激动的脸，我猛地有些感动，对他的恶感一下减少了一大半。张永武继续激动：“我告诉我们厂里人，你是我的邻居。他们全不相信！操他妈的，我明天非把那些家伙拖来对证不可我不知怎么回答他。

张永武倏地靠近我，神秘地放低声音：“你写这篇报纸给多少钱？”

我认真地计算了一下：“20多元钱……”

“20多元？别骗人啦！”

“真的，一个字二分多钱，一千字……”

“绝对不是！写报纸，全市的人都看，至少给好几百！”我脸色通红，再三恳切地更正：“确实是20来元，现在刚刚稿费提价，否则才10几元。”

张永武终于相信我不是撒谎，不由得傻呆呆地瞪大眼睛：“这么少？”我惭愧地点点头，像犯了错误。

“那你还干个什么劲儿！跟大哥我干，倒弄点什么还不给个百儿八的！”

张永武热情而怜悯地拍打我肩膀：“我下班到自由市场转半个小时，也不止赚20来元钱！”

张永武突然火火热热地富起来。这首先从他家门口里的垃圾堆里看出来，时而一堆喝完的空易拉罐，时而一堆高级酒瓶子，时而一堆红红的大虾壳。更令人眼热的是，不时地有小轿车开到楼下鸣喇叭，接张永武出去。

张永武西服革履，神气十足地走下楼梯，边走边回头吩咐他老婆：“要是杨经理来找我，告诉他我在丽丽酒店！”

小轿车冒一股白烟，鸣的一声开走了。楼上的邻居们都把鼻尖贴在玻璃窗上行注目礼。

刘干部终于忿忿然而怒形于色，他用手指点着茶几，痛心疾首地说：“这样的流氓无赖竟能大发其财，国家这不完了吗？！”

我看得出，刘干部已经对我去掉了戒心，在我面前渐渐畅所直言地痛斥张永武。他也许从那次惨败中恢复了元气，伤口早已平复，精神也抖擞起来。他从张永武的变化讲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又从国家的宏观到张永武的微观。总之，经济管理体制的漏洞及法制的健全，造成张永武钻空子的机会。刘干部沉重地点着头：“可怕的是不止一个张永武在钻国家的空子，而是千百个张永武！你们搞文学创作的应该面对现实，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拿起笔来大胆地……”

一直沉默的雅雯插了一句：“你整天国家国家的，有什么用？”

刘干部严厉地瞥了雅雯一眼，雅雯赶紧止住了话语。但她咬了咬嘴唇却又勇敢地再度张开嘴：“人家孩子考大学，家里都给孩子买鱼买虾买肉，买高级营养的东西给孩子补脑子。咱呢？连瓶汽水都舍不得给孩子喝！考试复习那几天，李燕她爸每天给买五筒可口可乐！”

刘干部说：“我过去考试那阵，连白开水还喝不上呢！渴了，就趴在井台上的破水桶里咕嘟几口……”

刘美在一旁抢白说：“你老提你那阵，你那阵是什么年代？你要提远古还钻木取火呢。可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在前进！”

刘干部不吱声了，他对孩子有股慈母般的温柔。

常同刘干部家来往，也就看出他家生活挺寒伧。雅雯长期病号，连工资都开不满，刘干部是机关工作人员，不像企业单位有奖金。他只挣几个死工资，确实应付不了当今物价上涨的生活需求。

我爱人很会说和谐话，她看到刘干部全家谈话不投机，破坏了友好的家庭气氛，便以电子琴般的动听音调出来打圆场。她说当国家干部也有当国家干部的好处，就说这三室一厅吧，全市有几家三口人住这么宽敞的房子？房子是小事，你要是住兔子窝似的窄房子，就是天天吃山珍海味也没意思！另外别看那些暴发户有钱，今天发财说不定明天就破产了。报纸上不是经常报道某某有限公司什么经理董事长的，结果不全是骗子大贪污犯被逮捕了

吗？

一席话说得刘干部脸上涌出血色，红光光地兴奋起来。他说张永武蹦跶不了几天，早晚得完蛋。正气肯定要压倒邪气！

问题是张永武不但不完蛋，反而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他原来在厂里办了停薪留职，又倒弄起鱼缸和鱼来。这家伙虽然粗野，却又心灵手巧。据说香港来的那种高级龙鱼谁也养不好，有的干脆就养死了。几个玩鱼的老手虽然养住了几条龙鱼，但干养不长个头，养了好几年，依然和才买来时一般大。

张永武却专能养这种龙鱼，一条小拇指长的小龙鱼，到了他手里，不出几个月就长成半尺多长。花 150 元买的小龙鱼崽子，张永武养了一年，就能卖 1500 元，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利润百分之十百！”

看鱼和买鱼的人纷纷涌向张永武家，经常敲错了我和刘干部家的门。刘干部家当然是百敲不应，甚至都不屑于瞅一下窥镜。他厌恶地告诉我：“一闻到那投机倒把的腥味我就够了！”

全楼上下都在谈张永武发迹的新消息。有人说外国人都来拜访张永武，对他直喊“OK”！有人说香港有个百万富翁指定张永武养龙鱼，专销港澳东南亚富贵人家；有人说国内外的大宾馆为装饰门面，都来买张永武的龙鱼。

人们总愿把事情说得惊人惹耳，因此越传越凶。但人们真实眼见的是全市鱼迷对张永武的狂热。这些鱼迷身份各异，有普通工人，有身居要职的官员，有商场经理，有工厂厂长，有饭店老板，有暴发起来的个体户。这些鱼迷们对贵重品种的鱼，痴迷得发狂，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不动地盯着张永武的鱼缸。张永武有两条巨型龙鱼，那是他优中选优一直精养着的开山祖师，真犹似两条银龙在鱼缸里舞动，借助灯光作用，两道银光交替闪射，观者无不赞叹。龙鱼游动时持水平状态，迂回路线极其精确，绝不随便斜游或变换方位，显得老练沉稳而又身价百倍。

张永武经常在来者面前大声夸耀：“别的省市咱不知道，在咱这方圆百里，我这两条鱼是独一份的了！商场杨经理开价四千，我都不卖！”

众人都信服地点头。

张永武更加兴致勃勃：“你们还没看这两个家伙交配，那才带劲呢！龙腾虎跃惊涛骇浪，比人干得凶……”说着张永武还带动作手势，众人开心地大笑。

一天黄昏，张永武在楼道里撞见我，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香气扑鼻的名片，大大方方递给我，并很文雅地说了句：“以后请多多关照！”

我看那名片：市鸟鱼花协会理事，市龙鱼公司总经理，张永武。

我笑道：“这么说还有副总经理了？”

张永武说：“我那一口子担任副总经理。”

我不敢笑，便装作认真地问：“龙鱼公司办公地址设在哪儿？”

张永武气派地说：“暂时设在我家，以后在市中心那儿买楼！”

我对刘干部讲张永武给我名片的过程，连他从来不动声色的妻子都乐得出声，刘干部却纹丝不动并阴沉着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世界太荒唐了，实在是太荒唐了……”

应该说，张永武为了龙鱼的生意也付出过相当的力气。开始那阵儿他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楼道里几乎听不到他那吆吆喝喝的声音。一些稳重的老邻居说：“他不知又胡闹些什么！”

等到一个个更大更结实漂亮的鱼缸抬进张永武家时，邻人们才大吃一

惊，觉得这家伙这次不是养鱼玩，大概要闹出点什么名堂。

张永武这次确是大干特干，所有的房间都满摆着鱼缸，连睡觉的床都撤了，晚上一家三口在地中间铺个垫子，睡在鱼缸空隙中。由于鱼缸太多，他家比浴池还浴池，打开门热气腾腾，连数九寒天也照样冒热气。龙鱼是热带鱼，所有的鱼缸都得24小时保持一定的水温，张永武拚尽全力用加温器用电灯泡烤。走进他的门，你立刻就汗水渍渍地难受。

张永武却不感到难受，除了出去办事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屋里，有时还美滋滋地哼起小调。然而浓重的水汽首先使木制家具承受不住，渐渐的衣柜涨得变形，箱子里面长出绿青苔来。张永武老婆在屋里声嘶力竭地叫喊：“我的衣服全完了，都长霉了！”

张永武听也不听，全身心都在龙鱼身上。此时不用说家具衣服完了，就是老婆完了他也全然不顾。

时间不长，张永武的老婆孩子也像衣柜一样变了形，浑身生出些红疙瘩，又痛又刺痒，终日搔挠不止，孩子更加哭声震天。有经验的老邻居看到浑身癞蛤蟆皮似的母子俩，便动了恻隐之心，告诉她们这是潮气太大所致，弄不好感染还会出危险：“叫张永武把鱼缸搬出去吧！”

张永武老婆实在痒痒难忍，便和张永武摊牌：“你要鱼还是要老婆孩子？！”

张永武当然要龙鱼，要是谁搬走他的鱼缸就像要他的命一样。这样，俩口子大打一场，吵骂声都惊动了楼外马路上的行人。但楼内邻居全都佯装听不见，没一个去劝架的。

刘干部在屋里侧耳细听，那表情完全像听优美的歌曲。他对我说：“这个无赖，不欺负别人就欺负自己老婆孩子！”

大打一场之后，张永武坚守阵地，老婆孩子却哭啼啼地摔门而走，满身疙瘩地回娘家避难。

令人钦佩的是，张永武也满身疙瘩，甚至脸上也有，红一块紫一块，人模鬼样的。问题是他却挺得住，就像没长疙瘩似的。老婆孩子一走，家里清静，他反而干得更欢，整日泡在鱼缸的水汽里，与龙鱼相依为命。刘干部用手指掐算：“坚持不了几天，饿也把他饿熊了！”

刘干部的说法有道理，张永武是从来不做饭的懒汉，老婆一走就断了炊，肯定打熬不住。很多邻居也和刘干部抱有一样心理，等着看张永武的狼狈相。

没想到张永武老婆打架的第二天就跑回来，拎着一大包好吃的东西，急急火火地奔进家门，生怕丈夫饿坏了似的。那急切的表情就像昨天压根没打架，倒是夫妇久别重逢的渴望。

张永武老婆进屋之后，厨房便爆出一片煎炒烹炸的声响，不一会儿，俩口子摆上酒菜，欢欢喜喜地喝上了。只听张永武老婆说：“多吃辣的，辣椒驱潮气！……”

张永武老婆怕长疙瘩，不敢多待，饭后拾掇完就赶紧回娘家，临走时却关心倍至，门口处回头叮嘱：“饭菜在冰箱里，到时你热一热！”

张永武却在里面骂道：“你把我饿死吧！”

张永武老婆并不生气，说：“我明晚还回来！”

刘干部坐在屋里听得真切，很有点沮丧。他说他要和妻子大吵一架，至少半年不说话，弄不好还能去法院转一趟。可张永武这个粗野的无赖，却能把老婆治得团团转，而他自己也并不说什么软话。要是换任何一个丈夫，都

得低三下四地跑丈母娘家请几回罪，像接皇宫娘娘那样把老婆接回来。

我问我那一口子：“咱们要是打一架，你能像张永武老婆那样？”

爱人沉吟了一下，并未直接回答我。但却用不屑的口气说：“张永武老婆太下贱！”

我大感悲凉，觉得还是张永武这家伙厉害。

一楼的一个老邻居，很了解张永武的历史。他说张永武在女人方面有玩艺儿，什么刁三顽四的女人，他都能摆弄得水光溜滑的！年轻那阵，张永武搞的对象多着哪，一个比一个漂亮，而且全都爱他爱得要死。你看张永武胡子拉茬的熊样，就是有吸引女人的能耐！别看张永武老婆现在不中看了，没生孩子那时，水灵灵的俊着呐！

张永武老婆果然天天晚上回来伺候张永武，有时还零星吵闹一番。有一次张永武咆哮如雷，用脚把老婆从屋里踹到门外，又从门外踹下楼梯。

我想这一次张永武老婆绝不会回来了，至少也得隔一些日子再回来。可是第二天一早她就跑回来，左手拎着一兜油条，右手提着一热水瓶豆浆。我感到我爱人确实说得有道理，这个女人太下贱了，越打她越殷勤百倍，越折磨她越有感情。我甚至琢磨出一篇小说题材。

我爱人尽管对张永武老婆看法不雅，但心情还是柔善的。在楼道上遇见张永武时，她便劝说：“你怎么能这样打你妻子？你妻子对你多好，好得都像奴隶了！你不怕把你的好妻子打跑了？！”

张永武听完我爱人的话，哈哈大笑起来：“她跑了才好呢，马上就来接班的！不是哥们儿吹，比她年轻漂亮的有的是，都在外面排队等着！”

我爱人脸一红，缩回屋里，再也不敢随意同张永武说话。她毕竟是搞艺术的，从小一直念书弹琴，后来考音乐学院，再后来进艺术馆，满耳都是优美的音符，没怎么接触过活生生的社会。听到一个比她大10来岁的男人称哥们儿，她就耳朵不对劲儿，更何况还有年轻漂亮排队之类的，她更受不了。

张永武毫不在意，也从不顾及对方什么表情。他还经常对我们表示热乎乎的关注，有时推开我家门，见到我的面就大声问：“你们俩口子都快30了，怎么还没孩子？”

我赶紧示意我爱人此时正在里屋，并急忙解释我们为了学业结婚较晚等等。

张永武这家伙根本就不听我解释，他好像早已对我们了如指掌，继续大声喧哗：“你们肯定方法不对，关键时刻得掀大腿……百发百中！”

我心惊胆战，被张永武这种赤裸裸的关心吓坏了，我估计我爱人在里屋能羞得昏过去。

张永武并不罢休，似乎我们生不生孩子与他有责任。他还多次热心找我，说他认识一个妇科大夫，是他铁哥们儿，治不育之症手到擒来！

一贯静如古井的刘干部家也发生了问题：刘美考大学落榜了。这使全家一片阴暗，刘干部也没时间憎恨张永武了。他整日里关门闭户，连我们俩口子也不愿见。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情，不再去打扰，暗暗为刘美叹气。

一天夜里，我和爱人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们以为这样粗暴的敲门方式只有张永武干得出来，开门一看竟是刘干部。

刘干部此时已五官错位，嘴唇不停地哆嗦。他哭声哭气地告诉我们：“刘美自杀了！”

我爱人惊得差一点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后来总算弄清楚：刘美一直到现

在没回家，刘干部俩口子以为女儿像往日那样，去几个同样落榜的同学家散心。但等到深夜还不见女儿回来的影子，雅雯有点疑心，到女儿房间一看，发现写字台上压着女儿一张纸条：“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我要离开这个可恨的世界！”

纸条旁边放着女儿小巧的电子表和一个熊猫脑袋式的小钱包。

雅文立即昏过去，刘干部也如五雷轰顶。

事不宜迟，我爱人在家守护雅雯，我和刘干部分头朝外面跑去。

外面天气晴朗，月色亮堂，星光闪烁，绝不是自杀的天气。我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心里有些稳沉。我分析了一下事情的可能性，然后对刘干部说，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海边，然后分头朝相反的方向，沿海边寻找。

我们这个城市靠海，有很多礁石林立的陡岸，是天然的自杀胜地。自杀者临死前可以站在礁石上饱览大自然美景，然后往下一跳，蓝色的海面上溅起一朵银白色的浪花，一切就消失了。这似乎像演电影电视那样，富有浪漫色彩。所以远近百里千里的自杀者，纷纷跋涉数日，风尘仆仆地赶到这自杀。特别过去那些轰轰烈烈的年代，到这里自杀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近些年虽然不轰轰烈烈了，但为失恋和考不上大学的自杀青年也不少，特别是女孩子。海边管区有一个警察因为在海边及时堵截自杀女青年而荣获模范干警称号，报纸曾为此大书特书：某某模范干警几年来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共解救出自杀女青年多少多少名，自杀男青年多少多少名。

刘干部看完这篇报道，曾勃然大怒：“这样的文章为什么要见报？简直是给国家脸上抹黑！简直是给外国人提供攻击我们的材料！”

此时，刘干部在我身后呼呼地喘粗气，他大概企盼那个模范干警能及时解救他的女儿。

我们先是朝地势险峻的叫跳台崖的海边跑去，到那里再分手，往相反的方向跑。路上我们堵了一辆过路汽车，但汽车毫不理会我们，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没办法，我们只好穿树丛，走近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到跳台崖。

意外的是跳台崖下面有一个钓鱼的老头。刘干部开始认为是他女儿，以少有的敏捷速度扑过去，把那钓鱼老头吓得一趔趄。

我们气喘吁吁地问老头，看没看见一个穿什么什么式衣服，什么什么色裤子，多高多胖扎什么辫子的女孩。

老头竟很迅速地回问：“几个女孩？”

刘干部立即哆嗦着。“——……一个！”

老头说：“一个没看见，看见了三个。”

我和刘干部愣住了，可刘干部很快就反应过来：“对对，三个，三个，她们在哪儿？”

原来刘干部想起来，他女儿时常和另外两个落后的女同学在一起，天天不拆帮儿。看起来这三个家伙要一块死。不过我和刘干部有些轻松了，总觉得三个一起死比一个死可能性少。

老头说那三个女孩在崖石上唱了很长时间歌，唱完以后就走了。

刘干部急切地问：“是唱歌还是哭？”

老头怔住了，便又改口说：“也许是哭。反正现在唱歌和哭都分不清。”

刘干部又问：“她们三个是真走了吗？也许走了两个？”

老头大概钓鱼心切，对刘干部的啰嗦有点不耐烦，便说：“走了，一个

不剩地走了，还手扯手儿地唱着走呢！”

我们对老头千恩万谢，然后按他指引的方向继续奔跑。

跑着跑着，我们发现海湾里的礁石上影影绰绰的有人，便不管深浅地扑下水去，噗通噗通地踩着冰凉的水花，到近前一看，还是钓鱼的，但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一面埋怨我们吓跑了鱼，一面哈哈大笑，说到这里自杀是外行，这里水浅滩平，就是死人到这太平地方也能活了！

我和刘干部继续顺海岸线奔跑，一直跑到天亮，累得浑身瘫软，再往前跑下去，即使刘美不死，我们也得死了。

正在这时，我们发现对面也跑过来和我们俩差不多的两个落魄鬼。彼此照面一搭话原来是刘美另两个同学的父亲，他们已把那边的海滩查找完了，他们家里也都发现要离开世界的纸条。

几个人在一起诉说了一阵心情和推测，结果倒有点乐观。其中有一个姓周的女同学父亲，说她的女儿绝对不会自杀，只要有她的女儿在，那两个也自杀不成。说着他要我们都去他家休息一下吃点饭，他家离海边特近。昨晚，那三个小冤家就是从他家出发的。不过，姓周的也挺伤心，说他老婆出差去外地，要是他老婆在家，肯定会惊吓出精神病。

到了姓周的家，大家全愣住了，原来三个要自杀的女孩正呼呼大睡，枕边，茶几上到处都是啃剩的面包、香肠和烤鱼片。

几个家长真是又喜又气又恨，纷纷拍醒各自的孩子，一顿情感复杂的斥问之后，又迅速拖着各自的宝贝往家奔。

刘干部挥动手臂叫住一辆的士，也不问价钱高低就喊快开。他说我早一分钟告诉雅雯早一分钟好，雅雯在家什么滋味呀！

刘美衣冠不整地坐在刘干部旁边，头发凌乱，眼圈红肿。她开始是一言不发，后来车快到家门口时，她蓦地说了句：“要不是那些钓鱼的，我们早死了！”

“往嘴！”刘干部愤怒地喊了一句。

刘美一进门，我和爱人就尽快地撤出来。

刘干部对我们轻声说了声谢谢，麻烦了，就很快很紧地关上门。那门一连好多日没开，一直到后来刘干部在楼道偶然撞见我，他也绝口不提刘美自杀的事，似乎从没有那么一回事。

刘美后来也正常进进出出，只是脸色更加白皙，像多日见不到太阳。她不像过去那样问叔叔阿姨好，见到邻居时总是一低头就过去了，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沉默。

与刘干部阴沉的家庭气氛相反，张永武家里却日渐兴隆。他的龙鱼打出牌子，远近闻名，买鱼者，观鱼者，求教者，进进出出，沸沸扬扬。

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到张永武在屋子里高谈阔论，大讲养鱼之道。人混出名堂，众邻居也渐渐高看三分，有意无意地来凑热闹。弄得似乎全楼的门都对着张永武家开，相比下，刘干部更是孤家寡人。

张永武身上的疙瘩也没了，脸上的胡茬也刮得精光，人显得格外精神。看来他确是有钱了，雇了个 20 来岁的女孩子来当助手，并给那助手印了名片，龙鱼公司、秘书、杨小惠。

杨小惠长得像街上时髦的女孩，打扮得现代式，颇有姿色。张永武说：“不漂亮我不要！”

张永武喊杨小惠只喊一个字：“惠儿！”

那女孩手头利索，随张永武的呼喊忙来忙去，干得挺起劲。

楼下的老邻居深沉地摇着头：“那女孩完了！”说着还使了个深沉的眼神，大家当然明白其中意思。但有不同见解者反问：“那样的事怎能藏得住！可为什么张永武的老婆不吵不闹呢？”

老邻居又深沉地一笑：“手段高强就表现在这里！”

有了助手，张永武干得更顺手，也有了闲工夫。他有时喝点酒，晕乎乎地就敲我家门，我爱人就怕他来，因为他身上老带一股腥气，那鱼缸里的腥气要比海鱼的腥气难闻。问题是张永武敲门擂鼓一般，不开是不行的。

不过，听张永武讲龙鱼很有意思，听着听着你就忘了他身上的腥气。他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说在养龙鱼方面，全世界人都是笨蛋，就他一个人聪明。他说香港龙鱼贩子全是飞机贩鱼，然后运到鱼店出售。可他绝不去鱼店买鱼，而是直接到机场。他手里藏着个小温度计，以看鱼质量的机会将港商鱼缸的水温弄准了，然后再把他的鱼缸水温调到和飞机上的鱼缸水温相同，绝不差一毫。龙鱼进了他的缸子，什么差异的感觉都没有，活蹦乱跳，一条也死不了！

酒喝多的时候，张永武就嘴巴大开闸门：“我的绝招谁也学不到，花多少钱我也不教！他们学会了我吃什么？你是外行，哥们儿不背你。其实我的绝招很简单，两个字就能泄露天机：温度。关键就是温度！人为什么感冒，就是个温度反差太大，鱼和人一样，也会感冒。说起来鱼比人娇贵，温度一丝一毫不对劲的地方都不行。”

“光鱼缸里的温度弄准了不行，这谁都会，可为什么别人弄不过我？我还有高超的地方！比方说吧，所有养龙鱼的人都捉城郊河沟里的小草鱼喂，我也一样，可为什么我的龙鱼长得最好？哈哈，关键还是温度！”

讲到得意处，张永武还会卖关子，故意抽几口烟再讲。接下去他的声音一下变小，显得极神秘地告诉我们，河里的水温和鱼缸里的水温不一样，河里的小草鱼体温当然和龙鱼体温不一样。那首先要用龙鱼鱼缸的水把小草鱼体温同化，才能喂龙鱼。别的那些傻蛋就没这两下子，反而以为河里捉出来的鱼新鲜，赶快喂龙鱼，结果全他妈玩完。

我猛地感到张永武这家伙挺了不起，如果要写小说，会相当生动精彩。

张永武的能耐远不止这些。例如看鱼的公母这是件极困难的事，大多数鱼迷都没辨别公母鱼能力。有些老鱼迷说能从鱼的翅、鳍和鳞的形状辨出公和母。张永武骂道：“全他妈故弄玄虚！关键是看动作。鱼也和人一样，公的主动，老是蹭呀蹭呀地调戏母鱼，你要是看那条鱼经常有流氓行为，那就是公鱼。”

张永武老是拍胸脯说全市就他能把龙鱼养到三尺长，别人怎么养也就是二尺半到头了。

楼上一个小伙子不服气，说他们富丽豪大酒店养鱼池里的龙鱼就是三尺长。

张永武说他知道富丽豪的龙鱼，根本没资格跟他的龙鱼相提并论。那不能叫龙鱼，那叫泥鳅，没色泽！把鱼养成那种样子应该上吊自杀！

小伙子不知高低，顶起牛来，说他们酒店龙鱼和张永武的龙鱼绝对一个样。

这下张永武火了，咚咚咚地跑下楼去。我们不知道他发火为什么往楼下跑，正莫名其妙，张永武却又咚咚咚地跑上来，拖住那小伙子和我们几个在

场邻居，非要下楼跟他去一趟富丽豪酒店。原来他叫了一辆的士，正在楼下鸣喇叭。

大家在富丽豪看完了龙鱼，觉得没什么异样，可回到张永武家再仔细对照一看，一下子就优劣分明，豁然开目。张永武养的龙鱼确实鳞片鲜亮，银光闪闪，精神活泛。富丽豪那对龙鱼身上就像落了一层灰，俨然如长年使用的铝锅色。

小伙子当场认输，像电视武打片那样，行礼作揖，说哥们儿服了！

张永武乘机更加吹起来：“我水平高超，管理严格。不信你们看，惠儿，过来！”

惠儿跑过来。张永武说：“伸手伸脸让诸位看看，有没有一点雪花膏和口红！”

我们看了，惠儿洗得干干净净，没一点化妆的痕迹。但大家疑惑不解。

张永武笑道：“不明白吧？这才叫严格管理！女人身上化妆品全是化学的东西，有毒，不小心沾染到鱼缸里怎么办？”

我们全都目瞪口呆，没想到张永武能这么细致。

惠儿走出门去，有人对张永武开玩笑：“秘书挺漂亮呀！”

张永武说：“要是换一个，哥们儿早把她干了！这个是朋友的孩子，哥们儿得讲义气！”

大家笑道：“话是那么说的，到时间什么都忘了！”

张永武说：“现在开放了，漂亮的女人多着呐！你们哪位需要？要什么样的？我挂个电话就能来一个排！”

众人立即止住了笑声，不敢再说笑下去，否则张永武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张永武又说：“关键是钱，有钱干什么都成！哥们儿不是吹的，你们全楼财产划拉一起，也抵不了我这几缸子鱼！不是吓唬你们，我把鱼缸子水倒出一半，就能把全楼淹了！”

众人说：“是呀是呀，看这些大鱼缸吧，没百十担水装不满。”

张永武借题发挥：“我不是过去处处受人欺负的张永武了。对门的刘特务，把我欺负到什么程度？到公安局告我到房产局告我到街道办告我，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现在他也不老实，还他妈到处搞特务活动，到工商局到税务局告我，写那些厚厚的上告信？但他这是痴心妄想，他告不动我，我上面有人！哥们儿现在和上面关系铁登登的，坚如磐石。上个月公安局一个局长来我家看鱼，你们可能都看见了，蓝鸟车，超豪华，哥们儿当场赏他一对龙鱼……”

众人听得面面相觑，觉得不对味，一个个先后溜走。

张永武却上了酒劲似的，越说越狂热，眼珠放光，唾液四飞：“现在挣钱要紧，哥们儿没工夫摆弄刘特务，等以后钱挣足了，我非得好好治治他……”

走出张永武家后，一个邻居贴我耳朵：“张永武确实厉害，惹不了！”

我说：“也许百分之八十是吹嘘！”

邻居之间最讨厌的是传口舌，因为这能挑起是非来。我绝对地不愿意充当传口舌角色，但是在张永武和刘干部之间，我还是愿意及时把张永武的事传给刘干部；特别是有关刘干部的话语，我当然要传给刘干部。在传递过程中，我充满了正义感，认定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另外，我隐去了刘特务等

激烈的词句。

然而我还没讲完一半话，刘干部就打断我说他知道了，雅受全听到了，还做了记录。我和你说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建筑，传导音响效果极佳，邻居放个屁，这边也听得响亮。

刘干部尽管充满了仇恨和怒火，表情还是相当稳重，甚至连流氓无赖的词儿也不骂了。

他从容地分析张永武说的一番话，说其中有一定真实缘由，但问题的要害不在张永武的上头关系，而是咱没有真凭实据。拿公安局长要张永武的龙鱼这件事说，什么时间，几点几分？怎么给的鱼？当时谁在场？鱼的尺寸是多少？值多少钱？局长得到鱼后给没给张永武钱？谁能证实？以后局长又给张永武什么好处了？这些好处违犯国家哪些原则法规？……

刘干部最后一摊两手：“咱全说不清楚！”

刘干部举了好几个例子，像偷税漏税问题，哪条鱼漏税？买主是谁？多少价钱？什么时间买的？……

刘干部又一摊双手，露出悲哀而无可奈何的表情。

雅雯小声说：“算啦，咱惹不了人家就别惹，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吧。”

刘干部冷笑一声：“君子报仇，十年不迟！”

刘美恢复了往日的容颜，又似往日那样活泼可爱，小鸟一样在楼道里飞上飞下。她和张永武的助手杨小惠交上朋友，经常听她俩在楼梯口叽叽喳喳地说笑。

杨小惠压根就没上大学，她对刘美撇着嘴：“傻鸟才考大学，首先耽误挣好几年的钱，毕业后还不知分配啥破单位！”刘美嘻嘻地笑，笑得那样开心。

我觉得刘美这一辈子再不会自杀了。

刘美在马路上见到我，老远就欢天喜地地喊我叔叔。我说：“再不离开这个可恨的世界了？”

说完这句话我一下子后悔了，怕伤了女孩子的自尊心。刘美压根就没怪我这句话，她说：“一百年后还得离开。”我说：“你野心不小呀，还想活一百多岁？”

刘美凑到我身边，神秘而兴奋地对我说：“我爸爸要我当克格勃。”

我吃了一惊：“开什么玩笑？”

刘美继续神秘而兴奋。她告诉我，他爸爸和她认真商谈过，就像大人和大人那样商谈。刘美说到大人和大人那句时，挺自豪的。她爸爸要她打进张永武的龙鱼公司，尽量搞好关系，弄清他都犯了什么错误。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这简直是在演电影电视。我问刘美：“你愿干这种事吗？”

“愿意呀！”刘美兴奋已极，“这多有意思！完全像侦察员地下工作者克格勃！”

刘美又认真告诉我，她已成功地攻破第一道防线，杨小惠。小惠已把她当成知心朋友。现在正准备攻第二道防线，张永武。实际上她已试探着进过张永武家几次，张永武没异常反应，也大大咧咧地和她说话。

我说张永武这家伙厉害，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刘美说没问题，他和我爸爸分析的如果一样，表面上粗野吓人，其实头脑简单，很容易攻破。我爸爸说他能攻破他，只要拿出时间去和他搞微笑

外交，几天就能把他弄迷糊了。

我忙问：“那你爸爸怎么不亲自上阵？”

“我爸爸说一看张永武的面孔就厌恶就够了！”

“你看张永武那可恶的样子不厌恶吗？”

刘美哈哈地故意大笑起来，不正面回答我。

分手时，刘美却又极认真严肃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这件事，她爸要她绝对保密，连她妈也不知道。等事情结束后，她再公布于众，并且用这段经历写一篇小说，肯定生动感人。刘美最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她的最终目的是当作家。

我当然要为刘美保密，在刘干部面前更得装作全然不知。不过我还是及时地对我爱人讲了。我爱人也很惊讶，说现在的女孩子真了不得真不可思议，即使现在叫她干这件事，她也不敢干也不会干。

看得出来，刘美干得很成功，越来越和张永武混得热乎了。有时，她还帮小惠干活，给鱼缸换水，喂食之类。

张永武这家伙也确是头脑简单，也许是养鱼业干得顺利，春风得意，不把刘美放在心上。刘美嘻嘻哈哈的笑声，张永武听得挺顺耳，不再认定刘美和她爹一样笑里藏刀。

刘美嘴很甜，叔叔阿姨叫得很勤，很亲切，叫你听了不得不动心。

张永武似乎完全忘了刘美是刘干部的女儿，没几天就喊刘美为美儿美儿的，那热乎劲儿令你肉麻。

张永武的老婆却十分警惕，并且略有敌意。她有时冷冷地问刘美：“你过这边来玩，你爸不骂你吗？”

刘美说：“我是我，我爸是我爸！”

张永武老婆也只是浅层次的敌意，当然想不到更深的东西，渐渐也就接受了刘美。

刘干部家还是依然紧闭，对张永武喧闹的家门表示一种沉默的藐视。一左一右一静一闹的邻居环境我早已习惯，但现在，刘干部那静寂的门有了内容，我感觉到平板的门面正鼓出两只眼睛。

张永武那边一片城门大开的和平景象。你经常可以听到张永武热情的话语：“美儿呀，将来我龙鱼公司正式挂牌进新大楼，雇你当秘书，一月500块！”

刘美笑道：“张叔说话可得算数！”

张永武抬高声音：“我张总经理说什么都算数！”

刘干部家爆发了一场危机，刘干部和刘美吵起来。尽管刘干部是在最里边的一间屋批斥刘美，我们还是从卧室靠他家墙壁的方向听到了。开始刘美还哇里哇啦地顶撞几句，后来就变成哭声，哭声越来越响，压倒刘干部的声音，再后来就是雅受细软的劝慰声。

我们只能听到模糊的声调，却听不清内容，不禁很着急。因为从声调的力度来判断，一定是发生了较严重的事情。

我和爱人一直在做斗争，是不是应该敲门过去劝架。但考虑刘干部老成持重的样子，又迟迟疑疑地拿不定主意；但听到刘美的哭声响亮起来时，又要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总之，那边断断续续地哭闹了大半夜，我们这边也进进出出地忙了大半夜，结果还是原地踏步，什么也没干成，什么也没清楚。

刘干部家即使出了天大的事，表面上也会安如泰山。第二天刘干部照例头发整齐油亮，衣裤笔挺地走出门去上班，见了我的面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地微笑。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刘美不去张永武家了，看来事情还是与张永武有关。终于，我从刘美嘴里弄明白了事情的全过程。原来刘美和张永武来往熟了，张永武有时就领她和小惠去迪斯科舞厅和游艺宫玩，有一次看模特表演，张永武情绪高涨，说要是有人有模特身上那件套裙，惠儿和美儿比模特还模特。

惠儿见张永武高兴，便说：“那老板就赏给我们俩各一套新装吧！”

张永武说那容易，领她们俩去商店选了两套套裙。

当刘美满心喜欢地穿着时髦套裙回到家里时，刘干部俩口子大吃一惊，问明了是张永武买的，俩口子脸色刷地变了。因为那套裙是250元一套，张永武肯花这么多钱给刘美买衣服，这其中必有缘故。

刘干部嗓子顿时冒上火来，失去往日对女儿的温情。250元呀，他两个月的基本工资，这说明事态严重。雅雯也沉不住气，脑子生出种种可怕的猜想，她并不知道女儿去张永武那儿的目的是什么，这几天她听到对门那里传出女儿的嘻笑声，还有点欣慰，她是个忍让性格的女人，无论对方好坏，都希望殷勤修好。

俩口子一红一白的面孔，一硬一软的嗓门儿，把刘美逼得蒙头蒙脑。开始她还不明白父母质疑的意思，后来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父母怀疑她和张永武干了那个事，才得到250元套裙的报酬。明白这个意思后，她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感到大羞大恼，愤怒得干脆都不说话了，任凭父母软硬训斥，就是一言不发。

刘干部见女儿不说话，反误以为他的怀疑是真实的，简直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恼怒。他的恼怒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女儿无知无耻；另一方面他是派女儿过去的，这不是自己断送女儿吗？当他一想到自己万分憎恨的坏蛋会和他女儿干那个事，整个身心欲碎，几乎要死过去。

折腾到后半夜，从女儿伤心而怨怒的哭声中，刘干部终于相信女儿完美无缺。但俩口子更难受无比，觉得女儿在自己的怀疑中受如此委屈，实在对不住女儿。刘美见父母心愧，却更加伤心落泪。弄得雅雯也哭，刘干部也暗暗掉下泪珠。刘干部被这件事弄得心惊肉跳，再也不敢让女儿去张永武那边侦察了。他怕一旦弄不好，赔了女儿又折兵。

问题是这件事却不知怎么被张永武知道了，他便在楼道里一口一个浑蛋爹，一口一个浑蛋妈的骂起来，说是老邻老居的给孩子买件衣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刘美是个勤快的好孩子，帮助他张永武干了那么多活，买套衣服是应该的，以后还要买更高级的衣服！说刘干部俩口子要是再胡说八道，诬蔑他张永武后果自负！说刘干部俩口子再欺负刘美，他张永武就不客气了！

张永武骂得有理有力，简直就是为刘美伸张正义，局外人听了，反以为刘美不是刘干部的孩子，而是张永武的亲闺女。

刘干部俩口子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比往日更老实地死守在屋里，任张永武叫骂不止。

我和爱人分析，张永武之所以知道刘干部俩口子怀疑刘美，是刘美自己传过去的。否则不可能有第三者传过去。

我们把刘美叫到家里，狠狠地批评她一通，说她这事做得对不起养育她

的父母。

刘美低头不语，说她没对张永武讲，但对杨小惠讲了。

我们看出，刘美不怎么愿接受我们的批评，临出门时她还软中透硬地说：“父母正确时为父母，不正确时就不为父母！”

我们尴尬地站在那里，好长时间呼吸不畅通。

爱人最后冒了一句：“咱一辈子也不要孩子吧！”

刘美把套裙脱下来，还给张永武。张永武说：“你张叔一不是反革命二不是盗窃犯，而是响 的企业家，给你买套衣服还犯法吗？穿，你给我穿！这是你自己挣的，这些日子你干了不少活，按劳取酬！”

杨小惠说刘美：“你爸你妈真是傻蛋，我赚件衣服回家，我爸我妈乐得都合不拢嘴！”

后来我们发现刘美始终没穿张永武给买的套裙，但她却穿了一套更时髦更讲究的套裙，这套裙的设计既雅致又艳丽，穿在刘美身上，升腾着青春朝气，同时又有一股贵重感。

刘美十分喜爱这个套裙，出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在楼梯上骄傲而矫健地迈着步子，年轻人很容易忘却却不愉快的事，刘美依旧满面春风，和杨小惠叽叽喳喳地讲着笑着。

我爱人被刘美的新套裙迷住了，跃跃欲试也想买一件。她说这种样式的套裙太绝太妙了，电脑绣花的花样凝重而典雅，领围袖口裙摆却又飞扬着现代式的花边。关键是那莹莹的中性色泽，在过于明亮的阳光下，它发暗，显得沉稳；在阳光暗的楼道里，它竟又能微微闪亮，充满活力。没结婚的女孩子穿这种套裙，具有小姐风姿；结过婚的女人穿这种套裙又多一种贵夫人气派，我说我干脆写一篇散文赞美套裙吧。她说对时装你们男人全是休止符。

我爱人迫不急待地问刘美套裙在哪儿买的，多少钱。我在旁边一下子生出担忧，怕这套裙还是张永武买的。

刘美笑吟吟地说是她爸她妈亲自到商场挑选的，差一元钱三百。刘美说想不到她爸她妈有这么两下子，竟有90年代审美意识！

我爱人说：“天下再也没有比你父母再好的人了！”

刘美甜甜地回了一句：“那是呀！”

张永武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也经常出些什么事故，哪条鱼病啦，哪条鱼突然翻白眼啦，弄得他不时地暴躁。他大概在另外什么地方还养着鱼，所以总是来来去去地跑。连杨小惠都说：“谁也弄不清老板养了多少鱼！”

张永武最伤脑筋的是饵料，也就是河沟里的小草鱼。今年天旱，各处河沟都相继干涸，捉草鱼越来越困难。没有那些活蹦乱跳的小草鱼，张永武就得宣布完蛋。龙鱼大概是鱼世界的贵族，食谱极其讲究，除了活蹦乱跳的新鲜小草鱼，其余的食物不屑一顾。张永武试着喂新鲜的肉，煮熟的肉和从商店买来的各种鱼饲料。龙鱼见了这些杂食，眼都不斜一下，依然高傲地扬着头，稳重而一丝不苟地回游着。

实在饿得不行了，一些可能是品位不高的龙鱼，偶尔咬几口熟肉，但那些气势不凡的龙鱼依然如故。

张永武心疼得几乎要抱着鱼缸嚎哭一场。不时可以听到他长吁短喘，唉声叹气。由于不景气，张永武有时拿小惠撒气，经常无缘无故呵斥。有几次小惠气得嘤嘤地哭。

刘干部在屋里幸灾乐祸，他呷了一口茶对我说：“那边看来日落西山了！”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一个无赖就能开公司就能发财，那世界也太简单了！”

刘干部对杨小惠悻悻于怀：“现在的青年太没思想，太没志气！让一个无赖肆意欺负，竟毫无反抗意识。要是我，干脆就罢他的工！外面有那么多工厂单位，到哪儿干不行，却偏跑这个无赖手下！”

刘美说：“你说得不对，杨小惠不是甘受欺负的人。她说到哪儿干也不如在这干，这儿活轻松，钱还多。要不是这样，她早摔了！”

刘美很了解内情，她说小惠在这儿干有许多好处。张叔特大方，还不到一年，就给小惠买了两套服装，一双鞋——那是名牌的，235元一双。另外，张叔高兴了，发的奖金也高！

我们四个大人全都哑口无言，望尘莫及。

雅受意外地开了个玩笑：“雇我去干就好了，不用给工资，光买这几套服装我就满足……”

刘干部说：“要是再给你买件貂皮大衣，你大概能搬过去住！”

雅受脸倏地红了，笑道：“这不是说笑话吧。”

张永武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全楼男女老少去帮他捉鱼，按数论价，捉多了有重赏。这家伙很有鼓动能力，他在楼道里上上下下走动，不时地大声吆喝：“不耽误大家的正常工作时间，只要下班后抓紧点，一两个小时就可挣十块八块的！这比你们一天还挣得多好几倍，一百个合算！不怕挣钱多就找我，我负责准备水桶鱼网，良机莫失，失不再来，快捞钱呀！”

看起来张永武这家伙确有能力。几声吆喝就把全楼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纷纷到张永武那去担水桶和借捞网，有的干脆就提自己家水桶干。那个最了解张永武历史的老邻居，胡子都白了。还颠颠地往城郊河沟跑，并且自己特制了个捞网比张永武发的捞网大一倍，他说大的来劲儿，收得多！

最初几天，成绩显著，六楼有一家五口全上阵，下班以后到天黑之前，挣了35元。胡子白了的老邻居是退休老工人，背着一壶水两面包，从早到晚在河沟里，一天能挣20元。

一刹时，楼上楼下人欢马叫，过节一样热闹呼叫张经理张老板的声音在楼道里频繁回响，只有刘干部和我们家紧闭门户外，全楼家家户户都在忙碌。

我那浸透艺术细胞的爱人也动了心，她动员我咱也干呀？就那么一两个小时，至少挣十来块钱多好！”

我有点不快，说：“凭咱们搞文学艺术的，提着水桶捞网，为了区区几个钱，成何体统。”

爱人也不高兴了：“亏你还要什么体统，写三篇稿能被编辑部退两篇，还体统什么？”

搞写作的最怕别人提退稿二字，我差一点勃然大怒，幸亏我爱人说这些话时有琴声般的温柔。我压着怒火：“那不是退稿，那是编辑要我修改！给张永武那种人捉鱼，我不愿意！”

捉鱼风潮并不给每家每户都带来欢乐，也渐渐带来不幸：二楼的两个学生为了捉鱼挣钱，开始逃学惊动学校老师出面干涉；楼上在富丽豪酒店工作的小伙子性急，骑自行车去捞鱼，连人带车栽进沟里，鼻孔里灌满臭水不说，肩头锁骨跌裂，回家躺了多天不能上班；更多的邻居是被蚊虫叮咬，河沟里布满成千上万饥渴交迫的蚊虫，突然来了一群香喷喷肉乎乎的城里人，不禁喜出望外，倾巢出动，前赴后继地奋战不止，咬得众人鼻青眼肿，据说七楼

的一个小伙子鼻尖被咬肿了，肿得像烂葱头，弄得他都不敢和女朋友见面。

这些困难并没阻止挣钱心切的邻居们，他们下班之后还是充满热情地奔赴城郊河沟。然而渐渐地最初热情消失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问题是河沟里的鱼被捉光了。本来就快要干涸的河沟，哪经得起如此折腾，何况全市养鱼者不止是张永武一个。

可以听到张永武在那里挑剔地叫唤着：“这不是鱼，是水虫于！泥鳅不要，泥鳅沉缸，龙鱼是上层水鱼，不行！”

有些挣钱心切的邻居甚至把青蛙都捉回来，说青蛙身上也是肉，也有营养，弄得张永武哭笑不得，他大声吆喝：“谁捉到纯正草鱼还加钱！”

过些日子，张永武突然也不焦躁了，也不吵吵闹闹地喊收鱼了。他又像往日那样从容地哼起小调来，邻居们发现，有人定期给张永武送新鲜活蹦的鱼，并且满足供应。现在，邻居们就是真捉来纯正的草鱼，张永武也没兴趣了。

原来，张永武和 30 里外的水库定了合同。保证龙鱼公司所有的草鱼需要。

张永武自负地夸口：“哥们儿大难之时，总有能人保佑。关键时刻，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送鱼，我怎么能不发财！”

万万想不到，保佑张永武的龙鱼，使他安渡饵料危机的贵人竟是刘干部。

刘干部和水库的头头过去是老同学，因此严禁捕鱼的水库对刘干部就城门大开。刘干部找了一个开摩托车的亲戚，两人下班后飞驰到水库，捞两桶鱼再飞驰回来。水库因为看管严格，鱼多得简直可以用手捉。刘干部让那个亲戚打着水库的旗号同张永武联系，自己悄悄隐在后面发财。

我开始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是全世界的人都去给张永武捉鱼，刘干部也不能去。我想起刘干部骂张永武流氓无赖时的表情，就死也不能承认这是事实。

我甚至觉得滑稽可笑，赤日炎炎，污泥浊水，刘干部洁白板整的衬衣，油光锃亮的发丝，会一起弯曲在腥臭的水湾上。刘干部那白净的手，那修剪得圆玉般的粉色指甲，能去挥动湿辘辘的捞网。我绝对不能想象！

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刘干部。我发现他的脸皮手臂明显地发黑并且粗糙，更重要的是他晚上确是回来很晚，面容疲惫不堪，脚步也相当沉重。

瞅了个机会，我找来刘美，拐弯抹角地和她谈起来。谁知刘美对我并不防范，她说不但她爸去捞鱼，有时弄到 130 货车，她妈也去捞。干得可欢呢！

我问她：“你怎么不去？”

刘美说：“一天挣一百我也不去，谁愿干那个破活！我爸妈身上都被蚊子咬烂了，搽什么药水都不管用。我们家的人皮肤嫩，都不抗咬！”

刘美走后，我心里好长时间不对劲儿，我老觉得自己被什么人欺骗了，还似乎有点伤心。

爱人下班后，我对她讲了我的心情。她并没有我这么多感受，也许女人心肠过分柔软而能适应世界的一切。她说：“人要是逼到了，什么都能干。”

张永武的老婆奇迹般地走进我家，她打扮得很夺目，身上的衣服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玻璃片片，宝石般晶莹；金辉辉的耳环项链和戒指，在灯光下闪烁烁。

更使我感到奇迹的是她竟提着两条大鱼，说是别人送来的，很多，他们吃不了，要我们帮着吃。

我们受宠若惊，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张永武老婆还从未进过我们家门。但她并不陌生，反而比我们大方熟练，不管我们怎么推让，还是径直走进我们的厨房里，把鱼放进自来水池，然后也不等我们邀请就直奔卧室，自家先在椅子上坐下。

她说她早就该来坐坐，总是倒不出来时间。她说话时东张西望，天棚地下屋里屋外地胡乱打量，又问我们厨房面积几平米，卧室面积几平米，进门小厅几平米，还随手敲敲身后的墙，似乎检查房子建筑是否结实。

我们被她弄得昏头昏脑，只好跟着她的问号走。

我过去从没认真端量过张永武老婆的模样，这次坐得近，细细一端量，还是个挺漂亮的女人。可惜她妆化得太艳，要不然眉眼会更清秀些。另外，我也才看出她比张永武小得多，至少差七八岁年龄。

张永武老婆看到我家衣柜上的提琴盒子，竟感叹起来，说她在学校时也爱好音乐，还是学校宣传队的，跳过新疆舞朝鲜舞呢！

我爱人立即就受感动了，忙问她，后来怎么放弃搞艺术这行呢？她猛地笑起来，说后来遇到张永武了。她说张永武可会迷惑人呢，几下就把她迷惑住。总之，生米做成熟饭，不跟他不行了。

我们没想到张永武老婆第一次来我们家，讲话就这么坦率和随便，意外之中倒感到亲切了许多。

张永武老婆又自然而然地讲到张永武。她说张永武这个人太直了，心眼太好了，什么话也藏不住，所以得罪人。接着她列举张永武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迹，说张永武做的那些好事多极了，简直就是活雷锋。但是被张永武救过或是帮助过的人却一个个忘恩负义，反成了仇人。说到这里张永武老婆有点激动，大骂那些人没良心。

张永武老婆挺善讲，嘴巴吐字又快又流利。她真诚地叹着气：“永武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善了！总是为别人着想，让别人过得去，自己老是忍让……”

接着她又列举无数感人的事例，最后她说到刘干部家：“刘干部那才是老奸巨滑的老狐狸呢！我这个女人都气恨得要命，可是永武却总是劝我忍让，忍让……”

我和爱人简直就不知怎么表示才好。我陡然地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永远不可理解。问题是张永武老婆所有的讲话都是充满真切的情感，绝没有编造的破绽。看来这个世界最不了解的恰是最贴近的，也就是说最不了解丈夫的就是妻子。

看到张永武老婆没完没了地讲，而且还那么激动，我们也只好礼节式地乱点头。

张永武老婆以为我们百分之百赞成她话语，更来劲头。她说张永武在单位里怎么受领导欺负怎么遭难，最后逼得干不下去才铤而走险借钱养鱼。她又说张永武怎么不怕困难，一心一意干事业，为了龙鱼公司的成立，连老婆孩子性命都不顾。她说龙鱼公司房子已弄好了，只等办好手续装修完毕，就可以正式对外开业。最后，她竟赞美英雄一样，说：“龙鱼公司正式建成，全是永武一片心血呀！”

我们也随声附和地说永武确是有能力。

我们的随声附和使张永武老婆大为兴奋，又继续赞美下去。她说她对永武不放心，这样有能力的男人谁都爱。现在的女人都不要脸，净爱别人家的

男人。追永武的女人太多了，丽丽大酒店里的一位餐厅服务员，才 22 岁，永武去餐厅吃了一次饭。她就看上了，死活要跟永武，爹妈都管不住，后来她去酒店打了那女孩两耳光，这才死了心，还有一个商场卖玻璃器皿的，永武也是去买了一次东西，那女孩非要跟永武，还给永武写不少情书，什么太阳呀月亮呀，海枯石烂呀，最后她去商场大大骂她一场，才断了来往。

爱永武的女人多得数不过来，而且全年轻漂亮要死要活。张永武老婆说幸亏她看得紧，要不永武早被人抢跑了。

我一面听她热情地赞美，一面想象永武那满脸胡须的脸，差点就要笑出来。令人费解的是永武老婆讲得有名有姓有板有眼，并指出那些不要脸的女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要我们逛市场时顺便看看她们。

激动过后，张永武老婆又一下子悲伤起来，说这种事看是看管不住的，现在越来越开放，不要脸的女人越来越多，没有办法。不过，她也想开了，永武在外面随便就随便吧，离婚是万万不成，我是正宫娘娘！

张永武老婆走后，我和爱人呆坐了半天，头脑还没从那喋喋不休的话语中走出来。我对我爱人说：“在我眼里，你真是电子琴般温顺。”爱人说：“你在我眼里也挺好。”我说是不是我们相隔太近了，才这样看，而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凶神恶煞！

爱人明白了我的意思，哈哈大笑起来。她说：“也可能是这样！”

但我们俩却同时迷惑不解：张永武老婆今天在干什么？难道是随便坐一坐？厨房自来水池子里那么大的两条鱼，说明她有一定的目的，可是，她找我们能有什么目的呢？

由于天旱，文联号召所有搞文学艺术的全都下到抗旱第一线体验生活，写出优秀的作品。我被派到离城一百里外的磊子山乡，这里雨天都干旱，何况旱天，简直成了火焰山。同去的写歌曲的写戏剧的全都大感动特感动，感动得不知怎么写好了。因为怎么写也和过去的抗旱作品雷同，没有新意。正在大家恼火忧愁之时，爱人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速回去，张永武有要事找我，电话里一时半时讲不清。

放下电话我心里发愁请假，怕大家嘲笑我临阵脱逃，经受不住艰苦的抗旱生活考验。正愁如何开口请假时，文联办公室又来电话，说市龙鱼公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联谊会，这也是体验企业家生活的重要机会，文联领导特批我回城，并要我在原地等着，等一会儿龙鱼公司去车接我。

我心里想，张永武你可真厉害。

果然，两个小时后，一辆皇冠小车尘土滚动地开过来。司机往回开车时，一面骂着这倒霉的土路，一面说：“要不是看张老板面子，领导就是开除我，我也不来这鬼地方！”

我才知道这车是张永武借公家单位的。我问司机张老板找我什么事。司机笑道：“张老板全是好事，吃大盘子呗！”

我越发糊涂，决计不吱声，看看到底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小车果真就开到一家大宾馆门口，张永武正焦急地站在大堂门前，见我下车，老远就喊：“作家真难请呀！”说着快步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把我一直领进宾馆餐厅。

在一间单独的小餐厅里，一张转盘式的大圆桌上早已摆满了酒菜。几个客人见我们进来便士兵似的一齐站起来。我一见都是熟人，有报社记者有电台电视台记者，还有市里有名的书法家冯老先生，其余几个不认识的一看气

势就知道是各公司的大经理。

原来张永武在龙鱼公司正式开业之前，特地招待方方面面的人，要他们在关键时刻给予大力支持。书法家冯老已写了条幅：龙鱼勇跳龙门。报社记者兴致勃勃地说这条幅的词儿太棒了，他就用这句词儿当文章标题，来写张总经理白手起家的动人事迹。

张永武扯着我介绍说：“我把这位贵客请来有双层意义：一是请著名青年作家，将来好给我写书树碑立传；二是请我的老邻居也是我的铁哥们儿！”

众人鼓掌叫好，接着就大吃大喝起来。

酒席上一一直很热闹，张永武粗野的妙语一直占据整个酒桌。众人对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夸张地点头微笑，连一贯稳重的冯老也对张永武频频赞许。

我开始有点奇怪，觉得大家是因为吃了张永武的酒席而不得不做谦恭状，后来渐渐感到这些谦恭的表情全是真的。原来在座的全是鱼迷，家里都不同程度地养几条鱼，冯老也养着一对龙鱼，但怎么也养不好。为此，他们对张永武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永武更多的是吹嘘自己的技巧及品德，说他多么正义，多么正直，多么正派。说他多么忠厚老实和善良。他拍着我的肩头：“有我们老邻居作证！”

我有些气闷，便鼓了鼓勇气，顶他一句：“你怎么不说说你的厉害劲儿！”

张永武毫不在意：“人厉害点不是毛病，关键是讲不讲道理。我这个人脾气暴，但讲理！”

众人连说对对对，脾气暴的人一般都是直心眼儿，满面堆笑的人其实更难斗！

餐厅服务小姐对张永武很熟，都亲切地直呼张老板。

张永武对她们也谈笑风生，他对那些花枝招展的服务小姐喊：“将来跟我干，等我在香港日本开龙鱼分店，派你们去！”

那些服务小姐一齐欢喜地说，“老板说话可得算数，别散了酒席就忘了我们！”

张永武哈哈大笑，指着我们一桌人说：“这些牛头马面我能忘掉，你们我可忘不掉！”

冯老用胳膊时轻轻碰我：“张经理举止粗一些，不过真有能量！”

我含糊其词地点着头，心里却不得不承认，从某种角度说，这家伙是强者。

酒席很丰盛，尤其对我这样的穷文人，简直就是仙果琼浆了。散席后，我悄悄问张永武这一桌花多少钱？

张永武一挥手：“花什么钱，半条鱼就够了！”

吃完酒席后，张永武招呼服务小姐给我们每人包里塞一条进口烟。然后又用车拉我们去他即将开业的龙鱼公司参观。有一条烟压包，大家更得听张永武指挥，一个不少地坐进小车，拉到龙鱼公司。

龙鱼公司很气派，四个大字招牌是冯老的手笔；门脸正对繁华的大街，巨大明亮的玻璃窗前一排巨大的鱼缸，尽管还没放进鱼，但那异状叶片的鱼草，已显出一片翠绿的生机。

张永武一下子精神百倍，这真正是他管辖的世界。肚里刚刚装进酒，他有点情不自禁，趾高气扬，自豪地向我们一一介绍：“鱼缸的电气设备全是港商投资的，鱼缸是关系单位给做的，牌匾是冯老赏的……总之，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

记者们赶紧掏出笔来飞快地记录。

几个工人正在呜呜地打磨水磨石地面。

张永武指手划脚地挑剔了几下，便又领我们到后面的办公室。办公室已装修完毕，沙发茶几写字台，泡沫壁纸和彩色吊灯，并且铺着红地毯，颇有点豪华味道。

张永武说：“办公室洽谈室合二为一，没办法，刚刚创业，就得因陋就简！”

我心下想，文联的破办公室要是能这样因陋就简，那真是上了天堂！

几个经理却不满意了：“这不行，港商来谈生意，坐这里哪像话！”

张永武笑道：“既然诸位大经理提意见，那就赞助赞助吧！你们国营的铁饭碗呀……”其中一个大概是五金交电公司的经理说张永武：“我们赞助不少啦，光屋里那些电线、电灯、开关、电闸，多少钱？要是按市价买……”

旁边几个经理也说：“哪个少帮你啦？你别他妈的心里不明白！”

张永武赶紧点头：“明白明白！我心里有数，日后绝不会忘记诸位恩德！开业时请大家赏光，市长来给我们龙鱼公司剪彩呢！”

最后散伙回家时，张永武又塞给我一条烟，说：“人家那些经理大爷好烟多着哪，都不要啦！”

我抬头看冯老和那些记者们也和我一样多得一条烟。我们尽管表面上不好意思，心下却欢天喜地。这进口烟一条 50 多元，两条 100 多元，白吃白喝还赚了 100 元的烟。

那些经理们笑道：“也算我们为文化事业做点小贡献，抽烟提神，能多写出好作品来！”

我们都稀里糊涂地大笑起来。

肚里满满地装着酒菜，包里鼓鼓地塞着进口烟，进到家门，我有些飘飘然地得意。

爱人似乎也挺高兴。但她说我抽这么高级的烟太可惜。我说那怎么办。她说她可以拿到艺术馆服务公司小卖店换力士牌烟。艺术馆那些搞音乐的，下乡下厂辅导业余文艺创作，有时下面单位也给送好烟。他们从来不抽，全拿到小店换便宜价钱的烟，有的干脆就叫小店代卖成现钱。

我计算了一下，这两条外国烟至少换 10 条力士烟，便更加欢天喜地。

第二天一早，张永武过来找我，说他有事求我，本来昨天酒席上要说的，但忙忙碌碌地忘了。

我赶紧提起精神，问他有什么事。看来酒烟的力气还是大，仅仅昨晚那么一桌酒两条烟，我觉得比张永武矮了一截了。

张永武说他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如果我能搬到他买的那套房子里去，那他就把我现在的房子和他的房子打通，形成完整的三间房。他说他是为了工作需要，港商外宾都愿意到家里做客，一个龙鱼公司经理住两间小房，那也给国家丢脸。

我觉得挺为难，这似乎不是一件小事，再说张永武买的那一套一室一厅条件怎样，我都不知道，可恨的是我竟提不出什么意见，一想到昨天的酒和烟我就不会说话了。

幸亏这时我爱人回来了，她听了张永武的要求后很爽朗，换房搬出去都可以，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那一室一厅的条件不能低于我们现在一室一厅的条件；二、那一室一厅的地点要离文联或艺术馆近一些。

张永武轻松地一笑：“我当什么条件呢，小菜一碟！凭我张永武，没有办不成的事！”

说着张永武就从他屋里吆喝出几个木瓦匠工人，长驱直入，直进卧室、厨房、厕所。张永武指点着：“这儿开个门，正通我那边的厨房，这里的厨房砸了，改卫生间，那边门给我堵死！”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这个小窝处理完了，好像我们早搬走了，这房子已属于他们似的。

更可恨的是他们这帮人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敲敲那碰碰，眼里似乎没有我们这两个房子的主人，后来张永武领木瓦工回他们屋计算工日材料费用，才回头补一句：“搬家不用你们动一手指头，我人马齐全！”

张永武一帮人呼呼隆隆走后，我和爱人沉默了好长时间。说实话，无论什么条件的房子，住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我望着爱人收拾得整齐洁净的小厨房，那刷着白油的炉台，现在还是那样白，当初我们本想镶白瓷砖，后来想到又要花钱买瓷砖又要请泥瓦工又要烫酒炒菜伺候，也就泄了气。但我还是尽力把厨房修饰得和镶瓷砖一样漂亮。现在看那白净的墙壁白净的案板，看那我用了整整两晚上刷的自来水管子，银油还是那样银光闪闪。可这一切就要被砸碎拆掉，我不禁有些难受起来。

爱人笑我：“到底是作家，感情丰富！”

我不知怎么，有点恼火。我对爱人说：“你以后再别提什么作家作家了！”

爱人异样地瞅了我一眼，似乎理解了什么，转了话题：“咱们去刘干部家坐坐吧，也算告辞！”

我立刻赞同。我们好多天没去刘干部家，不管怎么样也应该去了。

走到门口，我们又同时踌躇不前。我们去讲什么！也许这时刘干部捉草鱼还没回来呢！

暗洞洞的楼道回荡着邻人们隐约的说笑声。最听得清楚的当然是张永武家，他正和那些木瓦工们说：“等我家的鱼缸全搬走，你们就干，好好给我搞装修，要有点宾馆房间的气派，真正像个经理的家！”

爱人说改日再去吧，我说那也好。我们又回到即将不属于我们的家。张永武说到做到，雷厉风行。没出几天，他就在我爱人艺术馆附近小区弄到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那房子条件比我们现在的房子强多了，厨房大了两平米，炉台上已镶好瓷砖。爱人看了新房心情很高兴，说国家是在前进，房子的质量越盖越好。

当晚，张永武红光满面，酒气扑人地跨进我们家，他像跳舞似的在屋里转来转去，按捺不住酒精的兴奋。

他得意洋洋地问我们：“新房怎么样？”

我们一起点头：“挺好挺好！”

“满意不满意？”

“满意满意”

“哥们儿够不够意思？”

“够意思够意思！”

“哥们儿有没有水平？”

“有水平有水平！”

“那好！”张永武突地拍了个响亮的巴掌，“明天搬家！”我们惶然失措，说明天搬太急了，至少再宽几天，我们好有个思想准备。

张永武很惊讶：“搬家还要什么思想准备？”

我们更惶然了，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但就觉得明早就搬实在接受不了。后来我爱人说她要拾掇一下；我说我有一篇稿子没完，一换地方就断了情绪。

张永武不高兴了，说：“好，我照顾你的情绪，等你两天！”我其实真是换了地方就断了情绪，灵感也没了，构思也没了，怎么使劲写也写不下去。

我手头也正在写篇稿子，本来是应上级规定写抗旱的事迹和人物，却不知怎么写出一篇“大潮之后”。我对海熟悉，从小就泡在海里，海里生什么长什么我了如指掌。我望着干旱的磊子山，望着龟裂的土石上升腾的暑气，突然涌上构思：大海突然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潮，潮水越过沙滩越过土丘越过山岭。所有的鱼鳖虾蟹海螺蛤蚧都忘乎所以地往上爬，正爬得欢，大海突然退潮了，把它们全丢在山岭土丘上张惶失措……我不知这个构思有没有意义，但觉得挺有意思，我甚至入迷了。我怕真正搬家就毁了这个构思，第二天一早就摊开稿纸干起来。

猛然间，我家靠张永武那面的墙壁发出咚咚的山响，震得我心慌意乱。开始我还想同这咚咚的震响做斗争，或盼望住一会能静下来，可是我的盼望被这咚咚不停的震响击得粉碎。

正在拾掇东西的爱人也被震得心烦意乱。我们实在推测不出张永武家里搞什么名堂，难道我们还没搬他就敢砸墙通门？

折腾了好一阵我爱人突然醒悟，这是张永武故意捣鬼逼我们快搬。我觉得爱人说得有道理，立时怒气冲天，要冲过去理论一番。

我冲了三分之一的路就冲不动了，坦率地说我没有勇气冲过去。

张永武那边不但有敲击的声响，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声响，特别有一种磨擦的尖利声响，像铁锹在有沙粒的马路上拖磨，如果连续听十分钟，绝对会死过去。

还没到中午，我和爱人就彻底垮了，宣布投降：“如果可以，下午就搬家。”

听说我们搬家，张永武很爽快，说半夜搬也行，他的人马随时听令。

果真不到一个小时，几辆大解放车轰轰隆隆地开到我们楼下，一群如狼似虎的小伙子跑上楼梯，喊道：“张老板，怎么于？”

张永武指着我家的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空！”

小伙子们干得很猛，说是下午还有别的任务，一个个上楼下楼像刮旋风。不到几十分钟，我那一室一厅的小屋就被洗劫一空。

当我和爱人最后提着热水瓶走出门口时，身后轰然几声巨响，两个木瓦工已开始抡大锤砸我家和张永武家的墙了。

看热闹的邻居说：“真快呀，说砸就砸了！”

张永武粗声豪气地说：“这叫现代化的速度！”

装满家俱的汽车徐徐开动时，我意外地发现刘干部和雅雯在前面的路上走来。他们首先看见我们，两口子还急急地向我们这儿跑了两步。刘干部睁大眼睛：“怎么搬了怎么搬了？”雅雯眼睛瞪得更大，似乎不知说什么好。

我和爱人一下子激动起来，连忙从车上使劲挥手：“搬了搬了……”望着刘干部和雅雯明显黑瘦的面孔，我心头一热，后悔昨晚没去他们家告别。

司机毫无情面地加快了车速，我们更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拼力地挥手。

我和爱人说，新家安顿好后，回来看看刘干部全家。

人总是这样，激动过去之后将趋于更平静，一晃半年多我们竟再也没回去过。

一个明朗的早晨，我走在市内繁华的大街上耳边逐渐热闹的嘻笑声使我蓦地抬起头，原来到了龙鱼公司大门口。看来龙鱼公司的生意很大，橱窗的大鱼缸前围满了行人。大门口也有众多人进进出出。正当我呆望之时，刘美呼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她欢喜而又嗔怪地埋怨我们怎么一去不复返，她说她到龙鱼公司干两个多月了。

我条件反射似的连忙问：“你爸爸知道你在干吗？”

“我爸爸当然知道，他还在家学着养龙鱼。”

刘美又说了些什么，我似乎没听见。她有事要急走，因为她要到机场接客人，时间很紧。

马路边一辆小轿车朝刘美鸣喇叭。刘美问我同不同路，同路她们小车可带我一程。我说可惜不同路，我只好自己走了。刘美喊了声再见，很灵练地钻进车里。

我沿着繁华的大街继续朝前走，我发现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繁华，因为又有更多新的公司新的招牌挂出来，闪射着耀眼的光彩……

背靠背脸对脸

秋风醉了

刘醒龙

根据刘醒龙小说《秋风醉了》改编而成的《背靠背脸对脸》一出台，即获国内外 18 项大奖。曾两度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提名的黄建新也夙愿已成，获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主演该片而获得珠海三地电影节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两个最佳男主角奖的牛振华，也成了目前影视界“烫手”的明星之一。

电视播完晚间新闻以后，王副馆长才回家。王副馆长进家门时，妻子仿兰已领着女儿睡着了。客厅里，只有老父亲趴在地板上，认真地补着一双旧胶鞋，屋里有一股胶水的香味。父亲见儿子回来，问他吃饭没有。听说儿子还没吃晚饭，父亲忙起身到厨房去弄。

王副馆长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一会，忽然闻到一股煤气味道，他连忙钻进厨房，一把将煤气罐拧死。父亲说：“怎么关了？正准备点火呢！”王副馆长说：“你不是点火，是打算放火。跟你说了一百遍，要先将火柴点着，再开煤气开关，你总是记反了。”父亲说：“我见你媳妇也常常先开煤气，再划火柴。”停一下，又说：“就怪她，怕女儿玩火，总将火柴藏得连我也找不着。”

王副馆长劈手夺过火柴，转身将门窗都打开，让风吹了一阵，再关牢后，这才将煤气灶点燃了。又随手将一只锅放上去，加了些水，说：“煮点面条。”正要走，见父亲一双黑手从柜子里抽出来，他连忙说：“我自己来，你歇着去吧！”一边皱着眉头从父亲手里接过两只鸡蛋，一边将父亲推出厨房。

王副馆长将鸡蛋面做好了，盛到碗里，正要吃，父亲又返转来了，冲着王副馆长说：“我听说，有件事对你不利。”王副馆长搁住筷子问：“你能听说什么重要事情？”父亲说：“下午，李会计的娘送鞋来时，亲口对我说的。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也只偷了一只耳朵，没听准什么，反正是李会计在家里说的。”王副馆长想了想说：“你别瞎操心，到中间去搅和。我的事你想关心也关心不了。”父亲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说着就退回去。

吃完面条，顺带将手脸脚洗了一把，出厨房时，见父亲仍在客厅里补胶鞋，他说：“一双破胶鞋，你想补出一朵花来？”父亲说：“这天怕是要下雨了，人家到时要穿呢。”王副馆长懒得再理睬，开了房门，就往床上钻。

仿兰仍没醒。王副馆长在床上坐了一阵，还是忍不住用手去摸妻子。摸了一阵，仿兰终于醒了，朦胧地问：“什么时候回的？快睡吧！”王副馆长说：“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仿兰振作了些。王副馆长继续说：“组织部约我明天下午去谈话，我想，可能是要我当正馆长。”仿兰说：“这也叫喜事？代馆长都代了快三年，人都累脱了几层皮。现在，你就是坐着不动，百事不做，也该送你一个馆长当一当。”王副馆长说：“话是这么说，可人家如果成心不让你升这半级，你也没办法。”仿兰说：“所以你就把这个响屁，当成了喜事。”王副馆长说：“你以为我当上国家主席才是喜事？这好比月月发工资，明知这笔钱是你该得的，可一到领工资的时候，人人都挺高兴，都把会计当成了菩萨。”

仿兰打了一个呵欠。女儿忽然叫了一声：“我要屙尿！”仿兰连忙跳下床，抱起女儿要去卫生间。一开房门，见公公正蹲在客厅地板上，忙又缩回来。仿兰只穿着乳罩和三角短裤。她将女儿往丈夫身上一扔，回头钻进被窝

里。

王副馆长抱女儿去上卫生间。路过客厅时，朝父亲说了几句重话。待他从卫生间返回，父亲已上床睡去，破布、破胶皮撒了一地板。

关了房门，仿兰说：“他又是没洗手脸就去睡了？下回，他的被窝你帮忙洗。”王副馆长不作声。放好女儿，他又续上刚才的话题，说：“领一个月的工资，就说明自己有一个月的价值。让我当正馆长，也就说明我有正馆长的价值。不让你当，就意味他们不承认你有这个价值。”

仿兰猛他说一句：“就像猪婆肉不是正经肉一样？”王副馆长说：“差不多是这个道理。”仿兰又说：“只有你把狗屎当金子。换了我，我倒要先考虑考虑这个馆长能不能当。要当也得提它三五个条件。”王副馆长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算了，睡吧！明天上午这一道难关，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仿兰说：“谁叫你充好汉，领导要安排亲戚子女到文化馆，你答应就是，这个单位又不是你私人的。我们图书馆只有10个编制，却进了21个人，工资奖金反而比你们发得多。领导子女来是好事，可以通过他们走后门找财政要钱嘛。”王副馆长说：“文化馆是搞文艺的，不考试就答应进谁，那怎么行？”

有一阵两人都没说话。王副馆长一翻身，胸脯贴到仿兰的背上，他正要将手伸出去，仿兰又开口说：“你父和李会计的娘关系怎么这么密切，是不是在谈朋友？”王副馆长一愣。仿兰继续说：“这一段你父经常带着孩子到李家去串门，今天下午，他又将李家的破鞋，抱了一大堆回来补。”

王副馆长记起父亲刚才说的话，他当时还以为父亲补的是自己家的鞋。但他仍替父亲辩解：“我父当了一生的补匠。这两年不让他上街摆摊，他就像丢了魂似的。能帮人补鞋，就证明他活着有价值。你也别乱猜。”仿兰说：“又不是我的亲老子，我才不管呢！你只告诉他，别脏了我的屋子就行。”

王副馆长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他翻了一下身，将自己的背对着仿兰的背。仿兰说风灌进被窝里了，他也懒得理。

睡了一阵，王副馆长感到有人在推自己。睁眼一看，天已经亮了。

仿兰见他醒了，就不再推。说：“决起床去看看，你父在外面哭呢！”

王副馆长一听，真的有哭声，就连忙起床，披着衣服冲出房门。果然是父亲老泪纵横地坐在小板凳上哭泣。

王副馆长说：“你怎么啦？”

父亲抹了一把眼泪，不说话。王副馆长有些急：“父！你是伤是病，先开个口呀！”

父亲喘不过气来。王副馆长上去帮忙在背上捶了几下。平缓后，父亲说：“昨天夜里，他们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王副馆长一惊：“谁？”同时心里马上判断，可能是李会计他们见父亲老和他娘在一起，就起了报复之心。

父亲说：“你爷你奶，你太爷太奶！”

王副馆长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他们早已作古了，怎么会打你呢？”

父亲说：“他们托梦给我，在梦里打我！说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所以王家香火在我手上断了，王家上千年的血脉让我毁了！”父亲抬起手，指着脸让王副馆长看，“我这张老脸都打乌了，伢儿，我只生你一个儿子，你说什么也要还我一个孙子呀！”

房门一响，仿兰款款地走出来。王副馆长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仿

兰故意轻描淡写他说：“父，你也不必伤心，只要他愿意，我们离婚，让他再去娶个会生儿子的姑娘就是。”

王副馆长忙说：“仿兰，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仿兰说：“这话让人听了该多舒服！”说着就进了卫生间。

王副馆长好说歹说，总算将父亲劝歇住，不再哭了，原先他打算早上和父亲说说，要他别给外人补鞋，别丢他的面子。父亲这一闹，他就不好开口了。

洗漱完毕，他到厨房去，想和仿兰说话，做点父亲爱吃的泡蛋。进去后，见仿兰已经做了，他就转身去给宣传部的冷部长打电话。

冷部长是县委常委，电话自然是公家安装的。王副馆长的电话安装得不明不白。文化馆准备将旧房拆了盖舞厅，几家建筑公司来抢这笔活。其中八建公司借口说为了便于联系，抢先给他家里安了一部电话。所以，他一拿起话筒，就感到当不当一把手，确实大不一样。

冷部长有个么姑娘叫冷冰冰，暑期参加高考，考了290分。冷部长想到文化馆的干部只要有专长有才华，文化水平不高不要紧，就想将冷冰冰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于是，他托人将么姑娘写的几篇日记和作文送给王副馆长“指教”。经人一暗示，王副馆长明白，冷部长是要他主动去找他要人才。

今天上午这场考试，本是单独为冷冰冰安排的，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说文化馆公开招聘文艺人才，搞得全县来报名的不下100人，光县委、县府两个大院的干部子女就有10几个。弄得王副馆长骑虎难下，只得假戏真做，请了几个评委，将一百多人筛得只剩下10个人，参加今天上午的最后面试。

王副馆长拨了一个号码，等了片刻，那边就有人声传过来，娇滴滴地问找谁。王副馆长就说：“你是冰冰吧？我是文化馆小王，请你爸，冷部长接电话。”说完这话后，王副馆长等了好一阵，话筒里没有人声，只响过一阵公鸡的打鸣声。仿兰都催了几次要他吃饭，可他不敢放话筒。那边终于传来了冷部长的声音。

王副馆长先说自己昨天晚上在他家等到9点多，见部长忙还没回来，就只好先告辞，等等，然后，又说今天的面试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以冰冰的才华，名列榜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这时，外屋里仿兰大声喝斥谁，说：“送什么礼呀送——王馆长不是见东西眼开的人，都给我提回去，凭真本事考嘛，何必来小动作。”

王副馆长见声音好大，忙将话筒上的送话器捂住，一转念头，他又放开了，并对着话筒说：“评委都是我亲自挑选的，政治上绝对可靠，不会自行其是。”他说“政治上”三个字时，语气特别重。

等了一会儿，冷部长在那边说：“有件事现在说不知误不误你们的事，冰冰她病了，不能参加面试。”

王副馆长正要再说点什么，那边电话已经挂上了。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出了房门，冲着仿兰说：“你刚才发什么神经病？”

仿兰说：“其实没人送东西来，我想和你作个配合，让领导更相信你。”

王副馆长说：“你是在画蛇添足。”

这一变化，让王副馆长食欲大减，只喝了两口粥就提着皮夹子上班去了。文化馆办公楼与宿舍楼本是一个整体，只是将一半设计成宿舍，另一半作办公用。王副馆长从家里走到办公楼大门前只用了两分钟。

还没到上班时间，看门的郑老头还没来，他从皮夹子里找出一把钥匙，

将大门开了，人进去后，又反手将门重新锁上。一进办公室，他就坐在椅子上发闷。闷了一会，他记起下午要到组织部去谈话，就连忙找出笔记本写起来，他先将代理馆长这几年的工作作了一些回顾。

一写到自己的工作成绩，王副馆长就兴奋起来。他推开门，走到阳台上，细细打量这一幢五层楼的建筑物。文化馆大楼县里叫了10几年，馆长换了几任，都没建起来。轮到他代理馆长，只用了14个月，大楼就树了起来。县长还多次在一些重要场合里说，要向文化馆学习，帐上没有一分钱，却盖起了一栋价值80万元的大楼。所谓文化馆，实际上就是指的他。

王副馆长朝下看时，见宣传部秘书科的小阎领着一个人，正在楼下观望。他就叫起来：“小阎，上来坐一会吧！”

小阎和那人说了句什么，就领路朝楼梯间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办公室门口。

坐下后，小阎相互作了介绍，王副馆长知道随小阎来的这人是小阎的老师，听说文化馆公开招考干部，特来看个热闹。小阎的老师姓马，王副馆长看了几眼，总觉得有些面熟。老马看出他眼里的意思，就主动说，前年县里搞“金色的秋天”摄影作品展览，他有一幅作品入选了。他来文化馆拿入选证时，有些不好意思，就说自己是代人来领的。王副馆长记起有这件事，他还记得这幅作品名叫《秋风醉了》，作者是一个副乡长，作品本来很差，但名字取得好，作者身份又特别，王副馆长就力举让这幅《秋风醉了》参展。王副馆长本想问问老马现在作什么事，但见小阎起身告辞，他自己也忙，便作罢了。

临出门时，老马握着他的手说：“日后还望多关照。”

王副馆长说：“对来自基层作者的作品，我一向强调要特别关照。这一点请放心。”

老马没说什么，只是轻轻一笑，有点意味深长的样子。

和小阎握手时，王副馆长半天不松开，扯着问：“冷部长对我们这次考试，不知有何意见或指示？和我说一说，马上我们的舞厅做起来了，老哥每天送你两张票。”

小阎也学者马轻轻一笑，说：“冷部长对你工作中的锐气很欣赏，多次要部里的中层干部向你学习呢！”

王副馆长说：“他这么看重我，那他的冰冰今天怎么不来参加考试？”

小阎说：“这是冷部长的私事，我也不知道。”

王副馆长从小阎脸上看不出什么暗示，只好放他走了。

小阎刚走，李会计来了。问他今天的考试是不是按时举行。王副馆长怀疑他怎么这样问，是不是他已经知道冷冰冰不来参加考试，加上想起父亲昨晚说的那些话，心里忽然有了一股气，就说：“有什么变化，我会通知你的。”

李会计停了停，正要走，王副馆长甩来一支烟，随口问：“听人议论，宣传口最近像有什么人事变动，你消息灵通，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李会计一边低头点烟一边说：“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王副馆长就问他，让通知八建公司今晚来人谈判，拆旧房盖舞厅的事，通知了没有。李会计说已经通知了，今晚他们正副经理都来。隔了一会，王副馆长又问他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事进展如何，听说有些阻力，他答应过几天帮忙跑一下，疏通疏通。李会计当即表示感谢。王副馆长盼他嘴里能透露点别的什么，见他问一句答一句，半句也不愿多说，知道无益，就叫他走了。

门外陆续走过一些人，是馆里的干部来上班了。王副馆长一看表是8点半，离考试开始，还有一个钟头。他便又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汇报。

成绩自然有一大堆，不然他不会连续被评为省地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王副馆长想光说成绩人家会说你骄傲狂妄，还应该说点缺点。他最大的缺点是不大听话，上面的指示，他总要添点什么或减点什么，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和不折不扣。譬如说这次招考文艺人才，本来看准一个好苗子选进来就是，他却要别出心裁，组织一个评委会，搞初试和面试。宣传口的干部全归冷部长管，没有他点头，谁也提拔不起来。王副馆长觉得既然冷部长不计较这点，将他由副转正，自己不就冷冰冰的事检个讨，就太不近人情了。这种缺点的根本问题是个性太强，宁折不弯，遇事不讲究调和，态度强硬，方法简单。王副馆长又安排自己在说了这一通后，一定要说说老罗的事。

老罗是馆里的音乐干部，他本是在下面一个乡电影队当放映员，因和县委书记是同学，才调到文化馆。来馆不到一年就搞了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姑娘。弄得那一阵，天天有人来找老罗算帐，搞得全馆乌烟瘴气。宣传部、文化局都不敢处理。那时，前任馆长刚调走，王副馆长刚刚开始代理馆长，上面将这事交给他处理。他将心一横，给了老罗一个行政记大过，停发当年奖金的处分。奖金停了半年，县委办公室就有人来说情，但他不客气地抵了回去，结果他在馆内的威信一下子起来了。

正在盘算这小骂大帮忙的主意时，电话铃响了，隔着一道墙，清晰得很。跟着李会计在那边屋里喊：“王馆长接电话！”

他过去拿起话筒，听出是县政府文卫科的史科长。史科长说上午来考试的人当中，有个叫肖乐乐的，他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的妹妹，一定要特别关照。王副馆长嘴上应承了，心里却骂道：“20几岁，卵子还没长圆，就想在老子面前玩领导的味儿？真是睡着后笑醒了。”

放下电话后，李会计问他这次收的报考费怎么处理。王副馆长问清有差不多五百元时，就说：“再添一点，凑一千元，将银行那笔贷款的利息付了。”

李会计说：“是不是作奖金发了算了。银行的钱，一千两千地还，他们还嫌麻烦。”

王副馆长说：“没办法，银行这笔钱没还清，住在这房子里就不舒服，你同大家解释一下，现在为我捧捧场，将来会有大家的好处的。”

回到办公室，见屋里站着个挺好看的女孩。他心里有几分好感，就主动问她找谁。女孩说她叫肖乐乐，找王馆长。王副馆长想起刚才电话里史科长的口气，一点好感立即消失了。他接过肖乐乐递过来的条子，看也不看就放在桌上，借口叫肖乐乐出去放松放松，以免考试时太紧张，将她打发走了。

肖乐乐走后，接二连三地来了不少人，都是递条子的。王副馆长数了数，9个人参加考试，递的条子却有13张。条子上落款的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史科长在里面只算是一个小爬虫。

王副馆长瞅着那堆条子，犯了难，那些写条子的人都是不好得罪的。而这次招考只录取一人，原定是要录冷冰冰，那九个人只是陪着练练，再好他也不敢录取。

他想了一阵，想出个主意，就唤李会计过来商量。

李会计听说他准备让每个评委，给参加考试的人，统统都打九分，就摇头，说：“这会让人看出问题来。不如规定从8.5到9.4，共10个分数。评第一个人时，第一个评委打8.5分，第二个评委打8.6分，第十个评委就打

9.4分。评第二个人时，第一个评委打8.6分，第二个评委打8.7分，第十个评委打8.5分，这样依次排下去，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每个人都是71.6分。”

王副馆长见李会计脱口说这许多数字，就说：“你好像预先就知道许多事一样？”

李会计说：“王馆长这样说，以后我就不敢为你当参谋了。”

王副馆长说：“等我当了馆长时，一定举荐你当副馆长。”

李会计望着他不说话。

王副馆长说：“我还想将评委秘密打分，改为公开亮分，免得有个别人不听话，私下下我的绊马索。”

李会计说：“这个主意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粥面看饭面，谁若是抬谁的分，看得清清楚楚，谅他们无论如何不敢得罪冷部长。”

王副馆长说：“很对，如果今天9个人得分一样，我就可以一个不取，这个名额还是冷冰冰的。”

商量好后，李会计就去通知评委们来开碰头会。王副馆长数准10个人都到了以后，就说：“我先给个东西大家看看，然后请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分数。怎么个打法。”说着，他将桌上的13张条子，递给评委们过目。评委们看后，一个个脸上很严肃。

王副馆长说：“这样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将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我是很看不惯的。我的意见是一个也不录取。”评委中有几个人齐声附和。

忽然评委中有人问：“怎么没见到冷冰冰的条子？”王副馆长说：“她病了，不能参加今天的面试。”大家齐声“啊”了一下，然后都说就按王馆长的意思办。九点半时，评委们鱼贯进入考场。一坐定，王副馆长就宣布面试开始。

由于不收门票，来观看的人很多。

开始几个71.6分出现时，大家都发出各种惊叹。特别是第九个71.6分出现时，考场轰地一响，像是天上打了一个滚雷。等王副馆长重新出现在台上时，考场猛地静下来。王副馆长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尊重评委的意见，慎重地进行研究。”参加考试的人，都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一个个不知说什么好。王副馆长说了几句安慰话，他们就随大家往外走。一屋人中，只有两个人在笑。王副馆长认出，这俩人一个是小阎，一个是小阎的老师老马。

等人都走完后，王副馆长立即给冷部长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本来想下午亲自来汇报，但是组织部约他下午去谈话，所以就先将结果报告一下。他这样说，本是想探探冷部长的口气。冷部长只说了一句：“你的高招真多，我都防不胜防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王副馆长猜不透冷部长话里的意思。回家吃中午饭时，说给仿兰听，仿兰也判断不准。

四

下午，各机关都是一点半钟上班。王副馆长一点钟从家里出发，到组织部只用了15分钟。

干部科的门敞着，有两个人在办公桌上下象棋。王副馆长冲着执黑的一方叫姚科长，又冲执红的一方叫张科长。二人都朝他点点头，说声你来了，又埋头厮杀去了。王副馆长见红方张科长走错一步棋，就想提醒他，终究是

强忍住没有开口。黑方姚科长赶紧挥车叫将。张科长一看，将虽将不死，却要丢一只马。他懊悔不及，连连说自己不该太冲了。太冲了总要吃亏的。后一句是姚科长说的。

这时，墙上的石英钟响了一下。张科长忙一推棋子，说：“上班時間到了，不能下了。”

姚科长说：“这盘棋你是输定了。”

张科长说：“那倒未必，古话说先死而后生。老王你说是不是。”

王副馆长说：“其实姚科长的棋也潜伏着危机。”

一边议论，一边将棋收拾好了。

姚科长又叫张科长给王副馆长泡茶，说张科长是输家，输家就得受罚。

张科长却反叫姚科长给客人泡茶，理由是姚科长爱跳舞，若不待王副馆长客气点，等文化馆舞厅建起来后，不买票就不许进。

姚科长不以为然，说他不信王副馆长会拦在门口。

张科长说，王副馆长自然不会拦在门口，但他会请两个素不相识的民工守门，看谁有力气硬往里闯。

说着话又进来了一个人，是宣传部小阎的老师。老马进门后，腼腆地冲王副馆长点点头，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

姚科长和张科长扯了半天皮，到底谁也没去泡茶。

王副馆长趁他俩扯皮刚告一段落，赶忙插进来说话。他知道一会儿管县直机关的徐副部长就要来了，等他来了自己就不好主动谈自己今后工作的设想？趁他没来，自己就开始说，等他来了，正好可以听到一部份，而这些事闲聊时说，比正式汇报效果要好。譬如说建一个高档舞厅，闲聊时可以说星期六晚十点半以后，舞厅灯光改为烛光，舞曲一律是慢三、慢四，而且还要设几处屏风，跳到最抒情时，可以转到屏风后面去。又譬如，建一个镭射电影厅，专放一些进口电影，因为镭射视盘是采用激光信息处理的，无法进行剪接，所以刺激性很强的镜头特多。等等这些，都不能在正式汇报时说，说了就要犯大忌。

王副馆长说，他打算年内将舞厅建起来，明年再投资搞镭射电影，后年搞一个健身房，这中间再看准机会办一个公司。

徐副部长果然在王副馆长说到最精彩处时走进来，除了老马起身上前和他握手，别人都没多大反应。

徐副部长一直津津有味地听，直到王副馆长将话说完，才开腔。他说：“我们开始谈正事吧！”

姚科长赶忙起身给徐副部长倒水，却被张科长捷足先登了。

徐副部长接着说：“文化馆的工作，这两年在王代馆长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考虑到上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县里就不能小看它。所以，冷部长和我们商量过后，决定调西山乡副乡长马金台同志到文化馆担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

王副馆长听到这话，脑子里轰地一响，眼前泛起一层黑点。

徐副部长下面讲的什么，他听不大清。只见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他下意识地握住，抬头一看，见是老马。

老马说：“从前我是你的业余作者，现在转到文化战线上来，我仍是你的业余作者，因为我不算太内行，有些事还需要王馆长你多加指点。”

王副馆长定了定神，勉强开口说：“一个锅里吃饭的人，好说，好说！”

徐副部长又说：“你俩一正一副，分工是这样的：老马抓全盘，兼管人事。小王抓业务，兼管财经。不知你们有别的意见没有？”

老马说：“没有。我服从安排。”

王副馆长说：“我只管业务就行，别的都归老马吧！”

姚科长忽然说：“一个人事，一个财经，是最重要的两件事，让一个头头管不好，缺少一种平衡机制。”王副馆长本是赌气，听姚科长一说，就不再坚持了。他知道不管人事和财经就没有威信。

徐副部长说：“小王，我知道你心里有意见，哪个副职不想转正？老马比你大10多岁不是？你在年龄上有优势嘛！年轻人要经得住磨炼和考验。”

王副馆长不作声。

徐副部长又问老马：“有什么困难没有？住房问题？家属问题？”

老马说：“家属是半边户，田里的事离不开人，就算了。但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县里读高中，看看能不能搞几间宽敞些的房子？”

徐副部长说：“文化馆做了新房子，腾一套出来没问题吧？”王副馆长想了想说：“只有腾李会计的房子了，他在西街上买了一套私房，按政策有了私房的就不能住公房。”徐副部长拍了一下巴掌说：“就这样定了。”

张科长说：“具体的还是王馆长去落实。这是老马的事，老马不便出面。”

王副馆长说：“我这个副职说话，不知他听不听！”姚科长说：“我知道，你把文化馆几个人盘得像猴子一样，大家都听你的。”

王副馆长说：“你这样说可不好，老马来当一把手了，可别让他以为我在搞拉帮结派。”

老马忙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左派。”

大家都笑起来，王副馆长也笑了笑，样子有点吃力。于是，徐副部长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谈话是不是就到此结束。我还约了别的同志来谈话。”

老马和王副馆长一先一后走出来。在走廊上走了一阵，又在楼梯上走了一阵，二人都没说话。

走到办公楼外的花坛边时，王副馆长正想随便找句什么话和老马说说，老马先开口了。

老马说：“王馆长，你看我几时上班合适？”

王副馆长忽然生起反感，说：“你是一把手，想几时上班都行。”

老马说：“那就明天吧！”

王副馆长说：“那我就回去通知，明天上午开个欢迎会。”老马说：“大家见见面也行。”

又走了几步，二人就分手了。老马住在招待所，与王副馆长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王副馆长在回馆的路上碰见了李会计。李会计从银行取款出来，站在路边喊他。

王副馆长和他走对面后，立即就埋怨道：“你知道要调外人来当馆长，怎么不直接告诉我？”

李会计说：“怕你感情上受不了。只好让我妈向你父递个信，暗示一下。”

王副馆长说：“刚谈过话。老马来馆里住，还相中了你那房子。徐部长指名让我督促你将房子腾给老马。”李会计说：“老马没来馆，怎么知道的？”

王副馆长说：“上午宣传部的小阎领他来实地看过了，只是你我还蒙在

鼓里。”

李会计立即骂起来：“我日他老马的娘，第一斧头想砍我，别想！”

王副馆长提醒他：“你的党员还在预备期呢！”

李会计说：“预备期我也要日他娘！”

王副馆长说：“骂归骂，房子还是得让给老马。另外，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开全馆大会，欢迎老马到任。”

说完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顺顺气，当心将取的款丢了。”

李会计在身后直蹬脚，像是说宁肯不在文化馆干，也难咽下这口气。

五

在家门口，王副馆长正碰见老罗从屋里出来。见了他，老罗边阴阴地笑，边点点头，并不说话，就走了。

王副馆长很奇怪，老罗平日见了他像见了仇人，怎么今天倒亲自上门了呢？

进了屋，就见父亲的一副驼背正对着门口。

听见脚步声，父亲说：“还有什么要补的吗，罗同志？”王副馆长一扬嗓子说：“你同志个屁！”

父亲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是自己的儿子，就说：“伢儿，你怎么了，也骂起老子来了？”

王副馆长一愣，避开这个话题：“我问你，姓罗的来干什么？”父亲说：“没什么，让我给他补双鞋！”

王副馆长再也忍不住了，叫起来：“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你这不值钱，给他补鞋？”

父亲说：“我补了一生鞋，只认鞋不认人。”停一下又说：“你说老子不值钱，老子就不值钱。老子一生只认破鞋，不认好鞋。没有那些破鞋，能有你光亮堂堂的今天？”

王副馆长说：“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姓罗的今天是在损我，欺负我。他知道老马要来当馆长，我没法管他了，才敢让你给他补鞋的。”

他说着便跳到走廊上，大声说：“姓罗的，把你的臭鞋提回去。”

老罗在走廊另一头站着回答：“你说话怕是算不得数的。你父亲说过，补好后亲自给我送来。”

王副馆长说：“你不拿，那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老罗说：“扔不扔我不管，我只找你父亲要这双鞋！”王副馆长正要说什么，父亲从身后门里钻出来，平静他说：“罗同志，请稍等会儿，这鞋我马上就补好给你送去！”老罗和王副馆长忽然说不出话来。

父亲佝偻着身子趴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将鞋补好。然后稳稳地走到走廊那头，轻轻地将鞋交给老罗。

老罗说：“王师傅，我给你钱，要多少？”

父亲说：“我有儿子养，要钱做什么？只要你日后记得有个王老头给你补过鞋就行。”

老罗的脸一点一点地红了。

王副馆长知道父亲要对自己说什么，他没有在客厅里坐，径直进了卧室，关上门后，开始拨电话机上的拨号盘。

这次他要的是八建公司的经理。经理姓石。他先将馆里领导班子变动的情况和石经理说清楚了。电话里的石经理急了：“那你们拆旧房建舞厅的事

有变化没有？”

王副馆长说：“从明天起就不归我当家。我说不准。”石经理说：“好歹还有一个晚上，你支持我们一下吧，我老石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我是滴水之恩必报。”王副馆长沉吟一阵，才说：“那就按原计划，晚上见面谈。不过有句话说在前，我知道你们手上的活不多，所以，合同造价不能太高。起码要让明天上任的一把手找不到毁合同的把柄。”

石经理在电话里答应了。

放下电话，王副馆长正准备上幼儿园去接女儿，仿兰抱着女儿从门外走进来。

王副馆长问：“怎回得这样早？哪儿不舒服吗？”仿兰说：“还不是为了你的事气得肚子痛！”

王副馆长说：“你都知道了？”

仿兰说：“代了这几年馆长，起早摸黑地干，人瘦了几圈，到头来让别人坐享其成。”

王副馆长说：“昨晚你不是劝我别干这差事吗？”仿兰说：“劝归劝，事到临头，就得争那口气。”王副馆长听了心里怦然一动，禁不住脱口说道：“这口气我非争回不可。”又说，“这个家看看到底由谁当。”晚饭仿兰弄了点酒，王副馆长一口气连干三杯。一直没说话的父亲，忽然开口说：“老罗送鞋来补时，说从乡下调了一个人来当馆长，这事可是真的？”

王副馆长说：“单位的事你少问。”

父亲说：“我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老罗说，新馆长已和他通了气，准备重用他。”

仿兰鼻子嗤了一声：“这也不是什么绝招，每个新来的头头，总是要利用先前的反对派来站稳脚跟。”

这话让王副馆长动了心思。反对派他不怕，怕就怕有人向老马那边倒戈。幸亏让他管财经，老马管人事。馆内的干部子女，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上小学和初中，没有待业的，不会求老马找事做。而财经上讲究一支笔签字报帐，谅大家不敢做得太过份，以免得罪了他。至于业务，老马是个外行，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他像已经获胜一样，又喝了三杯酒。仿兰并不劝他，第一回由他喝去，在往常，她是绝不允许丈夫超过三杯的。

晚上，和八建公司的谈判是在外贸宾馆的一间客房里进行的。客房分为里外两间，大部份时间是王副馆长和石经理在里面屋里单独谈，石经理带来的人和文化馆的李会计在外屋吃点心喝咖啡。

王副馆长要求八建公司，明天就派几个人去扒旧房子，人别多，进度慢不怕，房子拆完后，停一阵再开始挖屋基，也不要搞得太快，屋基挖好后，就完全停下来。前面几点，石经理没有意见，只是认为屋基挖好后如果不做好屋脚，日后再做时，会有大量的返工。王副馆长当即表示，承认五百块钱作为返工费。

谈妥这些，他俩就开门，唤各自的随从进来，在合同上正式签字。按照乙方文化馆的要求，合同签字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合同规定，舞厅造价为20万零8千5百元。

合同一签定，石经理就让八建公司的会计拿出一个红纸包，说按建筑行业的规定，王副馆长可以拿总造价百分之五的信息服务费。红纸包包的是一万元现金。王副馆长坚辞不接，并表示他决不做违犯党纪国法的事。后经协

商，决定由八建公司给李会计家安一套燃气热水器，王副馆长这边则定为，待他父亲百年之后，由八建公司承担全部丧事费用，并负责建造一座墓。至于多余的钱，暂时留在八建公司的帐上，待适当时机，凭王副馆长的条子，请文化馆全体人员到北戴河旅游一次。

签完合同出来，天上下起了雨，趁石经理打电话叫车来送他俩时。王副馆长问李会计，明天上午的会，是否通知到每一个人了。李会计叫声哎哟，说事情太多，他将这事忘了。王副馆长知道李会计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说破，只说，那就来几个算几个。

六

第二天早上，王副馆长准时7点半钟到馆里上班。还在一楼就听到头顶上有不少人在说话。上到二楼，见会议室的门已打开，老马和先到的几个在聊天。大家笑咪咪地认真听老马讲他当副乡长时的笑话。

王副馆长在门外站了一会儿，陆续又来了些人，连一向只来领工资的退居二线的老馆长也病快地来了。王副馆长突然觉得李会计是不是在和自己玩瞒天过海的把戏。他昨天说忘了通知今天的会，但今天大家到得出奇的齐，还有会议室的门只有李会计有钥匙。李会计若倒戈，那他今后的处境就惨了。

正想着，李会计在楼梯上出现了。

王副馆长便说：“你像个预备党员，好积极呀！”

李会计一愣后才说：“门不是我开的。是老罗一大早上我家去拿的钥匙。我还没起床呢！老罗说是老马叫他去拿的，老马还叫他去通知全馆人员今天来开会。”

听了这话，王副馆长才放下心，说：“老马启用老罗，简直对全馆其他同志是个侮辱。”

李会计说：“我看没有人与老罗为伍。”

王副馆长说：“我们今天就开始，不让老罗的尾巴翘起来。”

李会计点了头。

王副馆长走进会议室，一坐下就对老马说：“开始吧！”也不等老马示意，就提高嗓门说：“今天这个会没别的议程，专门欢迎老马来馆里当馆长，请大家鼓掌欢迎。”大家都鼓了掌。他继续说：“老马以前专和农民打交道，抓火葬、抓计划生育、抓积肥很有办法。现在他要和各位文化人打交道，初来时可能会力不从心，希望大家多支持。下面请老马发表就职演说！”

老马一开始就说他那张获奖的摄影作品。他说：“我与文化馆是有缘份的，那年借人家一部旧照像机，随手拍了一张《秋风醉了》，就被王馆长慧眼看中，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说着，老马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照片让大家看。

大家从手上传了一遍，都不说什么，只有老罗连声说好。传到王副馆长手上，他看到照片上，一位老农民正在旷野里伫望着，一阵秋风吹过来，将老农民头上的草帽吹下来，正好落在蹲在他脚边的一只小狗头上，小狗抬起前爪，活像一个人。

老马又说了一通客套话，然后是大家发言表态。先是老罗说，老罗说他感到新馆长到任后，各方面有耳目一新的味道，他本人争取在新馆长的领导下，创作出好的音乐作品，评上省政府颁发的“屈原文艺奖”。老罗刚说完，搞文学创作的老宋说，新馆长能让老罗获此殊荣，那也一定能让我拿回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大笑起来。

李会计最后说：“老马看中了我那套房子，是看得起我，过两天我就腾出来。也算是以实际行动迎接新馆长吧。”

王副馆长及时插嘴：“说不定什么时候，上面给我们调来一个副馆长或副书记，希望在县城内有私房的同志向李会计学习，届时积极给予配合。”

接下来老马将正副馆长的分工宣布了。然后就散会。

老罗正要走，李会计叫住他，问会议室的茶杯怎么少了四只。老罗摇头表示不知道。李会计说：“不知道不行，你开的门，茶杯少了该你负责赔。”

老罗说：“你以前就丢了，别想往我头上赖。”

李会计说：“你才是赖呢！昨天上午考试，四十只茶杯还一只不少。”

老马出来打圆场说：“几只杯子，丢了算了。”

王副馆长马上说：“这可不行。馆里订了制度呢，除非你宣布以前的制度全部作废。”

老马愣了愣说：“既然有制度就按制度办。”

李会计说：“听见没有，老罗，四个茶杯共九块六角钱，在这个月的工资里面扣。拿钥匙时，我说过会议室里小东西多，丢了不好办。你说没问题，丢了你负责。你说话可得算话。”

老罗气急败坏他说：“谁敢扣我的工资，我要闹得全馆的人都领不成工资。”

老罗边说边往外走，刚走到门口，猛地楼下传来一声巨响，跟着一股尘土冲天而起。大家赶忙用手捂住鼻子。

老马冒着灰尘走到走廊边，探头一看，见一群人正在推那幢先前曾作电视录像厅的平房周围的临时棚子。

见老马一脸的疑惑，王副馆长装出一副对不起的模样说：“忘了和你通气，拆这房子是准备盖舞厅的。”

老马问：“签合同了吗？”

王副馆长说：“上个月签的。”

老马不作声。

李会计将会议室的一张旧办公桌腾出来，给老马用。办公桌有七成新，王副馆长嫌它旧了，别让人见了说他欺负老马是后来的，就要李会计去买张新的，反正会议室也要桌子用。老罗自告奋勇要去帮忙抬回来，老马推辞几下，也就随他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老马和老罗就抬回了一张新办公桌。就摆在王副馆长的对面。老罗拿着发票去找李会计报销。李会计见上面只有老马的签字，就不给报销，要他去找王副馆长签字。老罗回到馆长办公室，将发票递给老马，并说你签的字没有效，非得王馆长签了字才行。老马瞅着发票怔怔地没反应，王副馆长伸手拿过发票，飞快地签上“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将发票丢在桌面上。老罗见老马不说话，只好拿上发票出去了。

老马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说：“我在乡里工作时，乡长和管财经的副乡长签字的发票都能报销。”

王副馆长说：“你那是乡政府，是权力机关，这儿是文化馆，是事业单位。”又说，“县里各机关都是这样。”

老马没话可说，就要了一份馆内全年工作计划去看。

下午，老马又找李会计，将与八建公司签的合同要去查看。王副馆长听李会计说后，也去了会议室。老马刚看完，正一个人在那儿抽烟。

王副馆长说：“到处找你才找着。昨天上午考试的事，得好好研究一下，不得出个结果，可没法向考生们交代。”

老马说：“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副馆长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看你这一把手的了。”

老马说：“那就拖一拖吧，拖到最后，就不了了之。”

王副馆长仿佛才看到桌上的合同书：“哟，你在重新审查舞厅合同呀。正合适，查出问题还来得及处理。”

老马支吾说：“我没这个意思，只是想看看未来的舞厅是个什么模样。”

王副馆长问：“建价还合理吧？”

老马说：“没办法比这更合理了。”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楼下和拆房子的工人聊天，李会计将他喊到一旁，告诉他老马买办公桌的那张发票有问题。办公桌都是一百五六十块钱一张，可老马的这张发票上写的是210元。于是他就偷偷去查了一下，原来是老罗从中做了手脚，瞒着老马，偷偷给自己买了一对藤椅。

王副馆长想了想，让李会计别声张，先压一压再说，等到扣茶杯钱时，老罗若闹就一起处理。但到发工资时，老罗拿着工资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老马这几天一直要李会计腾房子，他不便直接和李会计说，老是找王副馆长，要他催一催。王副馆长趁势和李会计说了这事，李会计答应后天搬。王副馆长却说，楼下拆得这样乱七八糟的，你不怕将彩电、冰箱和家具碰坏了吗？李会计立即心领神会，说等房基做好以后，马上就搬。

王副馆长将这话传给了老马。

老马当时没作声，过后他向冷部长作了汇报。冷部长就让小阎给王副馆长打电话，限李会计三天之内搬家，否则，每一天收十元钱的房租，或者老马住招待所的钱由李会计出。王副馆长认为这样做不妥，让小阎转告冷部长，说如果老马是普通干部，这样做倒没多大后遗症，但情况不是这样，他这个当第二把手的，就不能不请领导慎重考虑。

说这些话时，李会计就在旁边，他几次伸手夺话筒，都被王副馆长挡回去了。

李会计气得脸发白。王副馆长放下电话对他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就让让步吧。”

李会计赌气不答应。

王副馆长说：“我作个主，馆里给你报销全部搬家费用。”

李会计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勉强同意了。

到搬家时，李会计将屋里的灯泡、锁全部下走了，还用砖头在客厅正中砸了两个大洞。

老马搬来文化馆后，一连几个晚上屋里是黑的，不知线路上出了什么问题，崭新的灯泡没有一个发亮，最后只好将全部线路换了，才算解决问题。

老马的两个孩子也来文化馆住。老马在乡下总是吃现成饭，文化馆没有食堂，他只好自己烧火做饭。因为没做惯，他的孩子总说他做的菜，还比不上学校学生食堂做的。

那天，老马接王副馆长的父亲到他家帮忙补破鞋，二人聊起来后，老马说他真不该到文化馆里来。

自从老马来后，王副馆长上班总是迟到。这天，他一进办公室，老马就告诉他，人事局将冷冰冰分配到文化馆来了。王副馆长问是上面硬性分的，

还是馆里自愿接收的。老马犹豫了一下，才说是他点头同意的。王副馆长说，你是有权同意。

老马也不客气，就和他商量，给冰冰安排个什么工作。王副馆长就说这些天了，你心里总有所考虑吧。老马就说他想将冰冰安排搞文学创作。王副馆长说他没意见，只是老宋的工作得重新安排。老马说，就是老宋的工作不好安排，他才犯难的。王副馆长说，经营部不正好缺个副主任吗。老马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便同意了。

冷冰冰来报到后，老马约老来到办公室里谈了一次话。谈到半中间，老宋拍起桌子和老马吵了一架，还指鸡骂狗地将冷部长骂了一通，冷冰冰当即气得哭着跑出文化馆大门。

第二天，一上班，老宋就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他说他不愿做老马的长工，让他给老马赚钱，还不如自己去挣点现成的。

报告是给王副馆长的。老宋不愿见老马，他说他见了老马，就会变成杀人犯。

王副馆长将报告复印了一份，将原件交给了老马，自己揣着复印件去了一趟宣传部。正好冷部长在秘书科坐着。他将复印件给了冷部长。冷部长扫了一眼后不高兴他说：“怎么老马连这点小事也处理不好，这多年的副乡长是怎么当的。”

王副馆长说：“文化馆的人，个个都难盘。”

冷部长觉得自己失言了，就不说话。

王副馆长像是无聊地找话说，他敲了敲办公桌，问小阎知不知道办公桌现在几多钱一张。小阎说多不超过160，少不低于150。王副馆长笑起来，说小阎衙门坐久了不知民情，老马前些时亲自去买了一张和这一模一样的办公桌，不多不少整花了210元。

他说完后，并不去看冷部长，但他从小阎的眼里看出，冷部长脸色没有以前好。

七

冷冰冰上班的第一天，就将双腿的膝盖都摔破了。她早上起晚了，没吃早餐就来上班。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她才起身上街去买油条。走到一楼楼梯口时，正遇上王副馆长，她和他打了个招呼。没提防脚下有一堆乱砖头，踩上去后，身子一歪，王副馆长伸手没扯住，冷冰冰人横着倒下去，左膝盖当即就出了血。她爬起来，一边哎哟直叫，一边往前瘸着走，一根废钢筋正好勾住她的大摆裙。这次王副馆长及时拉住了她，她只是双膝跪了一下，不过右膝盖仍出了血。高跟鞋跟也扭断了。

冷冰冰流着泪问王副馆长：“这破房子要拆到哪年哪月才能拆完呀？”

王副馆长说：“你问老马去，老马不弄点钱给建筑公司，他们当然干得不起劲呀！”

王副馆长将冷冰冰扶到家里，给她的膝盖上搽了红药水，又敷上消炎粉。

王副馆长的父亲见冷冰冰的鞋跟坏了，就要给她修一修。

王副馆长正想说什么，李会计在楼下喊他接电话，他就匆匆去了。

电话是县爱国卫生委员会打来的，说下个月五号，省爱国卫生检查团要来县里检查验收，文化馆拆房工地必须迅速清理好，县长发了话，否则，因此评不上文明城镇，是要处分人的。王副馆长答应，他一定将此事转告老马，尽快按上面的要求，将环境搞好，不丢县里的丑。

老马因要给两个孩子做饭、洗衣服，加上在乡里工作散漫惯了，上班从不守时。王副馆长等了一会儿，见老马还没来，就给他留了个条子。回头看看日历，见已是月底30号了，就又在条子上加一句，说自己这几天带冷冰冰下乡走访业余作者去了。

王副馆长回家时，冷冰冰正在试鞋。

他问她想不想和下面的业余作者见见面，相互熟识一下。冷冰冰因自己一下子成了全县业余作者的头头，早就想下去转转，所以就一口答应，也不管双膝怎么痛，跑回家拿上行李，就去车站赶10点钟的班车。

冷冰冰走后，父亲告诉王副馆长，说冷冰冰告诉他，她多次在冷部长面前说，老马是个平庸的人、无能的人，文化馆的工作要想搞上去，必须依靠王副馆长。

听了这话，王副馆长忽然觉得，其实父亲帮人补鞋，得到最大好处的是他，父亲这样作既可以帮他联络与别人的感情，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他给仿兰打了个电话，仿兰听说他和冷冰冰一起下乡，有点不高兴。王副馆长就开导她，说人家是县委常委的千金，我就是有贼心，也无贼胆呀。

王副馆长和冷冰冰走后，老马才到办公室，见了条子，他有些无所谓。在乡下，这类检查他见得多了，无非是到时拣个好去处领着检查团逛一逛，然后用好酒好菜款待一番，就没有不合格的。老马不知道，机关工作对此类事是极认真的。机关的人都是你上班我也上班，你下班我也下班，一起看报，一起聊天，你起草文件，我起草报告，都是一样的事，难分个高下。能分出高下的就是门上贴的“最清洁”、“清洁”、“争取清洁”等一类的纸条。

老马到拆房工地和工头打了声招呼，要他们将工程垃圾顺顺，别太招人眼。

过了两天，老马正在家洗衣服，李会计喊他去办公室有事。老马拖了一会，想将几件衣服洗完，还剩最后一条裤子时，老罗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冷部长在办公室等了半天，见老马还不来，发了一顿脾气后走了，要老马立即到宣传部去见他。

老马慌了，一扔衣服，手上的肥皂泡也顾不上擦，关上门就往宣传部赶。

到了宣传部后，才知冷部长专门为清理文化馆工地上的垃圾而登门的，冷部长是爱国卫生委员会的主任。离五号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可文化馆仍没有一点动静。文化馆地处县城最繁华路段，进县城的车辆和行人都要路过其门前，它的好与差，都是藏不住，躲不掉的。冷部长登门时就很恼火，没料到又坐了一番冷板凳，若是当时碰见了老马，他恨不能给他两耳光。

弄清冷部长的意思以后，老马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场表示两天之内就是用手捧，也要建筑公司的人将垃圾处理完。

老马回馆后，一边打电话，一边怪李会计没有把话说清。李会计辩解，说冷部长来自自然是有事，没事他来干什么，总不会是特意来看望老马的吧？

这时八建公司的电话通了，老马说他要找石经理。接电话的说石经理出差到武汉还没回来。老马就说那就找其他副经理。接电话的又说，只有一个副经理在家，但他不是分管文化馆工地的。老马还是要和这个副经理说话。副经理接了电话，问清意思后，为难他说，各工地都承包了，必须由分管的副经理才能解决。

老马说了半天仍没有说服对方。放下电话，他直接去工地找工头，要他

们赶紧将工地清理一下。工头硬梆梆他说，他们施工从来就是这样，工程完了才搞清理。

老马急了，说：“若不听我的，这工程就不让你们做了。”

工头一点不慌他说：“那样更好，我们可以白拿一笔赔偿金。”

老马急得团团转，心火上来，牙床肿得像红萝卜，一整夜没合上眼。第二天起床，眼没睁开就出外奔波，结果仍是徒劳一天。

晚上，老马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给冷部长打电话，说这事他干不成，撤了职也没办法。冷部长无奈，就答应明天到文化馆工地现场办公。

四号早上，老马去工地转悠时，碰见王副馆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王副馆长问他怎么脸肿成这个样子，像是被鬼打了。老马说是上火牙痛。王副馆长没往下问，径直回家去了。

早饭后不久，冷部长来了，跟着八建公司的头头也都来了。石经理表态表现得很好。但他刚说完，分管的副经理就说，这么多的垃圾，就是日死狗一样的干，一天也拉不完，就是两天也很勉强。

大家一算帐，果然有道理。

冷部长一直没说话。

李会计这时说：“听说王馆长回来了，叫他来，看看他能想出什么办法不？”

冷部长听了就点点头。

李会计转眼就将王副馆长叫来了。

王副馆长听了大家的述说后，后退几步到街中心站了一会，然后又爬到对面二楼的阳台上看了看，下来时，他说：“有个主意不知行不行，这垃圾咱们一点也不搬，像大城市街上搞建筑一样，用塑料编织布围起来，让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大家听了都说好。

冷部长脸色也缓和了些，说：“就这样试试，我明天早上来验收。”

冷部长说话果然算话，第二天一早就来了。老马和王副馆长，还有石经理都守在工地旁。

冷部长绕着塑料编织布看了两遍，果然围得滴水不漏，便满意地笑了，但他并没有表扬王副馆长。王副馆长原以为他会这么做的，心里已算好，如何回答。所以，他有点失望。

石经理走后，冷部长到文化馆办公室坐了一阵，他对老马说：“小王代了几年馆长，为馆里树起一栋大楼，你可别连一栋小楼也树不起来哟！”

老马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在文化馆干一阵，当然也想给大家留点什么作纪念。”

从这起，老马开始特别关注舞厅工程。

老马一过问，房子拆得比以前快了，过了一个月，地基也挖好了。

可是，就在地基挖好后的第二天，八建公司将人员设备全部撤走了。理由是文化馆必须预付10万元。10万元到了帐，他们才复工。

老马便开始四处筹钱。

财政局、银行、计委，他每家至少跑了十遍，才找到一点门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有个妹妹叫肖乐乐，会唱歌跳舞，可是户口在农村，肖科长放风说，如果能将肖乐乐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他可以帮忙在地区财政局搞到五万元财政拨款。

老马觉得此事是千载难逢，就召集王副馆长、李会计等开馆务会。

老马说：“五万元，光利息就可以养活肖乐乐，何况这是财政拨款，是百分之百的划算。”

大家都表示没意见。

老马说：“那就把肖乐乐作为上次考试的合格者，进行录取。”大家仍没意见。

过了不久，肖乐乐就来馆里报到，被安排在音乐组，和老罗在一起。

又过了不久，肖科长打电话来，说五万元已经汇出。李会计接电话后，就和王副馆长说了。

王副馆长说：“我们建这栋楼吃那多的苦，还落下十万元的债。老马来，挑好房子白住，从不过问过去的债，一心只想建舞厅，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太不公平了。”

李会计说：“其实，只要和银行透透风，他们就会用这笔钱去冲旧帐的。”

王副馆长想了想说：“这样也行。反正我们也是为公，自己得不到半厘钱的好处。”

李会计说：“确实如此。”

上午，李会计提前下班去了一趟银行。

下午上班时，李会计瞅空对王副馆长说，一切顺利。老马等了半个月不见五万元到帐，他就拉李会计亲自去银行查帐，才知道这五万元被银行扣下，还了过去的贷款。老马求爹爹告奶奶，说了一个星期好话，最后还是肖科长出面，银行才吐出一万元，不过是贷款，期限一年。八建公司用这一万元，将舞厅的地基填起来后，又停了工。

八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家看电视，外面有人敲门。外面很黑，刚开门一下子没看清，待那人进门后，才知道是老宋。

多时不见，只听说老宋发财了。王副馆长一见他那副油腻腻，红光光的脸面，就相信这话一点不假。

老宋见面就说：“我想整一下老马这狗日的。”王副馆长说：“那口气还没消哇？”

老宋说：“除非老马垮台。”

王副馆长说：“老马垮不了。”

老宋说：“我看未必。上回的考试，大家意见大得很，若是知道老马私自招收了冷冰冰和肖乐乐，他们不把文化馆闹个底朝天才怪。”

王副馆长说：“你可别到处煽动人造反！”

老宋说：“你怕什么？”

王副馆长说：“你还想不想回文化馆？”

老宋说：“老马一走我就回。”

王副馆长说：“这事牵扯到冷部长，若是得罪了冷部长，可不得了。还有，冷部长知道我和老马不大合拍，说不定他还猜疑是我谋划的呢！”

老宋说：“妈的？没料到还得放那老东西一马。”又说了一会儿话，老宋从包里拿一条“阿诗玛”送给王副馆长。他不肯收。老宋说，这是他刚才打麻将赢的，没花本钱，不收白不收。王副馆长笑一笑后，不再推辞。

送老宋出门时，见外面开始下雨了，王副馆长就连忙叫仿兰收阳台上的衣服。

半夜里，王副馆长被雨惊醒。起床关窗户时，他发现雨下得很猛，很恐怖。

这场雨下了一个星期，县里主要领导都下去防洪。领导下去时都要带一名记者，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被一、二、三、四把手带去了，冷部长只好叫文化馆派个搞摄影的人，随他一道下去。

老马见此任务重大，就自报奋勇地随冷部长下乡。

老马在乡下干的时间长，有经验，他想借此机会，在冷部长面前挽回一点影响。他鞍前马后随冷部长跑了五天，回来后，冷部长果然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他。

这一阵县电视台都是关于抗洪救灾的新闻，由于没人扛着摄像机跟着冷部长，所以电视上一直没有冷部长的镜头，只有几条口播新闻里提到冷部长。

这时，地区群艺馆下发了一个通知，准备在全区搞一个“抗洪图摄影作品大展。”老马灵机一动，便决定先搞一个全县关于抗洪救灾的摄影作品展览。

王副馆长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共征集到 100 多幅作品。老马也从自己的摄影作品中拿出 10 余幅，放入其中，然后由馆内几个懂摄影的人，从中挑出 70 幅参加展览。

王副馆长也在其中。

他对老马的作品很有兴趣，他说老马拍的这一组作品在用光和造型上，都与《秋风醉了》有质的区别。老马的这组作品以冷部长在洪水到来之际的各种动作和表情为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家一致同意这 10 幅作品全部入选。

展览定于 9 月 1 日开幕。8 月 31 日，先搞了次预展，主要请领导来审查。冷部长听老马汇报了展览内容，很是高兴。刚好地委宣传部熊部长下来检查慰问，冷部长就邀他一道来看预展。

熊部长和冷部长进展厅时，老马带头鼓掌，王副馆长和参展作品的作者也都鼓了掌。

冷部长扫了一眼那 10 幅关于他的作品后，就回头注视熊部长看这些作品的表情。

熊部长顺次序细细看，看到有特点的作品还赞赏他说几句。当看到老马的 10 幅作品时，熊部长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尽管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动作，但还是被冷部长和老马他们发现了。

老马回头再看自己的作品。不免大吃一惊，别的产品上，投入抗洪的干部群众一个个都是泥猴子一般模样，唯有自己摄下的冷部长，上着白衬衣，下着丝袜和胶鞋，旁边还有一个人替他打伞遮雨。老马喃喃地说：“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边说，两腿边发起抖来。

冷部长送熊部长回宾馆后，又回到文化馆，展厅里只有老马一个人，他正在将自己的作品往下取。冷部长将手中的茶水瓶，一下子摔到老马的面前，并大吼一声说：“老马，你真是一头教不转的蠢猪。你可误了我不浅啦。”

老马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冷部长走后，老马镇定精神，到暗室里泡了几个钟头，仍挑不出一张有关冷部长抗洪的比较像样的照片。

他在暗室愣坐到天黑，听见孩子在到处喊，他才出来。

第二天正式展出，县委书记要来剪彩，冷部长不能不来。

剪完彩，进了展厅，冷部长看见昨天老马取下照片的地方，换了一幅 20 寸的大照片，也是关于他的。

县委书记看了这幅照片，直说拍得好，拍出了冷部长的精神面貌。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王副馆长。

只有他们俩自己清楚，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当时冷部长还是个科长，有一天，他拖着板车去煤厂买煤，回来时遇上了雷阵雨，他将衣服脱下来遮住车上的煤，冒雨往家里拖，正赶上王副馆长拿着照像机在路旁屋檐下躲雨，就将他这狼狈样子拍了下来，照片洗出来后，还和他取乐了一阵。

冷部长过后托冷冰冰捎了一句话给王副馆长，说他的鬼点子真多。

王副馆长拍的这张照片被选送到地区参加展览，受到一致好评。并被改名为《宣传部长》发表在省报上。

9 月底，冷冰冰悄悄告诉他，老马要被调走了。

果然，没隔几天，老马就被组织部找去谈话，让他去县农科所任党支部书记。

九

老马一走，上面又让王副馆长代理馆长。

他一个电话打到八建公司石经理的家里，要明天就让舞厅工程重新开工，并且在一个月内竣工。石经理叫了一阵难处，最后双方商定，大后天正式开工，10 月中旬交付使用。

王副馆长又在馆里宣布，舞厅 11 月 1 日正式开业。

他估计，每年一到 12 月，县里就开始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所以，自己在这之前必须干出点实绩来，别把这次良机错过了。

王副馆长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就让李会计准备两千块钱现金，他要到省里去要钱。

李会计忙了两天，也只筹到 500 元。

走的头一天中午下班之前，老宋忽然来了，找着王副馆长，要求重新上班。

王副馆长见他来，心中就有了主意。老宋说了以后，他就答应下来，但要老宋向馆里上缴一点管理费。老宋一点没犹豫，反问上缴多少。王副馆长说就两千吧。谁知老宋眉头也没皱一下，就从怀里掏出一叠百元票子，数了数后，抽出一半扔给王副馆长。弄得他一时后悔，想真该将数字说大一点。

后来，王副馆长想出一个补救措施，让老宋陪他一道上省里去要钱。

在宣传口，王副馆长会要钱是出了名的。他平时对上面的人舍得下本钱，所以急需钱时，总有人出来帮忙。

这回出去，又得到老宋的鼎力相助。老宋在外面跑了大半年生意，对省里的人现在想的什么非常熟悉，想尿尿的就送夜壶，想睡觉的就送枕头。再加上在党的机关工作的生意朋友帮忙，来来去去，只一个星期，就从文化厅和财政厅各要了五万元。

回来一说，冷部长还不大相信。半个月后，省里的钱到了帐，大家才服了。

王副馆长从省里回来，发现父亲又抽起搁下多年的旱烟筒。

晚上和仿兰亲热一回后，仿兰告诉他，女儿近一段老喜欢喝他父亲泡的水，昨天她将女儿喝的水尝尝后发觉，那水里有一股旱烟味。王副馆长并不

在意，解释说，旱烟气味本来就很重，加上父亲的手摸了碗沿，气味就更明显了。

仿兰又告诉他，他走后的第三天，老罗喝醉了酒，从老马屋里出来后，站在走廊上，指名道姓地骂王副馆长心太黑，杀人不用刀子，难怪他家要断子绝孙。他父亲听了这话后，气得拿上补鞋用的割胶刀，要去找老罗拼命。幸亏李会计在场，他力气大，才拖住。

王副馆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也不给我家争口气，一胎生下个儿子。”

仿兰捶了他一下说：“你有本事再弄个准生证，我一定给你生个儿子。”

王副馆长说：“不说这无味的话了。不过老罗这杂种，有机会再犯在我手上，非要整得他跪着走路。”

第二天，王副馆长在家休息，睡懒觉睡到上午10点还未起床。躺在床上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细细听，听出是李会计的娘，又送鞋来让父亲帮忙补。

二人拉了一会儿家常话，父亲便改了话题，问：“你先前说，如果第一胎生下的孩子残废了，就可以生第二个？”

李会计的娘说：“那还有假，我儿媳妇的同事头胎生个孩子是哑巴，计生办的就让她生了第二胎，两胎还都是儿子呢！”

父亲叹气说：“人家怎么有那好的福份。”

又说了一阵，李会计的娘约好来拿鞋的时间就告辞走了。

王副馆长穿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父亲吃了一惊，问：“你没上班？”

王副馆长说：“出差累了，休息半天。”

刚刚完牙，李会计就来传话，说冷部长打电话来，不同意这么随随便便就让老宋回馆里上班，不然，单位就成了厕所，可以随便进，随便出，冷部长要馆里写出正式报告，老宋写出全面汇报，送给他看看后再说。

王副馆长和李会计商量一阵，觉得老宋的汇报可以叫老宋写，就说馆里要，别的都得瞒着老宋。

后来这事老宋还是知道了。他当着冷冰冰的面说：“你爸爸是个伪君子。”

老宋心里对冷部长的怨恨越发深了。

老马走后，人还住在文化馆，新单位没有房子给他住，他也舍不得搬出这套三室一厅。

王副馆长抽空上老马屋里坐了一回。去时，老马正在喂罐头瓶里的一只金鱼。

王副馆长说：“你这么喂，不出三天，鱼就会憋死。我有一只鱼缸，闲着没用，送给你好了。”

说完，就转身出门，不一刻，真的拿来一只鱼缸。

老马非常感谢。

王副馆长问他在新单位工作怎么样。老马说，那单位里头本来就多了，他去后，只是每月主持开两次支部会。幸好学会了喂金鱼，他还准备栽几盆花。王副馆长说，难得他这么快就想开了。

老马将金鱼换地方时说：“上次老罗赖着在我这儿喝酒，我又不好撵他。结果喝醉了，骂了你的人，搞得我真不好意思见你。老罗这人是令人讨厌，我当初想依靠他开展工作，真是有眼无珠。”

王副馆长来老马屋里，本来是打算问问那次老罗借酒装疯的情况，同时暗示一下老马，让他少过问馆里的事。见老马主动说起，反觉自己过虑了。

就说：“当初，在一些事上，我与你配合不好，你走后，才觉得实在可惜。”

又问了老马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王副馆长便推说有事，得走了。临出门时，他许诺说过几天送两条名贵金鱼给老马。

第二天，他就给老马送来一只墨龙和一只狮子头。

到了10月半，舞厅进入了内部装修阶段。天气也渐渐凉了，王副馆长就让石经理拿出那笔钱，安排全馆的人到北戴河旅游。

老马也去了，是王副馆长请他去的，还让他在路上带队。

王副馆长自己没去，他一人在家照料舞厅的事。他让李会计每天打个电话回，汇报路上的情况，特别是大家的情绪。

李会计打电话回，总说大家情绪很高涨。

这天，仿兰冷不愣丁地问他一句：“你听说过用烟油泡水喝，可以让好人变成哑巴的秘方吗？”

王副馆长说：“小时候，好像听大人们这样说过。”

仿兰不再说话，等王副馆长上班去后，她并不送女儿上幼儿园，对王馆长的父亲说她要去烫发，趁父亲不注意，她偷偷溜进父亲房里，躲在蚊帐后面。

过了一会儿，女儿叫渴，要喝水。

仿兰看见父亲倒了一杯水，然后用一根细铁丝，从旱烟杆里一点一点地掏出些烟油，放到茶杯里搅了搅，便端给女儿喝。

仿兰大叫一声，从蚊帐后面跑出来，夺过那杯水，一下子浇到父亲脸上。

事情也巧，王副馆长到办公室门前准备开门，才发现钥匙忘了拿，就转身往回走。在楼前碰到宣传部小阎和组织部姚科长、张科长站在路边说话，他就走拢去凑和了几句。大家都盼舞厅早点建成。王副馆长再次许诺，到时候他负责供应他们的票。

等回到家里，正好听到仿兰在骂：“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想害我的女儿，我到法院去告你！”

王副馆长一步跳入屋内，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仿兰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她原以为丈夫会帮她一起惩罚父亲，谁知王副馆长走上来，照准她的左脸扇了一耳光，又朝右脸掠了一巴掌，并骂道：“你这个不行孝的女人！为了一件小事就将开水往父的脸上浇，将父的脸烫成这个样子，叫我如何出去见人，大家会指着我的背，骂我是只要老婆不要父亲的家伙。你以为喝点烟油水，就真能让人变成哑巴？你到医院去问一问！真的这么容易，那天下的哑巴不知有多少！”

仿兰被王副馆长两耳光打懵了。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抱起女儿就往外跑。

王副馆长知道她是回娘家去，也不阻拦，反说：“想通了就自己回来，我没空去接。”

仿兰走后，屋里只剩下王副馆长和父亲。

王副馆长将正红花油往父亲脸上抹了些，什么话也没说。刚抹了几下，父亲挣脱他的手，钻进蚊帐里，用被子包着头，一声声的低嚎起来。王副馆长听见父亲在哭诉：“巧儿，你怎么不带我一起走呢，让我留在阳间活受罪。”巧儿是母亲的乳名。

王副馆长一听到母亲的名字，眼泪就流出来了。母亲生下他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母亲死时，他还叼着她的奶头。之后，父亲打光棍将他带大。

家里这一番闹，外人并不知道。

这天李会计打电话回，说旅游人员已到了武汉，明天就可以到家。

王副馆长接完电话后，就给仿兰单位打电话。仿兰接着电话，听见王副馆长要她回来，不然，全馆人员明天回了，将这事传出去，那就会将他所有的优点一扫帚扫掉了。仿兰在电话里只是嗯嗯，没说回，也没说不回。

天黑后，王副馆长见仿兰还没回，就叹了口气，准备到仿兰娘家去接，走到半路上，碰见仿兰抱着孩子过来了。

晚上，王副馆长待女儿睡着后，就开始厚着脸皮撩仿兰，撩了一阵，他就得手了，夫妻俩顿时就和好如初。

仿兰回来后，父亲就搬出他已多年不用的补鞋箱，到街上去摆了一个摊。每天早上，仿兰母女俩没起床他就出了门，夜晚等她俩睡后才收摊回家，三餐饭都是王副馆长送到街上去吃。

外出旅游的人回来，见八建公司已将舞厅修好了。

王副馆长召集大家开会，讲清离 11 月 1 日舞厅开业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他要求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克服一切困难，不分昼夜加班，一定要将舞厅内的各种设施装璜搞好。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答应了，连老罗也表了很好的态。

文化馆的人从没有这样齐心，刚好整五天，就将一切都布置妥当了。

那天下午，王副馆长将电闸一合，舞厅内顿时华灯齐放，音乐悠扬，大家忍不住跳了几支曲子。

冷冰冰回家吃晚饭时，朝冷部长描述了一通。冷部长搁下碗筷，要冷冰冰陪他到舞厅去看看。

冷冰冰连忙给王副馆长打了个电话。王副馆长得信后，又以冷部长的名义，请几个有关单位的头头来看看。同时，又让肖乐乐她们几个，好好打扮一下，晚上陪冷部长他们好好跳一回。

冷部长来后，对舞厅的一切都很满意，只是说舞厅还应取个名字。

王副馆长连忙检讨自己的疏忽。

冷冰冰趁机在一旁说：“老马搞了快一年只搞了个屋基，王馆长却只用一个半月就搞起来了。你再让他这么‘代，下去，我都对你有意见。”

冷部长弹了女儿一指，说：“只要真是人才，总会有用他的时候。”

王副馆长忙说：“那是。那是。”

冷部长他们玩到 10 点半才走。

他们一走，王副馆长就召集老宋、冷冰冰和李会计商量给舞厅取个什么名字。大家要王副馆长先说。王副馆长就说：“老马那张摄影作品，不是叫《秋风醉了》吗？我把它动一个字，叫‘醉秋风’如何？”

大家想了想，觉得似乎还不是最好。

往下，每个人都提出了十几个名字，都不满意，和这许多名字一一比较，“醉秋风”反越显得合适。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就叫“醉秋风歌舞厅”。

第二天上午，王副馆长就舞厅的名字向冷部长作了汇报。冷部长听后，沉思一阵，突然说：“不行！不行！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旧社会的妓院。”

王副馆长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料到冷部长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冷部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圈，说：“我有主意了，依然是这三个字，只是将它来个本末倒置，叫‘秋风醉’如何？王副馆长心里有苦说不出，嘴

上却连连叫好。

11月1日晚7点半，“秋风醉歌舞厅”正式开业。没几天，地区报纸就刊载了一则消息：我区第一座现代化舞厅日前在某县文化馆正式开业。该项工程几经磨难后，在现任负责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只用四十天就完成了全部基建和装璜任务。

王副馆长尚未看到报纸，小阎就从宣传部打电话来质问，这则消息是谁写的？光你王馆长一人努力，就没有领导的支持吗？

王副馆长知道小阎口气这样硬是有来头的，他背后是冷部长。

舞厅开业一个星期，就纯收两千元。李会计告诉他这个消息后，又告诉他另外一个消息，上面已确定，小阎来文化馆当馆长。

十

小阎上任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像老马。老马年纪大，我年纪轻。处理事时，可能没有老马考虑得周到。”

这话明显是一种示威。

果然，这次分工时，王副馆长只分管业务，其余人事、财经，小阎都揽了过去。

小阎来之前，舞厅由老宋负责。老宋对付那不买票进舞厅的人，有几套办法，所以舞厅一直收入很高。小阎来后，将老宋换了。他怕老宋有意见，就让老宋回文学组，说是让老宋发挥专长，加强文学创作的力量。老宋有苦说不出，只得忍了。小阎让肖乐乐负责舞厅。他每天至少要从肖乐乐那里拿走20张舞票，拿到县委和县府院子里去作人情。

李会计经常到王副馆长面前诉说，说这个舞厅简直成了小阎的私人乐园。

王副馆长一点权没有，也就无计可施。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提了几个开展大型文艺活动的方案，小阎都同意，但又附上一条，说要做到以活动养活动，实行经费自理，馆里最多只负责活动结束后，加一次餐。他只好自己打退堂鼓，弄得小阎还在支部会上批评他，说他光说空话，只有计划，没有行动。

有一次，他发现冷冰冰刚写完的宣传牌上错一个字而造成政治错误。他装作没看见，赶忙走开。可是，宣传牌挂出之前，小阎还是发现了问题，及时改了过来。

舞厅收入虽然没有老宋负责时高，但仍是够可以的了，全馆的人员只要没有旷工，每月都能拿到十几元的额外奖金。所以，小阎为人虽然霸道，大家也还觉得可以忍下去。

转眼到了5月。

这天，小阎将老宋叫到办公室，要他写一篇纪念“延座讲话”的文章。

老宋说他这一段老是头痛，连借条也写不了。

小阎在全馆人员中，唯独对老宋有点胆怯，有一次他对冷冰冰说，全馆人都无法把他怎么样，将来他要栽跟头，可能就栽在老宋手上。

老宋因手里有了大把的钱，回文学组后，他将往日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清点了一下，然后就常往省里跑，每跑一次，就有一两篇作品发表出来。弄得老宋名气日益大起来，连冷部长都不敢轻视他。

小阎见老宋不肯写，就转而叫冷冰冰写。

冷冰冰花了五天时间，将文章写了出来。交给小阎看后，小阎说很好，

很合他的意。然后就叫人抄到宣传栏上去。

这期间，老宋又去了一趟省城，兴致勃勃地回来时，猛地见宣传栏上的文章，不由得火冒三丈，拣起路边的废砖头，将宣传栏砸了一个大窟窿。

老宋行李也没放下，扭头就去干休所，找宣传部的元老董部长告状。

董部长一听说冷冰冰写文章，将全县过去的文艺创作，说成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假大空”的虚伪繁荣，顿时火冒三丈。冷部长是董部长提拔起来的，所以他才格外生气。但他不好直接骂冷部长，毕竟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他给冷部长拨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听说文化馆最近组织人写了一篇好文章，他想拜读一下，等等。

冷部长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亲自到文化馆将小阎臭骂一顿。

冷部长也是急了，不管旁边还有个王副馆长。

等冷部长走后，王副馆长装作随口说：“看来世上真的没有常胜将军，谁都会有克星的！”

小阎听了默不作声。

自此以后，小阎谨慎多了，对老宋越发客气。老宋不卖帐，他跟王副馆长说，这只小牛犊下场肯定还比不上老马。

王副馆长的父亲在街上摆了半年鞋摊，人显得更苍老了。王副馆长托好多人劝父亲收了这鞋摊，他自己也求了许多遍，父亲就是不答应，说要我回去，只有一个条件，叫你媳妇给王家生个儿子。父亲吃饭仍是一日三餐送。有时候，王副馆长有事不能送，仿兰就请老马帮忙送。因为这，王副馆长和老马的关系特别亲密起来。

父亲帮人补鞋，人家给钱他就收，人家不给钱，他也不要。偶尔将人家的鞋弄坏了，他就买一双新的赔出去。

宣传栏事件过后不久，冷冰冰花了100多块钱，给冷部长买了一双皮鞋，作为生日礼物。冷冰冰将皮鞋从商店里拿回来时，小阎见了直夸漂亮。

过了几天，小阎去宣传部，见冷部长脚上的新皮鞋破了一个洞。一问才知道，前天，冷部长下乡去，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个小偷抢一位老头的钱包。冷部长让司机停车，带着车上其他的人一起上去捉那小偷。小偷急了，拿出刀子来威胁。急切之中，找不到其它武器，冷部长就脱下皮鞋迎战。小偷倒地被抓住了，但新皮鞋却被刀子戳了一个洞。

小阎在秘书科，干惯了跑腿的事。见此情景就习惯地叫冷部长将鞋换下来，他拿去找人补一补。

冷部长也是习惯了的，小阎一说，他就依从了。

小阎提着冷部长的皮鞋，到街上问了几个鞋摊，要价一个比一个高，他就找到王副馆长的父亲，要他帮忙好生补一补。

王副馆长的父亲听说这鞋值一百多元，就说：“我还从没补过这么好的鞋，冷部长让我补，是瞧得起我。我就是将身上的皮割一块下来，也要将它补好。”

王副馆长的父亲不知道现在的皮鞋越好，皮子越薄，越不耐穿。他用钳子夹住洞边的皮，想看看洞里面破成什么程度，手上还没怎么用力，那皮子就哗地一下，被撕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

他一下子傻眼了，生怕自己一生的名誉被这双鞋毁了，就拼命想办法补救。结果，鞋面上的洞，由小变大，由一个变成几个。

小阎过了一个小时来拿鞋时，一见鞋成了这个样子，就急得跳脚，大声

说：“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补什么，去买一双赔给别人算了。”

王副馆长的父亲手一哆嗦，鞋子掉了下来。

小阎又说：“你补不了就该早点说一声，我好找别人去。到了这一步，看你怎么赔？你若不赔，我就将这破鞋挂在你的颈上，让你去游街！”

王副馆长的父亲将头埋在双膝中，不敢回半句。

这时，肖乐乐来传话，说冷部长打电话来，让他赶紧送鞋去，冷部长有事要出门。

小阎于是说：“这样，这鞋我先垫上钱，买一双赔人家，回头你将钱还给我。”

小阎说完就走了。

这天，王副馆长到县铸造厂当该厂“红五月歌咏比赛”的评委主任去了，中午饭由老马帮忙送。

老马送饭时，见鞋摊上没人，等了一会仍没人，他没在意，将饭盒放在小板凳上，自己先回了。

傍晚，王副馆长回来时，见父亲的摊子是空的，一个叫花子正捧着父亲的饭盒大口吞咽，心下起了疑问。他撵走叫花子，将鞋摊收拾好担回家。再一打听，便知事情不妙，忙叫上几个人帮忙寻找。

他沿着护城河找了个来回，没有发现什么。

往回走到十字街，迎面碰上老宋。

老宋急忙忙他说：“快！快去医院！你父亲在那儿卖皮呢！”

原来，王副馆长的父亲等小阎走后，就打定主意到医院里卖血。医生见他年纪大，没有答应。刚好，一个被火烧伤的人需要植皮。医院刚开始做这种手术，没人敢卖自己的皮肤给别人。王副馆长的父亲愿意卖，一化验，正合适。医生刚要下刀子时，老宋赶到了。

王副馆长一进医院，就听见父亲在手术室里叫：“我自己的皮，我愿卖，谁也管不了！”

父亲一见儿子，叫得更厉害了，还伸手抢医生的手术刀和手术剪。

王副馆长说：“父，再怎么难的事，还有儿子替你顶一阵呢！”

父亲说：“你别管我。我什么用处也没有了，还不如一刀一刀地割死了好！”

王副馆长说：“你真要这样，那我还有什么颜面出去见人？干脆先将我的脸皮割了！”

说着，他双膝一弯，人就跪在地上。

老宋说：“王师傅，王馆长大小也是个领导，你这样不讲情面，不等同于拆他的台吗！”

闹了半天，医生也有些烦，开始撵王副馆长的父亲走。轰的轰，劝的劝，总算将他弄下手术台。

这边王副馆长早被人牵起来，大家一起到外面的休息厅坐下，听王副馆长的父亲诉说事情经过。

父亲痛心地说：“我一生的名声，全叫这双鞋毁了。”大家对他这话没兴趣，一齐大骂小阎。

老宋说：“这次不把姓阎的整倒，我就四只脚走路。”众人都义愤填膺地说了许多话。

王副馆长的父亲要王副馆长将鞋赔给小阎。老宋叫别赔。他不同意，说

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天经地义的。老来说，这回若赔了，那就是天不经地不义。

王副馆长的父亲一急，加上饿了两餐，头便昏起来。王副馆长赶紧让护士给他推了一瓶葡萄糖。

七拖八拖就到了晚上十点。看热闹的人都散了，只剩下王副馆长和他父亲。老宋推说有事，先走了。

等他俩回到家，仿兰已搂着女儿哭过几场了。她以为父亲是为了她而出走的。那样，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戳她的背脊骨。见父亲回来，她连忙起身热情招呼。

父亲只想睡觉，直往房里钻。

这时，老宋来了。

老宋先回家，写了一篇新闻稿，《鞋匠割肉卖皮，只缘官官相逼》。老宋将文章给王副馆长过目。

王副馆长见文章中点了冷部长的名，就不同意，要老宋删去冷部长，他说冷部长是被小阎利用了，他是无辜的。

老宋嘴上答应，却没有改，仍然原封未动地寄给了省报。

没多久，文章登出来了。不过不是登在省报上，而是登在省报办的内部参考资料上面。冷部长那一条线还是被删干净了，读文章觉得那鞋是小阎自己的，标题也被改成《老鞋匠失手本该赔偿，年轻人可恶逼他卖皮》。

又过了几天，县里派人到馆里，讨论如何给小阎处分。大家一致认为，给他一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就够了。

半个月后，小阎的处分下来了，是双开除加双留用察看。并调到老马当副乡长的那个地方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和别的犯案人一比，大家都认为处分太重了。老宋说这是舍卒保车。

小阎走时，王副馆长派李会计和肖乐乐将他一直送到学校。他俩回来时，说学校对小阎的安排还可以，教的是思想品德课，课不多。

十一

王副馆长又开始代理馆长了。

这次他汲取了前两次代馆长时的教训，有事多请示，多汇报。

其实，在讨论给小阎的处分时，他就开始想自己这次如何代馆长了。所以，小阎走后第三天，他就去找冷部长汇报自己的工作计划。

冷部长听说他要搞镭射电影，就泼了一瓢冷水，说电影是电影公司的事，文化馆不要把这池水搅浑了，还说，能将舞厅办好就很不错，别把风头出得太足了。

王副馆长当时没争辩，心里却说：烧三根香，放两屁，菩萨不说话，问你自己过不过意？我就是代一回馆长，做一桩大事，搞得你非提我当正馆长不可。

他回文化馆后，让李会计去外贸宾馆订了一桌酒菜，将公安局、工商局等有关单位的关键人物请来吃了一顿。王副馆长在席间说了搞镭射电影的事。县里的人只听说过这码事，上省城时，见镭射电影都在一些高雅的地方放映，也没机会开眼界，便都答应大力扶持这件新生事物。

等冷部长察觉时，王副馆长已将营业执照拿到手了。就连买机器的钱也已筹到了一大半。

接下来王副馆长要到深圳去买机器，当然，主要是联系片源问题。

仿兰过去从不拉王副馆长的后腿，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放王副馆长出去。王副馆长的父亲，自那次从医院回来后，就一蹶不振，躺在床上只能靠王副馆长每餐送碗粥度命，开始是小便失禁，这几天大便也失禁了。王副馆长一走，剩下媳妇怎么好料理公公呢！

王副馆长先一想，觉得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后一想，镭射电影的事已是骑虎难下了，不一气呵成地办好更不行。他打定主意瞒着仿兰偷偷走，家里的事只好将她逼上梁山。

隔了一天的早上，他装着起来给父亲擦洗身子，将阳台上没干的衣服卷成一团塞进提包里，开开门悄悄走了。

这次去深圳，李会计、老宋等都想与他作伴，他却选了冷冰冰。他想通过冷冰冰来缓和与冷部长的关系。

在深圳，他俩一起选中机器后，王副馆长就有意避开了，让冷冰冰一个人去和老板谈价钱，回来时，冷冰冰给家里每人买了一枚金戒指，还送了一枚金戒指给仿兰。王副馆长心知她吃了回扣，想到回家后，仿兰这一关不好过，他就代仿兰收下了。

王副馆长走后没多时，仿兰就发觉了，她追到车站，客车刚开出两分钟。回屋后，见父亲那番模样，本想不理，又于心不忍，狠了狠心，只好闭上眼睛给父亲擦。她刚动手，父亲却弱弱地叫着：“不，不，不！”

正在为难时，李会计的母亲提着菜篮来了，说是看看王师傅好些没有。见此情形就说：“你去帮我将菜买回，我去替你找个人来帮他擦。”

仿兰心想谁愿做这下作的事，就多了个心眼，先出门去，在楼下躲了一会。见李会计的母亲还没下来，她就悄悄返回去，走到窗外，她听见屋里有女人低低的抽泣，和哗哗的水响，偶尔还能听到父亲的低声叹息。仿兰退下后，去菜场买了李会计的母亲要买的几样菜，又自己掏钱买了两斤猪肉搁在篮子里。她买东西时，头一回不性急，不管别人怎么插队，都不心烦。

回家时，见屋里仍只有两个人，仿兰就说李会计的母亲不该没帮忙留住来帮忙的人，她买了一块肉本来是要谢那人，现在只好给李会计的母亲了。谦让了一阵，父亲在床上叫李会计的母亲收下，这事才算完。

然后，仿兰要李会计的母亲每天上午请那人来一次，她借口图书馆每天上午忙，离不开人，将门上的钥匙给了一把李会计的母亲。李会计的母亲推也没推就接受了。

王副馆长惦记着家里的人，拼命往回赶。到了县城，一出车站他就扛着机器先到办公室。

进门后，见从前老马和小阎坐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陌生人。

一问，才知是刚上任的馆长，姓林，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王副馆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无话。

倒是林馆长见他这热的天出差回来，连忙又是敬烟又是泡茶，还打开电扇，对着他吹风。

吹了一会儿，王副馆长一连打了几个喷嚏。

十二

王副馆长打了几个喷嚏以后，回家就病倒了，烧得很厉害，老是在 39 度左右不退。连医生也吃惊，这么年轻力壮的一个人，未必真叫一个小小的感冒治趴下了。熬了一个星期，总算退烧了，跟着又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每天吊一瓶氨基酸，前后一算帐；一场感冒花去文化馆上千元。

住院的后几天，王副馆长嫌医院吵，吊完氨基酸以后就回家。

回到家里，他依然睡不着觉，一个问题反反复复地想个通宵。

父亲半夜里总是发出恐怖的呻吟，醒后就唤他去，哭诉祖上人在梦里是如何地用酷刑折磨他，说他教子无方，让王家香火断了。

王副馆长心头压力更大了。老想自己这几年何苦这样卖力呢，什么好处没捞着，反而连个儿子也没有，弄得一家人都伤心。第一次代馆长将文化馆大楼建起来了，第二次代馆长，修了一座舞厅，第三次代馆长虽然只有二十来天，也干成一个镭射电影，可这些都被别人拣了便宜，自己却是吃力不讨好。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吊氨基酸，李会计来看他。李会计告诉他，镭射电影今天搞首映式。李会计给了四张票，让他给医生护士，以表示感谢。

王副馆长将这票随手递给在旁边照看的那位护士。护士拿着票出去一会儿，几乎全内科的医生护士，都来朝他要票。

这时，李会计尚未走。王副馆长就问他还有票没有。李会计说票倒有，但都是给县里领导的。王副馆长一听，劈手将李会计手里提包夺过来，拿出里面的票，一人撕两张，边撕边说：“有些当官的吃人不吐骨头，这两张票他们当便纸使还嫌小。”

其它科室的医护人员，闻讯也来了。一大摞票转眼就剩下十来张。李会计一把抢回去，讨饶般地说：“这几张是给关系户的，实在不能再给了。”

没票的人仍在缠着王副馆长，他只好叫李会计回头再送二十张舞票来，然后，只要他在这儿住着，保证每天十张电影票。十张舞票。

看过镭射电影的人，回来都说够刺激。秋风醉舞厅的曲子，又迷死个人。所以，医院上下都对王副馆长很好。

那天晚上，父亲呻吟又起时，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试试让医生帮忙开个假证明，说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到计生委去弄个准生证，让仿兰再生一胎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医院。

他不去病房，而是去内科高主任家。高主任一家都成了镭射电影迷，见他到了，忙让坐。他先将从深圳带回的一条“万宝路”递上，再说自己女儿身体如何不好，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希望高主任高抬贵手，帮忙确认一下。

高主任笑着问：“是确诊，还是确认？”

王副馆长一慌不知说什么好。

高主任的爱人在一旁说：“你这老高，何必明知故问。王馆长是个老实人。”

王副馆长听了这话，索性将家里的一切都摊开说了。

高主任听了，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病情诊断书，填写起来。边填写边说：“人就是这样，政治上进不了，总得在生活上有个精神寄托。”

写好后，就递给王副馆长。

王副馆长一看，全是按自己说的写的，而且连医院的公章都预先盖好了。

高主任说：“我是第一次这样看病的。”

王副馆长见他写得这样从容，不相信这是第一次，就问：“不知到计生委那儿的手续怎么办？”

高主任说：“管他怎么办！你将这个诊断书直接交给李水蛇，他自然会亲自替你办的。”

高主任的爱人说：“李水蛇的肾不好，全靠老高给他治！不过申请书你可要写一份。”

高主任又说：“等你拿到准生证时，往你父亲眼前一晃，准保他的病能好！若是没好，我就将这条‘万宝路’还给你！”

王副馆长针也不打了，回家写好申请书，又找李会计盖上公章，便去找李水蛇。

李水蛇是计生委李主任的绰号。见了高主任的诊断书，果然不敢迟疑，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准生证交给了他。

王副馆长随即打电话，要仿兰到医院妇产科去下避孕环，说他已搞到准生证了，仿兰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从妇产科回来，王副馆长将准生证真的拿给父亲看了看。父亲眼珠一亮，忽然就坐起来，接过准生证，双手捧着，先哭一阵，接着大笑起来。

等父亲平静些后，王副馆长就和仿兰进了卧房。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滋味很特别。王副馆长一声说：“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仿兰一声回答：“我一定要给你生个儿子！”

下午，王副馆长去办出院手续时，碰见高主任的爱人。高主任的爱人教他每次同房之前，夫妻俩都用小苏打水洗下身，成功率会高很多。

父亲的病一天天见好了。当他听到仿兰已经怀孕时，就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过了几天，见自己走路已稳当些，父亲就要回乡下去，说八个月他可以养两头大肥猪，等仿兰生孩子时，他就将猪卖了钱，给她母子俩补身子用。

王副馆长拗不过，只得由他去。

王副馆长每天去办公室点个卯就回家做家务，家里的一切事他都包了，让仿兰整个地歇着。

农科所半年前开始做花鸟虫鱼的生意，老马屋里这类东西很多。王副馆长隔三差五地去拿一样过来，时间不长，屋里就变得一派鸟语花香了。

王副馆长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必到秋风醉舞厅和镭射电影厅门前转一转，遇到熟人，就叫看门的放进去。

林馆长不管他。

当过兵的人，总是讲义气。林馆长在他生病时，曾来家探望过，当面说自己是雀占凤巢。林馆长还吩咐李会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王副馆长要票，也不管是舞票还是电影票，要多少就给多少。对别人却卡得很死。

仿兰对王副馆长说：“小林这是在用软刀子捅你呢！”王副馆长说：“我已经死了那个心，不想当官了，他捅我有何用！”

他照旧每天去拿票。别人拿不到票，便渐渐对他有意见了，开始时见面还说几句话，到后来，就只点点头称呼一下就完事。就连老宋和李会计也变得生疏了。不过老罗是例外，过去老罗见了他总像仇人一样，但近一段变得客气了，有时还和他开个小玩笑。

和外面熟人的关系也变了。以前，王副馆长工作挺忙，和熟人碰面了，仓促拣几句要紧的说了，便走路。现在不同，上街买菜，不过500米的路程，可没有两个小时是回不来的，因为只要碰见熟人，不管有事无事，他总要走拢去，站着和那人说一阵。

有一次，王副馆长在街上碰见了冷部长。他见冷部长提着菜篮买菜，有些惊奇。冷部长说：“今天是星期天，买买菜，让人轻松一下。”

王副馆长马上说：“那我每天都买菜，不就每天都是星期天？”

冷部长笑起来，问他这一阵在忙什么。

王副馆长说他搞了几十盆花，光早晚搬进搬出就把人累死了，而且各种花浇水的最佳时间不一样，更是把人搅昏了头。还要喂鸟，那东西比养儿子还艰难。

他说了一大通，冷部长听得有滋有味，没有打断一下。只是在他说完后，冷部长才问，馆里的工作近段搞得如何。

王副馆长半年多不问馆里的事，就胡乱说，基本上是按你的讲话精神去做的。

冷部长一听这话就来了劲，问大家对他的讲话有什么反应。

王副馆长哪里知道冷部长的什么讲话，都是编的，见冷部长追问，就只好再编，反正是拣好的说。

冷部长很高兴，说过一阵闲了，他要到文化馆来蹲一段时间的点。

隔了几天，冷冰冰来家里玩，临走时，她说冷部长想要几盆花。冷冰冰说过就自己去挑，结果，拿走的都是名贵品种。王副馆长很是心痛了一阵。

林馆长的爱人和小孩在哈尔滨，转业时，林馆长要回南方，爱人不同意，闹僵后，林馆长一个人回来了。他没要别人腾房子，就将馆长办公室隔出半间做卧房，一个人住在办公楼上。

王副馆长有天去点卯时，进林馆长的卧房坐了坐，发现屋里的一盆昙花很眼熟，想一想后，记起这是冷冰冰上次从他那儿拿走的。

第二年开春时，仿兰生产了，王副馆长如愿以偿地得了个宝贝儿子。

王副馆长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正在亲仿兰的脸时，护士进来说外面有人找。

王副馆长出来后，见走廊上站着面黄肌瘦的一个人，他半天才认出是小阎，他要和他握手，小阎忙将手藏到背后，说他有黄疸肝炎。王副馆长连忙后退几步，将儿子送回产房，再返回来说话。

小阎说他住了几十天的医院，钱用完了，病没全好，医院要他拿钱来，不然明天就停他的药。他托人给学校捎了几次信都没动静。今天早上，他从病房窗口，看见王副馆长领着大肚子的仿兰进了妇产科，才瞅空溜出来的。

小阎要王副馆长无论如何要帮他一回。

王副馆长说：“你是我儿子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按乡下的规矩，他得拜你为干爹呢！这个忙我一定帮。”

正说着，王副馆长的父亲喜颠颠跑来了，见了儿子就说：“我把两头肥猪卖了，得了800多块钱。”

王副馆长说：“小阎在这儿呢！他病了，住院，想借点钱！”

王副馆长的父亲说：“借什么！我还欠你一双皮鞋钱呢！”

说着，数了120块给小阎。

小阎谢过后要走，王副馆长叫住他，本想问那次他为何不将冷部长说出来。又突然不想问，只说了一句祝福的话。

儿子满月时，王副馆长大请了一顿。席上人多，但他还是发现冷冰冰没有来。他打电话到冷部长家去问。冷部长的爱人说，冷冰冰昨晚就没回，她也在到处找。席间，李会计、老宋他们借花献佛，向林馆长敬酒。平日酒量很大的林馆长，没喝几杯就醉了，一句句地嚷：“我不怕！大不了去坐两年牢！”大家都笑起来。

自有了儿子后，王副馆长白天连点卯也懒得去了。等儿子9点钟左右醒后，先抱着他去图书馆吃奶，返回时，若天气好就到文化馆办公楼上转悠一下，文化馆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白胖胖的小子，都说王副馆长的这项“希望工程”搞得很好。镭射电影由于片源问题，已不那么红火了，但还是稳赚不蚀。秋风醉舞厅仍然门庭若市，所以王副馆长每天晚上必到。这天组织部姚科长给王副馆长打了个电话，说他的小舅子谈成了一个女朋友，今天晚上他的一帮朋友想到秋风醉舞厅庆贺一下，王副馆长问多少人，姚科长说，大约20左右。王副馆长一口答应了。

晚上，他抱着儿子往舞厅门前一站，将一大帮人呼呼啦啦地放了进去。林馆长也在旁边，他像什么事也没看见一样，一个劲地和王副馆长的儿子逗笑。

过了一阵，林馆长说：“今天宣传部开会，表扬了我们，说全宣传口就文化馆的班子最团结。”

王副馆长说：“全靠你支撑。”

林馆长：“以后就靠你了。”

王副馆长正要说什么，冷冰冰来了。林馆长就和冷冰冰进去跳舞去了。王副馆长进去看了看，觉得他俩跳得很投入。舞曲完了时，姚科长的小舅子走拢来，说他哥哥让他捎个口信，说文化馆这几天可能有大变化，要王副馆长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个心理准备。

王副馆长心想，无非是说我不干工作，要撤我的职，我还早就不想干了呢！

回家后，他没将这事告诉仿兰，他怕她着急，影响奶水。

第二天早上，王副馆长正在洗尿片，忽然从门外闯进一大群人。为首的是组织部姚科长，还有宣传部、文化局的一些头头。

大家坐下后，姚科长先说话。

他说林馆长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一年之内致使冷冰冰两次怀孕，两次刮宫，上面已决定对他进行撤职查处，文化馆馆长，从今日起由王副馆长担任。由于时间仓促，正式任命通知要过几天才能下达。姚科长还强调，冷冰冰的事在文化馆只限于王副馆长一个人知道。他最后还特地传达上面领导同志的意见，说王副馆长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各方面都成熟了，因此适合担任一把手工作。

没容王副馆长推辞，大家就裹着他到文化馆去开大会宣布。

会议上，王副馆长见林馆长自始至终都镇定自若。冷冰冰没有参加会。其他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林馆长嘴上答应检查，可是隔了一天，他就和冷冰冰私奔到深圳去了。

王副馆长升任馆长后，家里请了个小保姆，又将父亲从乡下叫回来。尽管这样，他仍心挂两头。馆里的工作，他要大家按部就班去搞就行，老宋提了几个改革发展的方案，都被他锁在抽屉里，其中包括搞健身房的方案。

上任两个月后，冷部长说要来看看。

王副馆长慌了，将近期来的文件、简报和领导的讲话找了一大堆，想先搞清上面是怎么说的，再想自己如何汇报。

正忙时，肖乐乐哭啼啼进来了，说老罗刚才在办公室里调戏她。王副馆长想也不想就说：“老罗就是这么个脾气，爱沾点小便宜。你就当和一个不情愿的男人跳了一回舞得了。以后自己小心就是。别再哭，让别人知道了不

好，这种事，丢面子是女方。”

肖乐乐出去后，他发现还缺冷部长的一个讲话。就打开老马、小阎和小林使用过的那张办公桌上的抽屉。他意外地发现，老马多年前拍的那张照片《秋风醉了》，被谁扔在里面。他拿起来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心里觉得酸溜溜的，不敢看那戴着草帽的小狗。

老罗走进来说：“你儿子在家哭呢！”

他放下照片，慌忙要走。老罗又说：“是和你开玩笑。你父正在家教小保姆补破鞋呢，小保姆不愿意，你父就劝她说，保姆不能当一生，学了手艺就能挡一生，只要人穿鞋就少不得鞋匠。”老罗探头看了一下小林从前的卧房说：“这好一盆昙花，他怎么不带走？”

他递了一支烟给老罗，却没有火，老罗说我去弄火来。老罗一走，他就连忙锁上门，往家里走。他还是放心不下儿子。

他在路过老马的家门口时，听见老马在训斥两个孩子，说不想读大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他猛地想到，可不可以说，不想升官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呢？

谈艺录

什么是电影的魅力

黄建新

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随着现代艺术表现手段的不断衍进，电影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也不断地获得变化和充实，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理论的综合重叠，深深地影响了创作者的分析方法和表现方法，改变了创作者的习惯视点，同时也造就了新的观众。当今的影片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美学追求，呈现出新颖独特的风格特点。譬如：多层次、延伸性、哲理化、表现手段的多样化、总体效果和结构意识、寓意、情绪等等，这种发展和社会总体发展相关连。因此，作为一名电影导演，在作品中如何表达思想，如何建筑构架，如何用独特的方法创造新的样式，如何把作品的内涵更广义地传递给观众，这些不能不成为放在创作者面前非常迫切、非常严肃的课题。

《黑炮》是我第一次独立执导的影片，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现在影片拍摄结束了，但思考还远远没有成熟。现将这些想法写出来，是为了向各方求教。

样式的思考

导演找到剧本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把这部影片处理成什么样式，在未来的银幕上以什么取胜。这个作品有这么几个特点：有一个悲剧内核；有相当成分的喜剧情节；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换言之，就是说有几种可能性，可以拍成不同的样式，悲剧、喜剧、正剧。那么选择哪一种样式才是正确的呢？张贤亮笔下的文学形式，用荒诞的手法写了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产生了新的含义，影片是师承这种手法，还是另辟蹊径？这些问题的判定和选择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能否超越原作，至少达到同等高度，又是二度创作中艰巨劳动所叩求的目的。

一个个问题，一连串思索，使我这个首次拍片的人处在一种语言无法表达清楚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影片拍成一部悲剧，可以使人心酸落泪，但是影片难以逾越悲剧冲突对观众发散思维的限制，会把观众锁闭在一种浓烈的情绪之中。

如果把影片拍成一部喜剧，可以使人乐不可支，但是影片所包涵的社会容量会大大减弱，其深度会受到影响。

如果把影片拍成一部正剧，倒是十分便当，但是传统模式又会局限影片的形式创新，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以上三种手法对《黑炮》都不适宜，使影片迈不出创造性的一步，从而跨越不过文学形式的门槛。

苦苦的思索，使人辗转反侧，究竟《黑炮》用什么手法才能构成一部真正的电影？罗丹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永远表现他所想的东西，不怕践踏现存的规范。”在否定了《黑炮》的三种表现形式以后，我们面临一个困境，还能找到理想的途径吗？偶然间复读一部文学作品，对我们的启发颇大，“黑色幽默”小说中一系列手段的复合使用，异于一般的特殊构成，形式内容之间体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那种冷峻的幽默感……一触而发，我们的想象被打开了：电影的多样化是否只表现在各个影片之间？一部电影不可将不同风格、不同方法融为一体？多元的概念已被广泛使用，一部电影为什么不能

以它作为结构的理论基础呢？（当然这只是为了自圆其说）

当代电影的探索似乎显现出一个规律：追求艺术创新和对艺术语言本身的探索，注重理论、注重结构形式的整体性以及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本质真实。这诸种因素形成的各个作品的实践，已经为电影多样化提供了依据，也为电影的未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电影应该也必须正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挑战，不停地充实更新自己。”这些都是理论问题，既然我们涉及到了，既然我们想在样式上有突破，就不能不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准备，不能不去探求一下。这一阶段，摄制组的主创人员集中读了一些书籍，主要是一些有关方法论和艺术新学说的书籍。

说一千道一万，影片还是要建立在电影自身的思维上。我们首先研究了影片的构成形式问题。作品的构成方法大体有两种形态，一是塑造，通过情节锁链上一系列细节，通过纠葛、冲突、发展，达到塑造人物的目的（人物性格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完善）。另一种是解剖，通过深层结构中的广泛的深刻的内涵，构成一度上的人物关系；一度上的各个元素只是观众阅读深层含义的媒介。用不断剥离剖析的方法，将人物的内心意识逐步打开，使观众从而理解深层的东西（人物性格相对静止，基本不变）。

《黑炮》的构成形式属于第二种。影片采取了经理李任重为第一视点的方法，形成时空交错的特点。影片一共有四个时空：

1. 现在时

2. 过去时（同年）

叙述

3. 过去时（去年）

4. 李任重的心理时空（闪入与其他厂领导周玉珍、武克功、王宏业的谈话）

在这四个时空中，后三个在逻辑上是服从于第一个的，其结构是完整的。倘若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二个视点，这个视点是创作者的，是一个俯视的视点（理由：解剖方式所规定）。那么这两个视点如何统一呢？解析性镜头的视点唯一性是要使观众达到感知上的认同，造成身临其境的幻觉，但是感知认同会妨碍联想性认同。这里出现了矛盾。好在时空交错的形式是非纪实性的结构形式，因此，《黑炮》获得了风格化处理的可能，这种可能使两种认同心理相互补充，这样，两个视点不会出现跳跃感。

非纪实性结构和风格化的可能性，成为我们构筑《黑炮》框架的突破点。我们采取了一个与小说手法完全相反的形式，用十分严肃的手法去表现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把悲剧、喜剧、正剧的三条界线打乱，利用越界产生重叠，构成一个“离经叛道”的混合体，一部多元结构的影片，追求一种幽默感，一种冷峻的幽默。这只是一种构想，但有理由这么想、这么做，“因为创造领域里的选择自由是不可限制的。”当然，创作过程中就遇到不少问题。首先我们试图保留下一个故事，但又不是情节剧，便用大段的情绪团，不时切入情节线。这些我们称作实与虚两部分，并把虚的部分（情绪团）称作具有更大创作自由度的元素。为什么这么做？两点理由：一是作为电影要不要众多的观众；二是电影要不要标新立异。说透了，是想在影片中构成几个层次：故事是最低的层次，人人看得懂，往上还有几个层次，在一个大家喜欢看的基础上，融入电影独有的影像表意功能。这部分是非情节的，它通过各个元素在结构中的作用去影响观众，它的作用不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情节，也不在

于显示技巧，而在于通过风格和富于想象的内容，揭示出一个内涵的特性。这样，使影片具有新颖的形式、丰厚的内涵和高的审美档次。所以，我们宣称要努力将影片拍成一部内涵丰富、语言通俗、理论完整、形式新颖的貌似寓言的故事。

有了要求，接下去是具体方法。举个例子说吧，影片中我们设计了两场会议，占据的时间又比较长，篇幅很大。一般说用压缩删减的方法处理，少拍为妙，因为会议要拍出名堂不容易；可这样做失去了很重要的表现机会（作为社会内容的特征），这是一个难题。我想起一位同行的话：“在我国电影中把会议拍得吸引人，拍得有味道是难度很大的。”难吗？我们偏要试一试。越难越要冒险的东西，突破和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豁出去了。

我们把会议的戏看作实与虚的交叉点，在非常实在的对话内容上采用了夸张变形的空间表现方法，机器的位置在第一场会议上采用了反常规的固定方式。会议室是搭置的景，4米宽，3.8米高，12米长，是一间狭长的、生活中没有的房间。在窗户上装上毛玻璃，白色的桌布，白色的椅子套，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所有人穿着白色的衬衣对坐在长条桌两边，甚至喝的也是白开水，一切都是白色的。冲镜头的一面墙被一面巨大的指针式石英钟占满（宽4米高3米的大钟）。只有指针和人们的头发是黑色的。摄影机架在面向大钟的中轴线上，连续拍摄了七八分钟，色彩、造型的主观化和剧中人物的言谈举止形成大反差，变成了视觉语言，这场戏的内涵都在这反常规的处理中诞生。第二次会议，随着矛盾冲突的发展，我们在白色中缀入了两件黑衣服和一件柠檬黄工装，将喝的水换成茶水，作了冲突的色彩暗示，机位又反常规地一气用了26个相同景别的中近景，最后回到最初的全景机位上。现在来看，这两场会议室的戏，银幕上的表现力较强，从造型的冲击到内容的表现，从色彩的象征到镜头的组合，都比较准确地在影片中起到了骨干作用，把写实与风格化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

电影与小说的区别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用电影处理这个题材时，应该发挥电影独具的长处，空间、运动、声音、色彩、表演……使观众感受到在其它艺术形式中不大容易感受到的东西，给人以特殊的审美享受。正是这个道理，我们才极力试图充分利用这些元素，加上情节叙述部分的功能（这不是电影的特点，戏剧、文学、甚至绘画、音乐中都有），构成我们追求的《黑炮》。

一言以蔽之，我们企图把传统情节剧的因素和现代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揉在一起，在一个新的总体构想的把握下，拍成一部有自己风格的影片，力争在思想和艺术上得到尽可能多的观众的认同。

真实性的思考

在《黑炮》整个的创作过程中，真实性的问题是我们思考的又一个重点。

什么是真实？这在电影中不那么简单，所以历来争执不休，众说纷坛。

一种是强调空间真实的和外部真实的电影形式，并把这些作为电影的内核，试图通过物质真实的对应来征服观众，内景外拍，反对搭景，反对特殊光效，反对声音变形等等。这是一种真实的概念。

毕加索说过：“艺术家必须懂得如何让人们相信虚伪中的真实。”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精神上的密切的融合或联系，那么艺术的

形式和内容一起将在观众心目中变形。所以，另一种真实的概念是强调创作者以他的作品为媒介，与观众在精神上建立联系，空间、时间、造型、声音组成的形式是精神上的心理上认同的通道，因此，空间组织不拘泥于生活，怎样能把两者之间的沟通速度和距离安排在最佳状态就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称前者是寻求物理的真实，后者是寻求心理的真实？

但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必定超越物质的。我觉得在艺术中那种依靠客观真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像一堆客观的素材，当创作者用自己的意识和方法去组织它时，它已不再是客观的了，因而也才有艺术家的不同风格。是否能够这样认为，一部影片创造的真实（不同形态的）是艺术家运用洞察力的结果。当然，那种在心理上不能掌握观众，在形态上又脱离生活的作品是另一回事情。

记得小时候，总认为童话中动物会说话是真实的，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动物说话是一种艺术手段，这种假定性是艺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使人们不去追究动物会不会说话而把注意力转向理解。电影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更逼近生活，风格化处理的难度相对大一些，但这并不等于电影的真实只有一个模式。真实在艺术中是一个主观的概念，真实性存在于对事物对历史的理解之中。所以，一个作品、一部电影的真实是建立在这一部电影和作品自己的模式上，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这些思考不可避免地带入到创作中，并驱使自己沿着这么一个思路去驾驭影片。

影片一开始是赵书信去邮局打电报，这是一件实得不能再实的事情，我们有意选择了一个线条简洁的邮局。几个镜头是这样安排的：

（全）一道闪电，大雨如注。

（大全）一辆出租汽车夏然停在前景。

片刻，赵书信从车内钻出，他胳膊下夹着一个大皮包，向邮局跑去。

（中）赵书信闯入邮局，撞在两个人身上。

（近）赵书信抬头一看。

（全）两个巨人站在面前，赵书信只到两人胸下。两巨人不满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离去，赵书信回头望望，莫名其妙地一笑，向大厅内走去。

这两个巨人的出现，实际是影片风格的一个暗示。我们想在这一对比之中，造成一种怪的感觉，造成一种风格倾向。自然，这一点是建立在实在的真实基础上的。既然《黑炮》要采用风格化的处理手法，那么物理真实是一个羁绊，它束缚造型、色彩诸元素的表现力，影片最终只有依靠心理真实才能使风格成立。情绪团的不断切入，是在用心理上的联想将观众向上拽，促使观众创造心理的发挥，形成一个游移在影片之外的思维；这里的深信不疑是观众自己的，是观众社会经验的验证。因此，《黑炮》在情节推进的安排上，真实是从实走向虚的，从物理走向心理的。赵书信打电报这是实，那一对巨人又是实上的虚；发展下去，观众不断地参与创作，他们对社会、人、历史的联想和思考重新赋予银幕以更广泛的意义，这是观众的发散思维的结果。到了影片的后半部，观众已不关心WD是什么，事故结果如何，这又是虚。影片框架架在这两个点上，像一座桥，观众从桥上走过，到达另一个境地。很明显，我们兼收了两种方法，这也许是个大杂烩吧！

想达到目的，需要具体的手段，我们采用了一些象征手法。譬如最后几场戏的安排：两辆红车离去，画面正中的大钟指在正午，钟声敲响12下，我

们组接了八个不同空间方位的太阳和一个长焦拍摄的街景，尔后是黄昏夕阳下的广场草坪。1.（全）两小男孩用砖头堆出一条长龙。

2.（中近）小男孩异常认真地堆砖头。

3.（中）两小孩起身。

4.（全）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向长龙的顶端。

5.（中）两小孩停下，抢着要堆砖。

6.（中）大孩子抢前一步推倒砖头。

7.（近）砖头一块接一块地倒下。

8.（近）大孩子高兴地笑着。

9.（近）小孩得意非凡。

10.（近）砖头一块块倒下。

11.（近）砖头一块块倒下。

12.（近）砖头一块块倒下。

13.（全）两小男孩追赶着，似乎想扶起倒下的砖头。14.（近）连续不断的砖头倒下。

15.（近）连续不断的砖头倒下。

16.（近）连续不断的砖头倒下。

17.（近）最后一块砖倒在一双大脚前。

18.（全）砖头长龙的两端站着赵书信和孩子，相互对视着。19.（近）赵书信毫无表情。

20.（近）小孩子做了个鬼脸。

21.（近）赵书信报以一笑，十分滑稽。

22.（近）小孩乐了。

23.（中近）赵书信想起什么，从皮包中摸出两块巧克力扔给孩子，招招手离去。

24.（全）两个小男孩毫不客气地将巧克力送入嘴里，又去堆砖。

25.（全）前景，小孩继续堆砖。

远方，赵书信渐渐消失。

全剧在这个镜头上结束。独立来看，这是非常生活的情景，但是放在片尾，通过结构产生了象征作用，引导观众在观看这几段时，产生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无确定方向的发散思维，形成观众审美过程中的模糊性效果。“所以，就读者角度看，象征模糊的审美意义就在于：它能唤起读者的许多思想，并很难用一个既定的概念来表达象征所引起的想象力所造成的表象；同时这种能使想象力自在的和有目的的象征具象，对于读者是‘时时新颖的，人们不会疲于欣赏它，’”（盛子潮、朱水涌《新时期小说中象征的破译和审美意义》）我觉得象征的手法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归结式，把作品总体的象征意念归结在一个具象上，例如大海、黄河、房屋等；再一种是具体的局部象征。作为封闭结构的作品，从纵向上归结的方式是恰当的；可是在开放结构中，这种手法不大适宜。《黑炮》的纵深感是依靠思想深度达到的，影片在时间上的进程极短，只能采用安置在横向上的散开的象征手法，我们自称为散点象征。不同于个别的具体象征，它有一个系列的递进安排，累积起来的意义才形成整体意念。将情节不断打断，切入情绪团，是象征手法的实际内容。譬如，舞蹈场面、会议、足球场、教堂，结尾的砖头，这些东西与情节相互补充，达到了心理真实的确立。当然，艺术中许多东西并不是理性

的，影片通过视听因素同时传递给观众许多信息，积累起来形成特殊感受，这些不大可能都条理清楚地说出来。但是，必要的理性分析和把握，相应的理论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不可能拍摄出优秀的影片来。

影片的真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观众联想的对应物，也就是说影片内容上所涉及问题的判断和表现与观众自己的判断联想在方向上要一致，不然，风格化的假定和非实在的形象就会被排斥，心理真实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改革的浪潮扑面而来，势不可挡，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这一点大家都深信不疑。但是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不能决定一切，人才是最重要的。为中国的未来准备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是历史的要求。通过《黑炮》这部影片，我们在表层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写了对知识的态度问题，深层则想表明，我们现在有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束缚我们自身，这种心态与政治的关连并不密切，它是传统文化精神造就的。于是，影片想提出，“黑炮事件”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起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种传统心理，一种形成了定势的心理制约着每一个人？譬如，周玉珍追问赵工为什么要花一块多钱的电报费去寻找一颗不值钱的棋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武克功一味搞平衡，名曰维护党委班子的团结，又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李任重心如明镜却不再抗争，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赵书信一忍再忍还回答说以后再也不下棋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几个人的心态是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搞四个现代化不抛弃这些东西行不行？

这许多问题关系着每一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发人深思的。这是影片建立自己的真实性和表现方法的基础。也正因为有这一点，影片的风格化和用其它艺术手段创造的形象，才被观众接受并在心里认定。

具体的思考

导演和演员：

通过这一部影片的实践，在导演与演员的关系上我有一些想法。

首先我觉得表演在影片构成诸元素中只是一个元素，它与其它元素（造型、色彩、音乐、运动……）处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而不是统治地位。在影片里各种不同的元素轮流出任画面的主宰。如前面谈到的结尾一场戏，多米诺骨牌式的砖头的形象含义大于演员。另外，说表演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是千真万确的，只是在电影中不好单独划开孤立来看，就像白糖放入开水中，已经溶在一起，无法分开。所以导演与演员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他对演员的责任是在演员创造基础上的把握。一位演员说得好：“这个人物成立不成立，真实不真实，导演负责；生动不生动，演员负责。”导演工作是要充分发挥演员的潜力，让演员创造，然后将其置在总体结构的合适的地方。

影片中赵书信这个人物是不太容易演的，结构本身决定了他的性格不发展，有人称他为扁平人物，再加上动作性不强，难度相当大。还有，扮演外国专家的西德演员是一位职业明星，在不少电影节上获过奖，这又为我们的演员增加了难度——东西方人的表演怎样溶为一炉、和谐一致？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使我们受益非浅。观察西德演员的表演过程，我们发现，他每一遍的重复表演都不一样，台词也不一样，拍几次几个样，但有一点，他的状态非常准，情绪非常准。我们以前习惯于在理性上把表演的层次分析得很清楚，结果，演员在镜头前去演层次，一句台词、一个眼神都不错，拍几遍，如果

导演不改变方案，肯定一模一样。这个差别不是方法的差异，是表演观念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这样做，导演和演员在一起探讨的不是每个动作的层次，而是在总体结构相应位置上出现的状态。抓住状态，只要状态对头，观众自己会解释动作。这样，演员的手脚放开了，自如了。针对这些，我有时反而提出含糊一点的要求，并提出在影片中，主题与性格要依靠一系列细节组合的对比来体现，演员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状态和细节上，不要过多地依赖冲突和表演上的技巧。

在这样的方法指导下，剧组演员的潜力大大发挥了，刘子枫与西德演员配戏，完全不靠技巧与对方抗衡（应当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而是靠自身的气质和状态去影响对方，结果效果非常好。我们在拍摄中相应地使用了两种方法：一是使用主镜头方法，为演员创造条件，用一个镜头拍下全过程；一是采用多方案拍摄，以便在后期创造更准确的状态。所以，也有人认为在拍摄现场演员只完成了表演实质的一半，另一半在剪接台上完成。

再者，还有一些感受是语言不能表达的。如第 77 场教堂中赵书信冲小女孩的一笑和结尾赵书信冲小男孩的一笑，究竟什么含义？怎么样才为准确？说不清楚。我们采用了库里肖夫效应的方法，每个笑都拍了好多条，在剪接台上寻找最合适的一条。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演员要有能力创造出这么多不同的笑。因此，我不赞成使用非职业演员。

总体把握：

德里迪里厄斯·奥班恩认为：“……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方法，对艺术品的创造和欣赏是最大的障碍。”这话有道理，只是在电影这个特殊的综合性艺术中，导演与画家、音乐家、文学家在创造作品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大量的技术因素的介入，迫使导演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使他介乎于理性与感性之间。

影片要形成一个整体，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既要构成新鲜的感觉，又要互不争抢，这就需要导演在总体上进行把握。

我们在影片中追求一种红色的基调，为此，我们改变了很多背景的颜色，如 WD 工地上几层楼房高的机器，足球场上的红色广告牌，工厂区的输送车等等。这些改变为影片创造出独特环境和构成色彩语言起了很大作用，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迷恋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迷恋感又不利于影片，这就要从大处着手，舍得放弃。譬如，工厂区的输送车，原来是蓝色的，改变一次颜色不容易，面积太大了，上面装得下两节火车皮，可我们就拍了一个镜头；回过头看，还是比较准确地完成了影片所需要的情绪。这种把握也是创造，应该说是理性的。再说，电影生产是二度创作，是把剧本分解后补充添加、重新组合排列，这又比一度创作上的理性把握要多得多。

电影思维是立体的，像一个团状的球向前滚动，里面包涵着视听两大因素，不可分割。第 79 场只有一个镜头，内容是：一架飞机似离弦之箭，射向天空。这个画面实际上是为声音而存在的，巨大的轰鸣声是要将观众从第 78 场中的思索中拽出来。这是剧作意义上的声响，画面只是为声音提供了声源。从这一点出发来说，导演的任务也就是在众多的元素中进行协调，分寸得当地使用它，将它摆在最恰当的位置上。

在分镜头剧本上，现在影片的砖头结尾是在片头的；在双片放映时，我们觉得原先的设想达不到，而且喻意很难理解，就决定放到片尾去试试，结

果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影片整个制作过程中，导演自始至终都处在时进时出的状态里。还有一点，就是导演应该把各种元素：构图、色彩、空间关系、音乐、音响纳入到剧作的高度，在结构上进行思考和安排，这样完成的影片才能形成整体，不至于形成两张皮的感觉。精心的设计，统一的构思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就像乐队的指挥，他的意义不在指挥演奏，而在于使各部分微妙地构成整体，产生撼动人心的乐曲。

影片的不足：

初出茅庐，虽想法不少，但功力不足，影片中明显地存在着很多缺陷。

首先表现在对艺术形式感的把握上还是有些犹豫，某些场面拍得太实。例如换西服一场戏，原先设计要找一间四面都是玻璃的房间拍，形成一种魔幻感，由于找不到就随便找了一间房子拍了，结果十分别扭。还有一些细节的设计欠考虑，如汉斯用计算机计算数据的动作，自己以为影片既然风格化了，计算实际只是一个符号，表示一个过程；现在看来不行，欣赏习惯使观众在这些地方追究，直接影响对影片的理解。

其次在表现方法上不成熟，很多场意思有了，可都没拍出火候。像足球场，红色的渗透，场上斗殴，意思都对，但镜头方位和调度不准确，使这场戏流于浮浅。这样的地方不少。

一部影片拍完了，在它问世之时，我们心中惴惴不安，我们盼望人们能喜欢它，能为之所动。同时作为导演队伍的一个新兵，我也诚心诚意地盼望专家、师长、同行和观众们指出它的缺点和不足，使我这个当事者能跳出迷网，反省成败，在新的影片创作中争取一点长进。

《轮回》导演阐述

每一部电影都是要说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说，也就没人拍电影了，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以载道。

《轮回》这部电影说什么呢？说的是人的事，是今天年轻人的事，人有千种万种，心有三心二意，《轮回》说的是一个男青年和他的朋友，相识之间的事和他们心里的事。

信不信由你，今天的人比中国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谁之过，谁之功，时代。回头想想 20 年前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想想今天又是什么关系？十年前谁家有个电视就不得了了，今天却司空见惯。人渐渐有了钱，心变了，关系也变了。看看剧中的石岙，前半段是一个样，后半段又一个样。腿瘸了，穷了，他的情感才沉下去了，才真切。好事？坏事？没法一下做出判断。老人常讲，50 年代人和人之间多么好？提起今天的青年就摇头，冠以名为“垮掉的一代”。年轻人就讲，过去人像工具，没有人的性格，活的太累。石岙活的够滋润得了吧，可又跳了楼，这就是生活。理想和现实，行为和心理常常是二律背反。

《轮回》大概就是说这点事，让人们在闲遐之余，无所事事之时，浪费一点精力，去想想，想得明白不明白没关系，医生说过，脑子是越用越灵。

电影是人拍的，挺累的，所以在不顶的时候，大伙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骂，哪个混蛋发明了这个鬼东西。

电影又是给人看的，坐在影院里，流泪的流泪，叹气的叹气，紧张的紧张，据说还有吓死人的事。

这么一说，电影是个人哄人的活，要让人信，让人想，活得干的绝点，不然是白费神。

现在我就绷起脸来说了。

前些日子，在京时，有几个朋友问我，《轮回》拍成什么风格？我说我不知道。过了一个多月了，我还是没想明白，习惯又逼导演非写上设想。我就现找了几个词。

《轮回》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虽悲观又乐观，在严峻现实中又蕴藏着理想，用现实手法加杂着心理现实手法拍摄的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电影。

这里面含着很大的张力。

这么一说，似乎挺复杂，实际上组里各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已心中有数。不用言传了。

既是大家干活儿，就有各种各样想法，我呢，先在这侃侃我的念头。

摄影：必须搞得有点意思。这点意思搞起来挺难的，镜头要跟人物心理结合，那运动、节奏、构图、光线也就变得有趣了。所以我强调与人物结合，要有意义的形式。

美工：天地在你手里，大家干活都在你选择的空间中，这个空间挺重要，选好了，人在里头自由自在，选不好，人在里边憋气难受，就这点，挺微妙。要仔细，要使其本身有发挥的余地。

声音和剪接：由于结构的原因，声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现实空间，要尽力创造同期效果；二是心理空间，要尽力创造对人心理施加影响的力量和感受。另外本片音乐极多，大约可长达40分钟之久，应注意与音响的配合。

剪接的基本要求是流畅，避免磕磕绊绊，希望一气呵成。

表演：依靠直觉发展感觉，以往的任何成功都不能照搬，要在人物身上生根，找到和谁都不同的精神气候。自然、舒服是基本条件而不是目的。

人物我不分析了，他们在剧本中，理念对表演似乎并无太多好处，演员去自己寻找。因为电影不是说的，是看的。

说多了就烦人，所以我也知趣。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重要，也就希望大家一条心，多流点汗，少计较些杂事，把电影拍得能哄人。

什么是电影的魅力

许久没有拍电影了，再加上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不在国内，所以，拍摄一部新电影，特别是现实题材的片子对我来讲是一件不易之事。

自去年从澳洲返回国内，我一直被一种感觉强烈地撼动着。那就是周围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我未曾体会过的生存观念和信仰的大裂变，这包括与改革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我试图去掌握它可无从下手，这使我着实在不短的时间里摸不清头绪。无奈，只好到各地走走。我去了海南、广东，又去了山东、四川，我在寻找，寻找能引起我冲动的点，寻找一种人物的原形，寻找那思考的落脚处。

记得在前些年关于文化寻根的讨论中，我始终持有一种观点，文化就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在今天的生活中，就在朴实无华的行为里，问题是我们如何将它表现出来。

通过走走看看、说说谈谈，一个事实展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传统价值观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了动摇，而这个动摇是由于钱所引起的。天大的事，可在具体人身上表现出来却平平常常，似乎只是一种生存和改变生存环境的要求。我们习以为常的轰轰烈烈无了踪影，口号无人再喊，人们开始了八小时以外的活动。这难道不是新的文化现象？新的心理现象？在这一段时间里，听到的两句话给我印象至深：人总得活着，但不会满足于活着；钱

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切引发了我的兴趣，使我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也就是为什么我一下子被邓刚的小说《左邻右舍》所吸引的原因。

将一部小说变成一部电影，工程是浩繁的。

法国让·米特里在《蒙太奇与非蒙太奇》一文中说：“电影的引人入胜是同画面形象的运动相联系的，是与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的一切相联系的……所谓引人入胜是一种接近思考的注意状态，这种思考，是在画面是充实而不是空洞的前提下假定值得思考的，是假定在某段延续时间中意识主宰着事物……意识活动是分解于迷醉之中的，而引人入胜最后也进入了一种近似吸毒以后大脑完全进入幻化的状态。”

我以为这段话最起码涉及到某种电影的实质，道出了创作者、影片和观众之间内在联系的核心问题。换言之，要把小说改编成为一部有意思的电影，一是要建立画面形象的运动和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构成方法；二是要与观众建立一种近于思考的联系，而这种结合如能产生一种活生生的形象并将观众带入阅读的幻觉，才会把电影变得有魅力。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首先研究《站》剧与小说的不同形态方式及构成特点。

叙事视点

电影：第三人称。

小说：第一人称。

叙事风格

电影：完全的顺序时态。

小说：大致的顺序时态和部分的插叙倒叙。

人物

电影：将所有人物明确化，增加了看门老孙头这个人物形象，组成一个群像系列。

小说：除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虚化处理。

结构

电影“跳跃的转场（共 206 场）有意对常态叙事的回避，有意破坏因果定势，形成观众可以补充想象的双层并行结构。

小说：情节的发展加上作者的议论，组为一个互补的叙事链条。

由于在改编时，我们根据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进行了上述部分的变动，加之大量细节的融入，使小说的涵义和韵味在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中得到衍生。这个转变是必须的。许多例证告诉我们，只有将文学作品的精髓真正在找到的电影独有的对应形式中负载，改编才谈得上创造。

在改编完成之后，我们摄制组进入到一个习惯的工作程序中，各个部门寻找自己在影片中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大家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有时吵得招待所的其他客人敲墙抗议。可这值得。因为，这是要决定未来电影外部形态的大事。回想以往几部戏的创作过程，我每次在这个程序中都获益匪浅。通过充分的争论，大家的观点逐渐聚合到一点，将《站》剧拍成一部有新写实主义风格的而不是虚假现实主义的作品，大家一律向后转，大步后退，藏起来，大气一点，远远地瞧，这会给影片带来一种从容，一种气度。

以往拍片前，我总会带领全组读一些书，进行比较细致的理论准备。但拍《站》剧，我连导演阐述也没有做。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觉得很难写，

不明了。影片中的人和事虽然那么贴近，但又如此不确定，使人一下子无法定论。在我有点困惑的时候，一位朋友的短信启发了我。他这样写道：“在影片中有正确，有错误，但没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这是因为，所谓正确与错误，只能说是今日所见的人际现象和今天的判断标准——个人负不了责任，只能从历史和社会中去找寻。”这段话使我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并向摄制组提出在拍摄中去发现去体会的要求，提出做平民，不做贵族的口号。

《站》剧写了一层楼里三家人的故事，这些人：人人有毛病、家家有苦衷；人人有优点、家家有真情。历史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高作家的正义与怯懦；刘干部的原则与计较；张永武的自私与诚实。这些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心理联系，但在历史的浪涛中又时时发生变化，发生倾斜和交融，导致出生活自身的丰富。可笑任他可笑，可恨任他可恨，只要艺术家不作有意识的褒贬，甚至连一点倾向性都不流露，影片的深度就会在一种原生态中繁衍膨胀，就会使众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进来，这是《站》剧构造上的一个特点，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下子感到把握不住影片而有飘移感的原因。

电影并不一定真的能让观众明白一种什么道理，虽然创作者总是希望如此。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去设法打动观众，触发他们的共鸣，通过一系列细节，活生生的原生态的细节，让观众想象、体验、参与。这种合一的创造愈接近思考，就愈会产生幻觉，产生迷醉，产生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艺术的追求有时显得很飘渺，甚至可笑，“然而离开了这样的追求就不会有人类那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的文明史”的道理，也就是电影对创造者和观众来讲那一种魅力存在的缘由。

四

《站》剧的情节发展是一种散点式的，它缺少中心事件，又没有贯穿的戏剧冲突，要将它拍成一部好看可乐又发人深思的影片该从何入手？

1. 迅速交待背景，引出人物，展开冲突。这是我们赋予影片第一本的任务，我们用了300多尺的长度来做这件事。在这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10多个人物粉墨登场并展开第一次冲突。

2. 精心选择细节，进行总体的铺排和设计。我们将饶有兴趣的细节与情节的进展进行了选择性的安排，使影片相隔几分钟就出现一次兴趣点，以此抓住观众。

3. 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的真实心态，酿成让人入围的真实生活气氛。这亦是我们提出的从生活原生态进入的创作方式。以往的创作中，我们有些影片教条地套用典型化的观念，把活生生的生活自身榨成苍白干瘪的假象。那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原生形态却绝少有人去使用，唯恐违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久而久之，便习惯了一套已成为定势的创作方法。这一次我们有意将一些原生形态搬上银幕，结果它产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可看性。

4. 掌握节奏，便于阅读。这是一条简单易行但极有成效的方法。我们大量使用了跳接的手段，进行快速的场景换切。全片共206场，超出一般影片一倍多。这样做使影片更符合当代人的心理阅读的节奏，产生一种合拍的效果，使人看起来更为舒服。

五

一部电影，不仅仅是导演的事，离开了任何一个部门的努力，都无法达

到一种艺术的境界，都将使影片的魅力荡然无存。

我非常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十分优秀的创作集体。

张晓光是厂里最年轻的摄影师之一，他感受力强，又异常用功。《站》剧70%的镜头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这就为摄影出了很大的难题，既要除去棚味，又要创造出几家人不同心情与环境的关系，在光和色上予以区别。为此，张晓光与照明师姚卓玺一起，做了许多的构想和试验。他们选择了张家冷调、高家暖调和刘干部家中性灰的色彩构成方法，并将一些色彩在三家关系的发展中进行了相互渗透。在用光上，他们极注意与剧作的结合，使影片中的心理描写和叙事都变得更微妙，更有趣。

美工师张自立是我结识的一位新朋友，我要感谢他为影片创造了一个统一和谐的空间。影片中不但三家人的住宅是搭制的，走廊、院落均是搭的景。

这是一堂从摄影棚一直搭到场地外景的布景，难度很大。美工师发挥了艺术的想象，将摄影棚、走廊与场地外景有机地连接起来，构成一堂真假难辨的制作，为拍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录音师延军、党望是两位兢兢业业的艺术工作者。《站》剧采用100%同期声录音，一方面影片必然受益，另一方面拍摄困难增多，特别是在青岛外景那100多个镜头。

回想起那一段日子乐子不少。夏日的青岛到处蝉鸣，可我们却要拍一部分春天的戏。为此，爬树打知了成了家常便饭，两位录音师常常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两位录音师虽然年轻，可多年跟从名师（一位从李岚华；一位从顾长宁）经验丰富，再加上自身的严格，从而保证了100%的同期效果，加强了影片的真实感和感染力。

剪辑师张晓冬是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伙伴，他非常了解我的想法，加之他那洗练流畅的剪接手段，将影片素材处理得很完整。

化、服、道、制片等部门的工作都是优秀的。正是有了这么多人付出的努力和血汗，才使得《站》剧得以完成，才使我们艺术的想象展开了双翅，变成了现实。

我要特别写几句关于演员和表演的话，因为在这部影片中他们表现得太突出了。

记得我刚刚定下冯巩、牛振华、达式常、傅丽莉等人来演这部戏时，有些朋友表示怀疑，认为这几位演员将很难统一在一起，加上各自的方法不同，不知会出现什么结果。

副导演杨亚洲是一位非常懂表演的人，他帮助我与演员在一起进行了细致的人物分析后，组织了两个星期的小品练习和段落练习。在这两个星期中，我们与演员之间建立了信任（这是十分重要的），达成了默契，并且寻找到了一种感觉。

开拍后，10位演员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投入，渐渐变得轻松。这种轻松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让我欣慰的是几位演员都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不断地用这些经验来丰富人物，创造出许多方案供导演选择。这种反复的碰撞会时常迸出火花，出现即兴的发挥。《站》剧有不少处精彩的东西就是这样产生的。

电影的表演说到底是一种心理旅程的外化。我不反对天才的说法，但摄制组形成一种轻松的氛围对表演无疑是有利的。只有这样，演员才不会被干

扰，演员才显得无比自信。

冯巩的聪明，达式常的稳健，牛振华的憨直，是演员自身的魅力赋予了角色的魅力。我感谢他们，还要感谢傅丽莉、张路、徐路、瞿颖、马双庆、罗京民、刘小惠，没有他们的齐心协力，这部影片一定不好看。

通过这部片子，我似乎摸到了一点表演与影片关系的窍门，可说不清楚，只好不强作总结，以免弄巧成拙。

激扬文字

并不只是边远的地方才有梦

吕晓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所谓的电影流派的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按照新闻效应或理论发现的需要被命名和宣传。其实，某个群体之被称为流派和浪潮，与其说是建立在导演们的观念兴趣、风格习惯或题材倾向趋同的基础上，不如说是由他们同此前的某种艺术传统或创作稳态的“同仇敌忾”而来，例如：没有对粉饰太平的“白色电话电影”一致的反叛，便不会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同样，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同仁们也多半是因着对战后的“优质电影”的不满才聚集在新浪潮的大旗下的。当然，除了共同的鏢靶，还有经历、年龄的类似、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的相投及对新的制片方式的认同等因素在起作用。但无论如何，它们仍然不能有效地规范群体呈现出一致的创作形态，被评论家们归纳的“流派特征”并不能掩盖流派内的个人色彩，维斯康蒂和德·西卡的气质如此不同，戈达尔和雷乃的秉赋那般的相异，以致对他们的关注不能不更多的是作为对个人的研究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流派的代表，在理论家的操作中他们总是屡屡地从“代表人物”的角色转换为个体的角色。

以这样的观点看待“第五代”的导演们，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十年来对他们的评说实在太多地偏向了共性的方面而漠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别。

我想说一个可能有欠严谨的观点，即在电影史上往往有“三个人枪手”的现象——如大仲马的小说所示的“3+1”（这里的“3”也可以是“4”、“5”……）格局，这“1”（在大仲马小说中是达达尼昂）既是群体的一分子，又是群体中的突出者，比起群体中的其他人，他的个性更为独特，与他们的区别更为鲜明。面对电影史上的大家们，我深感无力判断他们中谁是“达达尼昂”，但回眸我们自己的“第五代”群体，思维的搜索却没有太多的犹豫和停顿，直觉和理性一齐指向了一个目标说黄建新在“第五代”中是最独特的，最充分的理由是他对都市及都市人的长期的执着的关注。迄今为止，他的七部作品除了《五魁》之外，六部都是关于当代都市中人的生态和心态的。而《五魁》的拍摄除了证明作者还具备别一种才情，闪烁了他和“第五代”其他人在题材上的呼应之外，其孤立状态反倒是更映衬了他的都市视野的一以贯之。

有评论者认为黄建新创作的这种特征同他的经历有关（没有如陈凯歌那样上山下乡过），这自然不错，但更主要的正如黄建新自己近年来强调的是“对问题的思考角度不一样”所致。

在黄建新看来，文化的根是在“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身上，它并不玄乎，也不神秘，而活生生地体现在人的行为和心理上。

我不得而知在他的处女作《黑炮事件》拍摄之前他是否已有这样的认识，须知《黑炮事件》的诞生仅比《黄土地》晚一年而已，且早于《红高粱》，夹在了“第五代”的两部经典之作之间，其时向历史向传统向黄土高原“寻根”的“热”正方兴未艾，中国“西部电影”的旗号正树立不久，黄建新以另一种出身背景（并非电影学院82届的毕业生）加入到“第五代”的行列中，以写与黄土题材大相庭径的都市电影亮相，而其文化探讨的深度竟毫不见弱，这在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是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的。事实上，其时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韩小磊先生在谈及《黑炮事件》时便指出“探索民族文化心理，是否只有到古代到边远地区？《黑炮事件》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题”。

实际上，黄建新当时有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也许是受时尚（或曰浓厚的理论空气）的影响，身为导演的黄建新曾十分熟练地运用理论术语发表过不少导演阐述或总结，但是这些相当精采的论说，其历史文献的价值却远远不及他用摄影机在银幕上的任何叙写。和“第五代”其他人不同，从一开始黄建新便排斥了创造神话式寓言，自觉地充当了一名当代都市生活的目击者和书记员。都市，只有都市才最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的方向，凝聚了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冲撞，黄建新选择了都市，也就走上了一条不能自己的充满使命感的创作之路。

都市在黄建新那里远不单是一个题材的偏好，而是一种文化视野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三而一”的，除却当代、都市外，还有一个普通人。用黄建新自己的话来说他比较习惯于“从小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和人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中去发现一些问题。”“习惯于在平和之中去找人们身上那种社会赋予他的各种行为动因和心灵的矛盾，由此来发现一些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他宣布，“我要从文化角度去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这种宣言尤其体现在90年代初他的三部曲中。问题是写“小人物”（或曰普通人）早在黄建新的处女作诞生之前便盛行（以介绍前苏联电影的机会提出，又在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中得到实践），那么，黄建新的“小人物”观究竟与众不同在哪里呢？

很显然，黄建新写“小人物”并不含有同“大人物”对抗之意，而是因为“小人物”更具“日常性”，他们的生活“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根茎”，“小人物”成为文化剖析和社会剖析的一种视角。由这种写作动机出发，黄建新不打算无条件地对“小人物”给予单纯的同情和讴歌（如当年的好莱坞的弗兰克·卡普拉以“畸人喜剧”助“小人物”从道义上战胜“大人物”或是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们以“小人物”的美好心灵来反衬权势者的卑劣），黄建新宁愿让他的角色们处于“尴尬”的境地，或者如评论者说的“现代都市人心灵的潜层风景”，这风景既清晰又朦胧。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每个人包括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要被震动和裹挟，这里不可能有逃避者。正是从这些凡人小事中黄建新看出了历史动态进程中的个人命运，又从这一个之个别的命运中体现了社会和历史的主题。

就表现人的复杂性而言，新时期的文学艺术曾作出过巨大的努力，一度流行的口号“写出人的二重性”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诸如此类的口号本身却明显地缺乏科学性，人的本质并非“1+1”，甚至也不是任何的几加儿所能穷尽的。在电影创造领域，黄建新作品的人物是不能以任何艺术的教条去衡量的。作者的写作态度极为自如，黄建新对他的角色保持了间离、冷静的思考和观照，却又有所投入有所认同或谴责，正是这间离和投入之间的张力使他的人物在真实性和复杂性上达到了一个极为瞩目的高度。

然而，黄建新很清醒地认识到他在人物塑造方面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局限，早在《轮回》诞生之初，他就从创造个体人形象的角度对赵书信和石岜的形象作了认真的思考；五年之后，在一次访谈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在中国，人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性的人，个体的人还没有真正出现，还没有独立人格的出现，他意识到以前企图通过作品分析个体现象的目的实际上难以达到，在中国把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阅读的时候还未来到。这样，他但然地宣布自己写的是“社会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他不能不更多地

表现人对社会的依附，以对个体（不是个性）形象的部分放弃换取人物更多的社会涵盖率。

在创作的数量方面，第五代群体的主要人物相差无几，张艺谋作为导演有七部作品（另有担任摄影的两部和主演的三部），陈凯歌是六部，黄建新是七部。但他们间的不同同样明显，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创作速率大体是均衡的（陈基本两年一部，张大体上三年两部），黄建新则不然，十年导演的七部作品在时间上明显地被分成两大段，其间（从1988年的《轮回》和1993年的《站直啰 别趴下》）有五年的大间隔，在这个间隔的两端，创作速率均匀且高速。这种并非因为年龄、健康、改行（当领导）等原因息影那么久的现象在当代中国第一流导演中是仅有的。

作为一个已经被社会和电影史承认了的一代名导演，黄建新不会发生无片可拍或无钱拍片的问题，显然，创作的暂搁完全是其个人的自觉行为。无怪乎当时人们不甚理解处在创作势头高潮之际，意气风发方兴未艾之时的黄建新为何会去国远游闲适如此？对自己的创作，黄建新从来充满自信，即使对受到批评最多的《错位》，他也是不服输的，那写在导演阐述中的“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不愿在保守中苟安”的口号自信而悲壮地体现了一个年轻电影人的锐气和热情，但不久黄建新却说出了“电影创作靠锐气冲出旧模式”的时期已经过去。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一个面对观众面对社会充满自信的黄建新的背后还有着对一个对社会和艺术不断进行着思索、自省的黄建新，这在他的同辈人中间也差不多是仅见的。

尽管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们仍有理由认为黄建新在自我息影的几年中思考得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的现状。1993年起是他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他在这期间作品的新形态正是建立在（或者说是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社会学的思考基础上的。

不必讳言，1988年之前黄建新的公众形象是十分先锋的，无论社会观还是艺术观都是如此，社会对他的这种印象在象征本体论的《错位》出现时达到了高潮，影片流露出来的陌生化和异质性着实使社会感到一种震动。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电影的前卫热是一致的，人们如饥似渴地生吞活咽西方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电影，从中汲取多种实验性的风格技巧；同时也把西方的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的特征移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同西方社会类似的“异化”现象，以此来作为电影“现代化”的依据。毫无疑问，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乃至多少年之后看来都是必要的，非如此中国电影不能有历史的突破。但同样毫无疑问，在进行这种美学和电影观念转换的时候所提出的社会特形的依据都是牵强的。对于这种牵强，黄建新当时有所察觉，但真正有清醒认识，却是若干年后的事。

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想法总是同对这个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黄建新对当前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作了这样的分析，即他们还在为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挣扎，还远没有到高度发达、高度文明和高度经济收入、高消费下人的困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这一步，这是因为中国还处在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更不用说后工业社会。

同样，关于社会的看法又必然导致对城市性质的某种分析，黄建新认为，中国还不存在西方概念中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大体还是“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相对比较商业化的地方”。这个论断肯定会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质疑，至少中国叫城市的地方千差万别，黄建新自小长大的西安同东南沿海城市就有很大

区别，但黄建新的最终结论却是令人信服的，他由上述的观点出发，把中国城市电影的任务规定为表现“中国城市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的尴尬”。

从这样的社会阶段观及城市观出发，黄建新开始对自己以往的作品产生了新的自我评价，他修正了自己的“异化”观点，把因高度发达的工业和高速运转机制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他的创作理论库中排除，他承认自己的《错位》企图超前他说这个问题，“脚没有落在实处，浮在了空中，无法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而《错位》在国外得到的理解恰恰又反证了《错位》的错位所在。但黄建新把“异化”观点挪到了《黑炮事件》上，提出《黑炮事件》是写“政治模式对人的禁锢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感觉，写人的一种想反抗又无能为力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对于《轮回》，则认为是表现了经济生活繁衍变化物质富裕后精神生活无处着落的一种精神漂移现象。

对80年代旧作的自我的重新审视同先前的自我评价相比更明确的体现了黄建新对现世对身处的这个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至少同当年更注重个体的分析、角色的意义相比是这样。

当《站直啰 别趴下》在1993年乍一露面，人们惊讶地发现先前充满先锋性精英感的黄建新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目光平和、态度沉着却不乏狡黠幽默的黄建新，接下来的《面对面背靠背》和《打左灯向右转》巩固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印象。黄建新把他的新作规定为“表现人生百态”，一种素描式的当代中国城市人心态恍惚的记录，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干部、知识分子还是个体劳动者，都不不断地被抛出经验的轨道，投进陌生的生存境遇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黄建新时而痛楚，时而震惊，时而批判地看着思考着这一切，黄建新不外露自己的立场，却在情节和镜语中隐隐地流露出感情和情绪。80年代末，一位电影学院的老师曾对黄建新说在写人的尴尬状态时要将对这种尴尬不能把握的成分如实地表现出来。今天，在黄建新的三部曲中感觉到的却不是消极的“不能把握”，而是客观与主观、冷静与感情、间离与投入相织在一起的状态。其实，对艺术家来说不能把握的是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不应该成为放弃自己情感态度的借口。

出于这种写作立场，黄建新调整了他的创作习惯，比起以前对题材的理性思考来，他认为自己现在更多地是依靠“直觉”，凭“直觉”选择题材，凭“直觉”现场操作，因为这样做可以创造出“生动活鲜的形象和一种自在自为的感觉”。

对这所谓的“直觉”应怎么看？它和理论的思索是否矛盾？其实，对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来说，直觉都是重要的，都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直觉指向不一样，正如黄建新所说的“每个人的触角和感觉都不一样”，艺术作品视角的多样化、艺术形态的丰富多彩正是由这些不一样的直觉而来。黄建新强调的“直觉”是对先前题材理念的探求而言，黄建新对比了这中间的不同：把以前的创作方法称为“解析”式的——对一个个篇章层层剥开，现在则不然，“摆开一个生活长卷，让观众自己去看去分析”。

黄建新并不喜欢别人为他的“常态电影”捧上一顶“现实主义”的帽子，他不领情地宣布自己的影片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嘲讽和背叛”。这点不难看出——在黄建新的作品中人们很难找到任何的虚伪和粉饰。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常态电影”也偶然有异于任何的“纪实主义”，人们看得很清楚，三部曲的日常形态分明是精心构思组织的结果，仅就作品的结构而言，黄建新的“常态电影”仍一如既往地有着精心的布局——仍呈现出某种二元倾向。

如果说《黑炮事件》的二元结构体现在表层——深层的关系上，《轮回》则是情节剧和心理剧的衔接和统一，那么《站直啰 别趴下》便是喜剧和正剧的结合和互补，《面对面背靠背》则有升官得子、办公室——家庭的交织。这种二元结构形态自然不是“纪实主义”所赞同的。这样黄建新的“常态电影”从风格上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而这种以艺术加工取得真实感的做法也正是当前世界电影制作潮流的一个主要方面。

黄建新的“常态电影”的独特性是昭然的，其开创意义不亚于当年的《黑炮事件》。在80年代《黑炮事件》诞生之初，黄建新曾受到过种种的暗示，认为荒诞得不够彻底，荒诞只体现在造型还没有体现在情节、人物上。郑洞天直截了当地认为那教堂的结尾是矛盾的，一面夸张变形，一面又常规之至。或许由于这些批评，黄建新才迈出了《错位》的那一步，把他的探索推向一个极致（类似更早的吴贻弓在《城南旧事》后拍《姐姐》的情形）。现在的黄建新大约不会再受各种赞扬或批评的暗示了，但无庸讳言，在《背靠背脸对脸》取得重大成功之后，《打左灯向右转》已呈某种疲软之态，过多的调侃和琐碎的细节不由得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当初，《黑炮事件》曾引发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城市荒诞电影热，但这些影片没有一部超过《黑炮事件》所达到的高度。如今，黄建新给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震撼已达到了效果，但却不大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引发出一股什么“热”。中国电影在一定时期内将不会再有领潮者了，人们关心的倒是黄建新自身：他的下一步将如何走？他何时能给中国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惊喜？！……黄建新创作年表

- 1985年 执导影片《黑炮事件》。
获政府奖、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美工提名奖；1986年创作并导演影片《错位》；
- 1988年 导演影片《轮回》。
获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提名奖；
- 1992年 改编并执导影片《站直啰别趴下》。
获政府优秀影片奖等国际国内14项大奖；
- 1993年 导演影片《五魁》。
- 1994年 改编并导演影片《背靠背脸对脸》。
获金鸡奖最佳合拍片奖、最佳导演奖、日本福冈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18项大奖；
- 1995年 改编并导演影片《打左灯向右转》；
- 1996年 导演影片《埋伏》。

